

董必武年譜



董必武年谱

《董必武年谱》编辑组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203641

1991年12月

董必武年谱
DONGBIWU NIANPU
《董必武年谱》编纂组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mm 32开 18印张 410,000字 0,001—1,500册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73-0067-6/K·8 定价 17.00 元



董必武



1951年11月在頤和園

病中見窗外竹感賦

竹葉青，~~陳~~不黃，~~清~~枝條楚，耐嚴
霜，昭蘇美，物，~~才~~風裡更有
笋尖出土忙

六月一日

1952年手迹

目 录

一、青少年时期

1886年.....	(3)
1890年.....	(5)
1891年.....	(6)
1892年.....	(7)
1893年.....	(8)
1894年.....	(9)
1895年.....	(10)
1896年.....	(11)
1897年.....	(12)
1898年.....	(13)
1899年.....	(14)
1900年.....	(15)
1901年.....	(16)
1902年.....	(17)
1903年.....	(18)
1904年.....	(19)
1905年.....	(20)
1906年.....	(21)
1907年.....	(23)

D52 S/ - 5

1908年	(24)
1909年	(25)
1910年	(26)
二、投身辛亥革命	
1911年	(29)
1912年	(31)
1913年	(32)
1914年	(33)
1915年	(34)
1916年	(36)
1917年	(37)
1918年	(38)
三、积极创建中国共产党	
1919年	(41)
1920年	(44)
1921年	(48)
1922年	(50)
1923年	(52)
四、在大革命的洪流中	
1924年	(57)
1925年	(59)
1926年	(63)
1927年	(73)

五、赴苏学习·在中央革命根据地·长征

1928年·····	(97)
1929年·····	(99)
1930年·····	(100)
1931年·····	(101)
1932年·····	(102)
1933年·····	(103)
1934年·····	(105)
1935年·····	(107)
1936年·····	(110)
1937年·····	(112)

六、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卫

1937年 7 月·····	(117)
1938年·····	(127)
1939年·····	(142)
1940年·····	(153)
1941年·····	(162)
1942年·····	(175)
1943年·····	(180)
1944年·····	(195)
1945年·····	(222)

七、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

1945年 8 月·····	(231)
1946年·····	(237)

1947年.....	(279)
八、领导华北人民政府，支援解放战争	
1947年3月.....	(293)
1948年.....	(305)
1949年.....	(322)
九、为新中国的政权建设和法制建设呕心沥血	
1949年.....	(347)
1950年.....	(358)
1951年.....	(385)
1952年.....	(404)
1953年.....	(417)
1954年.....	(428)
1955年.....	(450)
1956年.....	(461)
1957年.....	(470)
1958年.....	(481)
十、为人民造福，鞠躬尽瘁	
1959年.....	(489)
1960年.....	(495)
1961年.....	(501)
1962年.....	(506)
1963年.....	(510)
1964年.....	(514)

1965年	(529)
1966年	(536)
1967年	(541)
1968年	(542)
1969年	(544)
1970年	(546)
1971年	(549)
1972年	(551)
1973年	(553)
1974年	(555)
1975年	(557)
后 记	(562)

一、青少年时期

一八八六年 诞生

三月五日（农历正月三十日）生于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县城南街。

按董氏族谱辈数序列^①取名贤琮。十五岁时，据《尚书·大禹谟》：“董之用威”语改名用威；取《汉书·律历志》^②“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之意，号璧伍。从事革命活动后，改用“必武”。后来以号代名。

父亲名基文，号采臣，排行第三。清朝秀才（增生）。通经史，与四叔基明（号素怀，清朝秀才，廪生。平生喜好桐城派文章）在黄安、麻城、汉口等地教书几十年。居陋食简，以清贫自守，鄙视趋炎附势，不与权贵交往。有耿直之名。母亲蔡氏，勤劳贤良，茹苦含辛，操持家务，并从事纺线织布劳动。有两姐一弟，弟名贤珏，又名觉生。

父辈兄弟八人，全家三十余人共同生活，家计由大伯基睿经

① 董氏族谱序列为：士、为、其、基、贤、良、绍、德。

② 《尚书·大禹谟》：“禹曰：‘……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俾勿坏。’”休，美好。董，监督。言善政之道，美以戒之，威以督之，歌以劝之，使政勿坏，在此三者。

③ 《汉书·律历志》：汉太初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是指日月同升，出现于阴历朔日，在我国很少见，古人附会为国家的祥瑞。

管。家无土地，主要依靠父亲、四叔教书，大伯、二伯基哲为县府造户口、田亩、粮赋册书的微薄收入，同时由五叔基聪、七叔基智买谷碾米出售，以及妇女纺线织布等维持全家生计。家境清贫。

先世原籍湖北省麻城县，祖辈迁到黄安。黄安位于湖北省东北部，距武汉百余公里。北靠大别山，与河南省的罗山、光山接界；南与新洲毗连；东临麻城，西接大悟、黄陂。老君山、天台山环绕于县境东北部；云台山、五云山绵亘于中部和西南部，构成纵横起伏的半山地、半丘陵地带。黄安后来成为黄麻起义及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发源地。

一八九零年 五 岁

父亲在黄安县城东街广善庵教书，常随玩耍。一天，父亲让塾童背诵《三字经》，有背不出的，董必武在门外朗声代答。父亲见他聪明好学，非常高兴。从此，在广善庵学塾随同读书。

一八九一年 六 岁

随父到黄安县李貌村(又名李冕二村)私塾读书。

一八九二年 七 岁

父亲受聘东张煜村张姓家塾教书，约定不带子弟入学，遂到四叔任教的黄安县城易家私塾读书。

七月 麻城县宋埠镇教堂的瑞典、意大利传教士，因欺压百姓，激起公愤，被群众打死，在附近各县颇有影响的“宋埠教案”发生。

一八九三年 八 岁

随姑父到黄安县东河寺读书。在此前后，课余借得《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水浒》、《七侠五义》等章回小说阅读。

一八九四年 九 岁

父亲在黄州府科举考试中得第一名，拔为府号，因家没钱办理，只补得无廩无职的增广生员(增生)。后拟辞去张家塾师，改教散馆，经张家挽留同意带子入学，所以未去职。董必武转到东张煜村私塾随父读书。

课外阅读《天雨花》、《孟丽君》、《二度梅》等长篇弹词、小说。

七月 中日战争即甲午战争爆发。次年四月十七日，清朝与日本政府签订《马关条约》。

一八九五年 十 岁

随父亲到麻城宋埠镇附近的张杰湾读书。

此时“宋埠教案”平息不久，群众领袖李金枸、徐全福被处决，另有多人被判刑。当地群众据教案经过，编了东路花鼓戏、皮影戏和鼓书等广为演唱，热情歌颂教案中的群众领袖。董必武看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外国传教士欺压中国人民的行为，极为愤慨，对当地群众反对教会压迫的英勇行动，深表同情。

一八九六年 十一岁

随父亲到黄安县傅董家湾读书。除认真读经书外，课外读了《西厢记》、《牡丹亭》等，喜欢这些书文词优美，很多段落都能背诵。

一八九七年 十二岁

继续在傅董家湾读书。

读《尔雅》、《说文》、《古文释义》及《左传》、《通鉴辑览》等，开始阅读历史书籍。

一八九八年 十三岁

继续在傅董家湾读书。课外阅读了《聊斋志异》等，对书中精采文句记了很多。

春 黄安地区发生灾荒，爆发了大规模抢米风潮。

四月 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呼吁救国，宣传变法。

六月 清帝光绪接受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的变法主张，从六月到九月，颁发变法法令，推行新政。慈禧太后坚决反对维新，于九月二十一日发动政变，幽禁光绪帝，谭嗣同等六人被杀害，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变法失败。

一八九九年 十四岁

随父亲转到黄安县城福生祠董家家庙的县办萃英书院读书。

课余，除翻阅父亲的藏书外，并借阅《东莱博义》、《训蒙草》等书，对学习写作受益颇多。是年，为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开始学作八股文。

一九零零年 十五岁

继续在萃英书院读书。

是年 参加县府举行的观风^①考试，得第二名。

春夏间 义和团迅速发展 to 京津地区。

八月 英、法、德、奥、俄、美、日、意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古都再遭受浩劫。

① 观风：古代派采诗官到各处采集民间歌谣，以便从中了解政情和民俗，称为“观风”。清代学政及地方官到任时，命题考试士子，也称“观风”。

一九零一年 十六岁

继续在萃英书院读书,开始学写策论及演习算术。

弟贤珏诞生。

九月 清政府与德、奥、比、西、美、英、法、意、日、荷、俄十一国
签定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一九零二年 十七岁

继续在萃英书院读书。

是年 参加县试，得“膏火”（即灯火费）的奖励。

一九零三年 十八岁

五、六月 先后参加黄安县、黄州府科举考试，都榜上有名，获得附学生员（即附生），中了秀才。

△ 在黄州府考试中，学政对考生强行搜身，考生拒绝，学政将考生饶汉堯殴打致死，激起黄州考场风潮，遭省抚台派兵镇压。董必武曾参加封锁龙门，包围贡院的斗争。

△ 中秀才返黄安时，得知乡人在县城东门外准备燃放鞭炮迎接，对这种旧习俗，不以为然，特地避开而绕道回家。

八月 赴武昌参加乡试。初到省城，感觉事事新奇。一次，路过巡抚衙门，因好奇到门口观望，被守卫诬为“窥探官衙”，遭到一顿殴打，愤而弃考回乡。“从此，恨死当官人”。

秋 赴武昌投考湖北省武普通中学堂（相当陆军中等学校），虽然文章受到主考官认可，但在面试时因穿父亲的一件旧长衫，被误认为“年纪太大”，不予录取。愤然返回黄安。

一九零四年 十九岁

在黄安县城教蒙馆，并曾在黄安县高等小学为四叔代课。

一九零五年 二十岁

春夏间 经阮毓崧介绍,赴武昌报考湖北省文普通中学堂^①。

△ 在等待入学期间,住武昌戈甲营司衙巷一间私人小屋,经常到日知会^② 阅读书报,见康有为、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立意新颖,文字生动,笔下带有感情,很感兴趣,开阔了眼界,起了积极的思想启蒙作用。在此结识了革命党人刘静庵,并常往来。

八月 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推孙中山为总理,章程确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十一月二十六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

十一月 入文普通中学堂。入学后学习刻苦努力,所作第一篇作文《伍子胥、申包胥合论》深得监督(即校长)纪钜伟赞赏,作了“锲尔不舍,他日必以文学名家”的批语。董必武因文史基础好,得以较多精力攻读英文及数理学科,考试成绩总列第一。

① 该校是由旧书院改办的中等学校,学制五年,当时学生的衣、食、住及文具等均为公费。后改为湖北省立第一中学。

② 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一九〇四年六月成立,十一月被清政府封闭。该所负责人刘静庵等暂避于武昌高家巷美国教会圣公会,并与圣公会会长胡兰亭借会中附设的阅报室,广集新书、杂志、日报,任人阅览,名曰“日知会”。不少知识分子前往阅读,革命党人常在此聚集,抨击朝政。一九〇六年二月成为秘密革命团体,名称也叫日知会。

一九零六年 二十一岁

是年 在文普通中学堂读书。对同学宋教仁、田桐等参加科学补习所（为此先后被当局开除）及上班同学查光佛等参加刘静庵领导的日知会活动，极为赞同，和其中一些人往来密切，感情很好。

二月 革命团体日知会正式成立，董必武经常参加其组织的各种革命活动。经刘静庵介绍和指点，读了《扬州十日记》^①、《嘉定屠城记》^②，对清军残暴屠戮人民群众的罪行极为痛恨，对明末烈士史可法、黄淳跃等从容殉国，深为敬佩，激发了反对清王朝统治的思想。

四月 《民报》第三号发行号外，列举《民报》与《新民丛报》之间的根本分歧十二个问题，同改良派展开激烈的论战。董必武认真研读两派文章，了解了孙中山、章太炎为首的革命派的观点和主张，经过思考鉴别，思想日渐倾向革命派民主主义主张。

① 《扬州十日记》：清扬州人王秀楚著。一六四五年清军南下，史可法率全城军民进行抵抗，坚守扬州。城破后，清兵曾大肆屠杀十天。王秀楚身历危境，就所见闻而记之。此书被清王朝列为禁书。

② 《嘉定屠城记》：清朱子素著。记叙一六四五年清军南下，嘉定人民纷起反抗，公推黄淳跃、侯峒曾为领袖，坚守城垣，奋战十天，终因众寡悬殊为清兵所破。清军泄怒，三次屠城。此书被清王朝列为禁书。

十二月 萍乡、浏阳、醴陵爆发起义，不久即失败，文普通中学堂革命党人纷纷逃离学校。

一九零七年 二十二岁

继续在文普通中学堂读书。课外曾读《红楼梦》、《花月痕》等小说，虽也记得一些较好的文词，但不感兴趣。

一月 日知会遭破坏，刘静庵等被捕。刘在庭法上劲挺不稍回曲，慷慨言中国危殆，虽遭种种残酷刑罚折磨，仍戟手指骂不绝。后瘐死狱中，被人们誉为“铁汉”。董必武对刘静庵这种英勇不屈，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极为敬仰，后来常以刘静庵为自己革命思想的启蒙老师。

一九零八年 二十三岁

文普通中学堂改称湖北省立第一中学堂，学生改为自费。董必武学业成绩优异，家庭虽然困难，但仍得到父亲、四叔支持，继续在校读书。

一九零九年 二十四岁

在湖北省立第一中学堂四年级读书。是年，提督学政令该校监督纪钜伟筹办文高等学堂，纪想把四年级作为文高等第一期学生，决定不按原规定期限毕业。学生群起反对。由于当时学校常以种种借口开除学生，同学们多有顾虑，不敢出头领导。董必武品学兼优，学校很难找到开除的借口，在被同学们推举为领导人后表示，不干则已，干就要破釜沉舟，坚决干到底。经月余斗争，终于取得胜利。

一九一零年 二十五岁

十月 在湖北省立第一中学堂修业期满，成绩是最优等中的第一名，湖广总督瑞澂保奏宣统奖为“拔贡”。想继续求学深造，但因家庭经济困难，不得不返乡教书。

十一月 和黄安县黄家田村黄俊贞结婚。后生有一子，幼年夭折。黄同情革命，大革命时期曾到武汉与董必武共同生活。后病逝。

二、投身辛亥革命



一九一一年 二十六岁

春 在麻城县立高等小学校教国文。

△ 收到纪钜伟要董必武继续入学深造的信后，复函说：“受业家无担食之粟，野无附廓之田，食指几三十人，仅赖家大人与家季父笔耕以度日，其况能有余资再为受业修业乎？此情也，五年来未尝以资上述者，恐道对人言贫之笑，貽夫子之羞也。”表示因家境贫寒，难以继续求学。

夏 经纪钜伟推荐，入武昌湖北文高等学堂读书，以在湖北省立第一中学批改一班学生作文的报酬补助学费。

△ 因学业太重，批改作文工作过繁，经济上又不能帮助家庭，不得不放弃学业，应黄州府中学校长陈逵九邀请，到该校教英文。

十月十日 湖北革命党人联络武昌新军发动反对清王朝的武装起义，辛亥革命爆发。各省纷纷响应，革命风暴迅速席卷全国，清王朝的反动统治被推翻。

十月十三日 得武昌起义消息后，立即离开黄州府中学，赶赴武汉投入辛亥革命。

十月中，下旬 到武汉时，武昌军政府已经成立，清军派兵南下反扑，起义军与清军在汉口展开激烈的争夺战。董必武在蒋翊武领导下的军务部工作，动员并带领市民群众向前线送饭送水，支

援起义军在汉口刘家庙、三道桥等地作战。董必武后来回忆：“革命军和清军作战的英勇，以及武汉市民男女老幼对革命军的帮助，那种自动馈粮食，送子弹，抬伤兵，踊跃欢欣的情形，是难以笔墨和口舌来形容的。守藩库和官钱局的是学生军，真是秋毫无犯。妇女投身革命者虽不多而能努力看护伤兵。参加革命队伍者都抱着推翻清朝政府争取革命胜利的一颗纯洁的心。这自然是民族精神的一种表现。”

十一月 汉口、汉阳失陷后，转入蒋翊武领导下的战时司令部，和潘怡如等一道，安抚武昌城内外军民，协助巩固沿江一带防线。

十二月 经同邑刘兰松推荐，和张国恩、姚汝婴到武昌军政府理财部任秘书官。

△ 和张国恩等加入同盟会，并参与重新组建同盟会湖北支部，被推为支部评议部^①评议员。

△ 奉武昌军政府命令，以理财部特派员身份赴黄冈为革命募捐筹款。不久，军政府又委派调查处理当地绅士控告黄冈知事贪污案。董必武不畏权势，力主正义，在认真查核后，证实黄冈知事并没有贪污，钱都用在建立革命队伍开支上了。如实复命，直到使此诬告案得到较公正的处理。

^① 中国同盟会总章规定，总部设总理及执行、评议、司法三部。各省设分会或支部，仿效总部设会长及执行、评议、司法三部。

一九一二年 二十七岁

一月一日 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布中华民国成立。

三月十一日 孙中山发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四月九日 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应黎元洪邀请到武汉，宣传发展交通运输和工商业。此时董必武正在黄冈，返武汉后，孙中山已经离开，未能遇见，深感遗憾。

四月 袁世凯上台后，武昌军政府改为湖北军政府，所属各部均改为司，理财部改称财政司。这时一批旧官僚进入财政司，排挤打击革命力量。董必武被派往一地方税局任职，但又另派人对其监督，故拒绝赴任。

十月 调任财政司总务科科长。在任职期间，接触了大量湖北财政经济问题，了解了辛亥革命前后湖北的财政经济状况。

十二月 湖北省议会举行第一次选举。董必武为击败旧官僚和立宪党人在地方选举中当选，在黄安南、北、中三个选区，结合同志，组织进步力量，积极参与组织领导黄安地区的竞选活动，使革命党人张国恩等当选为省议会议员。

年底 黎元洪为控制湖北军政大权，进一步排挤打击革命力量，派了一批旧官僚进入湖北军政府，取代原来的革命党人。董必武等受到排挤。

一九一三年 二十八岁

二月 被湖北军政府委任为宜昌川盐局协理。这时，因辛亥革命陷入失败深感苦闷和痛心，认为革命失败的原因是缺乏懂得革命而又有能力的人才。因此，决心出国学习。为准备留学积累学费，委任后不久，赴宜昌上任。

三月底 母亲病故，返黄安奔丧。不久得知袁世凯指使特务暗杀了宋教仁，未到宜昌返任。

七月 “二次革命”爆发后，积极参与詹大悲、潘怡如等在湖北策动军队进行的反袁活动，由于黎元洪的血腥镇压而未成，革命党人惨遭屠杀，詹大悲等纷纷逃往日本。

秋 应聘到湖北省立第一师范教英文。

一九一四年 二十九岁

一月 和张国恩、张谥英一起东渡日本留学，考入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法科，攻读法律。

七月 中华革命党在日本东京举行成立会，孙中山就任总理，并公布其手书的《中华革命党总章》。

△ 经居正介绍，和张国恩一起谒见孙中山。在谈话中孙中山说：“在失败后不要灰心短气，要再接再厉地干。革命不是侥幸可以成功的，只要在失败中得到教训，改正错误，想出好的办法来，继续革命，胜利的前途是有把握的。”听后受到很大鼓舞，和张国恩一起参加了中华革命党。

秋 孙中山在东京多次领导中华革命党讨论《革命方略》，并派人回国进行反袁武装起义。十月，中华革命党本部为讨袁发布了《告同胞书》。董必武参加了中华革命党在日本组织的革命活动。

一九一五年 三十岁

五月 袁世凯接受日本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六月 受孙中山派遣，和张国恩一起回国策动军队反袁。路过上海时，与中华革命党人潘怡如取得联系。到武汉后，发觉北洋军阀政府对革命党人的活动监视甚严，潜回黄安家中。

夏 秘密来往于黄安与武汉之间，和革命党人李愈友、张国恩等策动反袁斗争。

△ 在驻扎武昌南湖的炮兵团长李愈友处，见到在四川省武胜县当知事的友人姚汝婴的来信，当即和张国恩联名去信，揭露中国仍在北洋军阀“衮衮诸公”的反动统治之下，人民“沉郁惨淡”，被压榨得“不能出痛苦之声”；指出，若“以此为基，而建国其上，喻以累卵，尤觉不切”；并认为：“惟美国为条顿民族之殖民所组成，其程度特高，国情安定，社会已良，而后产生善良之政府。其余各国，大率类是。历史所陈，吾国亦莫逃其例。”“教育确为救亡之第一策。”表示要以谋民族和个人幸福“为心”，采取“我尽所以善之”的态度，下定“做得一分是一分”的决心，为重新改造中国而奋斗。

△ 被黄安县当局逮捕。张国恩闻讯逃脱。罪名是在日本奉孙中山之命回鄂策动李愈友起事反袁。在黄安坐牢三个月，后由陈逵九等具保获释。

九月 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名《新青年》)。

冬 袁世凯为称帝加紧镇压革命党人。和张国恩同案，再次被捕，在黄安坐牢。

十二月十二日 袁世凯发布“接受”帝位令，下令称帝，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二十五日，蔡锷联络唐继尧通电各省，宣告云南独立，并组织护国军出兵讨袁，“护国战争”爆发。

一九一六年 三十一岁

三月 袁世凯被迫撤销帝制，六月死于北京。

初夏 和张国恩一起被释放，稍后，赴武汉从事革命活动。

秋冬 湖北省议会恢复后，詹大悲出狱由上海返回武汉，被省议会以多数票推选为议长，董必武被推荐为秘书长。督军王占元唆使一伙顽固派议员，声称詹的议员资格是省议会取消的，进行阻挠反对。这样，詹大悲虽已当选为议长，但却不能就职，第一届湖北省议会后期因此一直没有议长。

一九一七年 三十二岁

二月十一日 离武汉再赴日本，参加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法科毕业考试。在日期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书籍。

三月三十一日 经考试合格后，在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正式结业。

四月 由日本返武汉，和张国恩合办律师事务所。因第一个案件办得迅速而且获得胜诉，在社会上赢得一定的声誉。

八月 偕姚汝婴赴川。过宜昌后，改乘木船进入三峡。身边带有《杜诗镜铨》、《剑南诗稿》随时阅读。两岸景色和逆水行舟的险阻，激发起他们对国家和个人前途的感慨与希望之情，互相吟诗唱和。从此，喜好作诗。

△ 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在北京执政，拒绝恢复国会和临时约法。九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政府”；十月，护法战争开始。

九至十一月 偕姚汝婴经云阳、万县、重庆到达成都，见张澜后，姚被张任命为安岳县知县。赴任途中到简阳，正值熊克武与刘存厚作战，不能前进，两人遂返成都。

十一月七日 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一九一八年 三十三岁

春 在成都，得知俄国十月革命消息后，写信给在日本的友人，探询情况，索取资料。

三月 应鄂西靖国军总司令蔡济民的邀请，和姚汝婴离成都，途经简阳、乐至、顺庆（今南充）、合川、重庆、万县等地，抵利川蔡济民部驻地。蔡留他们在总司令部任秘书职务，共谋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斗争。

十一月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是年 经常在利川县教堂中借阅英文报纸，以浓厚兴趣阅读报上有关十月革命的新闻，对人民革命的胜利深感敬佩，新思想开始在头脑中激荡。

三、积极创建中国共产党

一九一九年 三十四岁

一月中旬 赴四川万县，为靖国军蔡济民部筹款。

一月二十七日 靖国军杨春芳、唐克明两部勾结川军方化南部，乘蔡济民部无戒备，夜间袭击蔡军总司令部，蔡为了不同室操戈，隐忍退让，“宁死不战”，在出面论理时惨遭枪杀。得此消息后，立即返回利川。在与同事处理蔡济民善后事宜中，发现唐克明、方化南谋害蔡济民的密电多封，都非常愤慨。

二月至五月 受鄂西靖国军同事委托，离利川，途经武汉赴上海，向孙中山及各方面申诉蔡案。到上海后，在詹大悲等协助下，晋见了孙中山先生，会见了章太炎等各方人士，报告了蔡济民被害惨况。二月二十一日，在《大汉报》发表《鄂西靖国军总司令蔡济民利川被害始末记》。五月十七日，和靖国军成员苏成章、姚汝婴等十人联名在报上又发表公电，向广东护法政府、上海孙总裁以及云南、四川等联军司令部呼吁，申张正义，要求惩办祸首，为鄂西靖国军司令蔡济民昭雪。但解决问题要靠实力，蔡部瓦解，没了力量；孙中山虽表同情，此时已被迫辞去大元帅职务，难以相助；章太炎等人慷慨陈词，愤愤不平，却无实力；地方势力各人自保，不肯出力。申诉长期不得结果。董必武感慨万千，开始思考探索着新的革命方法和道路。

三月 湖北善后公会^①在上海成立，旅沪同乡公推董必武和

张国恩驻会主持会务。此时结识了住在湖北善后公会对面、刚由日本帝国大学留学回国的李汉俊。李几乎天天来公会和董必武、张国恩、詹大悲交谈、讨论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情况。把带来的马克思主义和关于俄国革命的外文书籍供董等阅读。渴望了解十月革命真实情况的董必武如饥似渴地研读了这些书籍。从这些交谈和研读中，逐渐认识了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同朋友们对照辛亥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切磋中国革命的方向和道路，认识到：“中国的独立，走孙中山的道路行不通，必须走列宁的道路。”

五月四日 震撼中外的伟大爱国反帝运动爆发。董必武看到五四运动孕育着人民群众极大的革命力量，受到巨大鼓舞。

△ 在“五四”运动中，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他们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

五月八日 湖北善后公会致电湖北省议会、教育会、武汉商会、汉口各团体联合会，电文称：“外交失败，败亡间不容发，请亟起主张严惩卖国党，急电巴黎专使拒绝签字，并要求列强主持公道以图挽救。”告知上海各界正开国民大会，誓死力争。

五月十八日 湖北善后公会通电各省议会、商会、各报馆、各团体及广东国会，陈述南北双方谈判代表主张，通电称：现值外交失败！国内和会忽告停顿，致对外益陷穷境，南代表蒸日书面提议八条，本会认为（是）解决时局唯一方法。北代表犹袒庇卖国贼党，

① 湖北善后公会是湖北省旅居上海的同乡组织。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国内南北军阀也开始议和，各界都在讨论解决战后的所谓“善后”问题。善后公会以研究战争结束后，中国出路为宗旨，又是带有学术性的群众团体，不同于一般的同乡会组织。

不肯容纳，是岂国民希望和平之初心所及料，务请一致主张公道，力促北方当局反省。”

五、六月 经常会晤湖北各界来上海的人士。此时结识了来上海参观的陈潭秋，互相交换了对当前斗争和未来前途的看法，畅谈了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志同道合，结下深厚友谊。

△ 潘怡如应孙中山之邀，来上海洽谈任务，准备回湖南烟溪督师出征。董必武对他说：“中国革命成功，必待新兴势力之参与，徒知利用军阀无济于事。”对其行动进行了劝告。

△ 和张国恩、詹大悲、李汉俊等商量，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应从宣传新思想、培养革命人才入手。目前能作的有两件事：一是办报纸，一是办学校。并具体筹备在湖北办一种不为军阀所掌握，而是为人民说话，向人民宣传新思想的报纸。根据这一设想，拟定了一个办《江汉日报》的募捐章程，确定了办报宗旨及组织办法，并从孙中山给自己的一百元川资中，拿出四十元钱印刷了股票、章程、宣言等，大家分头筹募基金。

八月 回到武汉，和张国恩继续筹备办报。因筹款困难，办报未成，随即和张国恩等着手筹办学校。几位同学和同乡，也极力赞助。大家商议办一所中学，校址选在湖北省教育会附近一个学校旧址，开办费由创办人捐募。董必武把自己的皮袄付当铺典当，凑足了所承担的捐款。同时，和张国恩等十一位创办人组成校董事会，决定校名为“私立武汉中学”，聘请郭肇明为董事长，刘觉民为校长，在教育厅立了案。学校各门课程的任教，首先由董事们分担。董必武教国文，陈潭秋教英文。武汉中学的开学事宜于年底全部就绪。

一九二零年 三十五岁

一月二十八日 武汉《民国新报》载文介绍私立武汉中学筹备经过。

一月 李大钊、陈独秀在北京探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不久，陈独秀到上海，和李大钊分头在南方和北方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

三月 武汉中学正式开学。该校以宣传革命思想、培养革命人才为目的，在各方面都表现出新的特点：学生的报考费与学费，都比其他学校低；教员是低薪或不支薪；教员思想进步或倾向进步，教学工作认真负责；提倡白话文；男女同校同班；组织学生会，学生对学校兴革事宜，可向校董事会提意见；各班设班主任，指导学生课外阅读报刊，关心国内外时事，启发学生的革命思想。董必武除任课外，还参加各种校务活动，和陈潭秋经常同学生、职员生活在一起。在他们的影响下，武汉中学逐步成为湖北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基地。从一九二零年春季开学到一九二八年遭桂系军阀封闭的八年中，武汉中学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播下了革命火种。

夏 指导武汉中学学生会创办《武汉中学周刊》（实为不定期刊），介绍新思想，发表反帝反封建、推动教育改革的文章。

八月 上海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并成为创建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中心。

△ 接李汉俊、刘伯垂从上海来信，信中告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并约董必武和张国恩在武汉成立共产主义组织。他们立即找陈潭秋筹建。随后又有赵子健、包惠僧^①等参加，秋季正式成立了共产主义研究小组（也称共产主义小组）。开始到纱厂、铁路、码头找工人谈话，调查工人劳动生活状况，宣传马克思主义，讲解工人阶级求解放的道理。

△ 共产主义研究小组在青年中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最初吸收入团的是董必武与陈潭秋直接影响下的张培鑫等十多名进步青年。

秋 接待俄国马迈耶夫夫妇。马迈耶夫是由李汉俊介绍从上海来武汉协助共产主义小组开展活动的。经商议准备开设一所外国语学校，请马迈耶夫以教外文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但此计划未能实现。

△ 发起召开湖北教育工作者大会，到会百余人。会议揭露了湖北旧教育会的种种弊端和会长谢石钦吞食公款等非法行为，并决定以旧的府制为单位，每府推一代表负责筹备改组教育会。

十一月初 和张国恩、李书渠等研究，正式成立武昌社会主义

① 包惠僧，湖北黄冈人。一九二零年左右，在武汉任记者。董必武和陈潭秋创建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他也参加了创建活动。不久去广州。一九二一年，他从广州到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活动。曾从事职工运动，并参加大革命活动。大革命失败后，脱离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国民党政府内政部任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在澳门致信董必武，内称在大革命失败后脱离中国共产党，跑到国民党做官，走错了路，要求人民政府给予重新学习和工作的机会。董必武指示秘书复信同意其请求。他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由澳门来北京，送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后，安排到内务部任研究员，后任参事。

青年团，确定“团的主要任务就是实现社会主义”。

十一月七日 上午九时，出席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共十八人，其中十一人为大中学校的学生，李书渠、包惠僧等也都出席了会议。董必武在会上讲话说：“自从政治战争停止以来，科学领域里出现了许多重大的变化。新思潮正在向我们扑面而来。我们该怎样对待呢？我们自然要投身到正在酝酿之中的新的运动中去。参加这场运动，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天职。我们应当去同现存旧社会（可惜我们现在正生活在它里面）的各种不合理现象进行斗争。有人会说，这是很困难的，也不是几个人力所能及的。然而，深奥的知识不也是悟透寻常事物的结果吗？难道从细微小事做起不会建树起伟大的功绩吗？譬如，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哥伦布证实了大地球形学说的正确性。在取得这些光辉的成果之前，他们经受了多么巨大的困难，作出了何等令人难以置信的努力啊！因此，我们不应当说我们人少，说我们的力量不足以着手改造社会。我们可以举出今年的‘五·四’学生运动为例，这个运动迅速发展成为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伟大革命运动，上海、武汉、九江以及天津、山东等地的工人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政治罢工，工人阶级的生活随着也有所改善。所以我们说，‘不要把我们看得分文不值’。”

十一月十四日 出席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会议，到会十九人。刘伯垂作了关于社会主义的专题发言，董必武讲了剩余价值理论，介绍了工会的组织状况，分析了近期发生罢工的原因和情况。

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很快又在各大、中学校建立起支部，组织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书籍，并到工人中宣传。在学校中也开始反对不合理的旧制度，如中华大学、武昌高师、湖北一师、湖北女

师等校先后掀起了学潮。

十一月十九日 出席武昌地方检察厅预审。湖北省旧教育协会会长谢石钦以其弟名义控告董必武、张国恩、黄负生等“诬蔑名誉，妨害秩序。”董必武、张国恩等在预审庭进一步揭露谢石钦的种种罪恶，地检厅要求谢将原案自行撤销，否则将追究谢的冒充和诬告罪，并劝董必武等不与计较。这场官司获得全胜，教育界进步势力受到莫大鼓舞。

冬 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一方面作为共产主义研究小组的公开活动阵地，另一方面吸收先进的知识分子研究马克思主义，为发展党的成员准备后备军。与此同时，和陈潭秋等先后还在青年学生中，组织了妇女读书会、青年读书会等传播新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组织。

△ 邀请李汉俊到武汉中学作社会主义问题的讲演。

一九二一年 三十六岁

是年 继续在武汉中学任教。

一月 和陈潭秋、黄负生、刘子通、李书渠等创办《武汉星期评论》，并为该刊写评论。

五月四日 组织青年学生、青年工人和农民在武昌阅马厂举行“五四”周年纪念大会，并在大会上讲话。会后，和陈潭秋等人率领群众举行游行示威。

七月 和陈潭秋代表湖北省共产主义研究小组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于七月二十三日至八月初先在上海、后转移嘉兴南湖进行，中心任务是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规定党的奋斗目标：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利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家所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指导工人运动。从此在中国出现了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董必武和李汉俊起草了给共产国际的报告。

八月 “一大”结束后返回武汉，和陈潭秋一起进一步发展党的组织，成立了中共武汉地方工委，作为湖北省党的领导机构。

△ 代表“湖北省自治筹备处”^①赴川请兵援鄂。川军总司令刘湘为了稳定西南及四川局势，防止曹、吴等北方军阀势力扩充到长江各省，决定联湘援鄂，共同出兵武汉。董必武和潘康时（潘怡如）、詹大悲等一行五人从武昌出发至夔府（今奉节），恰遇川军鄂西总司令潘正道（潘笑侯）已进军至巫山，相见后，随潘军由巫山经巴东至秭归，直逼宜昌。吴佩孚猖狂反扑，川军失利，退回巴东、巫山。后董必武代理川军鄂西司令部秘书长，组织了经建始向施南的转移。一九二二年五月奉党指示返回武汉。回来时，募集到六、七百元基金，解决了武汉中学二部校舍的建设问题。

十二月 根据中央政治局发出的《通告》，正式成立了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董必武为委员，负责财务。区委机关设在武昌黄土坡下街二十七号。

① 湖北进步分子李书城及蒋作宾等人，为反对统治着湖北的北洋军阀，以“鄂人自治”为号召，建立湖北自治筹备处，组织湖北自治军，发动“倒王”运动。1921年联络湘军进攻湖北，并请川军援助，将王占元部队击溃，王占元逃往天津，但湖北又落入北洋军阀吴佩孚的爪牙萧耀南（湖北新洲人）统治之下。

一九二二年 三十七岁

是年 继续在武汉中学任教。

一月 香港海员为反抗英国资本家的压迫剥削，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长江船员、汉阳钢铁厂工人和京汉、粤汉铁路工人在中共武汉区委领导下，也相继举行罢工，并取得了胜利。

三月 和陈潭秋一起，指导湖北女子师范学生为反对校方开除进步教师刘子通而举行的罢课，学潮持续达半年之久，终于取得了胜利。这期间，和陈潭秋为被迫离校的学潮领导人夏之栩、徐全直、袁溥之等学生补课。

夏 多次给在党领导下由夏之栩、袁溥之等举办的妇女读书会、妇女补习学校作报告，宣传妇女解放、社交公开，介绍苏联十月革命。

五月 参与领导湖北第一师范反对旧势力压迫学生的学潮，在被开除后、溺水死亡的学生的追悼会上，猛烈抨击反动势力，揭露一师当局对青年的迫害；发动学生开展斗争，驱逐顽固守旧的校长，取得胜利。董必武、钱亦石（介磐）、陈荫林等大批进步人士到第一师范任教，使一师成为革命者的重要阵地。

六月 积极发动武汉中学师生联合学界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反对曹锟军阀政府任命汤芑铭为湖北省省长。曹锟政府在群众压力下，被迫收回成命。

七月十六日至二十三日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发表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宣言，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和对象。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党在民主革命现阶段的主要奋斗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就为中国人民指明了反帝反封建的方向。

七月 因父病回黄安。不久父病故。

八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 中共中央在杭州举行中央全会，会议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民主联合阵线，推动民主革命的发展。

秋 主持武汉中学二部工作。与学生同吃同住，动员学生和教师利用课余时间到工人家中访问，了解工人生活状况。并举办“平民夜校”，吸收工人及其子弟上学，给他们讲文化课和国家大事，使“平民夜校”成了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人学习新文化的重要阵地，影响很大。

是年 在大冶铁厂建立了党的支部。这是在湖北厂矿中建立较早的一个党组织。

一九二三年 三十八岁

是年 在武汉中学工作及任教，并兼任启黄中学国文教员。

一月中旬 回黄安为父祭奠^①。在这期间为当地青年妇女办了一个“草帽传习所”，组织她们边劳动，边识字，并学习妇女求解放等道理。

一月 孙中山会晤苏俄政府代表越飞，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公开确立了国民党的联俄政策。

二月七日 军阀吴佩孚对汉口江岸、郑州、长辛店及其他各站罢工工人进行血腥镇压，造成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全路工人死伤二百五十余人，京汉铁路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和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宁死不屈，英勇就义。

二月下旬 邀请李大钊到武汉中学和湖北女权运动同盟会组织的寒假讲演会上，讲演社会主义和妇女运动问题。

春 武汉中学开始兼收女生，实行男女生同校同班。省议会为此向当局提出质问，令教育厅切实查禁，并以取消补助费相威胁。武汉中学在董必武领导下，对省议会的主张置之不理，继续坚持招收女生。

① 当时黄安的习俗，长辈去世后第一个春节要举行祭奠。

四月十二日 参与组织领导武汉各界群众反帝爱国游行示威及举行国民大会，声援北京、上海等地的“收回旅大”、“抵制日货”、“废除二十一条”的反帝运动。这一斗争振奋了武汉群众的革命情绪。

六月十二日至二十日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

夏 和陈潭秋等指导武汉中学、第一师范等校学生，利用假期回本县组织文娱宣传队、放足球队、辅导农民识字队等，开办农民夜校、农民识字班，开展教育改革、妇女解放、破除迷信等宣传活动。

秋 联络湖北教育界知名人士，联名向湖北政府提出改组湖北教育会的要求。同时，冲破重重阻力，召开了教育界师生代表大会，推选吴德峰等十余人为委员，组成湖北新教育会。并向政府提出改革旧教育、发展新教育的倡议。

十二月 李大钊到达广州，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筹备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冬 将武汉中学毕业生王健、雷绍潜等组成赴黄安党的工作组，派回黄安开展建党活动和农民工作。

是年 从武汉选派一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赴苏联学习。

四、在大革命的洪流中

一九二四年 三十九岁

是年 继续在武汉中学、湖北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并兼湖北第一师范学校训育主任和国文教员。

一月 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共武汉区委，组成直属中央领导的中共汉口地方执行委员会和武昌地方执行委员会。

一月二十日至三十日 在孙中山主持下，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

四月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派出党员帮助各省、市改组和筹建国民党组织的决定，领导筹建国民党湖北省临时省党部，担任该党部主要负责人，并主持成立了国民党汉口市临时党部。还派出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积极在各县建立国民党县党部和区党部。

五月 任中共汉口地委委员长（党的“四大”后改称书记）。新建的中共汉口地委兼管汉阳、江岸、徐家棚三处党的工作，分为汉口（两个）、徐家棚、江岸、汉阳、轮驳工会等六个小组，共四十七名党员，工运工作十分繁忙。这时，国民党湖北组织建设刚刚开始，任务极重。

夏 发动和指导武汉中学、第一师范等校的学生，分别组织各

县旅省青年促进会，利用假期回县宣传移风易俗、改革县政、革新教育，并发动农民开展反压迫反剥削的革命活动。

九月五日 在武汉召开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同盟代表大会上被推为临时主席。大会讨论了大同盟简章；和陈潭秋等十五人被选举为执行委员；决议举行“九七”（签订辛丑条约日）国耻纪念会。

九月七日 出席由武昌反帝国主义运动大同盟发起召开的武昌“九七”国耻纪念大会。被推为大会主席，主持大会并报告开会的宗旨。到会有五十多个团体代表及各界群众数千人，十几位代表在大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讲述了国耻经过，一致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会后，在阅马厂举行了示威游行。

秋 为了揭露湖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压制学生要求改革教育、开除进步学生陈卫东、艾子良等人的反动行为，特发起为被迫害致死的艾子良同学举行追悼大会，并在会上朗读了亲自写的悼词，痛斥了官僚政客对进步青年的残酷迫害。

一九二五年 四十岁

一月十二日至二十四日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指出：共产党要在国民党内和党外坚持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思想上、组织上和民众宣传上扩大左派、反对右派、争取中派。

春 按中共汉口地委和上级党组织的指示，正式离开武汉中学，专门从事党的工作和对国民党的统战工作。

二月 得潘正道信，说刘湘相邀赴川，盼董必武同去。经与陈潭秋商议，认为此行可以了解四川情况并相机做些工作，就和潘同赴四川。在四川除会见刘湘外，曾与《新蜀报》编辑肖楚女会见。

三月 孙中山在北京逝世。

△ 为了解当时北方各派势力的动向，通过刘湘介绍，偕同潘正道北上。先后到北京、奉天（今沈阳）。四月在张家口会见了冯玉祥。按照党的指示，六月初由北京回武汉。

五月三十日 五卅运动爆发，全国反帝爱国运动进一步高涨。

六月上旬 组织和领导武汉和湖北各地群众声援上海工人斗争，在湖北掀起了反帝的爱国运动。武汉学生、工人、市民和商人从六月二日起连续展开罢课、罢工、罢市和游行示威。学生在各处宣讲五卅惨案经过，揭露帝国主义的暴行。肖耀南为破坏群众斗争，强令武汉学校提前放假。董必武通过党团组织，使大批党团员

和进步学生有组织地返回各地，宣传反帝运动，使斗争普及到湖北中小城镇。并回到黄安进行革命活动，在党团代表会议上讲话提出，要办刊物，向人民进行革命教育和宣传；要掌握全县教育大权，以学校为阵地，派干部在各乡展开工作。

六月十二日 和陈潭秋等领导召开武汉各团体联席会议，声讨军阀肖耀南十一日制造的汉口屠杀案。决定组织外交后援会，坚持展开斗争。二十一日，又成立了武汉汉沪案救济会，主持捐款救济上海、武汉工人。

七月十五日至二十日 主持召开国民党湖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听取了临时省执行委员会的报告，通过了大会宣言以及教育宣传、农民运动、工人运动、青年运动等决议案，选举了省执行委员会。董必武、陈潭秋、钱介磐、张国恩、蔡以忱、吴德峰等当选为执行委员。

九、十月 和陈潭秋先后派陈荫林、蔡以忱、陈卫东、王健、王平章等以及武汉中学、一师等校学生到蒲圻、咸宁、汉川、天门、沔阳、京山、黄安、麻城、黄陂、黄冈、黄梅、襄阳、枣阳、随县等县，进行农民运动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广大农村秘密的农民协会纷纷建立。黄安的十六个村建立了农民协会，会员一千五百余人。为了培养农运干部，七月间又派聂鸿钧等人到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

秋 和陈潭秋等领导中共湖北党组织发动武汉学生、工商各界，在阅马厂召开万人大会，反对吴佩孚的苛捐杂税和盐斤加价。湖北督军兼省长肖耀南派大批军警包围会场。群众队伍以战斗姿态坚持开会，并提出“反对军阀扩军备战”，“反对盐斤加价”，“反对一切苛捐杂税”等口号。大会结束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迫使吴佩孚收回成命，为湖北三千万人民免除了额外负担。

△ 开始筹办《楚光日报》，为解决经费、房舍、人员、纸张、印刷等问题多方奔走。

冬 支持黄安旅省青年促进会，反对任命反动的县教育局长的斗争。经多方奔走，赢得胜利，迫使省教育厅收回成命，改任进步的刘运舟为黄安教育局长。

△ 派由苏联学习回国的董觉生，以特派员名义回黄安，从事农民运动和建党工作。董觉生到黄安后，和王健、雷绍潜等一起成立了中共黄安特别支部。此时，先期派回麻城开辟工作的刘文蔚、桂步蟾、蔡济璜等，也在当地成立了中共麻城特别支部。黄冈、黄陂、黄梅、汉川、沔阳、监利、荆门、鹤峰、咸宁、来凤等县先后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组织。

十一月 接到国民党中央通知，以湖北省代表身份，自筹川资赴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广州后，得知国民党中央已决定会议延迟到第二年一月一日召开，于是留住广州詹大悲寓所，等待参加会议。

十二月 为了团结、教育从湖北到广州黄埔军校等学习的青年，免受国民党右派组织的反革命团体——孙文主义学会的欺骗，和詹大悲一起发起组织湖北革命共进会。

十二月十三日 以湖北省党部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和海外各总支部、福建省党部等出席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联合通电，痛斥林森、邹鲁等在北京召集的反苏反共反对国共合作的西山会议，拥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十二月二十五日 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谈话会。

十二月二十九日 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谈话会,和邓颖超、陈其瑗、詹大悲等被推举为大会开会词草案审查委员会委员。

十二月三十一日 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得知大会将开会词改为告民众词。

一九二六年 四十一岁

一月一日至十九日 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上被选为各代表团办事处调查组干事。

一月六日 在大会讨论议案时动议：“现在反段尚未达到目的，本大会应宣言反段，并训令各党部作反段运动”，未被通过。

一月七日 在大会上被选为党务报告审查委员会委员及组织提案审查委员会委员。

一月十一日 代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向大会作《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党务工作的报告》。报告内容包括湖北省国民党组织发展、宣传、工运、农运、青运、妇运等方面的情况，以及军事、财政、民政、外交、经济五个方面的问题。并提出废除总理制，反对“同志俱乐部”及“护党委员会”，开除叛徒党员，严厉对付反革命分子，肃清反革命军队等主张。

一月十七日 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同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的共产党员有林祖涵、李大钊、吴玉章、恽代英等；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的共产党员还有毛泽东、邓颖超、屈武、夏曦等。大会重申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通过了斥责国民党右派的决议。

一月十九日 提案审查委员会对国民党西山会议派成员处理问题向大会提出报告书，这个报告书提出的弹劾方案，除对谢持、

邹鲁等永远开除党籍外，对居正、张继等仅分别给予开除党籍一年及警告处分，对戴季陶只是“拟由大会训令促其猛省”，但汪精卫仍觉太重，提出修改意见。董必武对此提出异议：“对于象居正一般人的处分，大家试设想各地党务之前途，有否困难，即可得相当意见。所以本席主张居正、石青阳应永远开除党籍。”这个提议获得大会通过。

一月二十二日 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由会议决定派驻湖北省负责指导党务。会毕返武汉。

二月 在汉口召开全省活动分子会，传达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部署工作，着重指出国民党“二大”左派占很大优势，形势于国民革命有利，但国民党的右派分子仍很嚣张，随时都可能制造事端，必须看到他们的危险性；要求大家竭力协助国民党健全地方组织，扩大左派队伍，特别要在各县开展农民运动，组织雄厚的革命力量，把国民革命推向前进。

二月十九日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决议：致电董必武，派其出席湖北省代表大会。

二月二十一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确定党应从各方面准备北伐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会议还决定北伐必经的湖南、湖北、河南等地要加紧开展群众工作。

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 以国民党中央代表身份，出席指导国民党湖北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接受全国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以及对本省政治主张，发展农民运动等决议案。会议提出召集全省人民团体代表大会，解决全省政治问题；废除督办省长制，组织委员制之省政府；统一军队；统一财政，废除苛捐杂税；保障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等十四项主张。会议期

间,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及汉口市党部联合发表宣言,反对直系军阀吴佩孚控制湖北政权,非法任命其死党陈嘉谟为湖北督办,杜锡钧为湖北省长。大会在董必武指导下,改选和补选的新的省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绝对优势,与国民党二大陈独秀、张国焘的退让方针形成鲜明的对比。根据国民党中央的决定,董必武不再任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

三月四日 在湖北全省纪念孙中山逝世周年大会的筹备会议上,被选为筹备大会总负责人。

三月上旬 湖北省农民协会秘密机关遭到破坏,委员聂鸿钧被捕。董必武和钱介磐通过上层统战关系,多方营救,聂获释。

三月二十日 《楚光日报》出版。任经理,宛希俨(共产党员,湖北黄梅人,后在江西牺牲)任主编。这是在封建军阀统治下,共产党领导在武汉创办公开发行的第一份日报。因经常刊登工农运动情况的报导,很受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读者的欢迎。

△ 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中山舰事件”。

三月二十三日 国民党中央执委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讨论董必武关于湖北省代表大会情况的报告及函请在湖北设立政治委员会湖北分会的建议。会议决定把这一问题交政治委员会决定办理。

三月下旬 在武汉中学主持追悼会,沉痛悼念在该校读书并入党,毕业后考入北京平民大学,在北洋军阀屠杀爱国群众的“三·一八”惨案中遇难的共产党员朱照曷。在追悼会上讲话说:朱照曷同学为了救国救民,英勇地牺牲了,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大家要学习他的革命精神,踏着他的血迹继续前进。

△ 秘密赴长沙。以国民党代表身份和广东国民政府代表陈

铭枢、白崇禧一同争取原直系军阀赵恒惕的第四师师长唐生智转向革命。工作获得成功，唐生智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参加了北伐战争。在长沙期间，还同湖南省党部共同商讨了迎接北伐军的问题。

四月上旬 返武汉。在向中共武汉地委及国民党省党部报告情况后，领导研究布置了湖北地区策应北伐军的工作。

四月三十日 日前，从武汉到达广州。是日，参加国民党中央执委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请求派一全权代表常驻武汉，并许其在一定限度内有经济支配权案。会议决议：将此案送交政治委员会决定。

五月四日 国民党中央执委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讨论“董必武同志请求增加《楚光日报》经费”。会议议决交财政委员会核办。

五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 出席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谭延闿、蒋介石等九人联名提出旨在限制共产党、篡夺国民党党权的《整理党务案》。张国焘按照他同陈独秀商定的让步方针，要求出席这次全会的中共党团接受。从此，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辞职，换上了国民党右派分子，蒋介石当上了中央组织部部长兼军人部长，随后又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这样蒋介石就垄断了国民党中央的党政军财大权。

五月二十日 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锋，奉命进军湖南，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七月一日，广州革命政府发出北伐宣言，九日北伐军正式出师北伐。

五月二十八日 参加国民党中央执委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五月 中共武汉地委召开党团代表大会，根据中共中央再建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的决定，改中共武汉地委为中共湖北地委，

董必武任中共湖北地委委员，主管军事工作，并继续任中共汉口地委书记。后中共湖北地委改为中共湖北区委，继续任区委委员。

六月一日 参加国民党中央执委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讨论湖北省党部、汉口市特别党部呈请的派员组织政治委员会分会一案。会议决议“交政治委员会并请董必武同志于政治委员会开会时出席说明”。

六月四日 参加国民党中央执委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六月八日 参加国民党中央执委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政治委员会的决定：不必设立湖北省政治委员会分会，而设立特种委员会，其员额以三人组成：（一）刘孝澄，（二）省党部委员一人，（三）第三人与董必武商定。其任务：（一）破坏敌人军纪，（二）特别宣传，（三）侦察军事政治消息。会议还通过董必武提出湖北省党部拟开暑期训练班案，其经费由北伐经费项下提前拨给。会后，带着军事工作人员的活动经费，由广州经上海返回武汉。

七月十一日 任湖北特种委员会主席。委员刘孝澄、潘康时尚未回汉，暂以张国恩、吴德峰代理。

七月十二日至十八日 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扩大会议。

七月十三日 国民党中央执委常委会第四十次会议，讨论了湖北省党部呈请的从速北伐、注意女子军事教育、请汪精卫销假等六项议案。会议收到了湖北省党部关于《楚光日报》编辑宛希俨、夏筠二同志突被汉口警察所拘捕，现正设法保释，并另派同志继续进行工作的电报。

七月十三日至十五日 以国民党中央派驻委员身份，出席指导国民党湖北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并在会上作了报告。会议通过了政治报告、党务报告以及对本省政治宣言等，并选举了第三届

执、监委正式和候补委员。

七月 和中共湖北党组织负责农运的陈潭秋、陈荫林等一起，发动各县，主要是北伐军进军所经各县的农民群众，准备支援和协助北伐军。

△ 在北伐军占领长沙后，率领湖北各界人民欢迎北伐军代表团到达长沙。向北伐军总司令部报告了湖北敌情，欢迎北伐军继续北进；参加长沙市举行的军民大会，并发表演讲；同时还与湖南有关方面商讨了配合和支援北伐军作战等问题。不久返回武汉。

八月二十二日 再赴长沙，出席在湖南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执监委员及湖南、湖北执行委员特别联席会议，并和邓演达联名提出促进湖北省党务具体方案，为会议通过。

八月 为配合北伐军攻占武汉，和特种委员会委员潘康时，化装察看了武汉地形及敌人军事部署，提出了作战建议，送交北伐军先遣队。叶挺率部攻打汀泗桥时，董必武组织群众配合作战。

△ 以特种委员会名义，领导并选派一些同志到直系军阀刘佐龙部（刘佐龙系肖耀南部第二师师长兼任汉口公安总司令）从事秘密工作。经争取，刘部巡缉营于九月六日缴械。

九月七日 北伐军先后攻占汉阳、汉口后，中共湖北区委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机关及部分执监委被困在武昌城内。董必武立即率领在武昌城外的国民党省党部执监委组成办事处，在汉口电报局公开办公，展开各方面的工作。

九月二十一日 和北伐军总政治部、武汉各人民团体的领导人，在汉口组织军民联欢大会，庆祝攻占汉口、汉阳胜利。

九月二十二日 在汉口华商跑马厂，主持召开军民联欢会，邓演达、郭沫若、钱介磐发表演讲。

九月 和陈潭秋等乘武昌守敌负隅顽抗，省教育厅强迫学校停课的时机，组织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及进步青年回各县开展农民运动。黄安旅省青年学生近百人回县后，在各区乡，组织农民协会，发动“反压迫剥削”、“反苛捐杂税”的斗争。

十月一日 湖北省政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定成立湖北教育讨论会，函请董必武、杨一如、钱介磐、李之欧、宛希俨、耿丹、邓初民、刘季良、周佛海等九人为会员。在这个教育讨论会中，董必武提出了许多建议。

十月五日 组织武汉各界群众万余人集会，追悼“万县惨案”死难同胞，并举行游行示威。

十月十日 北伐军攻占武昌。在攻打武昌时，董必武和中共湖北区委委员刘伯垂、武昌攻城别动队司令梁瑞堂策动武昌部分守军举行内应。

△ 出席武汉三镇双十节纪念大会，三十万人参加，在会上号召民众一致反对英帝国主义，声讨其炮击万县的野蛮罪行。晚上全市举行了提灯会。

十月十一日 率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汉口办事处到武昌阅马厂红楼公开办公，并很快组织了援助北伐军继续北伐，消灭吴佩孚、孙传芳残部的特别工作委员会。

十月 北伐军占领武昌后，董必武指导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开展组织、宣传、肃清反革命等方面的活动。并创办了血光通讯社，出版了《血光画报》。

△ 指导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和汉口市党部共同商订提出《湖北目前最低政纲》二十一条：实行民主政治，切实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等自由；肃清贪官污吏，铲除土豪劣绅，建设廉洁政府；赞助工农组织的发展，改善工农生活；废除军阀政府的一

切反动制度以及干涉工农组织的苛刻法律等。

△ 湖北广大农村在北伐战争胜利推动下，各地秘密农会迅速公开，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向不法地主和土豪劣绅展开猛烈的攻击，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被打得落花流水，农民协会成了农村的权力机关，真正做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村大革命正席卷湖北大地。城市工人运动也蓬勃发展。

十月二十日 出席武汉市民数万人在武昌公共体育场举行的欢迎北伐军大会，并任大会总指挥。大会通过追悼死难人民、阵亡将士和审判陈嘉谟、刘玉春的决议案。

十一月 为庆祝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九周年，在《楚光日报》十月革命纪念增刊上，发表《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一文。指出：十月革命开辟了世界革命的先河，为全世界被压迫民众解放的起点。它给予中国革命以极深厚的影响，使革命民众知道了中国的乱源是帝国主义在中国争夺市场，勾结它们的走狗——军阀作恶捣乱。中国要想自由解放，除了国民革命之外，除了向帝国主义作猛烈的进攻之外，当然没有更走得通的道路。同时，也使中国从事革命工作的人，认识经过了辛亥革命后不久便与反革命派妥协而终于失败的教训，并认识民众的势力，才晓得要得到自由解放、和平统一，必须唤起全国被压迫的民众共同努力奋斗。十月革命的胜利还从精神上影响了中国广大民众，一个国家要想从严重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必须有独立奋斗的精神与勇气。文章号召革命青年，要实行到民间去，向广大的群众做宣传工作，才不负庆祝十月革命的本意。

十一月十三日 在九江和耿丹、詹大悲等到林伯渠住所聚谈。

十一月十七日 和刘伯垂、詹大悲、李汉俊等在武汉翼江楼与林伯渠会见。

十一月二十日 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机关报《汉口民国日报》正式创刊，董必武任经理。宛希俨、沈雁冰等先后担任主编，毛泽民负责行政工作。该报实际上直接受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领导，以大量篇幅报导了国内外革命运动，特别是工、农运动以及妇女运动的消息，影响很大。

十二月中旬 列席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的中央特别会议。会议根据陈独秀的报告作出决议，认为“当前主要的危险是民众运动勃起日益向左，蒋介石因恐惧民众运动而日益向右，左右倾距离日远，会破裂联合阵线而危及整个国民运动”。从而规定当时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反对实行耕地农有，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不惜牺牲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去迁就蒋介石的反动要求。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进一步发展成为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的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会议通过的“湘鄂赣三省党务决议案”确定，中共湖北区委应兼汉口地委，书记为张国焘，组织汪泽楷、项英，宣传陈潭秋，民运董必武，职工李立三，农运陆沉，军事聂荣臻。

△ 指导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开办党务干部培训班，并亲自讲课。

△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正式开学后，经常到该校作政治形势报告。

十二月十三日 出席在汉口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和湖北政务委员会主席举行的座谈会议。会议决定在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未到武汉前，组成临时的中央党政联席会议，代行中央最高职权。

十二月二十六日 英国油轮“亚亚”号在黄冈团风江面蓄意撞沉我“神电”油轮，造成淹死四百余人的惨案。当天，武汉三镇数十

万群众集会示威，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暴行，董必武任武昌阅马厂会场总主席，在讲话中叙述了英帝国主义的种种侵略罪行，指出，“中国今天要想得一生路，非工农商学大联合不可”。大会通过致全国的通电，希望一致奋起，共争民族之生存，要求政府立即收回妨碍革命之租界。

△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并派邓演达赴武汉筹备，随后，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政府委员分批北上武汉；决议在武汉先行组织中央执委，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务。中央政治会议还决定在武汉设政治委员会分会，由宋庆龄、邓演达、董必武等十三人为委员。

十二月二十九日 出席二十八日成立的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确定了办公地点、经费筹备、办事机构，并着重研究了聘请学校教授的名单。

一九二七年 四十二岁

一月一日 以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临时联席会议代表的身份,和宋庆龄等人参加武昌人民为庆祝元旦、庆祝北伐胜利和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决定迁鄂,在武汉南湖机场举行的阅兵典礼大会。

一月一日至十三日 出席国民党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被推为主席团成员、决议案和宣言的起草委员会主任委员,并亲自负责起草省民会议的文件,自始至终领导了大会的工作。这次大会是在北伐军攻占武汉后,国民党已公开活动的新形势下召开的,四十四个县派了正式代表参加,代表全省三万余国民党员。董必武在开幕词中指出:我们革命的目的是求中国自由平等。有些幼稚同志,以为现在晋、陕、浙、贵克服就是革命的成功;殊不知要使中国一切经济政治均不受外人束缚,然后才能成功。“我们现在革命,是民主势力向封建势力革命。封建制度的铲除,不仅在打倒军阀,还要打倒封建制度的基础土豪劣绅。但要达到上列目的,必须普及农民运动。国民革命是要大多数的民众参加,就是要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参加。此为今后党务工作应注意之点。”“我们大会的责任,就是讨论如何使湖北成为革命的湖北。”七日,在大会上又作了有关省民会议的报告,随后发了省民会议宣传大纲。大会开全体会议十七次,听取了省党部及地方党部的报告,通过了政治、党

务、省民会议和农民运动等决议案，发表了大会宣言，强调：“我们的革命工作不是革某个人的命，而是革中国现在整个的社会基础的命。”“所以我们的工作，便是彻底将农村中现有的封建制度推翻”。要求全省国民党党员“认识本党工农政策的意义”，认识“本党的势力要建筑在多数的工农群众上”。还指出，湖北境内党的责任是“团结全省民众的势力，防备反革命势力进攻与袭击，而谋巩固全国革命之新根据地”。大会改选了省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董必武当选为执行委员。十三日，向大会致闭幕词，号召代表回县遵照议案一一施行。

一月三日 蒋介石等擅自决定，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另于武汉设立政治分会。

一月五日 汉口工人和市民数十万人举行大示威，收回了汉口英租界。

一月七日 下午二时，出席为“一三”、“团风”惨案^①召开的二十余万人的武昌市民反英示威大会，担任大会总主席并做报告，指出：“英帝国主义者，在此革命高潮中，竟纵使其铁舰撞沉我油轮，死者达四百余人。目前于新年庆祝会中，又无故屠杀我同胞。此种残忍手段，直欲杀尽我同胞而后已。我革命同胞，已起激烈反抗。现英租界虽收回，归我政府派军队管理，而束缚我们之一切不

^① 《汉口民国日报》一九二七年一月七日载：“一三惨案”：一九二六年末，我国革命势力伸张到长江流域，北洋军阀吴佩孚被打倒，英帝国主义在长江流域的权益随之动摇。英帝国主义为稳固其势力，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当汉口各界庆祝新年，政治学校宣传队在江汉关与英租界附近讲演之际，英帝国主义突然派大批水兵，荷枪实弹，武装登陆，并架机枪，大肆屠杀，惨死二人，重伤十余人，轻伤百余人。“团风惨案”：一九二六年末，英帝国主义者，在武汉东北团风附近之长江中，纵使其军舰，撞沉我“神电”油轮，死难四百余人。

平等条约尚多，英帝国主义者，仇视我民族利益益甚。我们要求生存，就要集中力量，继死难同胞精神，与英帝国主义者奋斗。”大会通过了维护国民政府外交政策、维护各人民团体要求等决议案。

一月上旬 对蒋介石截留第二批到达南昌的国民党中央委员，违背迁都武汉的决定，擅自决定改迁南昌；以及蒋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名义，决定设立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等分裂阴谋，坚决予以反对和拒绝。

△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决定，成立湖北省政府，省政府委员会下设厅。会议委托邓演达、徐谦、孙科、詹大悲、董必武五人，会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委会筹备组织湖北省政府。

一月十一日 得知蒋介石十二日要到国民党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国民党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特于本日通过并发表欢迎中央政府迁鄂的通电，指出：中央政府迁鄂，是中央在广州的决定，中外皆知。现武汉又为全国政治中心，民众革命情绪高涨。因此，中央政府应从速迁鄂，以寒敌胆，而厚民气。

一月十五日 主持国民党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执行委员会实行常务委员制，常务委员轮流担任主席，推董必武、钱介磐、何翼人（何羽道）为常务委员；还推定了省党部各部部长，并通电宣布就职。会议接着讨论了筹建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问题，决定送学员二百人，拨款一万六千元，推陈荫林、张国恩、李汉俊参加筹建工作。

一月十八日 出席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召集的讨论湖北省政府组成问题的会议。决定由十一人组成省政府委员会，政府设七个厅。议定了政府委员、各厅厅长人选，推孔庚等四人为筹备委员。这个决定将董必武及左派人士排斥在省政府之外，遭到中国

共产党及左派势力的反对。因此，会议结果未能实现。

一月二十一日 到汉口工人运动讲习所祝贺开学。后在该所讲授农工政策课。

一月二十三日 出席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第三次执行委员会。会议审定和讨论了妇女协会拟办妇女运动训练班、三省农讲所地址等二十余项议案。在讨论黄梅、咸宁、通山民众要求枪决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问题时，决议报请中央临时联席会议准予执行，对农民的革命要求给予了积极支持。

一月二十四日 就任湖北省中小学教师党义研究所所长，在开学典礼上致词：我们的教育是要因社会要求而进行教育，尤其是要把教育变成平民化、团体化、革命化的教育，去造就社会需要和要求的人材。认为对教师和青年知识分子灌输革命思想，是推动湖北革命运动的重要措施之一，应当尽量吸收在校教师和社会上革命青年知识分子，给以短期训练。学校开设《各国革命史》、《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三民主义》、《青年运动》、《群众运动》、《教育政策》等课程，对学员进行革命理论和革命策略的教育。并聘请恽代英、陈潭秋、宛希俨、李汉俊、詹大悲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教员。在董必武的推动和倡导下，湖北省许多县都仿效办了本地的教师党义研究所。

一月至二月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武汉为中心的声势浩大的群众反帝运动，同武汉政府的外交谈判相结合，迫使英帝国主义者不得不将汉口、九江英租界交还中国。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帝斗争所取得的重大胜利。

二月六日 主持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第七次执委会。会议讨论了请中央拨给三省农讲所经费等二十余项议案。

二月八日 出席中山大学第九次筹备会。

二月十日 出席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第八次执委会。会议讨论了发展国民党组织等议案,在讨论所谓“麻城纠纷”时,积极支持麻城农民协会的要求。

二月十三日 出席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召开的临时联席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发言。会议讨论了恢复党权,反对个人独裁等问题。

二月十六日 出席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第十七次执委会,代表湖北省党部提议用省、市两党名义去电,欢迎谭延闿即日来鄂,由会议一致通过。

二月十八日 出席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第十次执委会,被推为《县党部与县政府之关系问题》的文件起草委员会主席。

二月十九日 出席国民党省党部召集的武昌、汉口、汉阳等各级党部联席会议,为会议总主席。会议要求各级党部速开紧急会议,讨论党务宣传问题;要求中央政府迁鄂;开展恢复党权、反对独裁的运动。并决议二十四日在武昌阅马厂召开党员大会。

二月二十日 代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参加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开学典礼。

△ 列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接受二月二十一日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联席扩大会议关于三月一日以前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提议,并决定用国民党中央名义通电各地中央执监委如期到会。

二月二十三日 列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增补唐生智、蒋作宾、宋庆龄、彭泽民、吴玉章等五人为政治委员会委员。

二月二十四日 出席在武昌阅马厂召开的武汉三镇国民党党员大会,任大会总主席并致词:“今天开会为的是救党,自从中央党部

从广东出发后,有人只看见军事上的力量,看不见党的力量,只看见个人的意志,没有党的意志。革命策源地广东竟有派兵解散市党部之事,各处党部都有反动分子捣乱。中央党部不能迁鄂,汪主席也不能复职,这都是党的病象,都是老腐昏庸的反动分子把持操纵的结果。所以我们要实行党的民主化,巩固党的权威,打倒一切封建势力。”到会党员一万五千人,一致通过了“巩固中央权威,统一本党的指挥机关”、“立即召开中央全会解决党的问题”等决议,并发表了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电。

△ 下午,召开声援上海工人大罢工的群众大会。在武汉地区掀起了反对独裁、恢复党权的群众运动。

二月二十四日 列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二月二十五日 出席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第十二次执委会。会议对三十三军抢走鄂城劣绅一事作出决定:呈报中央飭令三十三军交出。

三月二日 出席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为处理阳新、监利土豪劣绅勾结土匪、焚杀党员、捣毁党部而召开的紧急会议。会议议决:(一)紧急办法:派专员会同湖北省政务委员会前往调查、设法解决;根据两县事实编写宣传大纲;召开市民大会追悼被害同志并抚恤其家属。(二)根本办法:制订惩治土豪劣绅条例,推定邓初民等三人组成起草委员会开始工作;敦促湖北省政务委员会迅速办理农民自卫军;在农民自卫军未成立以前,遇事请政务委员会派遣警卫营或卫戍司令部派兵镇压土豪劣绅暴乱。

三月四日 出席湖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开幕式和当天下午武汉市民及近郊农民为庆祝农代会召开举行的三十万人的庆祝大会,并讲话。农代会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指示,正式提出了农民土地问题,作了土地问题的决议案。会议还通过了农协组织问题、武

装问题、工农联合、县政改革等三十五个决议，选举了新的省农协领导机关。会议期间，黄安土豪劣绅向农民猖狂反扑。董必武闻讯后，急派王健返回黄安组织农民武装，打击了黄安反革命分子的凶焰，鼓舞了农民的革命斗志。

当时，全省六十九个县已有四十三个县建立了县农协或筹备处，会员达八十万以上。第一次省农代会把农民运动推向更加深入发展的阶段，到一九二七年六月，湖北农协会员已达二百五十万人。

三月六日 主持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第十五次执委会，讨论通过《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和《审判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并决定提交国民党中央执委核准后实施。

△ 《汉口民国日报》公布了《惩治土豪劣绅条例》(草案)。

三月七日 应邀到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由筹建中的三省农讲所扩大而成)做专题报告。

△ 下午，以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出席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即二届三中全会)的预备会议。积极参与会议的筹备工作。讨论中，谭延闿以所谓“要十九人到会始得开会”为借口，企图拖延会议的举行，董必武发言认为：“解释权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联席会议惯例是十六人到会即可开会，今日出席人数为十六人，当然可开。”发言得到其他人支持。会议通过是日为预备会，十日开会正式表决。会议还讨论通过了统一革命势力案(即建议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立即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合作办法)和应邀派代表团参加共产国际会议案。

△ 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提案委员会。

三月八日 《汉口民国日报》发表《从我们的立场上说出来的几句话》的社论，对蒋介石二月二十五日在《南昌革命军日报》上发

表的演说词，逐条予以批驳，重申“巩固党的权威”、“统一党的指导机关”、“实行民主政治”等主张。

三月十日 《汉口民国日报》发表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致湖北省政务委员会的信。信中历数政务委员会的作为后，指出：“半年以来，除经广大群众直接打倒之土豪劣绅外，迄未见贵会依法惩办一人。所谓依法审判，亦仅徒说斯语，是政府方面对于土豪劣绅过于优容，适予彼辈得以反动之机会。因之阳新、监利、汉川、麻城、夏口、钟祥、潜江等县，捣乱党部、焚杀党员之惨案，遂接踵而起。风声所播，蠢蠢思动者，乘机爆发，更将濒于不可收拾之势。此种责任，应由政府负之。”“诚以对反革命分子仁慈，便是对革命分子严酷。”

三月十日至十七日 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会议修订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把一切政治、军事、财政、外交等权力集中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撤消了蒋介石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组织部长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会议还作出了许多有利工农运动发展的决议，尤其是对农民运动作了《农民问题决议案》，发表了对农民宣言，确定必须竭力保障农民权利和发展农民组织，在本年内实行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临时联席会议关于减租百分之二十五的决议。

三月十二日 出席在武昌举行的纪念孙中山逝世二周年大会，并宣读大会关于铲除党内外反革命恶势力，查办暗中与帝国主义、北洋军阀联络和妥协者等决议案，被大会通过。

三月十五日 代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向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提交了《惩治土豪劣绅条例》和《审判土豪劣绅条例》，并作说明：“湖北的惩治土豪劣绅条例，系根据湖南已行之条例，足以保护农民运动。因为土豪劣绅之犯罪，为普通法律所不及。应从速颁

布。”毛泽东发言认为：“土豪劣绅必须以革命手段处置之，必须有适应革命环境与法庭。最好由农民直接行动，和平方法是不能推倒土豪劣绅的。故亟应颁布此条例，以便推行各省”。会议批准了这两个条例。

三月十六日 代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出席解决阳新惨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将主谋凶手解回阳新枪决；前县长、公安局局长押解来省，严行迅办，与阳新惨案有关的三十三军，限七日内离鄂。阳新惨案得以圆满解决。

三月十七日 蒋介石在江西九江纠合青红帮流氓捣毁国民党左派领导下的九江国民党党部和共产党领导下的总工会、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政治部，打死四人，打伤九人，强占了市党部和总工会。

三月十八日 出席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第十八次执委会。讨论宣传执行《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审判土豪劣绅暂行条例》事项；决定组织审判法庭，审判土豪劣绅；出布告宣传两个条例以打击土豪劣绅破坏农协的反革命活动。

△ 毛泽东在国民党农民部、全国农运委员会和农讲所举行的欢迎湖北、河南两省农民代表大会上讲话说：“农民利益和地主利益冲突，在湖北一派国民党同志主张农民利益。近几日中央全体会议最重要的议案是通过了惩治土豪劣绅的条例。我们要打倒土豪劣绅，就要援助这派主张农民利益的。”

三月十九日 出席由吴玉章主持的国民党第二届中执委常委会第一次扩大会议。詹大悲在会上提议将段锡朋缉拿惩办。

三月二十日 出席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第十九次执委会。会议以省党部的名义发表通电，谴责蒋介石制造九江惨案，并请中央严惩江西反动分子。会议还号召全省各县人民向国民党中央军政机关要求发放枪支子弹，以建立民众武装，巩固后方。

三月二十一日 上海工人在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参加的中共特别委员会领导下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经过三十多小时激战，打败军阀部队，占领上海。

三月二十二日 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名义通令各县党部迅速设立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

三月二十五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决定组织湖北省政府委员会。

三月二十六日 出席国民党第二届中执委常委会第三次扩大会议。

三月三十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会议，讨论由董必武、詹大悲、邓演达、吴玉章、徐谦起草的湖北省政府组织法。该组织法在广州时已公布，此次稍行修改后，由会议通过。

三月三十一日 出席湖北省政府筹备会。会议决定四月十日正式成立湖北省政府。

△ 出席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第二十一次执委会。会议鉴于“蒋介石近日摧残农工，破坏党部，入江苏后任用私人，不受中央节制，破坏行政统一，实属反动已极”，议决呈请中央执委会，免除其本兼各职。并推定董必武为庆祝中央军事委员会成立大会的主席。

四月一日 汪精卫从国外回到上海。十日到达武汉。

四月二日 出席国民党中执委常委会第五次扩大会议，欢迎国际工人代表团。

△ 蒋介石、李宗仁、李济深、黄绍竑等在上海密谋“清党”方针。

四月四日 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举行的孙中山总理纪念周会上，作《我们目前的大斗争》的长篇讲话。五、六两日《汉口民国日报》以代社论全文发表。讲话指出：目前革命势力的发展，引

起了国际间的重大变化。同时因国民党内封建势力把持，而引起国民革命的危机。认为：“我们是处在一个很严重的时期，不但是国际间的危险，而且是国内的危险，更使我们痛心的是党内的危险。”提出目前要进行反抗帝国主义和排除妥协分子的两大斗争。讲话公开指明蒋介石就是革命内部妥协分子的代表。提出：“要打倒帝国主义必先排除妥协分子；与帝国主义妥协，就是反革命。”强调“凡是革命非武装不可”，号召党员武装化，群众武装化。

△ 组织省党部专文呈报国民党中央，要求开除蒋介石的党籍。

四月八日 出席国民党第二届中执委常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讨论湖北全省总工会函请照湖南总工会例，发快枪五百枝，子弹十五万发，为工人纠察队训练班之用；另发驳壳枪二十枝，子弹四千发，为该会平时戒备之用。

四月十日 湖北省政府正式成立。政府委员为徐谦、孙科、邓演达、李汉俊、孔庚、邓希禹、恽代英、董必武、宋子文、张国恩、詹大悲；并由徐谦兼司法厅长，李汉俊兼教育厅长，孔庚兼建设厅长，董必武兼农工厅长，宋子文兼财政厅长（由詹大悲代），张国恩兼民政厅长。本日，湖北政委会宣布撤销。十三日，徐谦辞去湖北省政府委员及司法厅长。

△ 在湖北省政府成立大会上，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名义发出对省政府的训令，要求新的政府：澄清吏治、造成廉洁政府；打倒土豪劣绅，铲除封建下层势力；实行农工政策、扶助农工团体之发展；最短期内召开省民会议，尽力实现中央最近之政纲和湖北最低限度之政纲，使湖北省政府成为革命化、民主化之政府。全体省政府委员、厅长在武昌阅马厂举行就职宣誓典礼，近五十万群众到会祝贺。

△ 下午，出席省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省政府实行常务委员制，不设主席，并选举孔庚、董必武、张国恩为常务委员。会议还讨论了各厅工作人员的人选、会议制度、接受省党部训令等问题，决定发表就职通电和布告。

△ 晚上，出席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第二十五次执委会。会议再次通过决议：呈请国民党中央，迅速免除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及其它一切职务，以免其假借名义藉图反动。

四月上旬 中共中央由上海迁到武汉。

四月十二日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

四月中旬 指示《楚光日报》、《汉口民国日报》及时揭露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反革命政变，并鲜明地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指出目前中国革命的出路是：打倒蒋介石；铲除封建势力；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工农政策；拥护政府最近对土地问题的新政策；反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反对帝国主义出兵华北。

四月十五日 出席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代表湖北省党部首先发言，严厉谴责蒋介石“四·一二”在上海大屠杀，并要求国民党中央加以处置，以申党纪。会议通过决定：着即开除蒋介石党籍，免除其本兼各职，依法惩治。

四月二十日 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号召人民起来打倒蒋介石。

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九日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批评陈独秀犯了忽视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右倾错误，但没有提出任何切合当时实际的纠正右倾错误的办法。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政府和武汉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没有根据当时的危急局势，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大会仍

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

△ 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改组为湖北省执行委员会，董必武为中共湖北省执行委员会委员。

四月二十二日 《汉口民国日报》刊载了董必武和林祖涵、吴玉章、毛泽东、恽代英、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以及其他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中央候补执监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联名声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通电。

四月二十八日 出席湖北省教师党义研究所期满结业式，在致词中提出：教师在对革命理论认清的同时，要忠实、明白、勇敢、能干。

四月 抵制陈独秀对《汉口民国日报》登载工农运动消息太多的指责，指示《汉口民国日报》主编沈雁冰继续大量报导工农运动消息。

五月一日 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的身份出席武汉群众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并致词。

五月十日 出席国民党湖北省党务干部学校第二期开学典礼。在讲话中勉励学员学习革命理论，努力实际工作，认清目标，担负责任。谴责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阐明了三民主义的意义。指出：民族主义是要实现世界各民族之自由平等；民权主义即实行革命民众的政权；民生主义即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求经济之自由平等。

五月十六日 主持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第三十五次执委会。会议决定呈请国民政府迅速惩治反革命；武汉民众捕捉之土豪劣绅交由湖北省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审理等二十余项议案。

△ 出席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十二日，国民党汉阳县党部逮捕了破坏革命罪行昭著的反动分子周文轩、周

仲宣。本日会上，汪精卫竟无理地指责汉阳县党部，下令释放“二周”。董必武在发言中据理力争，主张把“二周”送交革命军事法庭裁判所处置。会后，董必武又指示在报上揭露此事，十八日，《汉口民国日报》以《汉阳县党部宣布周文轩、周仲宣罪状》为标题，公布了“二周”的反革命事实。

五月十七日 主持湖北省政府第十一次会议，会议讨论了各厅提案二十余项。

△ 晚，出席湖北省、武汉市及各民众团体举行的欢迎北伐凯旋将士宴会。

△ 武汉国民革命军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宜昌叛变，进攻武汉。武汉卫戍司令叶挺率部平叛，于十九日将叛军击退。

五月十八日 出席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提出十九日将在汉口德国球场开会，欢迎太平洋劳动代表，并举行声讨夏斗寅大会，请中央派人出席。

△ 主持召开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联席会议，讨论夏斗寅的叛变问题。会议通过了声讨夏斗寅的通电、告十四师官兵及各界宣言等文件，并决定召开武汉三镇群众大会，宣布夏斗寅叛党罪状。根据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意见，会议推定董必武、詹大悲代表省、市党部出席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

五月十九日 代表国民党省党部出席武昌群众声讨夏斗寅大会，被推为主席团成员，在演说中指出：革命民众对反动派必须与之势不两立，绝不能宽容。夏斗寅屠杀党员和工农群众，是蒋介石的小走狗。我们讨夏，便是讨蒋的一部分。

△ 下午六时，出席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和武汉市党部联席会议，提出派人慰劳讨夏前线部队，被通过。

五月二十一日 在蒋介石、汪精卫唆使下，许克祥在长沙发动

反革命政变(即马日事变)。

五月中下旬 听取王树声代表中共麻城县委关于麻城反动地主武装,屠杀革命群众,进而包围了县城,要求紧急援助的汇报。立即召开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省农协联席会议,决定组织“麻城惨案委员会”前往调查处理。并和毛泽东商定,派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军,前往镇压地主武装。又以省党部及省政府名义派正在黄安剿匪的省警卫团一个营,前往麻城协同学生军作战,迅速将麻城反动势力镇压下去。

五月二十三日 出席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在讨论清理逆产问题时,对汪精卫、谭延闿等不严厉清查北洋军阀官僚的逆产,提出严肃的批评。

五月二十五日 出席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五月二十六日 出席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第三十七次执委会会议。会议通过了省农民协会关于农民问题的提案。决定没收土豪劣绅及反革命者的土地,保障小地主及革命军人土地所有权,帮助无地贫农得到耕地及农具;进一步武装农民,保护乡村政权,镇压反动势力。

五月三十日 出席武汉三镇“五卅”惨案二周年纪念大会,被推为大会主席。在武昌会场致词指出:“自从国民革命进展到长江一带,帝国主义勾结新军阀蒋介石及旧军阀张作霖等,在各地一再向我们屠杀,企图破坏革命。所以我们最大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号召“革命的民众起来,打倒帝国主义!”

△ 晚, 出席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会上,汪精卫等反对通过国民党湖北省执行委员会呈报的《惩治贪污官吏条例》和设立湖北监察院两案,指责审判土豪劣绅,提出停止湖

南农民协会的活动,限制人民团体活动等。

五月 为回击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保卫革命成果,指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催促省农协派员赴长江上游各县,收集散存枪支,增强农民武装。并多次亲自在武汉搞枪支供给黄安、麻城的农民自卫军,促进了农民自卫军的发展。

六月一日 参加湖北省农民协会举办的农民武装训练班开学典礼。和谭平山、李汉俊、张国恩、张太雷等被聘为政治教官。该校学员为各县农协选送之农民积极分子约三百人。目的在施以政治、军事训练,培养基层农民武装骨干。

△ 在董必武等支持下,湖北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从今日起,以“勿枉勿纵”的原则,开始开庭审判土豪劣绅。

六月二日 出席湖北省政府第九次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河南光山县红枪会进攻黄安的报告,决定委派恽代英向国民党中央军委接洽,派兵支援黄安。

△ 主持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委会,研究国民党右派支持黄冈县反动势力,诬陷该县国民党县党部、县农协支持农民拒不纳税一事。(汪精卫以此为借口,六月一日曾以国民党中央名义训令湖北省党部、省政府解散黄冈县党部和农协,逮捕其负责人。)会议决定,派陈荫林赴黄冈调查处理。

六月五日 武汉国民政府解除苏联顾问鲍罗廷、加伦等一百四十余人的职务。

六月八日 代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出席国民党武昌市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致词中指出:中国革命的特点是:彻底打倒帝国主义;革命政权归革命民众,政权应操于大多数人之手;前途是向非资本主义方向发展。“此为真正三民主义之真义”。

六月十日 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等赴郑州,同冯玉祥举行

会谈，密谋反共。

六月十三日 出席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在会上就国民党右派造谣诬蔑黄冈县农民协会铲除烟草问题发言，省党部经派人调查，并没有那么一回事，希望中央再派人调查。

六月十四日 《汉口民国日报》根据董必武的指示，以《黄冈县党部县农协被无理解散经过》为题，发表陈荫林的调查报告，揭露国民党右派勾结反动势力，摧残农民运动，无理解散县党部、县农协的经过，并说明现已重新组织了县党部、县农民协会，继续开展革命运动。

六月十五日 出席武汉三镇民众举行的欢迎第二期北伐将领及武装同志大会，被推为大会主席团主席。此时正当武汉工人罢工，要求国民党中央从速下令讨伐夏斗寅。参加大会的有工人市民近百万人，使大会变成了一个向反动派的大示威。

△ 出席国民党中执委政治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六月十九日 代表湖北省政府出席省农协第一次扩大执行委员会。在致词中分析了中国的社会状况及革命性质，指出当前革命和困难形势，号召大家要克服困难，打破困难，不断地向前奋斗。

△ 出席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四十五次委员会，向会议报告了大冶同志反映该县群众被反动派残杀五百余人的情况，提出要派兵支援，派人调查，抚恤受害群众的利益的提议。据此会议议决，请军委会派兵，省党部派人调查。

△ 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在汉口举行。大会号召工人阶级同农民、小资产阶级结成坚强的同盟，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叛变，继续深入展开斗争。

六月二十日 蒋介石同冯玉祥等在徐州举行会议，更进一步

反共反苏,实行宁汉合作,武汉政治局势逐日恶化。

六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 出席国民党湖北第一次省县市党部联席会议,被推为大会主席之一。在第一次会议上作政治报告。在详细回顾了一九二六年蒋介石日趋反动及党内对蒋步步退让的事实之后指出:我们此刻唯一的出路是迅速讨伐蒋介石。并具体提出肃清土匪溃兵;建立乡村自治政权;建立农村合作社;纠正错误,改进革命工作等。会中,还起草了关于政治报告、党部与人民团体及地方政府之关系等决议案。会议通过了政治报告、党务报告等决议案,发表了声讨蒋介石、反对帝国主义出兵华北的通电等文件。

六月二十二日 鉴于汪精卫等日益摧残工农运动、打击革命势力,省内竟有三、四千工农群众被杀,而自己又屡次遭汪等无理指责,无法履行党政职责等原因,于日前以书面形式提出辞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常务委员、湖北省政府常务委员和农工厅长的职务,拒绝出席今日举行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会上,汪精卫提出托詹大悲来劝解慰留。会议决定由国民政府慰留。董必武仍请假不出席中央政治委员会。

六月二十七日 致函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第四十六次会议,称病不出席并提出辞去省党部常务委员,请另推参加中央政治委员会人选。会议经过讨论,议决慰留。

六月三十日 自今日起董必武直接领导的湖北省政府农工厅在《汉口民国日报》上连日公布工作报告,详细说明农工厅成立五十天来为整顿各地有关组织,保护农工利益所做的大量工作。

七月四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第三十四次会议。会上国民党右派指责湖北省党部对制止工农运动不力,提出“若今后再这样,连湖北省党部一起解散。”会议决定“通令整理各省农工运动。”

七月八日 出席湖北省政府第十三次会议，会议通过农工厅呈送的四月十日至五月底工作报告书议案。肯定了农工厅的工作。

七月上旬 和罗亦农、陈潭秋、钱介磐、郭述申等参加中共湖北省委在汉口召集的会议。并在会上对形势作了分析，指出进步机关被封闭，革命群众被逮捕，工人纠察队被缴枪，连儿童团的棍子也被收去，这是汪精卫即将叛变的迹象。会议确定凡在武汉已经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的同志，都要暂时离开武汉，并指名要董必武出国。

七月十日 主持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第五十次执委会。决议由由省、市两党部合组工运委员会，并议决呈请国民党中央将反革命分子周佛海开除出党、停止其监察委员职务。

七月十二日 中共中央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陈独秀停职。十三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时局的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党的反动罪行，撤退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同时发表《国民革命目前行动的政纲草案》，表示中国共产党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七月十五日 汪精卫公开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遭到失败。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迅即决定实行反抗，在南昌举行起义。

七月十八日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辞去湖北省政府委员、农工厅长和《汉口民国日报》经理的职务。辞职书中说：“钧府设立农工厅于本省，原为保护农工利益。日来工会之被蹂躏者，时有所闻；农民之被屠杀者无地无有；听之不忍，救之不能。似此情形，实属有辜重寄。现既不能奉行钧府法令，复无以慰地方人民，再四思维，惟有辞职。”严词痛斥了汪精卫的反革命罪行。

七月下旬 到九江安排输送干部。

△ 《楚光日报》遭查封。

七月二十四日 在九江会见了沈雁冰。同日返回武昌，夜十二时，和陈谭秋、李汉俊、钱亦石、何羽道、耿丹等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后楼何羽道宿舍聚会，商讨国共分裂后的形势，决定在鄂东组织武装斗争。

七月二十七日 汪精卫主持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四十一次常会，决议指斥：湖北省党务从秘密时代起就是“共产党从中组织，是共产党湖北区执行委员董必武一人包办。多数党员不是CP就是CY”^①，“虽然号称十万党员，CP和CY占过半数”，“党部受CP影响，接受了CP理论，非CP的主张不能提出，非CP的言论不敢发表”，决定要彻底改组湖北省党部和全省党务。

七月底 被汪精卫反动当局多次下令通缉，遂转入地下，坚持革命斗争。

八月一日 南昌起义爆发，和宋庆龄、邓演达、林祖涵、吴玉章、柳亚子、毛泽东、邓颖超等联名在《南昌日报》发表《中央委员宣言》，谴责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号召革命同志，集中革命势力，为反帝国主义，扫除新旧军阀，解决土地问题而奋斗。

八月七日 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在中国革命紧急关头，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

八月 和吴德峰等一起，听取了罗亦农关于“八七会议”确定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总方针等精神的传

^① CP 为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缩写。CY 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缩写。

达。旋即派人回黄安准备武装暴动。

九月至十月 毛泽东和湖南省委一起，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十月，起义军到达井冈山，展开了武装斗争。

十一月 黄安、麻城两县人民，在中共鄂东特委领导下举行了黄麻起义。董必武虽未直接参加起义，但因黄麻人民拥戴，仍以董必武名义出布告、发传单，号召工农武装起来，实行土地革命，推翻豪绅地主统治，打倒国民党蒋介石。起义军攻占了黄安县城，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黄麻起义和董必武的革命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董必武曾多次来这里开展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为这个地区培养和输送了大批的革命骨干；通过各种渠道给这个地区运送过枪支弹药，为黄麻起义和以后的武装斗争提供了极重要的条件。

十二月十一日 广州起义。由于敌人的疯狂反扑，起义失败。

十二月十七日 李汉俊、詹大悲被国民党桂系军阀胡宗铎部逮捕，并于数小时后惨遭杀害。鉴于白色恐怖日益严重，根据党的指示，经袁范宇、袁祥福等人的帮助，连夜化装成水手，乘轮船离汉口，取道上海去日本。

十二月底 抵达日本京都，避居在袁范宇的弟弟家中。

五、赴苏学习·在中央 革命根据地·长征

一九二八年 四十三岁

春 黄安老家遭国民党反动军阀查封没收，房屋被拆毁，家人离乡外逃。七婶母因体弱有病，未曾逃脱，被害致死。外甥张培鑫（中共党员）在武汉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被残忍地割头示众。

四月一日 在日本京都，撰写回忆詹大悲的文章，回顾在“五四”时期，同李汉俊、詹大悲等一起接受新思潮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经过，总结同封建军阀以及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的经验教训，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残酷杀害革命人民的反革命罪行。

夏 在日本京都和林伯渠、钱介磐、刘伯垂等人秘密往来，数次躲过日本军警的搜捕。后来钱介磐在东京与杨贤江（在日本负责党的工作，后改名李浩吾）接上关系，经杨办理护照、签证后，和钱介磐同赴苏联。

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 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举行第六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文件指出：中国的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前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大会制定了反帝反封建、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革命纲领，批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盲动主义错误。这次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缺点是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等问题认识不足。

八月 经海参崴到达莫斯科，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和徐特立、吴玉章、林伯渠、何叔衡、叶剑英等被编入年龄较大、实践经验较多的特别班。董必武喜欢和同志们交谈。常对同志们讲：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是不会长久的，只要我们共产党人深入群众，领导人民艰苦奋斗，革命运动必能再起来。还常对别人讲，“我像一块碎布，哪里有洞，党要我去补，我就去补。轰轰烈烈的工作需要人去做，补洞的工作也不可缺少，只要革命需要就应毫不犹豫地去做。”还说，“演戏有主角、配角和‘跑龙套’之分。光有主角，没有配角和龙套，戏就演不成。要演好一场戏，主角要认真演，配角和龙套也须认真演。干革命也是一样，各项工作都需要，各项工作都须认真作好。”

一九二九年 四十四岁

春 因英语基础较好，由共产国际保送到列宁学院英文班学习。该院归共产国际主管，学员有英、美、加拿大、朝鲜、中国等各国共产党骨干。课程设有：哲学、政治经济学、党的建设、国际共运、群众运动等。用俄、德、英、法等语讲授。除听课外，董必武整天在图书馆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原著，常跟别人议论说：“有学而不能者，未有不学而能者”。“人一能之，己十之；人十能之，己百之，这是我的学习信条。”这种勤奋好学、刻苦钻研的精神，得到中国同志的好评，也深受外国同志的敬佩。

是年 除自己勤奋学习外，还担任了列宁学院中国工人特别班的语文课教学和政治辅导工作。引导学员结合党的“六大”文件学习，总结中国革命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要求学员每周必须写一篇文章，亲自批阅后，综合写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讲解。因此学员们的政治、文化水平和写作能力提高得很快。深受大家的敬重，被称为革命长者。

十二月三十一日 复信给何叔衡，提供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议事日程及会上讨论的问题等有关情况。

一九三零年 四十五岁

是年 继续在列宁学院学习。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精心地研读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对“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给革命造成的严重损失，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假期曾赴工厂、农村参加实习调查。在巴库油田和列宁格勒工厂，与工人一起生活劳动后，写出的总结报告，得到学校很高评价，被誉为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优秀作品，并在全校展出。

六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会议，在李立三的主持下，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

九月 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六届三中全会，批评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

十月至十二月 中央苏区和湘鄂西、鄂豫皖红军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巩固和发展了革命根据地。

一九三一年 四十六岁

一月七日 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支持下，以执行“国际路线”，“反对李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为旗号，指责李立三为代表的错误是“左”的词句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提出一系列比李立三的冒险主义还要“左”的错误观点。从此，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统治全党达四年之久。

一月十五日 根据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决定，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县黄陂成立，指定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为委员，周恩来为书记。在周恩来未到职前，暂由项英代理。

九月十八日 日本帝国主义悍然侵占沈阳，九一八事变发生。

冬 在列宁学院毕业。由于学习成绩优异，被留校从事研究工作，并在中文班教课。

△ 因国内工作需要，中共中央决定董必武回国工作。回国前曾表示愿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

十一月七日至二十日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二十七日，在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上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一九三二年 四十七岁

一月二十八日 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国民党驻军第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要求影响下，奋起反抗。

三月 根据党中央的决定，离莫斯科回国。途经海参崴时，为寻找入境关系，停留两个月，喜遇正在远东工人列宁主义学校任教的吴玉章，相互交谈了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和变化。

六月 到达上海。先后同刘少奇、陈潭秋、潘康时等相晤，经他们介绍，对蒋介石发动的几次反革命“围剿”等情况有了初步了解。不久，经中共临时中央同意，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

七、八月间 由上海出发，经汕头、大埔、长汀，在中秋节前后到达瑞金。被分配到红军大学任上干队政委。不久，身患重病，入冬病未痊愈，就又开始工作。

一九三三年 四十八岁

一月 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在中央革命根据地进一步推行“左”倾错误路线，反对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

二月至三月 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灵活运用前三次反“围剿”中的经验，粉碎了国民党发动的对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取得重大胜利。

三月十三日 中共中央创办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即中央党校）。被调到该校任教务长，校长为洛甫，副校长为杨尚昆。后杨尚昆调离，即接任副校长，实际主持该校工作，并讲授“苏维埃建设”等课。

三月十八日 为纪念巴黎公社的创建，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举行的报告会上，作关于巴黎公社的演讲。

三月二十六日 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人民委员会第三十五次常会呈请，董必武、刘少奇被委任为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

七月十五日 在党校国家职工会支部成立大会上，作成立职工会意义及任务的报告。

八月一日 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项英等一起，出席在瑞金沙洲坝中央礼堂举行的第一次纪念“八一”建军节万人庆祝大会。

八月十三日 在党校四月班毕业典礼上致词，指出：开学的时候正是我们处在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的前夜，而今天我们已经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现在国民党蒋介石正在疯狂地布置对苏区和红军的第五次“围剿”。粉碎敌人这次新的“围剿”，争取中国苏维埃的出路，是每个学生最光荣的任务。最后，宣读了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致毕业学生的电文：“热烈欢迎党校毕业班同志到红军中来，加强红军中党的骨干，彻底粉碎国民党的五次‘围剿’”。

九月 蒋介石开始纠集一百万兵力，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领导使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遭受到重大损失。

一九三四年 四十九岁

一月十五日至十八日 出席中共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这次中央全会通过的一系列文件全面肯定四中全会以来的“左”倾错误路线，使“左”倾错误发展到顶点。全会选举董必武、刘少奇、邓发、林伯渠、邓颖超为中央党务委员会委员，董必武为书记。

一月二十二日至二月一日 出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大会听取了毛泽东作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两年来工作报告、朱德作的红军建设报告等；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等文件；选举了毛泽东、董必武等一百七十五人为中华苏维埃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选举了董必武等三十五人为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委员。

二月三日 出席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张闻天为人民委员会主席；任命董必武为临时最高法庭主席。随后又委任为最高法院院长。

三月二十五日 遵照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最高法院组织特别法庭，并任特别法庭主审，何叔衡、罗梓铭为陪审。法庭审判了渎职贪污的被告人县苏维埃主席熊仙壁。根据被告人纵容反革命分子，玩忽政府法令，贪污和包庇贪污的犯罪事实，将熊判处了徒

刑。此后，因主张办案要有一定的手续，要有必要的文字材料，要建立档案，被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人指责为“文牍主义者”。

四月 在项英调离工农检察委员会后，兼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检察委员会代理人民委员。

五月二十六日 在党的刊物《斗争》上，发表《把检举运动更广大的开展起来》的文章。阐明了检举运动的初步成绩、检举运动中的经验和怎样进一步地开展检举运动等问题。文章指出：“检举运动的目的，是在改善我们的地方机关。”“不让一个阶级异己分子、嫌疑分子及不可靠的分子，存留在任何机关内。这是保证任何机关都能适合战争需要的先决条件。”“地方机关只有在洗刷阶级异己分子、嫌疑分子和不可靠分子的过程中，逐渐健全起来，提高工作效能，改进工作作风，才能在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中起应有的作用。”

十月十日 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从瑞金出发，开始了长征。

△ 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出发时，被分配在中央总卫生部妇女队任队长，徐特立任副队长。妇女队约有妇女干部二十人左右。沿途既要雇请民工、管理担架，又要收容伤病员，并对民工及伤病员进行关照和教育。

十一月 长征开始后，秦邦宪等又在军事上犯了逃跑主义错误，使红军蒙受巨大损失。

十二月 行军到贵州黎平县城，同毛泽东相见。毛泽东发觉对董必武的工作安排不当，遂和林伯渠联系，调董必武到没收征集委员会工作。不久，又调到干部休养连任党支部书记。

十二月底 带领休养连在乌江南岸的猴场举行庆祝新年的会餐和联欢晚会，和大家一起歌唱，鼓舞干部战士的战斗情绪，表现了崇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一九三五年 五十岁

一月七日 中央红军强渡乌江，占领贵州遵义。

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 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揭发和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共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批评秦邦宪在会议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进行辩护的错误，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在组织上作了必要调整，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遵义会议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董必武听传达后，坚决拥护会议的决定，对毛泽东负责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感到无比喜悦。

一月十九日 红军离开遵义，移师北上。根据敌情变化，毛泽东等采取高度灵活的运动战方针，先后四渡赤水，在遵义歼敌两个师又八个团，三月底南渡乌江，五月初巧渡金沙江，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二、三月 在红军四渡赤水期间，反复教育干部战士要充分认识长征的意义，做好克服各种困难的思想准备。同时，组织干部战士深入群众，开展筹粮、筹款和扩大红军工作。

四月 所领导的直属连队进到贵州盘县的羊场时，遭到敌机

的轰炸，造成了一些伤亡。董必武沉着果断地处理了许多困难问题（如民工难找、伤员增加等等），随后又做了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组织连队总结经验教训，化悲痛为力量，在急速的行军中，随时作好防空准备。

五月底 在抢渡大渡河的行军路上，把马让给发烧的饲养员骑，自己在前面拉着马步行。走到一个悬崖斜坡路时，不慎人马齐往坡下滚去，幸被树木挡住，被抢救上来；赶到泸定桥时，高悬空中的铁索桥桥板已被敌人拆掉，只好用门板代替，行走时铁索摇晃，董必武、徐特立等老人匍匐前进，以惊人的毅力和红军战士一起渡过了天险大渡河。

六月 翻越夹金山时，行前专门作了动员，督促大家要多穿衣服、带点辣椒。在爬山途中，克服了年高体弱等重重困难，拉着马尾巴爬上山顶，翻过夹金山。在懋功地区，红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会师。

六月二十六日 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否定了张国焘向川康边退却的主张，明确提出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董必武到达两河口时，得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对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董必武对同志们说：张国焘向川康边退却逃跑，要分裂党，是错误的，必须斗争。党中央的方针，还是要力求争取张北上抗日。只有北上抗日，才是正确路线，中国革命才能成功。

八月一日 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宣言对推动抗日统一战线和抗日救亡运动起了积极作用。

八月 任干部团上干队政委。

九月下旬 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率领下，跋涉过荒无人烟的茫

茫草地，突破天险腊子口，翻过岷山，占领哈达铺，在榜罗镇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十月 随中央红军经过整整一年的长途跋涉，战胜了长征路上遇着的无数艰难险阻，胜利地到达了陕北。

十一月 中共中央决定在瓦窑堡恢复中央党校，董必武被任命为校长，校址设在安定第二完小。十二月初，克服了教员、干部少，缺少教室，没有桌椅板凳等各种困难，因陋就简地开始招生。在这里办了两期。第一期主要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训练班；第二期在瓦窑堡会议后，主要是传达、学习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学习会议精神。

十一月初 被中共中央指定为五人委员会^①书记，负责纠正陕北地区肃反工作扩大化的错误，主持对案件的审查。五人委员会在调查研究掌握大量事实材料的基础上，对案件一一进行了审查。月底，五人委员会在张闻天的领导下，查清了问题，平反了一些冤案，宣布刘志丹无罪，解救了刘志丹等许多好同志。

十一月二十日 出席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的土地会议。张闻天在会上作报告时指出：党在农村中的路线是消灭地主，反对富农，联合中农，依靠贫下中农，按人口平分土地。

十二月九日 北平爆发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获得了全国人民热烈的支持和声援，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的高潮。

十二月十七日 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① 五人委员会成员包括：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董必武，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中共中央保卫局长邓发（后由红军保卫局长王首道代管），中共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中革军委代表张云逸。

一九三六年 五十一岁

六月 中共中央党校由瓦窑堡迁至保安后，除担任苏维埃政权建设课程的讲授外，还到分散住在四、五个村庄的学员中，亲自抓党的工作、教学工作，经常到各村学员中了解学习、思想、生活等情况。发现问题，就及时组织有关人员讨论研究，立即改进。

八月二十五日 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书，再次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组成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抗日统一战线。

八月至十月 应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红军长征记》编辑委员会征稿，先后写了《出发前》、《从毛儿盖到班佑》、《长征中的女英雄》三篇文章。

九月十五日至十七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了目前形势和一年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确定把“反蒋抗日”改为“逼蒋抗日”。并通过了《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

十月 中共中央党校由保安迁至定边同红四方面军党校合并时，为了加强团结，对党校学员反复说明，张国焘的错误是张国焘个人的问题，决不能与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混为一谈。教育原中央党校的学员正确对待这一问题，要尊重、团结四方面军的同志。

十二月十二日 以张学良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

首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多次进谏蒋介石无效后,被迫在西安扣留蒋介石,发动西安事变。中旬,中共中央正确地分析了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并派周恩来等前往西安谈判。蒋介石被迫于二十四日接受联共抗日的条件。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推动作用,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一九三七年 五十二岁

一月 中共中央党校由定边迁至延安桥儿沟，继续担任校长，并讲授《党的建设》等课程。

二月十日 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同时提出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边区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政府实行普选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四项保证。

三月初 为培养教育第一批从全国各地、海外到延安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张学良杨虎城部下的军官，抗日军政大学四大队成立，董必武被派往四大队兼任政委。董必武针对学员的不同特点，制订教学计划，调配管理干部，组织了六个分队，进行不同形式的思想政治工作，显著地提高了学员的政治思想觉悟，为革命培养了数百名干部。

三月二十七日至三十一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揭发清算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

五月二日至十四日 出席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

《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会议批准了遵义会议以来党的政治路线，为迎接抗日战争的到来作了重要准备。

六月 在党的《解放周刊》发表《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一文，系统地论述了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三民主义，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驳斥了国民党散布的共产党必须放弃共产主义国共才能重新合作的谬论。指出：目前摆在每个中国人面前最严重和最尖锐的问题，是怎样救亡，是如何抗日，是如何动员广大的群众参加到抗日救亡战线上来，使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获得最终的胜利。这就是国共重新合作的基础。

七月 林伯渠调西安作统一战线工作后，董必武代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

夏 经李坚真介绍，与原在四方面军党校学习的何连芝结婚。

△ 向美国记者海伦·斯诺讲述了个人生平。后来，海伦·斯诺在《七十年代西行漫记》一书中称董必武“是一位有经验的老将，有着非凡的体力和生命力，并有着快乐的性格。”“曾经是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之间的联络人物之一。”并写道：“我敬重毛泽东、董必武和其他好多人，他们竭力向人们讲授真理标准。”

六、在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的前卫

七月七日 日本侵略军公然向北平郊区宛平县卢沟桥的中国驻军发动进攻，中国军队奋起英勇抵抗。全国性抗日战争开始。

七月八日 中共中央发出《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号召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呼吁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

七月十三日 卢沟桥事变后，为鄂豫皖高敬亭部与国民党停战及改编后的名义、给养、安全等问题，自延安打电报给汉口的潘怡如、张国恩，请潘、张与国民党政府武汉行营负责人何成濬进行交涉，如果何能负全责，即亲偕郑位三自延安赴汉口商洽高敬亭部有关诸问题。

七月十七日 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博古）、林伯渠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张冲、邵力子等在庐山举行会谈。中共代表提议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作为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尽速发动全国抗战。

△ 蒋介石在庐山就卢沟桥事件发表谈话，提出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沟桥事件的解决。”而把中共的提议搁置起来。

八月十三日 日本侵略军继侵略平津地区和河北大片土地之后，突然向上海发动大规模进攻，爆发了“八一三”事件。十四日，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发表“自卫抗战声明

书”。

八月十八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布《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十项条件给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的训令》，指出：两党合作必须建立在一定原则上，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使党和红军取得合法地位。红军充任战略的游击队，在总的战略方针下，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

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举行扩大会议，分析了全国抗战开始后的新形势，研究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任务和基本政策，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八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常委会决定成立“长江沿岸委员会”，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为委员，周恩来为书记。武汉工作由董必武负责。西安工作由林伯渠负责。

八月二十五日 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同国民党达成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协议后，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三个师。八月下旬至九月底，三个师的主力相继开赴山西前线抗日。九月十一日，按照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第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

八路军出师前后，中国共产党在西安、太原、上海、南京、武汉、长沙、桂林、兰州、迪化（今乌鲁木齐）、重庆、广州、香港、南宁、洛阳、贵阳等地先后公开设立八路军办事处或八路军通讯联络机构。

八月 为了对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进行革命教育，培养抗战人才，和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成仿吾、张云逸等人发起筹办陕北公学。

九月三日 毛泽东致电在上海的潘汉年：董必武日内赴鄂。随后，董必武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由延安赴武汉。

九月十日 林伯渠致电毛泽东，报告湘鄂赣红军领导人在武汉与国民党当局谈判的情况。内称：“湘鄂赣红军改为抗日第一游击支队，国民党武汉行营派副官及军需主任各一人。”随后，毛泽东致电林伯渠并正在赴武汉途中的董必武，指出：“（甲）湘鄂赣在武汉的谈判，根本错误，请兄不待董到即行通知在汉代表，停止谈判。（乙）董老已在中部途中。（丙）请告董老到鄂后，立令湘鄂赣代表回去，由傅秋涛换派新代表，否认旧谈判一切不利条件，重新提出有利条件。（丁）董老到后，坚持下列原则：（一）部队包办，国民党不得插一人。（二）一定防区，此防区背山地，有险可守，不与国民党军队及民团混杂，不争驻大地方。（三）一定的足够的饷款。（四）对鄂豫皖边区，谈判原则同上。”

九月中旬 到武汉后，立即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会见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代主席兼民政厅长严重，以及著名的国民党人士石瑛、李范一、孔庚、李书城等。筹建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并筹办《新华日报》。经过向国民党当局交涉，并得故友熊子民等的帮助，迅速将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建立起来。同时，秘密筹建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恢复和发展武汉和湖北地区党的组织。

九月十四日 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并告林伯渠、董必武及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再次批评湘鄂赣代表与国民党武汉行营谈判时的错误，指出：“统一战线中，地方党容易陷入右倾机会主义，这已成党的主要危险，请严密注意。”

九月十九日 毛泽东致电林伯渠转董必武：（一）你到武汉后设法通知傅秋涛，驱逐国民党所派人员。（二）利用有线电通报及派人送信，暂时不能配电台。

九月中、下旬 得知湘鄂赣苏区和傅秋涛领导的一支队伍的现状，发现何成濬派人去湘鄂赣有收编傅秋涛部队的企图；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高敬亭部队给养问题尚未得到解决，急需休整训练等情况，以及向国民党武汉行营何成濬交涉释放政治犯问题，三十日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

△ 指示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领导人陶铸拜访著名的国民党人士李书城、孔庚、李范一等人，开展统一战线活动。

九月二十二日 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延搁两个多月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由中国共产党倡导、推动的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九月二十八日 毛泽东、张闻天致电林伯渠：对项英、陈毅两同志处，先令董老派人联络，告以情况和政策。

十月六日 为解决鄂豫皖、湘赣、湘鄂赣三支队伍的改编问题，由武汉到达南京与国民党方面谈判。经与叶剑英、秦邦宪商议后，当日，致电毛泽东、张闻天：现在国民党“接洽改编事权不统一，枝节横生，名义乱出”，建议三支游击队统一“改名为八路军补充队”，这样，“可由我作主，有支配之余地”。

十月八日 和秦邦宪、叶剑英共同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改编南方游击队的建议：南方游击区域应坚决保持其为战略支点。但现在各地区实际上无大的根据地，游击队长期保留在原地区极困难，大多数是极分散的流动部队，一集结则给养无法办，继续分散则将消耗力量。因此似以集合成一个军，归八路军指挥为好。这

样做，游击力量就可以成为一支整个的力量不致分散；可以直接属我方领导，补充给养较好接洽领取，以后仍可要求人员补充；各地方仍可公开与秘密地留一部分武装，保卫小根据地及发展革命运动。并报告：叶挺“现已委任为新编第四军军长。叶表示，如我们不赞成，他仍可辞职”。

十月二十一日 和秦邦宪、叶剑英电告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一）叶挺愿前来面谈，已得何（应钦）同意，一两日后即起程；（二）叶挺已领到关防及开办费五万元，尚未呈报就职，待延安结果再呈报；（三）各部伙食钱暂由叶商地方政府维持；（四）叶挺声明完全接受党的领导。

十月下旬 自南京返回武汉。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接见了经过一再交涉才从武昌反省院释放出来的原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华岗和原中共山东省委书记任作民。以后又陆续营救出不少被国民党长期监禁的党员和干部。

十月二十九日 向中共中央报告抵武汉以来的工作情况并提出对高敬亭部和傅秋涛部的组织与人事安排的建议。

十月 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将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边界十多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新四军军部于十二月下旬在武汉组成，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周子昆任副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任副主任。下辖四个支队。

在武汉办事处会见湘鄂赣省委负责人傅秋涛，向傅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战线中地方党容易犯右倾错误的指示精神，要傅与国民党重新谈判，把国民党派来的副司令、参谋长礼送出境。

△ 热切关心武汉地区青年工作，亲自邀请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负责同志到武汉大学和“抗战常识研究班”演讲抗日战争形势

与任务,向青年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游击战争以及抗战中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

△ 在武汉会见陈独秀,重申中共中央对处理陈问题的条件,陈未接受。

十一月三日 向中共中央报告全国文化界百余人十月二十九日在武汉集会,决定成立文化界抗敌协会,发表文化界对时局的主张,以及沈钧儒拟发起组织一个全国民众抗敌后援会的总机构等情况。

十一月七日 和叶剑英等致电中共中央:八路军驻南京与汉口两办事处已正式合并为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作为公开的办事机构。

十一月八日 和叶剑英致电中共中央,提出关于新四军各支队建制及人事安排意见。

十一月十二日 上海失陷。二十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

十一月 应武汉大学学生抗敌后援会和抗战问题研究会的邀请,两次到武汉大学演讲,题目是《群众运动诸问题》与《怎样开展群众运动》,指出:有了群众运动才能真正实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肃清汉奸”、“坚壁清野”、“游击战争”等口号。只有深入发动群众,才能有效地消灭敌人,争取抗战的胜利。在讲演中还介绍了发动群众积极参战的各种办法,阐明了发动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群众起来参加抗战的重大意义。

十一月二十九日 陈绍禹(王明)、康生等从苏联返延安。

十二月九日至十四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毛泽东等抵制了陈绍禹所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等错误主张。会议决定由周恩来、陈绍禹、秦邦宪、叶剑英组成

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同国民党谈判；由周恩来、秦邦宪、项英、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

十二月十三日 南京沦陷。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撤退到武汉。

十二月十八日 周恩来、陈绍禹、秦邦宪、邓颖超到达武汉。

十二月二十日 经多方联系，反复协商，筹办的汤池训练班第一期正式开学。为能通过国民党政府机关，用合法名义，训练大批干部，宣传、动员、组织农民，准备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董必武通过原辛亥革命老友、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建设厅厅长兼农村合作委员会主任石璞以及李书城、李范一等友好人士的关系，用训练“农村合作社”人员的名义，在湖北省应城县汤池举办训练班。为加强训练班领导，派中共湖北省工委领导人陶铸以共产党员的公开身份主持训练班工作，并派曾志、雍文涛、刘季平、童世光等共产党员为教员，开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农民运动、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合作社常识等课程。为加强武装训练还组织军事演习和农村调查，招收来自华北、东北以及本地大学毕业、肄业的革命青年六十余名。到一九三八年五月共举办四期，培训了三百多名干部，分配到湖北各地，发动群众，准备敌后游击战争。在坚持办好汤池训练班的同时，支持陶铸积极开展鄂中地区的统一战线活动，发展应城、京山、安陆、汉川、天门、汉阳、钟祥等县农村群众工作，为准备鄂中抗日游击战争和创建鄂中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一九三八年五月前后，汤池训练班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反对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干扰，被迫结束，董必武指示陶铸改换训练班的名称为“汤池临时学校”，继续招收鄂中地区六百名知识青年培养训练。同时又指示杨显东在襄阳以“鄂北棉业讲习所”的名义办了一期。湖北广大地区沦陷后，这些学员多数成了开展游击战争的骨干。

与汤池训练班同时，董必武指示中共湖北省委利用新四军的第四支队七里坪留守处的合法名义，在七里坪举办干部训练班（亦称抗日青年训练班）。派方毅主持训练班工作，亲自向方毅介绍鄂东的上层人物，作为开展统战工作的对象，并派几名军事干部随方毅前往鄂东，同时写信给高敬亭，让他支持方毅的工作。七里坪干部训练班共举办了三期，坚持了八个月，先后毕业的六百余名学员，大部分被派遣到新四军第四支队工作，其余由湖北省委派往各地准备开展游击战争。

十二月二十三日 出席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联席会议。会议讨论了：（甲）关于新四军问题，会议同意中央原则决定，项英主要工作应在军队方面，各地游击队应迅速集中起来，集中一切力量到抗日前线去。（乙）关于代表团与长江局组织问题，会议认为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成员大致相同，为工作集中和便利起见，决定合为一个组织，对外为中共代表团，对内为中共中央长江局。中共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由项英、秦邦宪、周恩来、叶剑英、陈绍禹、董必武、林伯渠组成，暂以陈绍禹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以上意见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批。代表团下设五部分：参谋处，由叶剑英任参谋长；秘书处，由李克农任秘书长；民运部，由董必武兼部长；组织部，由秦邦宪兼部长；党报委员会，由陈绍禹任主席。（丙）八路军驻汉办事处组织问题，会议决定由钱之光任处长，下设总务、经理、招待等科。

十二月二十四日 出席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联席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宣言。

十二月二十七日 下午二时，出席中共中央代表团与中共中央长江局联席会议。会议认为在日军加紧进攻中国南部，群众抗日救亡运动向前发展的时候，长江局应发展广东和广西的工作，并

将两广工作的中心从香港移至广州。关于开展武汉工运问题，会议通过了董必武和项英建立武汉工会的提议。会议还决定派一批铁路工人赴延安学习，并在武汉举办职工运动训练班，培养工运人才。为解决大批青年要求去陕北的问题，会议决定委托秦邦宪、董必武向各方交涉合办训练青年的机关，同时动员、说服这批青年参加国民党所办的各种训练班学习，不一定去陕北。对中央拟调董必武回延安担任党校领导工作问题，会议认为必武在汉口工作离不开，不能回延安。

△ 致电中共中央，汇报王昆仑向我党提出的建议：八路军应与广西、云南地方实力派一起，设法使蒋介石抗战到底不致动摇。八路军应与四川、广西、云南、山西各地方实力派以及国民党内左倾军人的代表在汉口协商共同纲领。并应派一高级参谋给刘湘，协助刘计划发展游击战争，提供教员和教材，举办游击训练班。

十二月下旬 和周恩来、项英、叶剑英、叶挺等人，在武汉商谈改编新四军和筹建新四军军部等问题。

十二月二十九日 出席中共中央代表团与中共中央长江局临时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游击地区党及部队的工作，听取了傅秋涛、高敬亭、张青萍同志关于湘鄂赣、鄂豫皖、鄂豫边游击区的军事、党及群众工作情形。会议肯定了三地区几年来在极其艰苦条件下、英勇奋斗所取得的成绩，认为基本上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和军事领导给予的基本任务。

十二月三十日 出席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临时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纲领》(草案)。

十二月三十一日 晚，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同在胡宗南身边作秘密工作的共产党员熊向晖谈话。指出：“国共合作是现阶段

的大局。我们从各方面推动国民党抗日。目前国共合作形势较好，中央还要努力加强和发展国共合作。至于我们这一愿望能否实现，蒋介石、胡宗南在抗战中会不会反共，还难以断言。恩来同志经验丰富，主张未雨绸缪，着手下闲棋，布冷子。这是一项特殊任务，具体要求须根据情况发展再决定。传达了周恩来送给熊向晖的八个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一九三八年 五十三岁

年初 和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致电毛泽东、洛甫，要求派“能做游击队工作”的干部来武汉，以便“迅速发展我们的军事工作”。

一月一日 出席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联席会议。会议认为，目前应动员一切力量阻止日军占领郑州、武汉，争取三至六个月时间准备和组织新的抗战力量，为此应派大批干部到安徽、河南发动和武装广大人民群众。并建议中共中央加强西北工作和巩固西北交通。会议还认为对国民党提出的改组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各部等意见，一般应采取赞助的立场，应该同国民党开诚合作。

△ 在《群众》杂志上发表《怎样动员群众积极参战？》一文。指出抗战以来军事上失利的一个极重要的原因是，广大群众没有积极起来参加这次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批评国民党当局政治动员不够，有人忌嫌群众运动，或者怕群众运动，或对群众无信心，懒得去动员，或动员的方式与方法有问题。认为要真正动员群众，“就需要政治上有相应的民主与自由，经济上要能减轻其若干负担，军队能与群众发生良好的关系，这样去动员群众参战，没有不可动员起来的。”

一月五日 经同国民党元老孔庚协商，湖北战时乡村工作促

进会在武汉成立。

一月六日 新四军军部移到南昌。

一月七日 出席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联席会议，听取和讨论河南、湖南省委的工作报告。会议认为目前河南正处在日寇进攻的前线，将成为中日战争的重要地区。因此，河南党的总任务是武装保卫河南；巩固原有的军事力量，用各种方式争取创造和发展新的力量；用各种方式建立和发展农村中的工作；加强铁道及矿山工人的工作。湖南目前已成为抗战的近后方，或在不久也会成为前线，因此，湖南党的总任务是建立广大的抗日统一战线及发展党的力量。

一月九日 出席《新华日报》为在汉口建馆举行的招待会，听取了《新华日报》创办宗旨及筹办经过的报告。

一月十日 在《怎样争取最后的胜利》一书上，发表《怎样争取抗战的胜利》一文。指出：只限于政府和军队的单纯抗战，是当前在抗战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严重的不可允许存在的弱点。论述了只有动员全国民众，才能彻底战胜日寇的极端重要性。指出：“开放民众运动应是目前最迫切的问题，因为只有给全国民众以充分的爱国自由，才能把全国民众坚固组织起来，才能给他们以训练，并武装他们，使民众和政府、军队打成一片，结成一个不可消蚀的力量，在持久的艰苦的神圣抗战中争取最后的胜利。”

△ 出席为庆祝即将于十一日创刊的《新华日报》报馆全体人员大会，代表中共长江中央局致辞说：《新华日报》是共产党的嘴巴，希望大家做好宣传工作。

△ 和周恩来、林伯渠、秦邦宪、邓颖超会晤九日抵汉口的郭沫若，一起议论了郭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一事。

一月十一日 和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致电中共中

央书记处：国民政府军委会改组，蒋让陈诚任政治部部长，要周恩来任副部长，周曾再三推辞。请中央考虑具体意见。

△ 《新华日报》正式创刊。

一月十二日 出席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联席会议，讨论湖北省委工作和妇女工作问题。

一月十四日 出席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联席会议。会议听取林恺汇报鄂豫边的工作，决定河南省委须以这个地区为中心发展工作，鄂豫边特委须加强对该地区游击队改编而成的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的领导，并帮助做好巩固和发展工作，同时加紧发展党的组织。会议决定，第八团的行动由中共中央长江局参谋处指挥。

一月十五日 和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致电毛泽东、洛甫、张国焘、康生、陈云、凯丰，说明长江局工作量过重，现有力量难以应付，再次要求中央派军事、政治干部和能独立工作的人来。

一月十七日 国民党特务机关指使暴徒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及印刷厂。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就此事召开临时会议，并作出决议：致电蒋介石，要他制止此类事态；由周恩来、叶剑英出面同武汉国民党党政军当局交涉，要求采取有效措施，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一月十八日 出席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联席会议。听取彭德怀关于前方情况和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洛阳召开的军事会议的报告，以及罗世文关于四川省委的工作报告。会议认为目前四川已成为最后根据地，我们要用大的力量去布置工作，要纠正过去只进行上层联络的方式，进行公开的与发动下层群众的活动。决议将会议讨论情况电报中央，说明四川形势及我们工作的重要，要求调重要干部入川工作。

△ 为纪念《新华日报》创刊题词：“拥护抗战到底，为实现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国而斗争！”

一月二十日 在武汉青年救国团总团主办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题为《怎样做宣传和组织工作》的文章。

一月二十一日 和周恩来、陈绍禹、秦邦宪、叶剑英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告以长江局对四川工作的意见：四川已成为抗战最后根据地，成为联结西南和西北的枢纽，而且很快会变为全国各党派各实力派争夺的中心。迅速加强四川地区党的工作，使上层联络活动能尽力掩护和帮助党组织发展力量，这应成为目前四川工作的中心任务。二十三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同意。

一月二十二日 出席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联席会议。讨论鄂豫皖特委的工作问题。决定特委的主要任务是在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基础上尽量扩大部队，以增加抗日力量；加紧培养干部；健全党的组织和工作；在最近期间集中队伍进行训练参加抗战；留一部分队伍保护后方根据地。请中央调戴季英到四支队工作。

一月二十三日 出席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在汉口商会举行的成立大会，和周恩来、邓颖超、郭沫若、陶行知、章乃器等当选为该会理事。

一月二十四日 和周恩来、陈绍禹、秦邦宪、叶剑英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康泽等在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会议上，诬蔑八路军在华北游而不击，宣传“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等情况，提议用争取八路军在敌后取得的较大胜利和新四军迅速出动抗日前线、在长江南北创造新的军事力量等办法来给予回击。

一月二十七日 写信给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钱远镜^①，鼓励他一心不乱地学习，在课堂上，在讨论会中，在操场上或

在野外演习时，都要积极学习。

一月二十九日 在《群众》杂志发表《武汉民众的动员和组织》一文。指出：目前依然没有把本地民众从积极方面发动起来。而保卫武汉“不应只以武汉为限，亦不应只限于动员武汉的居民，而应当是使日寇夺取武汉的计划在其准备步骤时即受到的打击。”“使日寇目前打通津浦巩固沿海占领地区的计划不能完成；这就要保卫河南；这就要确实完成芜湖上游的江防及必要的要塞支点。打击日寇夺取武汉计划的准备步骤。”

一月三十一日、二月一日 和周恩来、秦邦宪一起，两次到郭沫若住所，共同研究对付蒋介石企图派特务头目刘建群充当政治部三厅副厅长的办法，以抵制国民党反动派控制三厅。

一月 和周恩来、叶剑英等受中共中央、毛泽东的委托，向新四军四支队负责人高敬亭等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发展抗日武装力量的指示，要求四支队从湖北黄安七里坪、河南确山竹沟向东挺进抗日，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游击战。

二月一日 出席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联席会议。会议讨论了军事问题及陕北抗大、鲁艺、陕北公学招生等问题，决议组织招生委员会，董必武为委员。还决定由董必武起草工运工作纲领。

二月七日 和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最近时局中发生许多新的严重问题，提议在二月二十日前后召开政治局会议。

① 钱远镜：钱亦石之子。由董必武亲自介绍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回到湖北参加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曾任中共天汉地委组织部干事，中共鄂南咸宁县委组织部长。后被叛徒出卖，被日寇杀害，壮烈牺牲。

二月十二日 为《新华日报》世界反日援华大会特刊题词：“文化是民族生命中一种不可磨灭的力量，因此，日寇在灭亡我民族的残酷兽行中，时刻都注意到摧残我国的文化，正因为如此，保卫文化，不仅是文化界同仁的任务，同时也是全体同胞的任务，也正因为如此，挽救民族危亡是全体同胞的天职，尤其是文化人的天职。”

二月十五日 出席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联席会议。会议估计日军将以突破黄河，夺取武汉为新的战略中心的形势，讨论了确立长江、黄河间的党的力量，必须迅速发动鲁、豫、皖、苏群众参加战争。决定在长江黄河间设立军区，由彭雪枫负责指导军区的军事工作。还决定在武汉不守时，建立长江、黄河间的领导机构，并预先派人布置重庆机关。

二月二十日 出席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联席会议。会议讨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的行动问题，指出目前原则上以巩固部队争取出发到前线为中心；以“保卫河南”作为动员群众的口号；对其他部队要事先进行统一战线和联络工作，以备将来扩大。

二月二十一日 和周恩来、叶剑英等代表中共中央及第十八集团军向武汉各界人民在汉口举行的空捷国殇追悼大会送挽联一副：“为五千年祖国英勇牺牲，功名不朽；有四百兆同胞艰辛奋斗，胜利可期。”并和周恩来、叶剑英、陈绍禹、邓颖超到会致祭。

二月二十三日 出席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周恩来、陈绍禹回延安参加政治局会议。建议中央多派能够独立领导工作的干部出来，担任各方领导工作。会议认为新四军应继续贯彻集中部队争取到前方的方针，决定加强新四军及鄂豫边特委的领导和工作。

二月二十七日 出席武汉各界举行的钱亦石追悼大会，并在

《新华日报》上发表《我所认识的钱亦石先生》一文。指出：钱亦石“有科学的头脑，他追求真理，加入共产党并不是偶然的。他在研究了马列学说和第三国际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后，才下决心要成为共产党党员的。他入党之先，既不是马马虎虎；入党以后，就始终不渝地相信共产主义。即令在极受摧残压迫的时候，总是抱定原来宗旨，向前迈进，他毕竟是一个无产阶级优秀的斗士。”“我们纪念亦石先生，只有秉着亦石先生的精神，一致奋起，把万恶的敌寇驱逐出中国。”

二月 接待章伯钧来访。

二、三月间 和叶剑英先后到新四军四支队驻地黄安七里坪，检查该部改编工作和挺进敌后的准备情况。

三月上旬 出席中共中央代表团与中共中央长江局联席会议。会议听取了戴季英的报告，讨论了新四军四支队工作。会议认为，中央和长江局希望四支队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之下，尽一切可能巩固和扩大部队，使第四支队成为政治上军事上有力部队。并决议立即停止打土豪现象。

三月十二日 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回忆第一次谒见中山先生》一文。文章说中山先生“指示中国的出路，惟有实行三民主义的革命；特别鼓励我们在失败后不要灰心短气，要再接再厉地努力去干，革命不是侥幸可以成功的，只要我们在失败中得到教训，改正错误，想出好的办法来，继续革命，胜利的前途是有把握的。”“现在我国正在进行抗日民族自卫战争，我们因为军事政治经济上有严重的缺点和弱点，在抗战过程中，自然容易遭受暂时的部分挫折，有些意志薄弱的人，难免不受敌人的威吓和软化。”“在先生逝世十三周年的今日，我们说起先生这几句训言，使我们抗战的意志更加坚定起来，贯彻到底，这不是无益的吧！”

三月十三日 出席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联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宋一平关于学联代表问题的报告，邓颖超关于参加设计委员会工作报告，研究了长江局下设妇女工作委员会和长江局的分工及各部处的指导负责问题。决议董必武负责指导民运部。

三月十九日 为陈独秀要求会见一事，和叶剑英、秦邦宪致函《新华日报》，重申中共中央对陈独秀提出的三条原则：“（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 出席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联席会议。会议讨论了关于广东党组织工作、青年工作及办事处机关工作等问题。

三月二十四日 为中共中央长江局拟定《关于恢复关系的通知》，对从国民党监狱释放的和普通失掉关系的党员作了六条原则规定。明确：“曾经动摇自首叛变过的（如写报告发表宣言破坏组织等）不论是消极或积极自首，应该永远开除出党；”“自由脱党的不论时期久暂及有无同志负责证明，应该叫他先在工作中表现，然后依新党员入党手续办理。”

三月二十五日 出席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并为大会题词：“中国目前统一的学生运动是统一的青年运动的先锋。”

三月 和周恩来、秦邦宪等先后多次到郭沫若住所，同郭一起研究政治部第三厅的宣传方针、组织机构的设置、人员的安排、党的活动方式等问题。

△ 中共湖北省委在汉口富源里举办党员训练班，学习党章、党的建设、游击战争等。先后共举办五期，培训了三百余名党员。

董必武主持党员轮训教育工作，并亲自讲课，不仅使许多从敌人监狱里被营救出来和失掉组织关系的党员，经审查培训后，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重新走上战斗岗位，而且还培训了一批骨干，增强了党的战斗力。

四月十一日 张国焘从延安私自经西安逃跑到武汉。为了挽救张，和周恩来等先后多次找张谈话，进行耐心教育，促其觉悟，回党工作。但张国焘毫无悔改之意。十六日见蒋介石，称“在外糊涂多年”。后即出走。十七日竟以书面申明自行脱党，公开投靠国民党。十八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张国焘的党籍。

五月 奉中共中央指示，由边章伍陪同，从武汉前往安徽舒城做新四军四支队领导人高敬亭的工作。高当时对党中央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揭发批判张国焘的错误不理解；排斥中央派去的干部；把一个战斗力很强的手枪团留在身边，不愿开赴抗日前线。董必武到舒城后，向高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对他进行耐心的思想教育，用充分的事实说明党中央对张国焘的处理是正确的。同时还帮助高分析了他所犯错误的性质、根源及其危害，启发和教育他认清抗日的新形势，努力执行党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过艰苦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高敬亭对错误有了初步认识，表示服从中央的领导，听从新四军的指挥，并把手枪团改编为教导团，开赴抗日前线。

六月 在离舒城的归途中，为勘察地形作游击战的准备，取道金寨、黄安，翻越大别山，徒步返回武汉。途径黄安县城时，会见了各界人士，宣传了中共中央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并在县立第一中学操场举行的欢迎大会上，向各界群众宣讲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六月十六日 经中共中央书记处同意，和毛泽东、陈绍禹、秦

邦宪、林伯渠(祖涵)、吴玉章、邓颖超等七人被国民政府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六月二十八日 一届一次参政会即将召开，在汉口《新华日报》上发表《对国民参政会的意见》。指出：“此次参政会最具体的任务，应是讨论‘抗战建国’的问题，如军事、政治、外交、民众运动等。”更希望参政员能注意到促进下层行政机构之改善，切实地遵照抗战建国纲领，在乡、镇组织工、农、商、学、妇女多种民众团体，并由民众自己选出能代表民众利益和传达民众团体意见于上级机关的甲长和保长、联保主任等。积极动员广大民众配合军队作战。

七月五日 和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等我党七参政员，在《新华日报》发表《国民参政会开会前夜，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指出：“我们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参政会，诚恳地愿意在参政会内与国民党和其他各党派以及无党派关系的国民参政员同志们，亲密的携手和共同的努力。以期能友好和睦地商讨和决定一切有利于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具体办法与实施方案，以便能够有效地打击与战胜日寇，并奠定使中华民国走向独立自由幸福的新国家的基础。”

七月六日至十五日 和陈绍禹、秦邦宪、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一起出席国民参政会首届大会，并被指定为第三审查委员会(内政组)召集人之一。十日，讨论决议拥护长期抗战国策和修正通过民众运动方案。十二日，会议一致通过《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提案》。十五日，当选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休会期间驻会委员会委员。

七月十日 和陈绍禹、秦邦宪、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致函武汉各界抗战周年纪念筹备会称：“敝人等本月份所得参政员薪金(每人三百五十元，共六人计二千一百元)，除已在参政会内委托秘

书处代每人献百元外(共已献六百元),现将下余全部薪资一千五百元献作救助抗战军人家属及受伤将士和被难同胞之用。”

七月十八日 接待黄炎培来访,并长谈。

七月二十一日 和陈绍禹、秦邦宪、邓颖超、林伯渠等我党参政员在《新华日报》发表献金《启事》:“七月份公费(每人三百五十元,共二千一百元)已全部作为‘七七’献金。八月份公费除照章缴纳党费(每人五十五元,共三百三十元)外,以一千二百元捐助抗大、陕公、党校及延安托儿所(各三百元),其余五百七十元,全数捐为救济死难同志遗孤基金”。

七月 和周恩来一起接见江苏省淮安县青少年组成的宣传抗日救国的革命团体“新安旅行团”。

△ 和周恩来、叶剑英同谢和赓(共产党员,时任白崇禧秘书)谈话,对谢在广西的工作做了指示。

八月五日 和叶剑英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会见旅越华侨代表,介绍八路军抗战经过和最近在华北敌后发展广泛游击战争等情况。会见后,代表八路军接受旅越华侨代表献旗。

八月 为抵制国民党反动派企图以“登记”社团办法限制和取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进步团体,和周恩来一起,一方面指示《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对此提出抗议;一方面将进步团体的一些成员分别转送延安和敌后。

八、九月 通过武汉大学教授、河南鸡公山林场场长李相符的关系,以办园林试验场为掩护,在鸡公山举办训练班,训练干部,准备在武汉沦陷后,发动农民,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鸡公山训练班结束后,全部学员转到大洪山打游击。

九月九日 上午,和叶剑英、罗炳辉出席“武汉各界拥护国际援华制日运动大会”。下午,和罗炳辉、郭树勋参加武汉民众要求

国联援华制日大游行。

九月十七日 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今年的“九一八”》一文。指出今年的“九一八”不仅和以前五个周年纪念不同，而且和第六周年比较，亦大有差别，今年的“九一八”，则是我们在抗战中。十五个月的抗战已把敌人速战速决的计划打得粉碎，打破了敌人想以三十万兵力、三个月征服中国的妄想。事实迫使敌人不得不承认和中国军队作战是长期的，而我们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即确定了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文章分析了敌我力量对比之后，认为：中日战争的前途，我国人是可以乐观的，但要实现这一乐观的前途，还需要我国人以最大的努力去争取。抗战不仅证明我国具有战胜日寇的基本条件，同时也暴露了我国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许多不适于抗战的弱点和缺点。抗战中军事改进较多，政治的改进赶不上军事的发展，如行政机构之欠调整，政治工作之不健全，群众力量之没有更广泛的动员等等，都使抗战发生不应有的阻碍，特别是国共两党的关系，还没有达到完全真诚亲密合作的程度，使许多工作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但这些弱点和缺点，只要我们不固执成见，不是不可克服的。

九月二十六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重新调整了各地党的组织机构，决定设立四个中央局：中原局、东南局、北方局、南方局；由周恩来等组织南方局，代表中共中央领导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的党的工作。

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重申全党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

北，发展华中。一致通过补选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十月初 在武汉失守前，率领八路军办事处及《新华日报》社先遣人员赴重庆。

十月七日 出席第一届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在重庆召开的第五次会议，听取了有关该会会务及最近外交军事、内政设施、交通行政等项报告，并为前方将士募集寒衣捐款贰百元。

十月八日 《新华日报》重庆分馆举行茶会，欢迎中共参政员、《新华日报》董事会成员董必武。董必武发表了题为《目前抗战形势与〈新华日报〉》的讲话，在批评了社会上一些消极悲观、失败情绪之后指出：《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自然是反映中共的政策和主张，但是它还反映其它各党各派及无党派的一切有利抗战团结的意见和主张。要求《新华日报》重庆分馆的同志要时时刻刻求进步，时时刻刻把握住《新华日报》是抗战工作的一部分，时时刻刻要以越战越强的精神来开展工作。次日，这篇讲话发表在《新华日报》上。

十月二十日 满载《新华日报》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部分人员的“新升隆”号客轮，沿长江向重庆撤退行至湖北省嘉鱼县附近时，遭日机轰炸，二十四位同志殉难。

十月二十一日 日军占领广州，国民党当局下令武汉实行紧急疏散。

十月二十五至二十七日 武汉三镇相继沦陷。

△ 《新华日报》于二十五日在武汉停刊。同日，在重庆出版发行。

二十六日 和秦邦宪、邓颖超出席国民参政会举行的谈话会，听取了最近军事情况的报告。

十月二十八日 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二十六日写的《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的展望》一文。指出：在“目前国际国内形势变更人心惶惶之际，参政会议决政府应付新形势之重要施政方针，可以安定国内的人心，可以端正世界的视听，更可以击破日寇汉奸的挑拨离间无稽谰言。持久抗战，全面抗战，争取主动地位，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以达建国成功，这是我国抗战以来确定不移的国策。参政会遵照这一国策，决议政府对内对外的施政方针，实是第二次大会的最重要的任务。”

十月二十八至十一月六日 和吴玉章、林伯渠、秦邦宪、陈绍禹、邓颖超出席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的第二次大会。三十一日，在分别召开的各审查委员会会议上，被推选为第三审查委员会（内政组）召集人之一。十一月三日，参加特种委员会，审查关于管理外汇及对外贸易案。六日当选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休会期间驻会委员会委员。

十月 与林伯渠等在成都市方正街晤见刘文辉。这是中共负责人同刘第一次正式接触。董、林等向刘介绍了中共的抗日救国方针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刘也讲述了自己拥护中共抗日的方针和对蒋介石的戒备态度。增进了刘对中共的了解。

十一月十一日 和秦邦宪、吴玉章出席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二次大会驻会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十一月二十六日 和陈绍禹、秦邦宪、吴玉章、何凯丰、邓颖超出席《新华日报》社为说明办报方针和任务而举行的重庆党、政、军当局、报界同业、文化界及民众救亡团体代表的招待会。

十二月五日 和陈绍禹、秦邦宪、吴玉章、何凯丰联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悼新华日报及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殉难烈士》的纪念文章。出席《新华日报》社举行的追悼“新升隆”轮遇难烈士大会，

在会上讲话中指出：要纪念他们，“一定要学习他们英勇的牺牲精神，继续他们未完成的事业。”

十二月八日 会见印度援华医疗队，欢迎柯棣华等前往延安。

十二月十二日 蒋介石在重庆会见中共代表陈绍禹、董必武、秦邦宪、吴玉章，拒绝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处理国共两党合作关系的跨党办法，坚持取消共产党，将国共两党并为一个大党。扬言：“我的责任就是将两党合成一个组织。过去我打你们也是为保存共产党革命分子合于国民党。”“此目的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什么意义”，“这个目的至死不变”。中共代表拒绝了蒋的无理意见。当日，陈绍禹、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吴玉章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了这一情况。

十二月十八日 国民党副总裁、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自重庆叛逃至昆明。十九日到河内、二十三日发表《艳电》。

一九三九年 五十四岁

一月四日 致电党中央并转林伯渠，由埃德加·斯诺等发起、由路易·艾黎主持、设在行政院之下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拟在延安设该会办事处，以推进陕北手工业合作事业。经费由该会出，人员我方选用。

一月五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提议将华南及西南各省合并成立一中央局，建议改名为西南局，由周恩来、秦邦宪、何凯丰、张文彬、徐特立、吴玉章、叶剑英、廖承志、吴克坚、邓颖超、刘晓、高文华、董必武十三人组成，以周恩来为书记。七日，周恩来等复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认为“以南方局名称为好。”

一月十三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回电同意周恩来等的提议，仍用南方局的名称，以周恩来、秦邦宪、何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六人为常委。周恩来为书记。并明确：除华南、西南各省外，江西、上海工作也归南方局管。

一月十六日 中共中央南方局正式成立。

一月二十一日 和黄炎培等出席在重庆的参政员茶话会。

一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 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在重庆召开。全会秘密通过了由蒋介石提出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并决定成立“防共委员会。”

一月二十五日 和周恩来、邓颖超一起参观胡厥文等开办的

合作五金厂，并为该厂题词：“在极艰难的条件奠定新中国工业的基础。”

二月十二日至二十日 和吴玉章、林伯渠、邓颖超出席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十四日，被推选为第三审查委员会（内政组）召集人之一。十八日在第三次大会审查会上提出《加强民权主义的实践发挥民气以利抗战案》，要求国民党政府对各党派予以法律上的保障，遭到国民党参政员的反对，经修改通过，但面目皆非，很为失望，故请假退席。在十九日会议上因所提案未圆满解决，国民党不允许其他政党有合法地位，再次退席，以示抗议。二十日，当选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休会期间驻会委员会委员。

二月二十一日 在《群众》杂志上发表《日寇企图搬出新傀儡》一文。指出：“日寇如果想搬出吴佩孚当这个新傀儡来对抗我国人民，来维持敌占领区的安宁秩序，来动摇我抗战胜利的信心，那是徒劳的。”严正警告：“如果一个腐旧的退职军阀，不安分，妄自尊大，为敌人作傀儡，一定会马上遭受国人的唾骂和声讨的。”希望吴佩孚自全晚节，不做日寇的傀儡。指出：“目前抗日的都是友人，附逆的都是仇敌，不管他过去历史如何，凡甘心让日寇利用来阻挠抗战者，都一定为国人所反对。我们要注意日寇在政治方面所弄的玄虚，我们要反对日寇所随意搬出的新傀儡。”

三月 约见自山东敌后来重庆的张友渔，向张介绍了国内政治形势以及武汉失守后蒋介石加紧反共降日活动等情况，听取了张关于山东、河北敌后形势、张在石友三部开展政治工作经过以及此次率领二三十名政治干部来重庆参加“中央训练团”轮训等情况的汇报。指出：在目前情况下，此次来重庆的石部政治部系统的我党骨干分子，已不可能再在国民党军政机关发生作用，除个别人外，一般不必再去参加轮训，他们的工作由党另作安排。不久，即

根据每个干部的政治思想情况、工作能力和表现将他们分别送延安、新四军五师以及重庆《新华日报》工作。对个别完全没有暴露身份的我党党员，则仍派去“中央训练团”接受轮训，结业后再准备进入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

△ 经与周恩来研究，决定派张友渔参加国民党政府新成立的战地党政委员会，以设计委员名义常与李济深、冯玉祥等人士联系，并以文化人的身份从事文化运动和民主运动，主要是参加以沈钧儒、邹韬奋为首的救国会。董必武向张指出：救国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起着重要作用，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同我党合作很好。要尊重他们的意见，不可强加于人，他们如有人和我们有分歧，也要争取团结，不可排斥。

四月十日 和秦邦宪一起在重庆会见李济深，谈如何解决河北磨擦问题。李拟提出两点建议：（一）恢复各县已有的县长，经省府考核后一律加委；（二）游击队的给养由中央发给。董必武等提出四点：（一）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辞职应准，空缺宜就朱德、彭德怀中择一兼任；（二）八路军照朱、彭请求按三军五师及直属队编制发给军饷；（三）游击队饷由中央发给；（四）与我军磨擦之部队应调开。如将来反攻增兵时，亦宜调与我军关系较好之部队前往。

四月 南方局为加强党的建设，从思想上、组织上巩固党，先后在重庆机房街十七号和红岩嘴十三号举办党员训练班，通过学习政治形势和党的方针任务、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社会发展史、党的组织建设、宣传工作、群众工作和秘密工作等有关内容，集训党的干部。周恩来、董必武、何凯丰、秦邦宪、邓颖超等南方局领导同志为学员讲课。

五月一日 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五一节与我国工人运动》一文。指出：“二十二个月的抗战，证明工人阶级的顽强英勇，是我国

战胜日寇的重要条件之一。”“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抗战作用，必须成立全国工人的统一组织，制定具体的斗争纲领。”“这是开展目前中国工人运动的关键，这是工人阶级保障抗战胜利的条件。”

五月四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党员被迫加入国民党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国民党最近在其统治区内强迫各机关公务人员、各学校教职员学生及军队中各级军官加入国民党与三青团。为了民族统一战线及党的利益，党中央决定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的我秘密党员，凡被迫加入时，除特殊情形外，一律加入，并报上级批准。凡加入国民党的党员，一般的应采取埋头苦干，积蓄力量，推动其进步的方针。

五月二十四日 到胡风寓所，转达周扬邀请胡风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文学系主任，征求他的意见。

五月 和林伯渠等在重庆曾家岩潘文华住所，同川西地方实力派刘文辉再次晤谈，向他分析了国内外形势，阐释了抗战必胜，妥协必败的道理。刘后来回忆说：“尔后我对抗战胜利的信念能够坚定下来，这次晤谈是有重大影响的。”

六月七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投降危险的指示》指出：目前最大的危险是国民党投降的可能，新的慕尼黑的可能。要求全党用全力反对投降反共活动，给一切投降阴谋和叛变行为以适时的、坚决的打击，公开揭穿反共投降活动即是准备投降的实质。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

六月十二日 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根据蒋介石的密令，派人带小股军队包围袭击设在平江嘉义的新四军嘉义留守通讯处，枪杀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新四军上校参议、新四军平江留守通讯处负责人涂正坤和通讯处军需员吴贺泉，并将湘鄂赣特委组织部长、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新四军司令部少校秘书曾金声等活

埋，制造了平江惨案。

六月十八日 周恩来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报告工作。南方局由博古代理书记。

七月三日 和何凯丰、叶剑英致电党中央：五战区范围内环境日益转劣，皖北、鄂东、鄂中、鄂北等地党的工作，应迅速随环境变化转入隐蔽，特别是鄂境武装多已暴露，请速电中原局转各该地负责机关严防反动派的进攻。

七月七日 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动员全党全国人民为克服国民党的投降反共逆流，争取时局好转而斗争。

△ 为纪念抗日战争两周年，《新华日报》从今日起陆续发表毛泽东、周恩来、洛甫、王稼祥、刘少奇、秦邦宪、董必武、吴玉章、叶剑英、邓颖超撰写的文章。

七月八日 和何凯丰、叶剑英致电中共中央，提出扩大宣传平江惨案所采取的措施：（一）刊登追悼启事；（二）给塔斯社发一公开文稿；（三）在《群众》杂志上发表文章。并建议进行扩大宣传，因它能引起社会上的同情，能证明国民党反共分子向我进攻，更足以证明鹿钟麟、张荫梧在华北之所作所为与平江反共分子相同。还建议新四军发动抗议运动。

七月十二日 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我国抗战两年来的民众运动》一文。指出：“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是我国的国策”，“动员四亿五千万的民众积极起来参加抗战，是持久战能获得胜利的基本条件”，“坚持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是我们能够战胜敌人的中心环节”。

七月二十八日 和何凯丰、叶剑英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了传闻

中的英日谈判情况，指出此谈判实为远东慕尼黑阴谋之开始，它和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危机一样，对中国抗战将给予严重打击。建议发动全国舆论、民众团体、社会名流抗议英国之妥协政策，并联络英国之人民团体及国际上反对英国妥协政策之舆论，在国内则发动打倒孔祥熙运动。如可成功，亦可给英日谈判以打击，即不成功亦可作为对英日谈判之示威。

八月一日 和张澜、沈钧儒、李璜、冷遹、章伯钧等，应黄炎培、江问渔、邹韬奋的邀请，参加午餐聚会。

八月三日 写《献给新四军嘉义留守通讯处遇害之涂罗等十烈士》一文，严厉斥责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战，破坏团结，制造谣言，制造磨擦，急于反共的罪行，指出：制造此惨案是一种有计划的有步骤的破坏我国团结的阴谋，是千百磨擦事件中最严重的一件。涂罗等十余烈士是为了坚决抗日而死，是为了忠实执行统一战线而死，是被一种极毒辣极严酷的阴谋所害。我们不仅要为他们雪冤，还要为他们的遗志继续奋斗。

八月八日 和李璜、沈钧儒在张澜住所宴请邹韬奋、章伯钧、黄炎培、林虎、江恒源等人，讨论有关第四次参政会的提案问题，并向与会者介绍平江惨案的经过，出示即将发表的《追悼新四军平江嘉义留守通讯处遇害烈士启事》。

八月十三日 在《新华日报》发表十一日撰写的《‘八一三’的教训》一文，指出：“两年前，‘八一三’日本进攻上海的举动，为其灭亡整个中国的毫无掩饰的步骤，他想吞并中国独霸东方的狰狞面目又一次在我国人民面前暴露了。”“在两年中日寇进攻我国的步骤和方法改变了许多，但要并吞我整个中国的政策是没有丝毫变更。”“我们只有抵抗才有今日，抗战则存，屈服则亡。这是血的教训，这是活的教训！”

△ 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追悼新四军平江嘉义留守通讯处遇害烈士启事》和《挽嘉义新四军通讯处涂罗十烈士遇害》五律诗四首。向全国人民公布平江惨案的真相；歌颂涂、罗诸烈士忠贞为国为民的革命精神；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兵戎相见，对新四军平江嘉义留守通讯处留守人员，竟“不问男女，不经审讯，立置之死，或以枪杀，或竟活埋，无法无纪，逞凶恃残”的罪行；谴责国民党反动派“今竟置外盗于不顾，手足无情，自相鱼肉。天下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之事，孰有过于此者乎？”沉痛指出：在日本侵略者正“欲亡我国，灭我种”这种民族危难之际，“只有团结，才能救国，分裂立遭灭亡”。

△ 下午，在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由叶剑英主持的追悼新四军平江嘉义留守处被害的涂正坤，罗梓铭等十烈士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致词。指出，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要为遇害烈士雪冤；要求国民党政府严惩凶顽；揭破敌寇汉奸破坏团结的阴谋；加强统一战线，挽救团结危机和坚持抗战。

八月十五日 和张澜、李璜、邹韬奋、黄炎培、江恒源、曾琦等举行聚餐会，再次讨论第四次参政会的议案，商定由董必武负责提出发动民众问题一案。

八月二十二日 接受《新华日报》记者的访问，谈对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的希望。指出：本次大会的主要任务应在充实既定的抗战国策真能贯注到每一工作。要充实抗战国策，首先要加强内部团结，这一点在目前是远未做到的，抗日党派间的磨擦，个别地方、部队间的磨擦，都妨碍着抗日事业的进行。其次应严格采用战时财政金融办法。此外，敌后工作的加强也是迫不及待的。我们游击部队英勇艰苦的斗争已使敌人的阴谋无法得逞。但是令人痛心的是，政治上给予游击战争的帮助太少了，甚至妨碍了他们的

奋斗。为了争取真正的相持阶段的到来，必须加强敌后工作，采用跟敌后游击战争相适应的政治机构，尽可能使其民主化，容纳、团结各抗日党派，广泛组织民众及武装民众。最后则是反对汪逆精卫的问题，我们要根绝此等毒害分子，亦是从消极方面充实抗战国策的要务。

九月五日 为《新华日报》纪念国际青年节特刊题词：“中国的青年在两年之余的抗日战争中锻炼了自己，表现出惊人的英勇，只要全国青年真正团结起来抗日，一定能把日寇驱逐出中国；中国青年的解放与中华民族的解放有不可分离的关系。”

九月八日 和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发表《我们对于过去参政会工作和目前时局的意见》。在总结前一段参政会工作后，针对当时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提出反对投降妥协，肃清汪派汉奸，实行战时民主，发展游击战争，努力增进外援，加强各党派团结。并要求：（一）命令保障各党派之合法权利，认真取消《防止异党活动办法》。（二）严禁对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党派之歧视压迫行为，严禁因所谓党籍及思想问题而妨害工、农、军、商各界人民及青年之职业与人权之保障，以促使全国一致，精诚团结。（三）在抗战各种工作中，广泛地容纳各党派人才参加，不以党派私见摒弃国家有用人才。表示决心以“坚持抗战到底，巩固国内团结，力求全国进步”，作为与全国同胞共同奋斗的方向。

九月九日至十八日 和林伯渠、秦邦宪、陈绍禹、吴玉章出席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被推选为第三审查委员会（内政组）三个召集人之一。十四日至十七日讨论各项提案时，和二十二个人联署在会上提出《拥护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声讨汪逆肃清汪派活动以巩固团结、争取最后胜利案》，还和张澜、邹韬奋、黄炎培等民主党派负责人提出《民众问题》一案，均提交会议讨论。会

议经过激烈争辩,最后通过:甲、治本办法:(一)请政府明令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二)指定若干参政员,组织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协助政府促进宪政。乙、治标办法:(一)请政府明令宣布全国人民除汉奸外,在法律上其政治地位一律平等;(二)因为战时需要,政府行政机构应加以充实并改进,以集中人才,从事抗战建国工作。还通过了否认伪组织,通电声讨汪精卫等提案。在本届参政会上当选为一届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休会期间驻会委员会委员。和张君勱、张澜、史良等十九人,被会议指定为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委员。

九月十二日 和陈绍禹、秦邦宪、林伯渠、吴玉章致电中共中央:(一)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对于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权利问题,已有提案提出,许多中立的、过去不表态的人都积极表示同意。(二)已在会内外散发专门揭露国民党制造平江惨案的小册子,争取各方面的同情和支持。(三)我党七参政员声明发表后引起各方极大注意,张澜等看过说“重要问题声明都说了”。张君勱、左舜生、章伯钧等向参政会提出结束党派统治开始宪政提案。

△ 和毛泽东、陈绍禹、林伯渠、秦邦宪、吴玉章、邓颖超发表声援香港《南华》、《天演》、《自由》三报罢工工友的电报,并捐款援助三报反汪工友的罢工斗争。

九月十六日 毛泽东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对国民党顽固派向解放区的军事进攻提出警告,宣布“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

十月一日 和吴玉章、潘梓年一起应邀出席张澜、沈钧儒等十三人在重庆市银行公会举行的宪政问题座谈会。会议除对如何促进宪政之实施等问题进行座谈外,还一致议决,经常举行座谈会,并组织一民众团体,协助宪政的实施。

△ 出席褚辅成、沈钧儒邀集的促进宪政实施座谈会。会议决定继续举行座谈会。

十月二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央关于第四届参政会的指示》，指示各级党加强反汪、反投降、反分裂的斗争，及要求实行民主，实现宪政的运动。

十月六日 和陈绍禹、秦邦宪、吴玉章、叶剑英、何凯丰、吴克坚联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哀悼吴志坚同志》一文，指出：我们深切地哀悼吴志坚同志，是为了“要锻炼培养出无数的像吴志坚同志那样坚强的战士！”

十月十八日 和秦邦宪出席在重庆召开的第二次“宪政座谈会”，到会各方面人士有七八十人，讨论“宪政与抗战”问题。

十月十九日 和陈绍禹、秦邦宪、吴玉章、叶剑英、叶挺出席重庆文化界发起的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大会。

十一月七日 和秦邦宪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苏联驻华大使馆为庆祝苏联十月革命二十二周年而举行的招待中外各界人士的茶话会。

十一月二十五日 向中共中央报告二十四日宪政期成会二次会议情况，并请示对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选举法以及宪法草案所应采取的态度。

冬 派人进行联络国民党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工作。指出：要鼓励李、白坚持抗日，做孙中山的忠实信徒，认真实行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建议他们与抗战爱国分子加强团结、对蒋介石要有较清醒的认识，防止蒋对他们进行分化，警惕中统、军统的特务活动；对蒋要求实施宪政，实现民主，反对独裁；还请他们注意保护进步人士，支持这些人士的工作。

十一月三十日 宪政促进会筹备会在重庆巴蜀小学举行首次

会议，到会五十余人。董必武和孔庚、张申府等二十五人被推为常委。

一九四零年 五十五岁

一月九日 在重庆曾家岩五十号接见川南中共游击队赴延安学习的军事研究班负责人，发给该班人员第十八集团军符号、证章及护照，并派汽车专程送至陕北。

一月十日 中共中央指示南方局，要以严正态度向国民党提出：陕甘宁边区应为二十三个县。中共和八路军在这二十三个县内，有动员民众实行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之全权，委托朱德为冀察总司令兼河北省主席，贺龙为察哈尔省主席；八路军扩充为三个军，九个师，二十二万人，新四军应为三个师，五万人。

一月十一日 在《新华日报》上发表题为《新华日报创刊二周年纪念》的文章。指出：《新华日报》是在抗日战争中诞生的，它和抗战是血肉相联的关系。它的延续，是继续抗日战争的一种标志，是发展团结抗战的旗帜。《新华日报》的存在，使中共的政治主张得以时时直接间接与热心抗战建国的人士相见，这是杜绝敌探汉奸挑拨离间造谣诬蔑的一种工具。两年来，《新华日报》用正确的方法分析问题，以坚定的立场去应付事变，在极危险和困难当中表现了极大的努力。“希望《新华日报》在奠定的基础上，发扬光大，与全国志士共同实现我国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伟大使命。”并出席《新华日报》为创刊两周年举行的纪念会。

△ 出席在张申府寓所举行的宪政促进会筹备会常务委员

会。

一月十三日 在曾家岩五十号接待黄炎培来访。

一月十五日 中共中央指示南方局：中央前次所提边区扩军等条件都是最低限度的、正当的、合理的，不能再让步。否则将于抗日不利，抗战阵地也将受到大破坏。

一月二十日 致电中共中央统战部，汇报南方局统战委员会的工作，以及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以来各党派的动态。

一月 为了驳斥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叫嚣，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

二月一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指出党的基本任务是强固抗日进步势力，抵抗投降倒退势力，力争时局好转，克服时局逆转。为此，必须强调抗战、团结、进步，三者不可缺一。

二月七日 出席重庆《新华日报》职工纪念“二七”十七周年大会并在会上报告“二七”惨案的经过及其意义，指出当前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是：“（一）坚持团结抗战，反对投降倒退；（二）开展反汪派汉奸运动，打击投降妥协分子；（三）广泛讨论宪政，促进宪政实施；（四）发扬与学习‘二七’死难烈士林祥谦和施洋等同志头可断志不可屈的顽强战斗精神”。

二月九日 中共中央指示南方局：目前同国民党谈判的重点，已不是军队扩编为九个师，边区应为二十三个县的问题，而是全面停止磨擦的问题。

二月 继派张友渔通过关系到孔祥熙出钱办的《时事新报》任主笔之后，又派彭友今、陈翰伯通过关系到该报任编辑，使该报的面貌起了较大变化。

三月一日 和秦邦宪接待黄炎培的来访，交谈当前时局问

题。

三月十一日 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目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报告总结抗战以来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针对党内出现的“左”的倾向,全面论述共产党必须坚持与国民党实行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深刻地阐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和在同顽固派的斗争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三月二十日 和张君勱、周炳琳、张澜、杭立武、史良、陶孟和、章士钊、李璜、罗隆基、黄炎培等出席第三次宪政期成会,讨论宪法草案,决定工作方针。

三月二十一日 和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参政员张澜、章伯钧、黄炎培、史良、罗隆基、左舜生等十人,及宪政座谈会的沈钧儒、邹韬奋、张申府、张友渔、张晓梅、潘梓年、曹孟君、刘清扬、韩幽桐等十余人出席宪政座谈会及宪政促进筹备会在重庆举行的招待会,交换对宪政问题的意见。

三月二十四日 向追悼蔡元培先生大会送了挽联。

四月一日 中共中央就国民参政会一届五次会议等问题致电董必武、何凯丰、叶剑英,指示要积极争取各民主党派和中间分子。

四月一日至十日 和秦邦宪、林伯渠、邓颖超出席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五次大会。二日下午,鉴于上午何应钦作军事报告时,歪曲冀察冲突事实真相,于是在会上向何提出质询,要求何应钦公布朱德、彭德怀的电报,以明真相。三日,在会上被推选为第一组(军事国防组)的召集人。六日,在讨论宪政期成会草拟的中华民国宪草修正案时发言。九日,和秦邦宪、黄炎培、张澜等当选为国民参政会第五次大会休会期间驻会委员会委员。

四月初 南洋侨胞回国慰劳团发起人、华侨筹备总会主席陈

嘉庚等于三月二十六日由仰光飞抵重庆。董必武和叶剑英、林伯渠一起至嘉陵宾馆访晤陈嘉庚，就国共两党磨擦问题进行了交谈。

四月 和叶剑英致电项英并报中共中央：胡服（刘少奇）、张云逸来电证明韩德勤、李品仙部正计划大规模进攻江北新四军，建议积极做好应战准备。

五月一日 在《新华日报》纪念五一节特刊上发表题词：“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大战，我国无产阶级的具体任务，是团结全国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在蒋委员长领导下，抵抗日寇的侵略，消灭汪逆伪政权，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中国。”

六月十五日 出席南方局常委会，由袁国平、饶漱石汇报新四军工作，并进行了讨论。

六月十六日 出席南方局常委会，由钱瑛汇报鄂西工作，徐特立汇报湖南工作，对两湖工作进行了讨论。

六月中旬 奉中共中央指示，离开重庆回延安。六月三十日抵西安。七月一日，参加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举行的纪念党的生日晚会，并首先讲话。十三日，由西安动身返延安。途经陕西耀县，因雨受阻车不能行，滞留中赋诗《暑雨》：“暑雨连宵滞耀州，农夫心慰旅人忧。桥倾路圯溪水涨，车不能行客自留。”

七月二十四日 在延安各界公祭成吉思汗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成吉思汗是民族伟人，也是世界巨人，这是我们足以自豪的。我们纪念他，要实行民族平等，研究优良的蒙古文化，将它继承和发扬起来，构成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一部分。”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正侵略我国，它对中华民族施行着分裂政策，企图这样达到其灭亡我国的目的。“我们纪念他要实行民族平等”，“要认清和反对日寇的分裂阴谋，团结国内各民族，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抗

战最后胜利。”

七月二十七日 向党中央汇报自本年一月以来在重庆观察到的一般政治情况，国民党和其他党派，以及妇女、青年、宣传工作方面的情况。

八月一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南方局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

八月四日、七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南方局党的工作报告。周恩来报告南方局的分工是：秦邦宪负责组织工作，何凯丰负责宣传工作，董必武负责统战工作，蒋南翔负责青年工作，周恩来兼任文委的工作。

八月八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就加强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和某些工作人员的作风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董必武说：过去中央苏区政府中有许多党的负责人工作，成为真正的政权。但现在边区政权人才不健全，须有大员去做。边区政府须派大员到庆阳、延安、绥德去工作，并可派外地干部去担任副职，真正使边区成为民主模范区域。毛泽东听后当即表示：同意董老的意见，要派大员去当县长，边区一级要加强，延安设立市委，成为特别市政府。

八月二十日 在陕甘宁边区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上作《更好地领导政府工作》的报告，论述了政府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党和政府的关系等问题，指出：“政府是政权机关，是一副繁重的机器。革命前是掌握在地主、资本家、豪绅、军阀们的手中。他们凭借这副机器作威作福，他们使用这副机器来保卫他们自己，来压榨我们劳苦人民。”“他们有了这副机器，就有了一切。民众没有这副机器，就没有一切。”现在“党领导民众把政权从剥削阶级手中夺取过来，便应当领导他们好好地使用政权，使它能为自己服务。”“政府是政权

机关，它必须真正有权，而党是领导政府工作的。”“党对政府的领导，在形式上不是直接的管辖。党不能对政府下命令。”“党只能直接命令它的党员和党团在政府中做某种活动，起某种作用，决不能驾乎政府之上来直接指挥命令政府。”“党包办政府工作是极端不利的。”“要使政府真正成为群众的政府。政府要为群众做事，为群众谋幸福。要倾听群众的呼声，采纳群众的意见，了解群众的生活，保护群众的利益，但这还不够，还要使群众敢于批评政府，敢于监督政府，一直到敢于撤销他们不满意的政府工作人员。”还特别强调着重教育党员应当无条件地服从和遵守政府所颁布的法令，所定的秩序。批评有些党员犯了法而逃避政府的审判和处罚的现象；并且以国民党在全中国范围内因为它的党员违法乱纪而遭受国人的痛恶作为鉴戒。特地请求边区党通过一个决议，警告我们的党员必须遵守边区政府的法令。党员犯法，加等治罪。“这不是表示我们党的严酷，而是表示我们党的大公无私。”党决不包庇罪人，党决不允许在社会上有特权阶级。

八月三十一日 和徐特立一起出席延安新文字运动委员会为欢迎他们举行的集会，并在会上讲话，指出：“新文字运动者，要以传教者的精神来发展新文字运动。”

九月二日 应朱德同志邀请，和徐特立、张鼎丞、王首道等到延安西川一些地方视察。

夏秋 作《次韵和朱总司令出太行》七言绝句四首：“元戎策马太行头，代北燕南次第收。箪食壶浆迎道左，欢呼甘与子同仇。”“空前国难已临头，破碎山河正待收。贯日长虹没石羽，只知倭寇是吾仇。”“为救危亡强出头，将军能发亦能收。何时驱寇鸦龙外，信有男儿复国仇。”“几许城头复阵头，将军出马寇氛收。蜚声异国称神勇，奸佞无端认作仇。”

九月二十五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向会议提出，请中央指示参加国民参政会的方针。毛泽东发言指出：我们要采取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以争取广大的同情。

十月四日 中共中央南方局会议，讨论内部分工问题。会议决定，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由董必武任书记，叶剑英任副书记，下设军政、党派、社会、青年、妇女五组，分别由叶剑英、秦邦宪、董必武、蒋南翔、邓颖超负责。文化委员会由何凯丰任书记，周恩来任副书记。此外，还有国际问题研究室和华侨工作组等机构。

十月五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关于救济被捕坐牢的同志问题，会议决定：（一）用各种办法实行救济；（二）在狱中同志的责任是坚持党的立场，保养身体，政治修养；（三）不做不必要的斗争；（四）狱中党员不采用支部组织形式。会议还决定，中央组织救济委员会，内部由陈云负责，外边由董必武负责。

十月十日 奉中共中央指示，离延安返重庆，准备参加即将举行的国民参政会，揭露国民党当局发动的反共高潮。茅盾夫妇同行。行前，赋诗《答徐老延安赠别》。

△ 途中夜留陕西富县（酆州）休息。赋诗《过劳山寄延安诸同志》：“今夜酆州看明月，得无清皎与延同？”

十月十二日 到达西安。因重庆政治环境日益恶劣，中共中央又决定林伯渠回延安主持陕甘宁边区工作。奉中共中央指示留在西安，主持八路军西安办事处。

十月十八日 周恩来、秦邦宪致电中共中央，报告蒋介石密令监视周恩来、叶剑英，国民党准备发动全面反共。国民党内部有人估计这次反共会空前紧张。建议董必武暂缓来渝。

十一月三日 中共中央电示周恩来：即刻按南方局意见作紧急布置，博古、凯丰即回延安。

十一月七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投降挽救时局的指示》，指出：我们目前严重存在着投降分裂的危难。我们共产党与各党派各界各军，为挽救民族危亡团结到底，而对亲日派和内战挑拨者决不容忍。要积极加紧统战工作，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切组织必须“全部的完全的有秩序的隐蔽起来，并准备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任何地方都要严防突然事变的袭击。要经得起这种袭击。”

十一月十日 收到毛泽东来电：请要洛阳袁晓轩，速调查汤恩伯集团是否已由南阳一带向豫东开动，以便我方准备自卫。

十一月十五日 毛泽东致电周恩来、项英、董必武、刘少奇等：“决定对皖南取让步政策（即北移），对华中取自卫政策，而在全国则发动大规模反投降，反内战运动，用以争取中间势力，打击何应钦亲日派的阴谋挑衅，缓和蒋介石之反共进军，拖延抗日与国共合作时间，争取我在全国之有理，有利地位。”

十一月十九日 收到毛泽东来电：请你速见熊（向辉）、蒋（鼎文），要求他们停止进攻。否则引起大冲突，双方都不利。

十一月二十八日 收到毛泽东来电：在胡（宗南）进攻期间，西安空气必十分紧张，望令办事处人员加紧检点，一切秘件全部烧掉，片纸不留，一切人员准备被捕时的态度与答话；遇紧急时，保证电台密码不落入敌人之手。

十二月十六日 和李华致电中共中央：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西安办事处及其周围，并不断挑衅。办事处已有人失踪。为应付这一局面，已作好各种准备。

十二月十七日 周恩来电告董必武、南汉宸、李克农，并请延安转港、沪两地：（一）国民政府军事动作未停，“且企图由西而东，由北而南，造成半包围圈”，逼我入江入海；（二）何应钦-白崇禧

不见面，蒋介石也未约谈。

十二月二十三日 和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等被国民政府聘为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十二月二十五日 中共中央发布《论政策》，指示针对党内存在的过左倾向，强调指出：“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决不会变更的。”指示进一步阐述了统一战线的策略原则，仍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

一九四一年 五十六岁

一月四日 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为了包围和不断袭击大江南北的新四军，不但大肆造谣诬蔑，还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以内开赴黄河以北。中共中央为了顾全团结抗日的大局，同意将皖南新四军移至长江以北。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九千余人奉命于一月四日从云岭驻地出发绕道北移。六日，行至泾县内的丕岭一带时，突遭国民党军的包围袭击，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一月十一日 致电中共中央：国民党一再制造麻烦，限制我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人员只准有二十七人，现在实有三十四人。请向国民党进行交涉，取消上述无理限制。

△ 周恩来得知新四军在皖南被包围、袭击的消息后，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董老来渝，剑英四年在外，仍以能回延安参加七大为好。毛泽东收到电报后批示：董（必武）去渝，叶（剑英）回，伍（云甫）去西（安）。

一月十二日 和周恩来、叶剑英联名致电李克农，并报中共中央书记处：白崇禧加紧反共，准备打击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对文化界恐不久将进行镇压，望告文化界注意。

一月中旬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离西安经成都赴重庆，继续协助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和重庆办事处的工作。二月二日，叶剑英返

回延安。

一月十七日 国民党政府发布通令，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并通缉项英。

一月十八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指出“皖南事变是国民党反动派有预谋有计划的反共行径”，表明国民党“已在准备着与我党破裂，这是七七抗战以来国民党第一次重大政治变化的表现”。在大后方应采取各种方式动员舆论与群众，要求驱逐亲日派，改组国民政府，实行民主抗口。

△ 中共中央电示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国民党已准备破裂，你们在重庆的环境日险，应立即设法离渝返延。渝办和《新华日报》干部应尽量减少，减下的同志设法分批返延。党外同情分子分批转移南洋、香港，并助其旅费。

△ 午，到黄炎培住所共餐，与黄就皖南事变的真情和将采取的对策，深入地交换了意见。

一月二十日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

△ 中共中央电示南方局和周恩来：中央决定逐步撤销各办事处，人员陆续撤回，八路军总部不再向蒋呈报任何电文。要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邓颖超及办事处、报馆重要干部于最短期离渝，资料、文件、密码、电稿作积极处理，对留在办事处人员应给以气节教育，作好最坏准备。

一月二十四日 和周恩来、叶剑英联名致电中共中央，报告皖南事变后各民主党派动向。报告说：皖南惨案发生后，他们对国民党大为失望，痛感有加强团结的必要。章伯钧、左舜生等拟发起成立民主联合会，以团结各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国民党左派，与

我党合作共同进行民主和反内战运动。第三党因近日当局压迫，日渐左倾，主张与我党密切合作，盼我们给予切实援助。我们已表示赞同。

一月二十五日 南方局收到中共中央来电：必须采取尖锐对立的步骤回答蒋介石一月十七日的步骤，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

△ 周恩来将解决皖南事变、挽救时局的十二条办法面交张冲转国民党中央。

一月二十六日（旧历庚辰除夕）为抗议国民党蒋介石悍然发动皖南事变，写《集恩来同志一月十八日新华日报题字得“江南一叶是奇冤”之句因成辘轳体四绝句》诗：“江南一叶是奇冤，遵令移师竟被吞。吞后又加违令罪，混淆黑白复何言。百战丰功众口喧，江南一叶是奇冤。茂林血迹斑斑在，泪洒西风白日昏。秦桧主和诛武穆，赵构偏安没齿辱。江南一叶是奇冤，只手掩尽天下目。将军抗日作屏藩，赫赫功勋半壁存。自坏长城千古叹，江南一叶是奇冤。”

一月二十七日 重庆办事处的全体工作人员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朱德：处在政治环境极端严重的重庆办事处同志们向你们保证：无论在任何恶劣的情况下，我们仍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坚守我们的岗位，为党的任务奋斗到最后一口气。二十九日，毛泽东、朱德复电：感电悉，甚慰，望努力奋斗，光明就在前面，黑暗总会灭亡。全国全世界都援助我们的。

二月七日 出席《新华日报》社召开的“二七”大罢工十八周年纪念会，并在会上讲演，号召继承“二七”烈士奋斗精神，不屈不挠，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实现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

二月十五日 和毛泽东、陈绍禹、林伯渠、秦邦宪、吴玉章、邓

颖超致电国民参政会秘书处，提出对于“皖南事变”善后处理办法十二条。要求国民党撤销一月十七日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命令；惩办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恢复叶挺自由，令其继续充当军长；交还新四军全部人枪；释放一切爱国政治犯等。并强调指出，在政府未予裁夺前，中共参政员碍难出席国民参政会。

二月十九日 和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指出蒋介石继续两面政策，目的在于争取外援，壮大自己，以各个击破我们。建议利用各种矛盾以击破之。办法是政治上全面反攻，军事上局部反攻。

二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 和周恩来一起两次会见黄炎培、沈钧儒、左舜生、梁漱溟等。他们前来斡旋，劝说中共改变拒绝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的主张。周恩来、董必武耐心地向他们说明了蒋介石的政策和共产党的立场态度，表示只要国民党不接受我党提出的条件，就坚决不出席。并提醒他们不要上当受骗。

二月二十九日 张冲奉蒋介石之命，敦请董必武、邓颖超出席参政会。董必武、邓颖超表示，国民党方面未能接纳中共提出的十二条办法之前，拒绝出席。

三月一日 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在重庆召开。国民党拒绝接受中共提出的皖南事变善后办法十二条，董必武、邓颖超等拒绝出席。

△ 和周恩来收到毛泽东来电，托收购多种报纸和书刊。

三月二日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为解决“皖南事变”问题，和邓颖超一起致函国民参政会。提出“为顾全团结，加强抗战起见”，提出临时办法十二条：立即在全国停止向我军事进攻；承认中共及各党派之合法地位，释放西安、重庆、贵阳及各地被捕人员；释放所有皖南被捕干部，拨款抚恤死难家属；承认陕甘宁边区之合法地位；

承认敌后之抗日民主政权等十二条临时解决办法，作为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的条件。并表示“倘此十二条能蒙政府采纳，并得明令保证，必武、颖超届时必可报到出席。”

△ 毛泽东电告周恩来：中央书记处一致认为，我们不出席参政会，完全是理直气壮的，而蒋介石国民党亦无可奈何。指出尽管在当前政治斗争空前尖锐的情况，有些中间党派人士发生动摇，但这是一时的，过一会就会起变化。

△ 和周恩来、邓颖超一起致函黄炎培、张澜、江恒源、张君勱、罗隆基、梁漱溟、左舜生、李璜、章伯钧、沈钧儒等各党派领导人，说明为顾全大局起见，提出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作为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和解决“皖南事变”的条件。“惟求诸先生能一致主张，俾此临时办法，早得结果，斯真国家民族之福，万一因一时扞格，大局趋于恶化，同仁等实已委屈求全，问心可告无愧。”

三月五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毛泽东在发言中称赞：这一次我党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三位战士，坚持党的立场，有重大的意义，给了国民党以巨大的打击，会给各方面以极大的影响。

三月八日 和毛泽东、陈绍禹、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电复重庆国民参政会，重申不能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的理由。指出：中共参政员为政府所聘请，而最近政府对中共则视如仇敌。中共中央为挽救危局，以保团结，先后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善后办法十二条和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不仅均未被政府当局采纳，而且政治压迫，军事进攻，反变本加厉。因此重申：皖南事变以来，对于国共团结所加之深重裂痕，一日未被消灭，则我们一日碍难出席政府所召集之任何会议。

三月十日 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在重庆闭幕。中共

参政员为抗议皖南事变拒绝出席这次大会。但本次大会仍选董必武为大会休会期间驻会委员会委员。

三月上旬 在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前夕，多次在张澜住处会见各党派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张申府（救国会）、黄炎培（职业教育社）、李璜（青年党）、章伯钧（农工民主党）等，以聚餐形式开会讨论同国民党斗争的问题，并推动各民主党派成立民主政团同盟。

三月十二日 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我们的攻势（双十二条及不出席）结果，迫得蒋介石作正面回答，却把问题向全国公开了，蒋原欲把问题缩小，现在却扩大，这些都是我们攻势的结果。现在还应继续我们的攻势，直到我们的临时办法各条实际上被承认。

三月十三日 和李璜、章伯钧、张申府、张澜、沈钧儒、罗隆基、周士观、梁漱溟、黄炎培、张君勱、曾琦等在重庆一心餐馆共议国共两党关系问题。

三月十七日 和周恩来、邓颖超宴请各界人士，说明中共对于国共关系及本次参政会的立场和态度，并同到会诸人士讨论时局问题。

三月十八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指出：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指示认为共产党在这次斗争中采用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政策，获得了完全成功。但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域内对我党和进步派的压迫政策和反共宣传，绝不会放松，我党必须提高警惕性。

三月十九日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黄炎培为主席，张澜、梁漱溟为执行委员。

三月二十二日 和周恩来在中共办事处会见黄炎培，并同至张君勱寓所。黄炎培详述三月二十日与蒋介石接洽组织特别委员

会之经过，周恩来、董必武坚决主张党派委员会之组织须在参政会以外。

三月二十四日 和周恩来到张澜寓所同黄炎培、张澜商谈时局。

三月二十七日 和周恩来在黄炎培寓所同张君勱、左舜生、梁漱溟、章伯钧商谈国事，转达了中共中央对组织各党派委员会的主张：名称为各党派委员会，不属于政府。

三月三十日 和周恩来、邓颖超联名，为因抨击国民党的财政金融政策被监禁的著名经济学家、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马寅初六十寿辰赠送对联：“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

春 “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日益紧张，国民党统治区白色恐怖更加严重。南方局在周恩来、董必武领导下，坚决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隐蔽精干，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董必武在传达这一方针时还指出：隐蔽是为保存力量，是为了今后工作，决不应忘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而消极隐蔽，每个党员都要更好地发挥作用，只要把大胆和细心两者结合起来，就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由于正确执行这一方针，不仅保存了党的力量，而且有计划地安排一部分党员转移，开辟新的工作阵地，有效地发挥了党的革命力量。

四月十七日 和周恩来到黄炎培寓所，向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说明苏日签约是苏联一贯的政策，与对华毫无关系，中共的态度决不因此而变更。

四月三十日 和周恩来同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就当前时局及发展趋势问题，交换意见。

五月四日 在《新华日报》为“五四”青年节题词：“发扬‘五四’精神，把日寇驱逐到鸭绿江边去，把三民主义的新中国建立起来。”

五月八日 毛泽东起草了《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

结》，指出：中日间的民族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共间的阶级矛盾依然处于从属地位。

五月十九日 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深刻地批判了主观主义的恶劣作用，号召全党树立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作风。

五月 和周恩来会见朱蕴山，告以蒋介石还在加紧反共投降活动，国内局势仍然严重，希望他为挽救国内危局，推动抗日出力。

六月六日 和周恩来在重庆冠生园，邀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负责人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冷遹、褚辅成及救国会负责人沈钧儒等，商讨时局问题。

六月十八日 和周恩来、梁寒操、冯玉祥、沈钧儒、老舍、郭沫若、王昆仑、曹靖华等一起，出席由中苏文化协会、文化工作委员会、国际反侵略运动中国分会等单位举行的高尔基逝世五周年纪念晚会。

六月二十二日 德国希特勒对苏联发动突然进攻，苏德战争开始。

六月二十七日 和周恩来到左舜生寓所，同章伯钧、黄炎培、张申府、沈钧儒、左舜生、周士观等商讨目前国际国内局势。

七月一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

七月四日 为纪念“七七”抗战四周年，撰写了《我国抗战四周年之民主政治》一文，因被国民党政府扣压，不准在《新华日报》上刊登。此文八月五、六日由延安《解放日报》以代社论发表。文章指出要动员民众，进行民族战争，挣脱日寇强加于我们身上的枷锁，“就必须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彻底的改革，以求适合于抗战的需要。只有这样，民族革命才能达到胜利的目的。”“我国的政治太落后于时代和广大人民的要求了。它还没有走上民主

化的道路，还不能发挥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和自动性。”“能够发挥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积极性和自动性的政治制度，只有民主制度。”“民主是全国力量的基础”，“民主又是战胜日本法西斯的指针。”

八月一日 为《新华日报》写的署名文章《联合起来扑灭法西斯》，以代社论发表。文章深刻揭露了法西斯的反动本质，指出：“法西斯主义就是黑暗野蛮的统治阶级向民主自由和劳动群众施行最残酷的进攻；法西斯主义就是疯狂猖獗的反动和反革命；法西斯主义就是横行无忌的民族侵略主义和强盗的战争；法西斯主义就是爱好民主自由的人们和劳动群众的死敌！”“但有些人并不深刻了解日寇亦法西斯，并对日寇盟友德、意法西斯的反动实质亦认识不足。”“必须把我们的抗日和苏、英、美的反法西斯运动配合起来，我们一定能战胜日寇。”呼吁中、苏、美、英四国人民联合起来，“协同动作，一定要扑灭法西斯。”

九月七日 在《新华日报》发表九月一日为纪念国际青年节的题词：“全世界青年团结起来，打倒法西斯主义，扑灭东方的法西斯是中国青年首要的历史使命。”

九月八日 和周恩来、邓颖超联名电唁《大公报》社长张季鸾逝世。

九月二十三日 中共中央复电周恩来，同意由董必武兼任南方局宣传部长。

十月二日 和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请示应否正式向国民党提出出席下届国民参政会的条件及董必武应否出席蒋介石举行的宴会问题。中央当日复电，指示采取积极态度，要求国民党解决新四军问题，否则仍不出席；董可应邀赴宴。

十月六日 出席中共中央南方局会议，汇报关于出席参政会问题和财政问题。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高级学习组，周恩来为

学习组组长，董必武为副组长。

十月十日 为《新华日报》撰写代社论《辛亥革命三十年》。论述辛亥革命后三十年，我国灾难重重，但历史仍在进步。从经济、文化、政治、军事诸方面精辟地分析了这种进步：“民族资本与无产阶级的的发展，乃促成中国民族反帝反封建的历史阶段之到来；”“五四时代的我国新思潮、思想界的活泼，呈二千年来所没有的如火如荼的伟观”，“而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更成为这三十年中国思想界的主力军。”“中国共产党由萌芽而成长壮大，已成为中国政治中主要的决定因素。”这些进步“不能不溯源于辛亥革命”。指出“辛亥革命的胜利是伟大的。”“辛亥革命的成就和孙中山先生的事业是不可分离的，特别是铲除帝制，建立民国，非中山先生莫办，先生创造三民主义，为革命的鹄的”。他所提倡的三民主义，首先是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七七抗战，我国系进行正义的民族革命战争，这是实践和扩充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已获得胜利的民族主义。为着争取这一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须动员全民和团结各种抗日力量，这就要实行民主，这也就是把中山先生辛亥革命未能实现的民权主义付之实施。”我们应当发扬辛亥革命的精神，坚持团结抗战，实现政治真正民主化，联合民主国家反对法西斯，驱逐日本法西斯强盗出中国。

△ 和邓颖超、孔原参加周恩来召开的谈话会，讨论参政会问题和外交问题，以及对国民党九中全会应注意搜集资料等。

十一月七日 和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报告南方局准备整风学习的情况：成立高级学习组，决定先研究思想方法论，同时搜集党史资料，准备以后研究讨论，并将学习中共党史。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王稼祥来电指示，学习中共党史先从讨论六大以来的文件入手。

十一月九日 和周恩来、邓颖超参加国民党谈判联络人张冲的追悼会。并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悼念张冲的挽词。

十一月十二日 和周恩来在张君勱寓所，同沈钧儒、张澜、张君勱、左舜生、章伯钧、黄炎培、李璜、罗隆基、余家菊等共商国事。

十一月十四日 为庆祝冯玉祥六十寿辰，在《新华日报》发表祝寿词：“上将勋名日月高，时危草野起英豪。龙争虎斗风云会，豕突狼奔海宇骚。力赞中枢抗强寇，性耽佳句弄柔毫。吟诗寿世原余事，语妙井州快剪刀。”

十一月十五日 接到国民参政会开会通知后，和周恩来会见张群、王世杰。张、王反复说明由他们负责在参政会后努力设法释放叶挺，坚持要中共参政员出席参政会。周恩来、董必武答应将意见转达中共中央，同时说明请假不出席会议的理由。

十一月十六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来电，共产国际要我们出席参政会，如你们还未最后答复王世杰，可顺水推舟，要王担保释放叶（挺）、发饷，则在渝两参政员请假事可以撤回，并准备出席。请根据情况定夺。

△ 与周恩来、王若飞、柳亚子、老舍、夏衍、梅贻琦出席郭沫若五十诞辰暨从事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祝贺活动。

△ 和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张群、王世杰已担保在参政会后释放叶挺。我们决定以两人报到，董必武一人出席，以督促其发饷。

十一月十七日至二十六日 和邓颖超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十八日，听取了行政院各部作的财政、交通、经济、社会等报告。十九日，听取内政、粮食、教育、农林等项报告，并被推选为军事国防组召集人之一。二十六日，当选为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休会期间驻会委员会委员。

十二月一日 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悼张栗原先生》一文。文

章回忆了五四运动后，在武昌和张先生结识的经过。张先生任武昌高等师范附属小学级主任。由于“先生的人品及多年教育工作的成绩，使他在附小教职员及学生中有极高的权威”。称赞先生是一位“潜心研究学术、不求闻达、恂幅无华的学者。”用新科学方法研究教育，支持并鼓吹教育上的改革。先生加入国民革命运动以后，更加支持、掩护革命活动，武昌高师附小有一个时期，简直就成了湖北革命运动的指挥机关。今天在悼念先生之际，虽然悲感，但并不失望。先生在湖北及其他各地的学生成千累万，会继承先生的事业的。

十二月八日 日本在太平洋上对美、英发动突然袭击，美、英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

十二月九日 中国共产党发表《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指出，全世界划分为进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斯阵线与进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最后明朗了。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坚决站在反法西斯国家方面，动员自己一切力量，为最后打倒日本法西斯而斗争。

△ 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德、意三国宣战。

十二月十二日 出席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二次大会休会期间驻会委员会首次会议。讨论关于政府对德日意之宣战及与反侵略国家合作互助案。

十二月十七日 和周恩来一起同张澜、张君勱、左舜生、李璜、黄炎培、王造时出席王世杰、张群举行的午餐会，商谈参政会决议案四条实施办法。

十二月十八日 和周恩来一起，同张申府、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等在张君勱寓所，商谈时局问题。

十二月十九日 和周恩来一起同张澜、张君勱、左舜生、李璜、黄炎培、王造时等再次出席王世杰、张群举行的午宴，继续商谈该

参政会决议案四条实施办法。黄炎培慷慨陈述政治机构之混乱，前途之危急。

十二月二十一日 在《新华日报》特刊上发表追念女科学家、小麦育种专家沈骊英逝世的挽词和诗篇。

十二月二十六日 和周恩来、沈钧儒、王造时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负责人张澜、左舜生、黄炎培、冷遹、章伯钧在重庆特园的聚会，共商时局问题。

十二月二十九日 和黄炎培、左舜生、吴耀宗、邓初民等出席中苏文化协会举行的座谈会，讨论时局问题，发表了对时局的看法。

十二月间 和周恩来、邓颖超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接待从香港进入广东东江游击区，而后抵达重庆的华侨领袖司徒美堂，并就国事各方面问题进行了交谈。

十二月（至一九四二年一月） 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举行会议，总结两年来的工作。周恩来在会上讲话，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国民党统治区实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正确方针，要求把西南党建设成为更加坚强、更能战斗的党。指出党的领导机关要熟悉国民党统治区各方面的情况，善于估计形势，运用策略，创造各种各样的工作方法，使上层工作和下层工作、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党外联系和党内联系相互配合（不要暴露）。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工作提高了共产党的政治威望，孤立了国民党顽固派，为坚持全民族抗战和配合敌后解放区战场的斗争作了贡献。

一九四二年 五十七岁

一月九日 和周恩来来到黄炎培寓所同张澜、张君勱、左舜生、章伯钧、沈钧儒、张中府、鲜英等会谈。

一月二十九日 和周恩来、郭沫若、沈钧儒、陶行知、邓初民、张西曼等出席钱亦石先生逝世四周年紀念会。和沈钧儒、郭沫若先后在会上致词。同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反侵略声中纪念钱亦石先生》一文。指出：先生在十年前就从事反法西斯侵略运动。在全国抗战数年前，他所写的分析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文章中，就公然指责德意日是侵略者，并结成三位一体的侵略战线，预言一九三七年是世界同时大敲战鼓之年。他不仅主张我们要抗战，而且分析了抗战获得胜利的条件。“亦石先生不仅口头和笔下主张‘抗战’，而实际去参加了抗日战争。‘八一三’后，他组织一个工作团随抗日名将之一的张向华将军在浦东工作，以辛劳致疾，竟以不起，他的死是为抗战而死的。”

二月一日 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全党整风运动开始。

二月八日 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

二月十六日 和周恩来致电毛泽东、王稼祥，报告南方局整风学习的情况：重庆办事处及报馆高级学习组已进行学习约十六

周，每周九小时，从未间断；上周起研究中共党史。

三月十二日 上午八时，和周恩来一起，同黄炎培、左舜生、罗隆基、章伯钧等人就苏德战局、日苏关系、太平洋战局的发展以及国民党当局的心理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三月二十日 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驻会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听取外交、教育等方面的报告。

四月十五日 和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对那些想去根据地的民主党派人士应表示欢迎，认为这样既给了他们一个确实的出路，也是我们争取中间党派的绝好机会。如果不表示欢迎，他们别无出路，势必一部分人可能消极，这样正符合国民党的愿望，而且民主运动也会受到损害。提出争取中间分子要靠我们党的路线的正确和执行得法，也要靠他们自己的体验。只要我们耐心地同他们接近，对他们诚恳和有礼貌，他们对我们的不满就会减少。为了开展统一战线，为扩大民主运动，同时也为了养成我们自己在民主制度下同其他党派合作的作风，建议中央加以考虑。

四月十七日 出席第二届第二次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听取了何应钦关于国内外最近军事作战情形的报告。

六月八日 南方局决定成立学习委员会，由周恩来、董必武负责，正式组织全体党员进行整风学习。

六月下旬 周恩来因劳累致疾住院。

七月二日 接到毛泽东电报，电称：“恩来须静养，不痊愈不应出院，痊愈出院后亦须节劳休息，请你加以注意。”

七月初 同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会面，再次向王提出国民党当局应释放叶挺的要求，并向王介绍了我党《“七七”宣言》的大意，表示参政会应是国内团结的标志，国共两党问题应从政治

方面寻求解决。

七月五日 致电党中央毛泽东，请示可否出席三届国民参政会及我党参政员名额等问题。六日，毛泽东复电：为争取国共关系好转，我们准备出席参政会，不争参政员名额，但以维持原额为宜。

七月七日 为《新华日报》撰写代社论《“七七”抗战五周年》。指出：经过五年抗战，“我国得道多助之势已成，日寇捉襟见肘之形渐露，曙光不远，只要我国人民抗战到底不懈，坚决地抗下去，胜利是可操左券的。”

七月上旬 同张治中会谈。向张说明：（一）中共对抗战胜利有坚定信心。（二）在取得胜利之前必定遇到空前的困难。克服困难，主要是依靠国共两党间的合作；两党之间的军事政治问题，经过商谈总可求得解决办法。

七月二十七日 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等六人继续被国民党政府聘为第三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九月十二日 和邓颖超、潘梓年、钱之光等在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召开纪念“九一八”十一周年筹备会。会议决议四点：（一）通电拥护苏联政府将反法西斯战争进行到底；（二）给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致敬电；（三）给抗战及军人家属致敬电；（四）加强民众运动力量。

十月十七日 为国民党即将召开国民参政会事，周恩来致电毛泽东，请示中央。十八日，毛泽东在复电中指示：在延安的参政员请假，董必武、邓颖超出席，应采取“七·七”宣言所持的态度。

十月二十二日 和邓颖超出席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开幕式。

十月二十六日 在国民参政会第一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军事方面的报告和建议）会议上发言。驳斥了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诬

蔑八路军“各自为政”以及 CC 分子、国民党一些参政员要求“加强军事统一”的反共谰言，介绍了八路军在华北敌后英勇顽强、艰苦卓绝坚持抗战的显著战绩，并指出十八集团军抗战五年多没有得到国民政府当局一枝步枪的补充，重兵器完全没有。三年多没有得到一粒子弹和一点药品的补充，两年来没有领到一文军饷。十八集团军不是天神，它的兵要吃饭，要穿衣，要作战，处在这种情况下怎能责怪八路军“各自为政”呢？发言后，何应钦部属进行了无理狡辩，董必武再次发言予以批驳。

十月三十一日 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宗派主义在对党外关系上的排外性》一文。指出：宗派主义“在党内阻碍党的统一团结，对党外阻碍党与非党人士的团结。”有的人“对党外的嚣张跋扈，将比在党内更厉害些”。文章论述了革命政党必须与群众密切联系的极端重要性：“马列主义认为：革命政党必须与群众密切联系。”“党要完成其革命任务，更非依靠党外人士（特别是劳动群众）作基础不可，任何时候，党外人士总比党员要多好多倍。不团结党外人士，党就一步也不能前进。”“要团结全国各抗日党派、各阶层，首先必须与党外人士民主合作。”指出：共产党员“不仅要善于依据党的政策去领导党外人士，同时也要善于向党外人士学习。向党外人士学习，向群众学习，是马列主义政党的一个基本原则。”“我党与党外人士民主合作的原则是永久的、是不变的。这是因为我党不能脱离群众而存在”。“共产党除了群众的利益，没有其自身单独的利益。它不是谋个人或几个人私利的团体。”告诫全体共产党员，除了要在理论上认识宗派主义者骄傲和狭隘的作风的错误之外，还必须在实践中去克服。我们用马列主义的原则作指导去和党外人士一起生活和工作，可以告诉他们一些东西，同时也要从他们那里吸取新的东西，以充实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 被选为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休会期间驻会委员会委员。

十一月七日 和周恩来、邓颖超出席苏联驻华大使馆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二十五周年的招待会。

十一月二十日 出席第三届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首次会议。听取秘书处关于本届第一次决议案处理经过，经济运动策进会筹备情形，以及外交部关于最近外交国际情形的报告。

十二月二日 和周恩来、林彪在办事处会见新西兰友好人士路易·艾黎，并共进晚餐。

十二月四日 出席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驻会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听取国民政府外交部和粮食部的报告。

十二月二十三日 出席国民参政会经济策进会第一次常务委员会会议。

十二月三十日 向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人员报告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情况。

一九四三年 五十八岁

一月一日 和周恩来、林彪在重庆红岩嘴办事处招待沈钧儒、张申府、刘清扬等，并为沈钧儒祝寿。

一月四日 在南方局工作人员大会上作关于前阶段整风学习的总结报告。

年初 和周恩来帮助谭平山、陈铭枢、王昆仑、郭春涛等发起组织民主同志座谈会，以团结国民党内的民主进步分子。本年九月该会定名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

二月六日 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我所看见的一年整风运动》一文。文章综述了整风运动一年来所取得的成就，指出整风就是发动全党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解决党的局部或党员个人身上旧的传统和不正之风。“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这样的一种人，他不怕找出自己的病根，且相信他一经发觉病之所在，决有法子把它治好”。“我们党所以能够进一步布尔塞维克化，就在于他一认为还有什么不正确的残余存在，他就毫不留情地加以揭发，加以纠正，一直要把那些不正的残余肃清为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曾引用大诗人弗洛伦萨的格言‘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这是马克思的格言，也就是我们整风运动的格言。”

二月十六日 和周恩来、邓颖超同冷遹、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鲜特生、史良、刘清扬、陶行知、杨杰、张申府、沈钧儒、邓初民等

十八人在特园聚餐，讨论世界战局。

△ 和周恩来、林彪到黄炎培寓所，同黄炎培、冷通交谈国事。

二月二十八日 和周恩来、邓颖超等出席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召开的重庆地区我党政军工作人员联席会议。

三月二十九日 和周恩来、林彪在曾家岩五十号同前来拜访的黄炎培、冷通谈世界大局。

春 和周恩来拜访国民党将领鹿钟麟，祝贺他的六十寿辰，并赠送书籍。

△ 和周恩来派华岗赴云南昆明联络龙云以及当地高级知识分子，争取他们和我党合作，团结抗日。

四月一日 在南方局整风学习会上，报告学习问题、统一战线工作问题以及交朋友、待人接物问题。

四月三十日 在南方局会议上代表审干委员会作关于审干的经验教训的总结。

五月十六日 为纪念张自忠殉国三周年题诗：汉水东流逝不还，将军志勇震瀛寰；裹尸马革南瓜店，三载平芜血尚斑。

五月二十三日 和林伯渠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谈判近况。

五月二十四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来电告周恩来、董必武：共产国际解散，党中央将讨论中国政策，请周恩来即回延安。

五月二十五日 和周恩来在曾家岩五十号会见宗教界人士吴耀宗，交谈国内外形势。

五月二十六日 中共中央在《解放日报》公开发表《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出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

六月四日 出席南方局会议，讨论宣布共产国际解散后的时

局及对策。

六月二十五日 和周恩来、林彪在中共办事处，同来访的黄炎培长谈。

六月二十八日 周恩来离开重庆返延安参加党的“七大”筹备工作和整风学习。此后，主持南方局工作。

六月 南方局调周新民及李文宜到昆明进行统战工作，指示他们广交朋友，扩大爱国民主统一战线。

七月一日 《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二周年》，被国民党当局无理扣留。七日，国民党当局又禁止《新华日报》刊登中共中央的“七七”宣言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将上述文件印成传单散发，并采取措​​施作好防止突然袭击的准备。

七月三日 就国民党当局扣压《新华日报》纪念中共二十二周年社论一事电告毛泽东：今日《新华日报》社论，只说我党坚持抗战及十八集团军、新四军配合友军作战成绩，我党对国家民族有不少贡献，今后仍坚持抗战、团结、民主方针，竟全部被扣，又派多人来报馆监视。

七月四日 接毛泽东来电：蒋介石正增兵包围我陕甘宁边区，内战可能爆发，请发动国统区广大群众及各界人士起来呼吁制止内战。同时，对张治中、刘为章及各国驻重庆使馆说明，我们正在研讨解决国共关系的办法，以赢得同情和制止内战的时间。

七月九日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将“七·七”宣言、朱德总司令致蒋介石胡宗南电、延安新华社揭穿西安特务假造民意的新闻及延安民众大会通电，秘密印发各报馆、各外国使馆、各中间党派及文化人士，并设法寄往成都、桂林、昆明各界及地方实力派。

七月八日、九日 同章伯钧等晤谈。在章伯钧等表示如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拟在四川发动反蒋军事活动来策应之后，指出：

我党的态度第一步是竭力阻止内战爆发；第二步如万一胡宗南敢于冒险，地方军队如起而反对也是重要的。谈话后即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

七月十二日 同黄炎培谈本月七日晚间国民党胡宗南军队炮击我陕甘宁边区的情况。

七月十三日 毛泽东致电董必武，赞扬他在打退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中的工作：“你的工作很得力”。并告：据此间获悉，不但七日记者会上各国记者纷纷质问张道藩，而且各国大使开了会，警告中国政府不要内战，否则各国援助将终止。史迪威并说，如中国内战，他必将飞机带走。因此蒋在十日不得不电胡改变决心，内战危机或可避免。

七月中旬 致电中共中央，建议组织力量批判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对国民党顽固派展开一个宣传攻势。

七月二十日 毛泽东复电，指出为彻底揭穿蒋介石企图以宣传攻势动摇我党，以军事压迫逼我就范的阴谋，除已发之通电和社论外，于本日公布陈伯达写的《评中国之命运》一文，驳斥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从思想上理论上揭穿蒋之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体系。并告收到此文广播后，印成中英文小册子，在中外人士中散发；搜集各方反映，报告党中央；《新华日报》、《群众》用其他迂回方法揭露中国法西斯的罪恶。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立即动员南方局、办事处和《新华日报》及地下党的同志，秘密印发了上述各种文件和材料，利用各种场合，向社会各界、各方人士揭露国民党的阴谋。

七月二十二日 向中共中央报告国民党军队进行鄂西战役情况，由于国民党当局开始对敌情不明，以后判断又出错误，招致损失十万人，蒋介石已亲到恩施召开军事会议。

七月下旬 向中共中央报告：（一）美军代表团要求提供最近八路军、新四军所牵制之日军番号、人数、将领姓名等；（二）陈诚允叶挺移柳州居住；（三）邓初民即去川军辖区开展工作等。

八月十一日 接毛泽东、周恩来来电，电告国民党法西斯统治正在步步加强，应动员大后方民主力量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开展反对中国法西斯化的宣传运动，组织文化界起来反对国民党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但不要暴露隐藏的文化人。

八月十二日 应左舜生、李璜、章伯钧、张君勱的邀请，到特园鲜英寓所参加晚宴，沈钧儒、史良、陶行知、邓初民、冷遹、黄炎培等参加，纵谈时事。

八月十六日 向中央报告参政会十三日开会情形：据出席会议的黄炎培说，何应钦在报告中没有怎么攻击我们。国民党迫于形势（英美苏都关心中国内战），改变了在会上通过反共决议的原计划。

八月二十四日 接毛泽东、周恩来来电：现美使馆情报处所愿交换之情报，如亦属敌伪情况及彼此抗战情况和宣传品可交换，在政情方面，我可供给边区游击区之民主建设和生产情况，彼方可告我以援华实况。

八月 向中央报告：对国民党反动当局加紧压迫作家和出版界，拟发动被压迫者作各种形式的抗议，以配合我党对顽固派的思想斗争。

九月三日 接周恩来来电：大后方党内阶级教育过去多偏重对斗争策略的解释和讨论，现应深入到瓦解和肃清大后方党内从武汉抗战时期种下的对国民党的阶级投降主义的一些残留思想。可组织学习和讨论七、八两月《解放日报》广播的文章，作为整风的继续。

九月九日 接毛泽东、周恩来电，说国民党有可能找董必武谈话，可顺带交涉陈绍禹、王稼祥等乘苏机去苏治病事。

九月十一日 接毛泽东、周恩来电，要求在把国民党情况弄清前先不要到国民参政会报到。

九月上旬至十月上旬 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批判抗战初期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会议概括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表现，认为错误的实质是放弃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并分析了错误产生的根源。

九月十四日 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国民党十一中全会于十三日对我党作出决议，责骂攻击我党“加紧危害国家，破坏抗战。”该决议已由中央社公布。请示中央可否通知参政会会议秘书处，我方不出席即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三届二次会议。

九月十六日 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决定你可出席本次参政会。会中，如有反共报告提案及决议，视情况或当场抗议，或退席后再提书面抗议，由你依据具体情况行之”。对国民党反共决议，中央决定发表一文件回答之。

△ 致电中共中央，报告民主同盟决定，参政会如有反共提案或通过反共决议，他们将不联署，不举手。

九月十七日 接周恩来来电，建议通过章伯钧联络龙云，在龙云的行营中建立电台。

△ 午前接见来访的王世杰，谈关于出席国民参政会问题。对王表示，原已作出席打算，但看昨日中央日报骂我党的社论，不能不有点踌躇。如果要利用参政会作出反共决议或发表反共言论，我必然要起而抗辩。如果这样，将对形势发展不利。因此我不出席。后来，王作出保证会上不作反共言论的诺言，劝董出席。下午，根据中共中央相机行事的指示，到大会秘书处报到，表明将出

席这次参政会。

九月十八日 单独出席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开幕式。

九月二十一日 国民党反动派违背自己不在会上进行反共的诺言，何应钦利用作军事报告的机会，颠倒是非，大肆攻击中共和十八集团军“不顾大局，扩充实力，袭击友军，破坏抗战”，“割据地盘，破坏统一，滥发钞票，破坏金融，大种鸦片，破坏禁令”等等。董必武在何报告后，依照议事规则，立即对何提出口头质询，针锋相对地进行了反驳。董必武首先问何：十八集团军在敌人连续扫荡、严密封锁，实行铁壁合围、三光政策的严酷情况下，深入敌后，坚持抗战，牵制住敌人十几个师团的兵力，粉碎了敌人迭次扫荡，取得了巨大成绩，何对此为何一字不提？接着指出：胡宗南调集大军向陕甘宁边区进攻。友好国家援助的大量药品以及政府应发给部队的药品，甚至外国友人单独为十八集团军在国际上募集的药品，都被国民党政府扣留。几年来，在敌后浴血奋战的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一片药品都没有领到过。这些事实说明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是国民党，而真正坚持团结、坚持抗战、援助国民党军配合作战的是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董必武并根据事实揭露了韩德勤、秦启荣向八路军、新四军寻衅闹磨擦的事实经过。整个会场鸦雀无声地听取了董必武的有力质询，非国民党的参政员认明了真相。何应钦则理屈辞穷，无言以对。国民党CC分子出面捣乱，对董必武的质询起哄攻击。董必武对这种违反议事规则的捣乱行为提出抗议后，毅然退席。国民党参政员大哗，会议无法进行，被迫休会。

△ 当晚，致信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主席团，声明不再出席本次大会。并向中共中央报告口头质询何应钦的内容以及退出会议的经过情况。

△ 致电周恩来：龙云已于十四日离开重庆，据说龙和罗隆基关系密切，建议通过罗隆基说服龙云在昆明建立电台，与延安取得直接联系。

九月二十三日 收到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主席团要求继续出席的复函后，再次表示：有人决心利用参政会宣传反共借以表示“民意”，故决不出席会议。

△ 致电毛泽东、朱德，报告二十一日退席后各方面的反映：“于震瀛认为我们宣传大成功，乘机把要说的话都说了，国民党人士也认为我们胜利，他们失败。几个老头都认为很好，向来没听到的话都听到了。”“王世杰也发牢骚说，对共产党既不用武力解决，又不愿政治解决，这是自告党的政策破产。”

九月二十五日 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报告蒋介石今日在参政会的讲演中表示愿实行民主政治、组织宪政促进会与党派协进会。竭力拉拢张君勱、左舜生、李璜等。蒋这样做的目的是拉拢中间派，分化我党与中间派的关系。

九月二十六日 同前来拜访的黄炎培、冷遹畅谈。表示不再出席本届国民参政会，如果组织协议机构或可出席。

九月二十七日 国民党在董必武退席后，一方面封锁消息，另一方面则利用在参政会中的多数，通过所谓《关于十八军集团军的决议》，诬蔑中共破坏“政令军令统一”。同日大会闭幕，仍选董必武为大会休会期间驻会委员会委员。会后，董向非国民党参政员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做了大量工作，揭露国民党利用参政会进行反共的卑鄙阴谋，使国民党在政治上陷于被动。

△ 致函蒋介石，要求恢复被国民党无理查封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电台，改为中共代表团设置使用。后来在谈判中又多次提出，国民党当局拒绝启封。

九月二十九日 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蒋介石在参政会的讲话是欺骗，告诉各中间派“不要过于乐观，要静观国民党事实表现。蒋及国民党每遇一次危机，即来一次宪政欺骗，毫无诚意，不要上当。”并指示不要出席本届参政会驻会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以示对三届二次参政会通过之反共决议的抗议。

九月三十日 在沈钧儒处，同张君勱、左舜生、邓初民等交换对目前民主运动的意见。研究了对付蒋介石拟组织的宪政实施筹备会的办法。

九月 致电中共中央，根据福建龙岩国民党特务呈报国民党中央的情报，我龙岩县党组织已被破坏，书记遇害，多人牺牲，并有二人叛变。

十月一日 接周恩来电：华岗既去滇养病，可否作长久打算，要让他与罗隆基联系，必要时让罗带他见龙云。

十月二日 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了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蒋介石的开幕词及会议决议的情况。

△ 同王世杰会晤并谈话。指出：胡宗南军队进攻边区，国民党十一中全会上指责中共的所谓罪状的由头很厉害，参政会上又通过反共决议，以致引起紧张局势，责任不在共产党方面。我方坚决拥护抗战，绝对不愿内战，欢迎政治解决两党问题，这个基本态度始终如一。要改善现状至少要把国民党军队包围边区的状况解除。

十月初 致电周恩来，报告自退席参政会后，国民党特务对红岩和曾家岩的包围，盯梢已成公开；出外必盯，且盯至关系人家中，令警察查户口；来客则盯入大门，甚至企图混进红岩。已决定应付办法：尽量少出，定期约会，用汽车送；不约人来两岩，自动来时，告以一时期不要来；送秘密信另改办法。

十月五日 接周恩来电：为防备国民党特务袭击的可能，提议停开大报告会，改小组讨论，红岩人员非经特许不外出，两岩利用此时机闭门进行阶级教育和思想生活的检讨等。

△ 接毛泽东来电，延安对国民党已取缓和态度，并表示愿意恢复两党谈判。以后谈判由你担任。见蒋介石时除申述欢迎政治解决外，应指明整个西北国民党军队备战甚急。延安不相信国民党对政治解决有诚意，但延安欢迎政治解决，不愿破裂。如继续合作，则延安保证继续实现四条诺言，并要求国民党撤退包围边区的军队，见王世杰或邵力子时，除申述上述意见外，还应指明：内战必投降，这是死路，愿彼方善处。我党准备对付任何险恶局面，但首先愿意继续合作。着重指出国民党胡宗南令军长董钊率部开赴榆林对我威胁甚大，刺激最深，延安不能不准备自卫。

△ 应约同邵力子谈话。邵希望能出席十月十五日举行的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并说“国共关系应当用政治方法解决，而且是可以解决的。”当即向邵表明：“我党的基本态度，是希望坚持抗战、团结、进步、民主，两党关系是可以好转的。”提出了改善两党关系的具体办法：双方停止刺激感情；国民党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和缓空气。

△ 和黄炎培、左舜生、沈钧儒、冷遹、章伯钧等商谈宪政协进会事，向他们解释目前中共的基本态度：我们要求民主政治，现在至少要求国民党采取能代表民意的一些步骤。

十月六日 致电毛泽东，请示是否出席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十五日的会议，并说：“我不出席第一次会议。在政治上的作用不大，因我党已宣布政治解决，对王、邵的私人关系，恐引起不融洽之感，特别是对邵会影响以后谈话的桥梁。”十日，毛泽东电复：“可以出席常驻会及参加宪政会。”

十月十一日 同邵力子、王世杰晤谈。表示我党愿意恢复两党谈判，欢迎政治解决；但胡宗南说“打下延安，不成问题”，仍在西北增兵，加紧包围威胁边区，急须解决。王、邵解释说：“中央绝无对边区用兵之意。”希望通过商谈，做政治解决外，还提出派人“到边区看一下。”对此，答复：如果各方希望选几位国共双方比较信赖的人，到边区去看一下，若人选得当，延安一定欢迎。

十月十二日 致电周恩来，告知已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支部大会上宣布关于秘密工作的指示，除按指示去作外，并作以下规定：通知在外直接联系人员三个月内不要到两岩。统战委员会在外之据点亦停止联系；约会、密件均须面约及口头传达，禁止由交通传递；两岩内部文件均由汽车上下山时携带。

△ 应邀会见蒋介石。邵力子、王世杰在座。蒋问：周恩来是否来？董答：我想他不会来。董向蒋提出：希望将胡宗南的部队改成六月前的状况。蒋说：总要慢慢地调动，决不会在国内用武的。并要邵力子、王世杰与董必武联系。当日，将会见蒋的情形电告毛泽东、周恩来。十五日，毛泽东电复：可告国民党，周在渝三年无事可做，暂时不拟出来。董被委以全权与彼方谈判一切问题。

十月十五日 出席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驻会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十月二十日 收到国民党方面送来的宪政实施协进会组织规则及会议名单（会员由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指定）。和周恩来一起被指定为会员。同时被指定为会员的还有：褚辅成、张君勱、黄炎培、胡霖、邵从恩、王云五、左舜生、陈启天、傅斯年等。董必武还被指定为常务会员。

十月二十二日 接周恩来电：请密告蒙巴顿和史迪威，国民党正增兵西北，目前包围边区的兵力共十四个军（三十七、八个师），

一个骑兵军(四个骑兵师)。

十月三十日 同黄炎培谈宪政实施协进会事宜。

秋 在南方局扩大会议上,传达了周恩来返回延安后于八月二日在欢迎他的大会上发表的演说中作出的重要论断:我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的意见,贯穿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的、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的路线,就是中国布尔什维克的路线。通过这一传达,对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党员干部进行了阶级教育和路线教育,并表示了自己对毛泽东革命路线的衷心拥护。

十一月一日 夜,出席以宪政实施协进会正副秘书长名义召集的聚餐会,详谈该会必须进行研究的宪草研究、国民大会代表、言论开放等问题。

十一月五日 同黄炎培、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冷遯等共商宪政实施协进会问题。

十一月九日 同王世杰晤谈。在王探问董的权限,以及国共谈判如何继续进行等问题时,向王指出:首先要解除国民党军队对陕甘边区的军事包围,中共欢迎公平合理的政治解决。

十一月十六日 同邵力子、左舜生、褚辅成、黄炎培、冷遯、刘任平、张志让、杨卫玉、张君勱、王造时等聚餐,商谈宪政协进会问题。

△ 晚,出席宪政协进会第一次常务会员会议,通过办事细则,决定分设三组:第一组,关于宪法草案研究事项;第二组,关于民意机关事项;第三组,关于宪政有关法令实施状况事项。被编到第二组。

十一月二十二日 接到中共中央宣传部来电:《新华日报》、《群众》杂志在国民党统治的险恶环境下,能采取各种方法开展斗

争,是有成绩的。但在今年七、八、九月反击反共高潮中却刊登了几篇大捧林森,宣传宋子文、苏州反省院长等国民党官僚和两年实行宪政等文章。在平时,对蒋介石、国民党亦常头条大题,使国共在群众中无所区别。指出大后方的思想斗争的中心任务,不是党的自我批评,而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反动派,坚持宣传我党我军的抗日成绩,解放区的进步,宣传唯物主义世界观和革命人生观。报纸应坚持群众性,多登群众需要的和自己写的,使人民觉得是自己的报纸。要求作详细检查与具体改革计划。

十一月二十六日 在接到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指示以前,于十月八日、十五日召开座谈会,用自我批评方式,批评了某些同志发表有不健康或错误内容的文章。本日,在办事处主持座谈会并讲话,批评了在《新华日报》、《群众》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在理论方面出现的错误,阐述了思想与感觉、理性与感性、理智与感情的关系问题。指出他们犯了唯心论和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错误。

△ 致电周恩来和中央宣传部,说在接到指示前我们已对《新华日报》和《群众》、《中原》两杂志近期内发表的几篇有错误的文章进行了批评,并开展了理论讨论。报馆编辑部负责同志和有关同志都同意中宣部的批评,并据以改进工作。

十二月七日 召集《新华日报》编辑部负责人员与红岩、曾家岩负责对外宣传的有关人员一起学习讨论中共中央宣传部十一月二十一日对《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的指示。指出《新华日报》、《群众》杂志之所以发表有错误观点的文章是由于:(一)政治警觉性不高;(二)整风运动不深入,未深刻研究毛泽东著作和思想;(三)编辑工作组织不周密,阅稿与检查皆有漏洞。下一步决定对从七月份开始的《新华日报》再进行检查。

十二月十六日 致电周恩来及中共中央宣传部:报告对《新华

日报》、《群众》杂志刊载观点错误的文章的处理情况。

十二月中旬 提出关于一九四四年统战工作的意见：（一）外面关系，除必要联系者外，一律减少联络，要他们独立工作。（二）准备组织五至十人座谈会交换政治意见。

十二月十九日 接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来电：为准备对付国民党的磨擦，恢复给蒋介石、何应钦发战报，由重庆办事处抄转备案，“以便必要时作为反驳的根据”；并嘱将国民党搞磨擦的事件，随时电告，以便向蒋介石、何应钦抗议。

十二月二十一日 出席重庆文化界、法学界、妇女界和各民主党派人士四百余人为沈钧儒七十寿辰举行的祝寿茶会，在会上致祝词，热情赞扬沈钧儒认真学习，研究新事物，并勇于实践的精神。又强调说：沈先生经历了若干时代，始终是一位拥护民主的战士。沈先生所主张的抗战、团结、民主，目前尚待努力。

十二月二十二日 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祝沈钧儒先生寿诞》一文。称赞：沈先生有许多长处，值得大家敬佩。第一、我常看见他拿了一本小本子，到处在记，到处在学。所谓做到老，学到老，沈先生真的实践了。其次，沈先生不怕新的东西，他出身于科举旧时代，还是科举进士，但是从咨议局、议会一直到国民参政会，他始终是一位民主的战士。沈先生主张的抗战、团结、民主，尚待我们继续努力，以求贯彻。

十二月二十三日 中共南方局组织部副部长张明（刘少文）致电周恩来：明年一月三日董老六十寿辰，粹年、汉夫、徐冰和我，都主张是日在《新华日报》四版出专刊。望中央同志写好贺电发来。毛泽东收到电报后批示：请周（恩来）替中央拟一复电。

△ 致电周恩来，报告叶挺未去柳州居住，生活无人照顾。他希望将明年全年补助费一次汇去。建议汇叶整数二十万元。

十二月二十八日 出席孙科主持的宪政协进会第三次常务会员会议。会议讨论了关于提高国民参政会权限的三条建议，通过了关于废除图书杂志审查等提案。出席的还有吴铁城、傅作义、左舜生、莫德惠。

十二月二十九日 接黄炎培祝寿诗七律一首：

平生谢绝人称寿，亦少人前祝寿来。
吾子长年须厚爱，中华元气待深培。
平和露出刚方性，渊默能兼激辩才。
世象日新人不老，大同梦境况恢恢。

读后作跋：余与兄自民纪二十七年七月十八日汉口中路八十三号寓庐握晤订交，六年以来，一月相晤，乃至一旬相晤，晤必纵谈时局，深佩兄于论事论人，平而不苛，深入而能客观。吾人理想，大致相同，欲以国家民族达于全人类，平其不平，乐其乐而利其利，意见亦谓然也。中华元气，凋敝已极，逐寇难，寇去而有以善其后，则尤难。兄将何以教我？

△ 钱之光、张明致电周恩来：董老生日是明年阴历正月，我们已准备替他在阳历一月三日祝寿。董老坚决反对。

十二月底 收到黄炎培祝寿诗后，感慨万千，复信给黄并送上谢寿诗一首。信中说：“赐诗拜读，感慨无地，武弩劣驷，久忘生日。同志中好事者不谅，以意为之。强言一月三日为武寿辰，已属非是，而距六十则尤远。武生于一八八六年，至一九四六年才周六甲之数。”并说，读黄诗“中华元气待深培”之句，弥后悚然。仁者之旨，敬铭座右。陕甘宁边区同仁年来所致力者，惟在发展生产与振兴教育诸端，与公所云培元气之旨，尚能暗合。惜国府当局禁阻公枉驾一游。使武所述者不能耳闻目见中证之。边区亦以未得指教为恨。

一九四四年 五十九岁

一月一日 接到周恩来亲笔代中央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贺六十大寿电：“董必武同志：庆贺您的六十大寿！您过去的革命奋斗，贯穿了辛亥、五四、北伐、内战一直到抗战的各个历史阶段，为着中华民族的解放写下了光荣的史迹。您是中国共产党创始者之一。二十二年来，您经历无数艰辛，始终不息地为党工作。现在您正代表着党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卫地位，高举着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不屈不挠地奋斗着。您是中国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老战士；您是中国共产党的模范的领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为庆祝您的生日，将感到光荣”。

一月二日 作《谢寿》七律二首，序：“新年连日诸友好宴集，为余作生日，感奋不寐，枕上口占二律谢之”。全诗如下：

恰逢令节为生日，柏酒延年共举卮。
诸子情深殊可感，藐躬德薄不相宜。
新中国仅雏形具，大亚东惊怪影驰。
实现民权要努力，同登仁寿域何疑。
“我似老牛鞭不动”，后推前挽总蹒跚。
愚公未惜移山力，壮士须怀断腕观。
大局隐忧为破坏，小民私祝是平安。
晨鸡屡作声喔喔，反复叮咛报夜阑。

一月三日 致中共中央谢寿电：“奉读中央元旦贺电，不胜感激之至。我在中央领导下不断的学习和工作着，抗战以来，特别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学习和工作着，感到无上的光荣。我党二十二年的伟大发展，光辉的成绩，已博得全中国、全世界要求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得到解放的各种族阶层人民的赞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党的成功是空前的，正因为全党在毛泽东同志旗帜下，才获得这样的成功。我自愧在这中间没有更多更大的贡献，使党给我的工作做得更好些。我愿在继续整风中纠正自己的错误，弥补自己的缺点，成为毛泽东同志旗帜下一个名实相符的战士，随着中央随着全党同志继续为完成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任务而奋斗；不管在什么地方，不论在什么时候，要毫不犹豫地坚守着中央分配给我的岗位。”

△ 下午，在重庆各党派人士举行宪政问题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指出：“民主是讨论宪政的先决条件，民主更是今天动员人民参加抗战、加强团结的先决条件。没有民主，没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就不能实现人民总动员，也不能认真的由人民研究宪草，宪草也就不可能实现”。

一月五日 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张云川已于日前抵渝。对我敌后根据地颇称赞。现正向各党派报告他的见闻。我和（章）伯钧商量，要他到桂、昆、蓉去一趟，以扩大我党影响。

△ 《新华日报》辟专版庆祝董必武寿辰。发表了郭沫若、黄炎培、沈钧儒、邓初民等写的祝寿诗、文，和徐冰、许涤新、钱之光、熊瑾玎、陈家康、潘梓年等联名写的《六十寿辰献词》和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全体人员名义发表的诗歌：《祝董老六十大寿》。八日，《新华日报》又刊载了署名何记的《董必武革命小史》和向群的《向董老学习》。

一月九日 接到周恩来来电，对国际人士的交往应该注意区别，有的只做一般交流，有的可交换情报，但必须注意机密。

一月十四日 致电周恩来，告知国民党当局忽来通知要取消我办事处电台，已去交涉，恐无法解决。同时提出了今后继续保持联络的办法。

一月十六日 和徐冰在重庆设宴招待各党派人士左舜生、邓初民、翦伯赞、张申府、张志让等，交换对时局的看法。

一月三十日 出席宪政实施协进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黄炎培提出的切实奉行训政时期约法案。会议决定交常会整理后送请政府办理。

二月三日 致函蒋介石，再次要求将已被国民党查封之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电台，改由中国共产党设立使用。

二月四日 接到毛泽东来电：观察今年大形势，国共将有协调的必要和可能，而协调之机，当在今年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现须作些准备工作，延安报纸力避刺激国民党，并通令各抗日根据地采取谨慎步骤。拟派林伯渠、周恩来先后赴渝一行。

二月七日 接到周恩来来电，询问叶挺的下落。

二月九日 复电周恩来，告知叶挺被关押在湖北恩施，已予汇款。

二月十六日 会见何应钦，并进行谈判。何作出和解的姿态说：（一）重庆、西安两办事处兵员眷属已照所谈名单批准；（二）国共要团结，军队中不要办党，欢迎延安来人谈判；（三）驻边区周围军队，已撤回四个师；（四）据传边区有反对蒋介石和他本人的举动；（五）取消办事处的电台是为防止泄露机密，各军办事处都停，不是单独对十八集团军这样做。董必武向何指出：（一）团结是我党基本方针；（二）去年十月六日以后，边区不会发生反对蒋、何

的事；（三）我重庆办事处电台名义上是军队电台，实际上是政治电台，不同于各军办事处电台。

二月中旬 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等谈话，内容要点有：（一）中共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问题可通过商谈解决。（二）对政府发言人最近所作关于“国共问题寻求政治解决”的保证表示欢迎，并邀请外国记者前往中共所在区域考察，并列举了中共领导的军队一九四三年的作战记录，边区民主建设的成就，以及人民生活丰衣足食的景况。（三）对斯坦因问及政府发言人坚称目前国共关系业已改善是否属实的问题时，答复：尚未见有这种趋向。中共已决定派代表于四月春耕后来渝谈判，周恩来来渝将稍后。估计延安来人将谈判下列问题：第一，要求政府承认中共的军队；第二，解除政府军队对边区的包围；第三，承认各边区政府；第四，承认中共之合法地位。谈话后，把上述内容电报毛泽东、周恩来，并说斯坦因将发出报道。

二月二十三日 就南方局和《新华日报》的部分办事机构工作人员变动的问题电请周恩来，提议：（一）调徐迈进为《新华日报》采访主任，杨立源为秘书长；王梓木为正、章汉夫为副，主持编辑部；宋平调报馆管学习兼支部书记；（二）陈舜瑶调文委为支部书记；（三）乔木（乔冠华）调兼外文秘书，住曾家岩编《群众》；（四）于江震任两岩支部书记；（五）许涤新管宣教计划及群众团结。

二月二十六日 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建议为迎接外国记者作准备工作。

二月二十八日 接周恩来来电：安排龚澎、龙飞虎陪送中外记者团来延安，便于此间配合沿途照料和指点他们注意国民党封锁边区的工事。

三月一日 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长三

月中旬启程赴加拿大，请即将边区工人组织及生活材料电告，以便交他带至海外；另外，外国记者希望我们对他们去延安有欢迎表示，我在谈话中已表示欢迎。《新华日报》也为此事写短文，国民党当局不准发，希望延安有所表示。

三月五日 出席各党派人士在重庆发起的宪政座谈会第二次会议。

三月九日 接周恩来来电，欢迎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其中有美联社、合众社、塔斯社等外国记者和《大公报》、《中央日报》、《扫荡报》记者）到延安参观。

三月十日 郭沫若为纪念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胜利三百周年所作《甲申三百年祭》完成，于本日送董必武审阅。董审阅后指示《新华日报》于三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连载，全文发表。

△ 致电周恩来：“战地通讯”很好。惟我报似缺乏系统的按时报道。望按时提供华北、华中各部队战斗旬报、月报；各根据地、民兵战斗要报、兵役法；伪军情况，各根据地书报杂志。毛泽东收阅后批示：叶（剑英）与周（恩来）商办，规定具体办法。

三月二十一日 出席吴铁城召集的各党派关系小组会议。重申了中国共产党拥护三民主义、拥护抗战到底的方针始终不变。指出何应钦所说边区周围已撤四个师实为换防，又换上四个师；最近又发生压迫《新华日报》的事。揭露了国民党破坏抗战、破坏团结行为。

△ 夜，出席宪政协进会小组会议，讨论张君勱提出的政治结社自由问题。讨论中孙科主张国民党应将军队与党划分，董必武表示中共早有此主张。此点获得吴铁城、张君勱、左舜生、莫德惠、黄炎培、邵力子、雷震等一致赞同。

三月三十日 向中共中央报告潘怡如已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

十五日逝世，介绍了潘的革命事迹。建议中央发电吊唁，并拨给治丧费及照料遗孤。毛泽东阅读电文后批示：请周（恩来）拟电照办。

△ 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准备赴延安访问的中国记者组成情况及在重庆准备工作情形。并告：徐恩曾在加紧训练记者如何提问题；梁寒操在外国记者中也正做工作。

三月 中共广东南路特委书记周楠到重庆，向南方局汇报工作。董必武对南路工作做了指示，强调必须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宣传群众，团结人民，建立我党直接领导的独立自主的武装，搞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同时决定南路特委暂由南方局直接领导。

四月四日 夜，和孙科、吴铁城、邵力子、张君勱、王世杰、王云五、左舜生、黄炎培、莫得惠等人，出席在孙科寓所举行的宪政协进小组会议，讨论关于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府不满的问题，主张开放言论出版自由。

△ 接毛泽东、周恩来来电：“速将国民党特务受命准备诬蔑中共等情况透露给记者，使有精神准备，并注意揭破。”

四月十二日 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学习与时局》的演讲，传达中央政治局关于研究党的历史经验应取何种态度等几个重要问题的结论。还总结了抗日战争的经验，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已完成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的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

四月十六日 和左舜生、沈钧儒、黄炎培等五十余人，出席宪政协进会召开的宪草座谈会。

四月二十一日 访王世杰。王希望林伯渠来渝后不要向外国记者发表谈话。不要激化两党关系。董必武说并非我们邀请外国记者，而是国民党方面通知外国记者来的，林来后，外国记者要向

他提问题，他不能不答。还向王指出，近来国民党报纸多次对中共进行攻击，如你们不加制止，中共将不能不予还击。

四月二十二日 致电周恩来，建议利用国际上对国民党的压力以及国民党内部动摇的机会，组织民主党派用政团同盟几个人的名义发表文章，阐明希望建立什么样的中国，并动员一些大学教授著文批评国民党当局只要独裁不要民主的统治人们思想的举动。

四月二十六日 赴黄炎培寓所，长谈国内外局势。

四月二十八日 同王世杰晤谈。王通报蒋介石准备派王世杰、张治中赴西安会晤林伯渠，以便到重庆后更能顺利洽商。次日，将此次晤谈内容电告周恩来。毛泽东阅读电文后批示：很可注意。

四月三十日 毛泽东致电董必武转十一个外国记者：诸位来延，甚表欢迎，恩来同志早已电达。只要（国民党）政府同意，即可来延。

五月二日 出席黄炎培、王云五、莫德惠的招待餐会。出席的还有孙科、吴铁城、邵力子、张君勱、左舜生、傅斯年、张厉生、褚辅成。黄炎培说：“国民党政府摧残工商业，以至从沦陷区载巨金来重庆者多愿回去。”孙科说：“中华民国不能听任它亡于一人之手。”于右任不满意蒋、孔所为，留词而去。

五月四日 应孔祥熙的宴请，和王云五、温源宁、左舜生、莫德惠、蒋经国、邵力子、宋子良、黄炎培、王正廷、杭立武、董显光、张君勱等出席。与会者叙谈商民怨苦、物价狂涨、前途莫大危机等问题。

△ 中共代表林伯渠于四月二十九日离延安赴西安。是日起，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谈判。经五次谈判后无结果。

五月十四日 出席沈钧儒、黄炎培主持的宪政座谈会，会议有

李璜、张志让、张申府、史良、左舜生、张君勱、章伯钧等三百余人参加。

五月十五日 接到毛泽东来电，要董必武转告林伯渠：向国民党提出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二十条，主要内容是：国民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与保障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人身自由；承认中共及各爱国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实行名符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至少给予中共军队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取消对于边区的封锁；停止对敌后抗日军队的进攻等。

五月十九日 和林伯渠会见蒋介石。董、林向蒋提出取消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和释放叶挺等要求。蒋答可以研究；但对董、林所提党派合法问题未作正面回答，说：首先是军事问题，民主以后再谈。谈话后，董、林把上述情况电告毛泽东、周恩来。

五月二十日 中共中央将拟定的谈判方案电告林伯渠，提出关于政治民主化，承认一切抗日军队，承认中共及各党派之合法地位，释放政治犯，承认边区政府及抗日根据地政权，实行地方自治等二十条要求。

△ 为欢迎代表我党来重庆同国民党谈判的林伯渠等，赋《迎林老邃园及偕同来渝诸同志》七言绝句一首。

五月二十三日 和林伯渠、王若飞致电中共中央，提出对时局的估计与两党谈判的方针：（一）由于蒋介石河南战事失败，英美舆论对共产党的同情与对国民党的抨击日益增加；国民党统治区的通货膨胀，物价高涨；对我党想打又不敢打；国民党内部各派系军队、各个人之间的倾轧和离心离德等因素增加，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存在着日益严重的困难。（二）但蒋的死而后已的独裁本质以及我党在西安谈判中避免刺激的态度增加了对蒋的幻想，以致他在国民党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采取了顽固的态度。（三）我党对

蒋的方针必须随情况的改变而改变。不然会被蒋利用去加强国民党内对于一党专政的信心，且向盟国粉饰我国的所谓团结局面，同时，使英美难于说话，使民主党派不敢硬挺，使国民党内以孙科、邵力子为首要求实行民主的力量不能抬头，对于促进全国团结抗战进步，将无所得。（四）同意中央所提二十条的精神。只有继续揭露蒋之欺骗，不给他敷衍捧场，才能真正对团结抗战有利。

△ 和林伯渠、王若飞、翦伯赞应邀出席在章伯钧寓所举行的宴会，同左舜生、张君勱、章伯钧、沈钧儒谈目前战局及两党谈判等问题。

五月二十五日 和林伯渠、王若飞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在民主党派、文化界、外国朋友和宋庆龄参加的座谈会上以及会见的一切人士当中，宣传我党抗战建国的成绩，拥护团结抗战的诚意，支持全国争取民主的运动，各方人士都对我们表示友好。各民主党派希望我党对蒋采取坚决斗争的态度。

五月二十六日 和林伯渠、王若飞应黄炎培之邀，前往赴宴。黄告以江苏共产党情形，希望改进。

六月三日 中共中央致电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同意他们对时局的估计与谈判方针，同时将修改后的提案十二条与口头要求八条一并电告，指示据此同王世杰、张治中谈判，并希望全部告诉即将来华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和各民主党派人士。

六月五日 和林伯渠、王若飞致电中共中央，报告自五月二十五日以来的活动情况及各方动态。（一）蒋介石目前虽极困难，但绝无解决问题诚意，只是作出谈判姿态给中外看。因此我们“不闭谈判之门，也不存急切解决问题之想”，而是全力用于向各方面宣传边区之民主抗战成绩推动国统区的民主运动。（二）已和美国驻华武官详谈两次，美方最关心的是华北、华中敌军行动，我根据

地哪些地方宜于飞机降落。我们建议他们派人常驻延安，一切均可满意解决。苏武官已谈过，英武官已约时间。（三）民主党派及实力派最初恐我单独解决问题，现经多次会谈及事实证明都清楚了，都说蒋解决问题无诚意，认为我党强大。黄炎培到处宣传新四军在华中实行民主与经济建设的成绩。（四）积极加强同川、康、滇、粤、桂各实力派的联系工作，了解他们的态度。他们派人来提出建议：从东南经滇、川、康到西北，对重庆形成马蹄形包围，希望西北来一个军事发动，他们打算双十节将有一个大发动。我们劝他们不要妄为，要在法令中抓住有利于实行地方自治的东西，放手去做，要使自己比国民党政府更民主进步。（五）左翼文化界、妇女界都开过座谈会，并同一些教授、学生、工业家谈话，他们都不满现状，要求民主。（六）国民党内有可推动争取民主的力量，还保有若干革命传统的元老等。

六月九日 中外记者参观团二十一人由重庆飞延安。

六月十二日 和林伯渠、王若飞同张晓梅、张申府、刘清扬等在曾家岩五十号讨论国际形势及国内政治、军事、经济情况等问题。

六月十七日 毛泽东致电林伯渠，指出张治中、王世杰说不愿考虑中共中央问题的意见，而又片面地提出“提示案”，中共坚决不能接受。并指示立刻将国民党的所谓“提示案”退还张治中、王世杰。

六月二十日 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抵重庆，翌日至二十四日与国民党当局谈判。

六月三十日 和林伯渠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报告同国民党谈判情况。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王世杰已收下我党十二条提案，国民党的提示案是否还要退回？是否要张、王到延安谈判？双方提案

的要点已密告美国使馆和史迪威司令部。

△ 接到毛泽东复电，告知国民党提案如未退，则不必再退，而另用伯渠、恩来名义分别在渝、延两地发表公开谈话。我方十二条及国府“提示案”可经美国友人密交华莱士，并在中间人士中传观，暂不公布。请张治中、王世杰两人或中一人偕林伯渠来商谈“提示案”，如张、王拒绝，则林单独回延讨论，以便作具体回答。

七月三日 和林伯渠同张治中、王世杰进行谈判，首先说明对方提案与我方提案内容相距太远，不能接受，表示我党中央欢迎张、王去延安谈判。张、王表示暂不去延安，在重庆先谈出个头绪再说。

△ 和林伯渠会见宋子文。宋表示很关心两党谈判，已看过双方所提条件，并问我方实际要求什么？要求军队编五军十六师，在此以外的军队怎么办？林答：我方要求：（一）解决全国民主团结问题；（二）军队请编五军十六师，以外的军队仍要打日本，如国民党政府不发饷，可自己想办法；（三）承认我方在敌后解放区的政权。宋子文表示：他考虑后，将约几个人谈，并向蒋反映。

七月四日 和林伯渠致电毛泽东，报告同国民党谈判情况，在目前局势下，谈判绝无解决希望，启封电台及放人等问题也不可能解决。蒋介石要谈判，不敢公开和我破裂，是在故作姿态欺骗舆论，即令谈判破裂，好把责任推在我方。我们对谈判仍是不抱任何幻想，而把主要精力用在向各方宣传，推进大后方民主运动上。我们已将双方条件的主要内容及蒋无诚意的事实告知了关心这一问题的中外人士。我们也认为根据今天的情况，不能采取退回“提示案”，拒绝商谈的形式。

七月六日 和林伯渠同王世杰谈判。王表示国民党方面想解决问题。对全国民主要求之言论自由、人身自由、地方自治人员小

组之甄审等都已放宽；同意共产党军队编四军十师；电台、放人等小问题都可解决。只是延安最近骂得太凶，不想解决问题，只有拖下去。林伯渠、董必武对王的歪曲、攻击都进行了驳斥。

△ 和林伯渠两次致电毛泽东，报告了本日国共双方代表会谈情况：“目前谈判绝无望具体解决问题，但他们总要故意做出谈判姿态，不完全拒绝去延安，也不让我们离渝。”现在我们的原则是，一方面要求张治中、王世杰对我提案逐条提出具体意见；另一方面访问国民党的一些中央常委，如孙科、邵力子、吴铁城等。

△ 接到毛泽东复电，指示他们约张治中、王世杰见面，声明已将他们提案转告我党中央，我党中央认为双方意见相距甚远，为进一步商谈，仍请张、王偕林来延一行。如张、王拒绝，则林单独回延安报告，并讨论对国方提案之复案。若又不让林离开，谈判无法进行，则拖延谈判之责任全在彼方。

七月八日 致电中共中央：从目前湘南战争形势看来，敌将打通粤汉、湘桂两路，敌后必甚空虚，建议即派干部赴湘南组织游击队。

△ 向中共中央报告日寇已迫近衡阳，桂林的疏散工作情形。柳亚子、何香凝均向桂东南之八步转移。李济深拟向梧州撤退。

七月十五日 在《群众》杂志上发表《党在不断学习中进步》一文。概述了二十三年来，党是在不断的学习中进步的。文章指出：除了学习马列主义，主要是向广大人民——工人和农民学习，也向其他阶级的人民学习。我们的党在革命斗争中研究了群众运动发展的规律，学会了领导群众斗争的方法，学会了怎样使工人和农民武装自己，管理国家大事，学会了建立全国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以团结全国的广大人民全力抵抗日寇，学会了怎样以劣势装备抵抗和战胜有优良装备的敌人。认为经过整风运动，对我们党的学风、

党风和文风切实加以整顿，因而使党更加团结、巩固和发展。“二十三年来党的成绩是伟大的，党已经成为中国政治中的决定因素。这是因为党是不断地和群众在一起学习而进步的。”最后指出：“党的任务是复杂而繁重的，我们不应当骄傲，而是应当在毛泽东旗帜之下，继续不断地和群众在一起学习，并领导群众前进，很快地把日寇打倒，把新中国照着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原则建立起来。”

△ 致电中共中央：美观察组头一批九人，定于二十日飞延。他们的任务是与中国新力量合作。主要是商量在边区及敌后根据地建设机场问题，了解我实际情况，观察我与苏联的真实关系。

七月十九日 接周恩来来电：中外记者到延安后，外国记者“愿意多看、多读、多住并去前线”，要求与中国记者“分开行动”，“中记者则消极，怕看怕读，愿早归”。经过月余的参观、谈话，中国记者连特务在内，“一致承认我党组织力量强，与人民成一片，军事不可侮，生产成绩好，文化方向对”，“公开表示，国共决不能打，只能政治解决”。外国记者五人，现仍留在延安，拟九月回渝。

七月二十二日 美军军事观察组首批成员在达维·包瑞德上校率领下到达延安。

七月 指示在桂林掩护和保存电台，保持党中央与华南地区游击队通信联络的秘密党员何世庸、何康将电台拆掉，争取向桂东方面撤退。

夏秋 由于国民党战场的军事危机，四川面临日军进攻的危险，在这种形势下，需要进一步加强对西南地方实力派的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决定派张友渔去成都同刘文辉联系。董必武在张临行前向张分析了形势，交代了任务。指出：根据党中央的方针，当前要抓紧两方面的工作，作为应变的准备。一是组织、发展党领导的地方游击队，打击日本侵略者；一是鼓励和推动西南地方实力派

团结起来，保卫西南。刘文辉是西南实力派的重要力量，而且是民主同盟的主要支持者，因此，要加强同刘的联系，加强与民盟的联系，还要配合川康特委，开展学生运动。

八月四日 和林伯渠一起，同王世杰谈话。王问，两党谈判的根本问题在那里？如派人到延安是否有把握解决问题？林伯渠、董必武答：根本问题在于实现民主和军队数目与驻地问题，并欢迎他们去延安。王说：双方互对对方提案，提出答案，然后同林到延安，再约周恩来同时出来会谈。估计王仍是采取拖的办法，想拖到参政会后再说。

八月五日 致电中共中央，请示对即将开幕的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应持什么方针。

八月十二日 周恩来在延安答新华社记者问，指出：国共谈判迄今还无结果，根本障碍在国民党“始终固执其一党统治与拖延实行三民主义的方针”。只有国民党“立即放弃一党独裁政治，立即放弃削弱与消灭异己的方针，立即实行民主政治，并从民主途径中，公开合理的解决国共关系，才能得到效果。”批驳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梁寒操在记者招待会上散布的谈判障碍在于中共等谎言。

八月十三日 接毛泽东来电，指示将周恩来十二日对新华社记者发表的《国共谈判迄无结果》的谈话，在重庆及各地广为散发，并要设法送往国外。衡阳失守，我敌后抗战地位更加重要，应要求我军扩编为四十七万人。

八月十六日 和林伯渠一起，致电中共中央，请示在两党谈判中，关于军队数目应如何措辞问题。林伯渠、董必武建议，为了使国民党不能在中外人士中宣传我党在衡阳失守国家困难增加的情况下提出新要求，攻击我无谈判诚意，在措辞上似宜说：“为了准备配合盟国反攻，敌后的军队不仅不能减少，而且应奖励他们，但为

顾及政府今天补给的能力，暂编五军十六师也可以。但盟国援华物资一定要公平合理分配”。

八月十七日 致电请示周恩来：传说国民党和张澜、左舜生等商议加补参政员名额，我党应采取何种态度？如赞成加补，则我党加补多少？推荐谁？应准备。毛泽东收阅此电后批示：应与张、左商各党派联合政府；参政会可同意增人，取积极态度，但是第二位的。

△ 致电周恩来：美司令部派人来说，对我敌后部队援助美航空员事，甚感谢中共；但美政府规定，为保证美航空员安全，今后不要在报上公布。请通知各根据地，以后不再将此事公布。毛泽东阅电后批示：请周拟电各根据地。

八月十八日 和林伯渠接到毛泽东来电：对参政会开会仍持去年出席的态度。如林伯渠未离渝可出席本次参政会。首要的问题是与民主党派商谈组织各党派联合政府问题。对增补名额应持积极态度，但是第二位的。如何应钦、俞鸿钧进攻，“我取针锋相对态度还击之”，并提出抗议。

△ 和林伯渠、王若飞致电中共中央，对目前日、蒋现状及抗战发展前途作了分析，并对中央的工作提出建议。认为：（一）这次日寇在河南、湖南的进攻，在占领洛阳、长沙、衡阳以至桂林后，不会打西安，对昆明是防御进攻。（二）蒋对日寇的进攻，完全采取保存实力向后撤的政策，抗战愈接近反攻阶段，蒋愈要保存反共反人民的实力，他的法西斯统治暂时不会改变，也不会就垮，他今天还戴着抗日的帽子，使人民不能武装反对他。建议：成立专门对国际宣传机构，加强新华社的工作；需要对马列主义中国化及中共独立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作更多的解释，并需要注意宣传的民族形式、中国气派、中国作风；加强对反共宣传的斗争；赞助朝鲜、台湾、南洋与东北的解放运动。二十二日，毛泽东复电董必武、林伯渠、

王若飞：你们对时局分析及各项建议均很有价值，当加研究。其建议部分当分别处理。

△ 和林伯渠接到周恩来来电：请考虑目前我党如何向全国提议并向国民党要求提前召集各党派及各团体代表会议，改组政府，然后由此政府召开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讨论反攻，实行民主，能否引起大后方（尤其是各党派）的响应和地方实力派的同情？并嘱此意见先行试探。

△ 和林伯渠、王若飞电复周恩来：我们经详细考虑，认为这是符合时局发展新阶段的正确主张。只能这样才能把全国民主运动向前推进；才能打破现在国共谈判的僵局。估计我们主张提出后，是会得到民主党派和地方实力派赞成的。我们改选政府的提议，要争取美国的支持，请由延、渝同时进行。

八月二十二日 就同张澜、左舜生、章士钊晤谈情形电告周恩来：谈到民主运动，左（舜生）表示：中共责任大；我说民主同盟作用很大。他认为，在外边，如无民主同盟配合，将处于孤立，民主同盟如无中共实力支持，则空洞无内容，但同盟困难多，人分散，不能集中意见，没有系统的机关。我征求他对中共的希望，哪些做得不够，要我们哪些实际帮助，请提出意见。估计他们想要我们帮助经费，请中央考虑。

八月二十六日 和林伯渠接待黄炎培来访，就国内外形势及国共关系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八月二十七日 晚，约见张治中，表示欢迎他和王世杰到延安商谈。张说中共方面不愿解决问题，存心拖延。董必武说：我方所提方案，都是有利团结抗战应办的事。拖延不解决的责任，应由国民党方面来负。

八月二十八日 致电中共中央，报告龙云曾催华岗提出作为

民盟、滇、川康、李济深及中共五方共同执行互相信守之合作纲领，经华岗与龙云、朱蕴山（代表李济深）数度磋商，归纳为五条：（一）实行民主政治，废除一党专政。（二）驱逐日寇出中国，恢复我国领土主权之完整。（三）保障人民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四）实行中央、地方分权制，在民主基础上完成国家统一，加强与美苏英及其他同盟国家之邦交，共同消灭法西斯，争取实现世界民主与正义和平。（五）因电台未通不及事先商妥，此初步纲领草案，望五方面各派正式代表，择地再度会商，以便确定。

八月下旬 和林伯渠、王若飞致电中共中央：（一）同意中央提出的“在目前由我党向全国提议并向国民党要求，提前召集各党派及各界团体代表会议。改组政府，然后由此政府召开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讨论反攻，实行民主”的意见，并认为这是切合时局发展新阶段的正确主张。（二）估计民主党派和地方实力派、国民党内孙科、覃振以及中、下层党员，都会赞成这一主张。（三）这一主张一定要争取美国支持，这一工作要在延安、重庆同时进行。

九月一日 致电周恩来：广西米人说李济深想在广西设电台。广西米人短期内返回，请即示知如何安排。

九月四日 和林伯渠、王若飞接到中共中央来电：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召开国是会议，改组政府，废除一党统治的时机已成熟，其方案是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贯彻抗战国策，实行反攻。改组国民政府，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的政治斗争目标。望林、董向张治中、王世杰提出此项主张，并在参政会上作为提案提出。关于扩大参政员名额问题，可提出重新增加救国会的沈钧儒、陶行知、张申府、史良等，文化人中可提郭沫若、茅盾等，如增加中共参政员，可先商定数目而后再

议人选。

九月五日 和林伯渠一起出席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提出这次大会着重讨论国共谈判、召开国是会议、成立各党派民主联合政府等问题。

九月六日 和林伯渠、王若飞致电中共中央，请示提出改组政府成立联合政府之主张的办法。

△ 致电中共中央，报告蒋介石、何应钦在国民参政会上讲话情况，国民党许多参政员对豫湘战事失利攻击很凶。估计蒋、何又要攻击共产党“破坏军令、政令统一”，求得参政会的赞同，以迫我就范。董必武、林伯渠拟在会上散发宣传我党主张的一些文件：边区政府报告、周恩来、叶剑英的讲话、八路军战报等，以取得同情，打击彼方进攻，建议利用林伯渠出席参政会报告两党谈判情形的机会，以中共中央正式致函参政会的形式，提出改组政府的主张。

九月七日 接到中共中央复电：同意用党中央的名义致函参政会，并利用林伯渠在参政会报告机会，提出我党关于改组政府之主张和步骤的办法。

九月八日 接中共中央来电：根据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的表示和太平洋决战任务的加紧，我们有利用这次机会向史迪威、赫尔利、纳尔逊提出援助我们的必要，请董必武代表中共欢迎赫尔利等来延安。

九月十日 晨，邵力子来曾家岩五十号与董必武、林伯渠晤谈。邵提出如董返延安，要偕五参政员一起返渝。邵还表示，民主和联合政府都愿意赞成，但必须有步骤，慢慢增加信心。

九月十二日 和林伯渠、王若飞接到毛泽东来电：在同纳尔逊、赫尔利面谈时，应提美国援华军火至少“国共平分。”

△ 致电中共中央，报告最高国防会议决定扩大参政会职权，

并定于明年四月开会以及本月二十一日将召开宪政实施协进会第四次全体大会。

九月十四日 和林伯渠电告毛泽东、周恩来：（一）各民主党派不赞成用中共名义正式提出改组政府问题，因为这样会引起大争论，他们不便表态。他们主张我们在大会报告中顺便提出。（二）美、加两国大使在与外国人谈话中曾表示，要改变中国现在政治局面，必须请中共参加政府等。

九月十五日 和林伯渠、王若飞接到毛泽东复电：各民主党派既不赞成我党单独向参政会提改组政府事，即请作罢，至于林在报告谈判经过时是否应顺便提到此点，请你们斟酌情形决定，可提则提之。但在再复国方代表信中则必须正面提出。

△ 出席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林伯渠在会上代表中国共产党报告四个半月来与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谈判的经过及迄今无结果的原因，他指出：要改组国民政府、改组统帅部，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统治，召开各党派、各抗日部队、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组成的国是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才能动员和团结力量，拯救民族的灾难。下午，张治中代表国民党报告了国共谈判的经过情况。张对林提出要求政府召集国民会议，改组政府的问题反驳说，应在参政会和宪政促进会中谈，不应另外再开什么会。

九月十六日 和林伯渠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十五日参政会开会情况，和张治中、王世杰本月十日给林复信的用意以及林、董准备回答的内容。

九月十八日、二十七日 和林伯渠两次接到毛泽东复电：仍可请五参政员及张治中、王世杰来延，但不必再催，来与不来，或迟或早来，听其自然，同时将修改后的致张治中，王世杰的复信告林

伯渠、董必武。

九月十八日 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闭幕。继续当选为休会期间驻会委员会委员。

△ 和林伯渠就《新华日报》发表林伯渠在参政会上发言的情形电告毛泽东、周恩来：国民党宣传部禁止报道此事。中央社所发表林的报告已删去成立联合政府这一段。十六日，《新华日报》已摘要透露。昨日，全部在《新华日报》发表。此两日报纸销量日增。

九月十九日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代表会议，决定改为中国民主同盟。还决定呼吁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

九月二十一日 和林伯渠会见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王云五、胡霖、冷遹、陶孟和、傅斯年，并代表中共中央欢迎他们前往延安参观访问。

九月二十三日 和林伯渠、王若飞电告毛泽东、周恩来：赫尔利愿约我们会谈，但仍对时局有疑虑。另外，国民党中央干部训练团已停办，改为召集中下级军官一万人由美训练；此外，国民党已开始征青年从军，拟征三十万人。

九月二十四日 出席在重庆的各党各派各界代表冯玉祥、覃振、邵力子、孔庚、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邓初民、章伯钧、李璜、左舜生、王昆仑、屈武、胡子婴等五百余人的民主集会。在几位青年发言反复说明民主的重要性之后，发表即席演说，指出：政府要求人民的，人民都做到了。而人民所要求政府的则一项也未做到。如果不实行民主自由，中国就将亡国。要真正实现自由民主的中国，就只有实现林伯渠代表中共提出的召开国是会议，成立各党派民主联合政府。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动员起来，团结全国人民，把日寇打出去。会议通过了沈钧儒发起组织民主宪政促进会的提

议,并推选王昆仑、屈武等为筹备人。

△ 致电中共中央,报告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的情况。报告分析了国民党当局在这次参政会上作出一些民主姿态的动机,是为了向国内外表明它的统治是“民主”的、中国是“团结”的。它不得不利用参政会来玩一套民主的戏法。在参政会上造成几分民意机关的气象。其结果是此次参政会上发言的人多,对国民党当局的批评都比较露骨。对国民党军队在河南、湖南两省吃大败仗、当局对失职人员处分不公、政府兵役腐败、官吏贪污腐败、溺职无能等种种黑暗面,都作了一些揭露。报告较详尽地介绍了参政会公开讨论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情况。指出国民党当局迫于国际压力,才敢于公开在参政会上讨论这个问题。我党是不怕公开讨论的,因为我们借此机会可以宣传我们的力量和战绩以及边区政治的清明,同时可以揭露国民党破坏团结抗战的事实真相。蒋介石本想利用参政会通过一个拥护军令、政令统一的决议,来压迫中共就范,他这个阴谋是彻底破产了。有人对我党在会上提出的改组政府的主张,誉为“好比参政会画龙,中共点睛”。报告最后指出:这次参政会尽管表现得比以前活跃,我们也不应对它寄托任何幻想,必须努力争取改组政府新主张新政策的实现。

九月二十五日 出席民盟等组织共同召集的宪政座谈会,在会上介绍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国是会议,改组政府、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冯玉祥、覃振、章伯钧、沈钧儒也在会上讲了话。

九月三十日 和林伯渠等出席中苏文化协会举行的茶会。讨论促进中苏邦交,沟通中苏文化问题。郭沫若、林伯渠等先后在会上致词,强烈呼吁为消灭法西斯、实现民主政治而奋斗。

十月一日 和林伯渠、宋庆龄、于右任、邵力子、郭沫若、张澜等在重庆参加邹韬奋追悼大会。郭沫若、林伯渠等先后在会上致

词，强烈呼吁为消灭法西斯，实行民主政治而奋斗。

十月十日 延安各界集会庆祝双十节，周恩来在会上发表题为《如何解决》的重要讲话。指出：由于国民党长期坚持错误的失败主义和反动的法西斯主义政策，致使国民党战场节节败退，国民党统治区呈现抗战以来空前未有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严重危机。“改组政府，改组统帅部，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联合统帅部，废除失败主义的军令和法西斯主义的政令，是挽救目前危机切合时到的唯一正确方案。

△ 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要求“立即取消一党的政府，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中国共产党关于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使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朝着明确的政治目标发展，出现了新的高潮。

十月十二日 电告中共中央：获悉六日蒋介石约孙科等谈话透露，中美商约濒于破裂。蒋说史迪威袒共，要求美国撤换史迪威。

△ 和林伯渠、王若飞接到周恩来来电：此间邹韬奋生前友人决定十一月一日举行盛大追悼会和著作展览并出特刊，请在渝搜集《萍踪寄语》、《生活日报》、《大众生活》等，并请宋庆龄、柳亚子、张澜、黄炎培、沈钧儒、陶行知写追悼短文。

十月十五日 致电中共中央：（一）已会过五参政员，促他们早去延安，并向他们揭穿国民党企图将拖延去延安的责任推给他们，说他们不愿去。五参政员同意早去。（二）美已拒绝蒋要求撤换史迪威等。

十月十七日 和林伯渠同美国总统罗斯福私人代表赫尔利就解决国共两党关系、结束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问题举行首次谈话。赫尔利在听取了董、林关于中共的主张和要求后表示：

(一)他和中共代表谈话,是蒋允许的;蒋也允许他必要时去延安;
(二)认为中共武装组织训练都好,力量强大,为决定中国命运一个因素;中国国民党政权不民主;并口头赞同中共的政策。

十月十八日 和林伯渠同赫尔利继续会谈。赫尔利称:(一)蒋介石态度已变好;(二)国共合作后,中共应取得合法地位;(三)赫拟约张治中、王世杰与林伯渠、董必武会谈,有初步结果即向蒋谈;蒋如同意,他便到延安与毛泽东谈;求得双方合作基点,蒋、毛见面,发出合作宣言。

十月二十三日 和林伯渠同赫尔利举行第三次会谈。赫尔利说,(一)他已为中国解决了中美邦交中很困难的问题(似指撤换史迪威事),现他试图调解国共关系;(二)蒋二十一日交给他一方案,被他当场退回,他问蒋为什么不可以和共产党并肩作战?(三)二十二日宋子文与蒋辩论了半天,当晚赫与宋又同蒋辩论许久;(四)他已告蒋,要马上行动,实行民主,释放政治犯,不能再等。

十月二十五日 中共中央就关于湘粤桂三省工作布置电示董必武:(一)同意派周礼、谢竹峰、张春林秘密回湖南布置敌后各县人民武装斗争,但切勿过早暴露,免为顽方所乘。国统区党员,仍坚持隐蔽待机方针。(二)李应吉如由衡阳撤回,仍宜深入商业,不参加秘密工作。(三)孙仁如能从川东调出,最好派回湖南。(四)东江部队沿粤汉路向北谋发展。(五)设法通知广州湾以北地区同志,一方面谋武装发展,另一方面力求与琼崖游击队打通联系。(六)同意对桂林疏散办法。对叶挺、廖承志、柳亚子三家多接济。如桂林危急,文化人宜走不宜留。

十月二十八日 和林伯渠致电周恩来,请示可否援《大公报》之例,派《新华日报》记者去印度作随军记者后,接到周恩来复电,说可与英军当面接洽,征得同意后再同美军交涉。

十月下旬 和林伯渠到重庆津南村看望柳亚子。

十一月四日 致电中共中央。建议：（一）在西南加强地方实力派的联系，促进各地方实力派不公开反蒋，以麻痹蒋，实际不听蒋的命令。政治上着重向蒋要求民主。（二）联合政府事，也要在川、康、滇酝酿起来。（三）中央速与昆明龙云通电，并要他转知刘文辉。另向中央报告：在渝正向各党派进行工作。龙云要华岗去成都与龙云、刘文辉、李济深代表及民盟等五方开会。

十一月七日 中共中央就董必武回延安期间重庆办事处和南方局的组织领导问题致电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如董必武能同林伯渠一道返延，仍望王若飞留渝主持工作，以待董必武返渝。在王若飞主持下，可组织工作委员会，以王若飞、刘少文、徐冰、钱之光、熊瑾玎、潘梓年、童小鹏七人为委员，王为书记。

△ 林伯渠偕赫尔利由重庆飞延安。由于国民党当局的阻挠，董必武继续留重庆工作。

十一月九日 同黄炎培、左舜生、张申府在重庆信义街三十九号举行座谈会。主持讨论国是问题。提出：各党派应进一步密切联系，共同奋斗，以建立民主自由之中国。

十一月十日 经过两天的谈判，今日毛泽东同赫尔利在延安签署了《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议》，主要内容是：改组国民政府，成立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承认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

△ 周恩来偕赫尔利等由延安飞抵重庆。

十一月十一日 参加由周恩来在红岩宴请柳亚子的宴会。参加的还有郭沫若、沈钧儒、王若飞、王炳南、徐冰、马寅初、冯乃超、阳翰笙、胡风、胡绳、夏衍、乔木（乔冠华）。

△ 和周恩来等参加郭沫若为柳亚子洗尘的宴会。餐后在同

柳亚子、郭沫若、沈钧儒、艾芜、阳翰笙等聚谈中介绍国内政局。

十一月十六日 和王若飞、徐冰、王炳南等陪同周恩来在曾家岩五十号，宴请美国新闻处三外宾。

十一月十七日 和周恩来、王炳南出席美籍驻渝广播记者福尔门、劳工记者爱泼斯坦、纽约杂志记者白修德、国际宣传处顾问夫聪等举行的宴会。同时出席宴会的还有邱莱莉、吉可比及塔斯社罗米诺斯基、普金科夏耐尼科夫等十人。

十一月二十一日 下午，和周恩来与赫尔利会谈。

十一月二十二日 上午十一时，和周恩来到赫尔利寓所会见王世杰，赫尔利、宋子文参加。王表示国民党不准备放弃一党专政。周恩来提出党派合法、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无权、军事指挥等四个问题，揭穿国民党所提方案的骗局。还表示：愿从双方协定中找出共同点，为联合政府准备步骤。

△ 下午，和周恩来会见蒋介石。蒋介石要中共交出军队，然后政府才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并妄称：我做的就是民主。人家说我不民主，我不愿辩论。周恩来、董必武坚持联合政府主张，并对蒋所称“政府的尊严不能损害”予以批驳。董必武还当面揭穿说：赫尔利说委员长愿作华盛顿，很高兴。但目前不仅没有实行宪政，就连训政时约法也未实行，请委员长督促政府实行才好。蒋听后无言以答。

十一月二十六日 毛泽东电告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将十一月十日在延安签署的协议草案及蒋介石拒绝本协议的情况，透露给各民主党派和外国记者。

十二月一日 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董必武，请回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十二月七日 和周恩来一起飞返延安。下午七时，出席中共

中央全体会议。会议在听取了周恩来关于国共谈判的情况报告后决定：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周恩来、董必武不回重庆。董必武还报告说：蒋介石已布置二个后方，一个雅州，一个天水，并介绍了英国政府对中国问题的态度。

十二月八日 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五次大会上作《大后方的一般情况》的报告，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反动实质。指出：大后方的一般概况，如果从政治、军事各方面作一概括的说明，那就是“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失败主义的军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他的“统治完全是为着一群封建法西斯的私人利益。”他的政策是反苏反共反民主。系统地介绍了国民党政治上腐败，军事上正面战场的溃败，财政经济上的紊乱、通货膨胀和文化教育事业横遭摧残等严重现象。指出：“大后方的民主运动正在兴起，各界人士都迫切地希望改组国民政府和统帅部，组织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我们要尽量揭穿蒋介石的阴谋和假面具，想出许多办法来和全国人民一道，为实现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这一总任务而努力奋斗。”

十二月十一日 王若飞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报告了赫尔利、包瑞德等对国共谈判的一些意见。

十二月十二日 参加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决定暂缓成立解放区委员会。

十二月二十日 向中央全会报告南方局近年来的工作以及国民党的有关军事、政治、经济及各党派、地方实力派的具体情况，周恩来作了补充发言。毛泽东听了报告后讲话：南方局工作、董老的报告都很好，都同意。大后方工作有成绩，南方局、《新华日报》、办事处做了很好的工作。针对抢救运动一度出现的问题，毛特别指出，大后方有十万党员，绝大多数是可靠的。

是年 派党员到从事军用布加工的中小工厂主当中进行工作,指示他们领导中小工厂主同国民党军需供给部门官员的贪污、中饱行为作斗争。这一斗争逐步发展到万县、璧山、成都等地。参加的中小工厂主有两千人左右。《商务日报》、《新蜀报》、《大公报》也分别载文揭露国民党军需部门对军布加工业中小工厂主的压榨以及对工人群众的剥削。斗争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同情。组织起来的中小工厂主派代表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保护了本身的合法利益。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军布加工业中小工厂主联合会。董必武应邀到成立会上讲了话。

一九四五年 六十岁

一月十八日 和周恩来联名致电王若飞，提出《关于大后方文化人整风问题的意见》。指出文化人整风只限于南方局文委及《新华日报》社两部门的同志，不宜扩大到党外。对党外文化人主要是引导他们向国民党政府要求民主自由，同顽固分子作思想斗争，揭露国民党文化统治政策的罪恶，并引导他们与青年接近，关心劳动人民生活，以便实际上参加和推动群众性的民主运动，“也就是很好的整风”，而抽象地争论世界观、人生观，“必致松懈对国民党内顽固派的斗争，招致内部的纠纷”。即使是文委和《新华日报》社同志的整风，也要根据大后方的具体情况。“引导大家更加团结，更加积极地进行对国民党的斗争。而防止同志们互相埋怨、互相猜疑的情绪增长。”

△ 致电中共广东组织负责人，指示他们在琼崖岛上设交通站和电台，继续在敌占区扩大武装，严防国民党军队的袭击，不利时要注意转移以保全实力。

一月二十四日 周恩来由延安飞抵重庆，代表中共中央向国民政府、国民党和民盟提议，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国是会议的预备会议，以便正式商讨国是会议和联合政府的组织及实现的步骤问题。

二月二日 参加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了

周恩来关于与国民党谈判来电的复电。

二月十八日 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扩大)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国共两党谈判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旧金山会议我们要参加，赫尔利已同意，需与民主同盟联合提出要求。

△ 周恩来就出席旧金山联合国会议的中国代表成员问题致电赫尔利，指出：四月二十五日将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会议，仅由国民党一方派代表参加不能代表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代表团应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和民盟。国民党只能占三分之一代表名额，其中还应包括国民党民主派，三分之二应是共产党和民盟的代表，否则不能代表中国，不能解决问题。

三月五日 和周恩来电复在云南作统战工作的华岗。肯定了他去年下半年在成都与各方民主力量协商，使他们了解我党政策的作法；阐释了党派会议是成立联合政府的一个实际步骤，用以坚决反对蒋介石包办的御用国会。电文还询问龙云对中共最近的主张和作法的意见。

三月八日 和周恩来一起出席延安文化界人士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大后方一般情况》的报告。

三月二十七日 国民政府行政院发表中国出席旧金山联合国会议代表团人选名单：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为首席代表，成员有王宠惠、李璜、吴贻芳、魏道明、胡适、顾维钧、张君勱、董必武、胡霖，顾问施肇基。

三月三十一日 出席中共中央全体会议。会议原则通过了毛泽东准备在七大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及党章。在讨论中发言：看了报告，给我一个很明确的方向，工作中经常遇到的问题都有明确的回答。认为，蒋介石在大后方的欺骗作用不可小视。这个政

治报告,解除了蒋的武装,很重要。报告所提的纲领很完善。表示同意这个报告。

四月一日 参加中共六届七中主席团会议。会议决定:董必武带随员二人(伍修权、陈家康或章汉夫),参加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代表团。主席团指示,董赴美后主要是争取外国朋友,提高我党的国际地位,并尽量争取留驻美国工作。下午,和周恩来、朱德参加毛泽东同美国驻延安军事观察组成员谢伟思的谈话。

四月二日 王若飞同黄炎培、吴贻芳、胡霖、邵力子、雷震、左舜生、沈钧儒、章伯钧、张申府、孙科等谈国共问题。大家一致请致电延安,欢迎周恩来和董必武再来重庆协商。

四月六日 晨,为准备参加旧金山联合国会议,由延安乘飞机抵达重庆。

△ 在中国民主同盟举行的欢送会上发表讲话,指出:中共与民主同盟今天奋斗的共同目的是“争取中国实现民主团结,以便达到抗战建国的成功。”阐明受中共中央委派出席旧金山会议是“代表敌后解放区一万万同胞向各国表示我们的意见”,我们将以爱好和平、力求民主团结的精神,为国际和平而奋斗。沈钧儒在发言中称董必武是中国人民的代表。章伯钧说董必武是真正代表中国的劳苦大众。

四月七日 出席张治中、王世杰、邵力子、雷震、黄炎培等在参政会举行的饯行会。席间褚辅成希望国民党要继续和共产党谈判,要董必武将此意报中共中央,意在请周恩来出来商谈。当即将以上情况报告党中央。

四月八日 在重庆妇女界举行的欢送茶话会上发表讲话,介绍了中国解放区和陕甘宁边区最近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况以及解放区妇女参加各种工作的概况,并听取重庆妇女界对旧

金山会议的希望和意见。

△ 晚六时，出席重庆各民主党派领袖及文化界人士欢宴郭沫若先生及文化工作委员会各先生的宴会。

四月十二日 率章汉夫、陈家康乘飞机离重庆飞印转美，参加旧金山联合国会议。

四月二十日 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四月二十一日 飞抵纽约。

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大会作《论联合政府》报告，系统地总结了党的二十四年来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深刻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理论，指出党的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在这次大会上董必武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四月二十三日 和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秦邦宪、陈绍禹、邓颖超、吴玉章等被国民政府聘为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四月二十四日 和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起飞抵美国旧金山。下午出席该市华侨为中国代表团举行的欢迎会。

四月二十五日 下午四时半，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在美国旧金山歌剧院开幕。出席会议的有五十个国家，二百八十二名代表。和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一起参加了开幕式。

四月二十五日到五月二日 为大会一般性辩论阶段。各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先后在全体大会上发言，表明对新的国际组织的态度。会议还讨论了大会组织工作问题。从五月三日起，讨论和制定联合国宪章。

四月二十七日 为防止敌人造谣，致函《新华日报》社：所有在

国外的一切谈话，都将交《新华日报》正式发表，以免道远传说，望诸友好鉴察。

五月一日 下午，参加中国出席联合国安全机构会议代表团举行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并回答记者提出的有关问题。

五月十八日 在旧金山用英文发表《中国解放区实录》。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及我党我军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巨大作用和影响。

五月二十四日 和代表团部分团员一起访问旧金山市华侨居住区，先后参观了中华会馆、中华学校、东华医院等。在中华学校还向学生发表了讲话。

五月二十七日 和代表团全体团员一起出席旧金山中华总会馆为代表团举行的宴会。

六月三日 和代表团部分团员到旧金山市孙逸仙公园向孙中山铜像献花。下午出席旧金山救国总会举行的侨众宣传大会。并在会上发表演讲指出：海外侨胞希望我国早日实现民主政治，国内同胞也具同一目标，切望大家一齐努力，争取我国的民主政治早日实现。

六月五日 在旧金山由华侨宪政党、致公党举办的演讲大会上，作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的长篇讲演，全面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民主进步的基本政策，介绍了在抗日战争以及建设陕甘宁边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巨大成就，指出中国共产党所有各项政策都是为了建立一个独立、民主、自由、团结、强大、繁荣的新中国。讲演内容随后连载于当月十六日至二十日的《华侨日报》上。

六月十一日 王若飞电告周恩来：董老请示可否同意他与汉

夫参加国际劳工大会，家康参加国际青年大会。毛泽东收阅后批示：可复，允。

六月十五日 为抗议国民党决定召开一党包办的“国大”，本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发表《关于不参加本届国民参政会的声明》。

六月十九日 中共中央举行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十三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六月二十日 下午参加代表团为招待旧金山市华侨各侨团领袖及新闻界举行的酒会。

△ 解放区职工联合筹委会在延安杨家岭举行第二次筹备会议，董必武和陈郁、邓发、章汉夫四人被会议推选为代表解放区职工出席九月间在巴黎举行的世界职工大会。后因在美任务繁忙，未成行。

六月二十四日 重庆民主人士为庆祝茅盾五十寿辰，举行庆祝茶话会。董必武出国前向重庆正大纺织厂负责人陈均建议，捐款十万元。由陈均委托沈钧儒、沙千里律师将十万元支票赠送茅盾作为“茅盾文艺奖金”。

六月二十五日 下午六时四十五分，代表中国共产党在旧金山电台对国内发表广播演说。

六月二十六日 晨，联合国宪章会议一致通过联合国宪章。宪章明确规定，联合国的宗旨是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并发展国际间的友好合作；联合国所应遵守的基本原则是，各国主权平等，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不得侵犯他国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并不得干涉他国的内政。董必武以中国代表之一的身份，在联合

国宪章上签字。

△ 晚,和中国代表团全体代表,出席旧金山会议闭幕式。

七月二日 离旧金山乘火车赴纽约。在纽约期间会见了华侨进步人士,并多方接触了侨胞,特别是华侨劳动群众。访问了中国人民的朋友史沫特莱、史迪威的女儿以及赛珍珠等。还为新华日报社购买印刷机而多方奔走。

七月十二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解放区临时救济委员会,董必武为主任,李富春为副主任,伍云甫为秘书长。

七月二十日 应华美协进社的邀请,出席该社在中国大厦举行的学术建国讨论会,作了题为《中国问题的关键》的演讲,指出:中国国内有两种反动主张,一为复古运动,一为仿效法西斯运动。此二种主张均不能救中国,均要不得。中国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不民主。国民党一党专制十八年,压制中国人民,排除异己,招致日寇武装进攻。现在国民党当局不得不说要“结束训政,还政于民”,它的办法是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但国民大会应称之为国民党大会,实为加强党治。因此中共、民盟及其他党都坚决反对。中共及民主党派主张抗战时实行有效的民主的联合政府;把日寇赶出中国后,由民主选举代表组织国民大会,通过宪法,依宪法选举政府负责官员。他的讲演不断被掌声打断。《华侨日报》于二十四日摘要发表。

八月十四日 日本政府照会美英苏中四国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十五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形式向公众宣布无条件投降。九月二日,日本天皇和政府以及日本大本营的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胜利结束。

七、争取和平民主， 反对内战独裁

八月十四日、二十日、二十三日 蒋介石在准备内战的同时，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进行谈判。

八月二十八日 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美国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从延安飞抵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

九月九日 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及陕甘宁边区职工联合会愿以其所推定出席巴黎世界职工大会之代表董必武、邓发、章汉夫三人参加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

△ 周恩来自重庆致函董必武(当时仍在美尚未返国)，告知与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国际劳工局理事会理事朱学范商定：(一)中国职工代表，由中国劳动协会组织联合代表团，内中包括陕甘宁边区及解放区职工会代表三人(董、邓、章)，以示一致和统一。中国职工代表团在参加世界职工大会上，力求协调一致，在报告各自地区或工会生活时，得由各单位代表自己负责说明；(二)边区职工会已加入中国劳动协会为其组成之一分子，解放区各职工会亦拟加入，惟尚未经过决定手续；(三)邓发今明两日可飞抵渝。王雪艇、甘乃光均赞成联合代表团的办法，现正与社会部交涉。如得同意，当于月中乘机赶往；(四)中国劳动协会决定扩大组织，准备于今年年底开代表会议，边区及解放区职工会决定参加，并共同筹备全国职工联合会；(五)上海原有二十万有组织的职工与解放区有联系，但中国劳协已派水祥云飞往上海进行组织。和水约定，上海

职工运动要取统一战线作法,力求联合一致,以争取工人生活福利和教育工作者的合作以及上海总工会的建立。

十月十日 国共双方经过四十三天的谈判,取得了初步成果,周恩来、王若飞、张治中、王世杰、邵力子在《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上签字。

十月十一日 毛泽东在张治中陪同下,由重庆返回延安。周恩来仍留重庆,继续与国民党进行谈判。

十月十三日 国共两党发表十月十日签署的《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议纪要》(即《双十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就密令国民党各战区司令长官,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努力进剿,迅速达成任务”。

十月二十一日 周恩来、王若飞继续同国民党代表谈判。会上确定各方参加政协代表的人数为:国民党八人、共产党七人,民主同盟六人,青年党五人,无党派人士九人。

十一月二十日 在章汉夫陪同下,离美回国,二十六日飞抵重庆。与王若飞主持中共重庆工作委员会工作。

十一月二十五日 周恩来乘飞机离重庆返抵延安。

十一月二十八日 赴黄炎培寓所与黄会面长谈。

十二月一日 中共中央得知张公权(张嘉璈)找董必武商谈东北问题后,致电董必武、王若飞:苏军严拒美军入东北,有利于我方谈判和发展,张找董老是必然结果。我就此时机,再开谈判并开政协会议,望复张公权并告王世杰、邵力子,同意就国民党军驻长春、沈阳问题进行协商,拟将廖承志作为我党代表,提议叶挺为无党派代表参加政治协商会议。要求国民党先释放他们,以避免争论。如彼同意先放人,但要求不为代表,我方可以同意。

十二月四日 访邵力子,告以中国共产党出席政治协商会议

代表拟于本月十日动身来重庆，希于本月八日派机往接。

十二月五日 和王若飞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同前来访问的邵力子商谈有关政治协商会议问题。邵问双方停攻、停占是否全面性的？还说周恩来来渝前，希望董、王先与王世杰、邵力子进行一些谈判。关于恢复电台和释放叶挺、廖承志事，邵答应向蒋提出。

△ 和王若飞接到中共中央来电：在美国特使马歇尔来华之前，不要明确答复国民党提出的问题。

△ 周恩来向中共中央书面建议，恢复中共中央南方局（或重庆局），由董必武任书记；王若飞任副书记；刘少文、徐冰、华岗、钱瑛、钱之光、潘梓年、熊瑾玎为委员，章汉夫、王世英、童小鹏、王炳南、许涤新、张友渔、夏衍为候补委员，共十六人组成，以领导国统区工作。另组中共代表团，由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陆定一、叶剑英、吴玉章、邓颖超组成，负责谈判和出席政协会议。

十二月九日 和王若飞出席在重庆举行的“一二·一”死难烈士追悼会，声讨国民党屠杀爱国师生的罪行。

△ 和王若飞接中共中央来电：（一）局势并非对我不利，英、美、苏三国外长会议即将召开，赫尔利在中国的政策已经失败，马歇尔来华后，美国的扶蒋反共方法可能改变。我们应在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取守势，同时又应使他在军事上知难而退。（二）我党政协代表除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邓颖超外加派叶剑英、陆定一、吴玉章。（三）党中央正准备施政纲领和宪法草案。（四）请告民盟，我方主张通过民主途径解决问题，请他们也在纲领、联合政府、国大及宪草方面做准备。

十二月十五日 中共中央全体会议通过了出席政协代表七人名单和周恩来关于正式成立南方局（目前称作重庆局）的提议。董必武为书记，王若飞为副书记。

十二月十六日 和王若飞等到机场迎接由延安来重庆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我党代表周恩来、吴玉章、叶剑英、陆定一、邓颖超及随团工作人员李澄之、齐燕铭等三十余人。

十二月十七日 和周恩来、叶剑英、王若飞、陆定一等分访孙科、王世杰、邵力子、张澜等。

△ 中共代表向报界发表声明：“中国需要和平统一，希望在政治协商会议以前及开会期间，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解放区，使能以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

十二月十八日 和周恩来、叶剑英、王若飞、邓颖超、陆定一出席中共代表团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会上，周恩来说明中共代表这次来重庆，一方面是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另一方面是要继续进行国共谈判。当前“首先待解决的是停止内战问题”；其次是“要讨论出一个和平建国方案”；还要讨论国民大会问题。解放区问题，“要在讨论全国实行地方自治问题下去解决”。军队国家化问题，我们要求改组成为各党派参加的政府，由它来统一全国的军队。

十二月十九日 上午，和周恩来一起接待来访的中国民主同盟成员张澜、张东荪、梁漱溟、蒋匀田等，双方就有关政治协商会议问题交换了意见。

△ 中午，中共代表团宴请国民党邵力子、张群、王世杰，因张、王不在渝，仅邵力子出席。双方商讨了政协诸问题。周恩来向邵力子口头提出，中共希望能在政协开会前立即停止内战，其他一切具体问题都可以在战争停止后，用商谈方法求得解决，这样可以使全国人民对和平解决争端问题不失希望和信心。

十二月二十一日 和周恩来、叶剑英、王若飞、陆定一、邓颖超应邀出席邵力子、雷震举行的招待会；出席的还有黄炎培、李璜、江庸、褚辅成、王云五、左舜生。

十二月二十二日 因美驻华大使赫尔利已于上月二十七日被准予辞职，本月二十日，美总统新任命的特使马歇尔抵达上海，本日，到达重庆。

十二月二十三日 和周恩来、叶剑英访晤马歇尔，对他来华表示欢迎。在谈话中，董必武提议马歇尔可邀请其他党派及各种政治、文化、经济团体代表见面，马歇尔表示接受这个提议。

△ 和叶剑英、邓颖超、沈钧儒、马寅初、梁漱溟、胡厥文等应邀出席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成立大会。该会是中共中央南方局为在经济界扩大统一战线，而推动组织起来的。

十二月二十四日 重庆各界反内战联合会致函蒋介石，呼吁和平，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武装冲突，接纳各党派所提民主要求。同时也致函毛泽东呼吁和平。二十八日，周恩来、董必武复信，对他们给毛泽东的信表示感佩，重申“坚持团结、反对分裂为我党十年来一贯主张”，并说明中共代表团已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立即无条件停止内战，一切争论通过和平协商解决。

十二月二十七日 下午七时，和周恩来、叶剑英应邀出席美使馆为欢迎美国特使马歇尔举行的宴会。

△ 中共代表团以书面形式正式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无条件停止内战的三项建议。（一）双方应下令所属部队在全国范围内均暂各驻原地，停止一切军事冲突。（二）凡与避免内战有关一切问题，均应于军事冲突停止后，经和平协商方法解决。（三）在政治协商会议指导下，组织全国各界内战考察团分赴全国发生内战区域进行实地考察，随时将事实真相提出报告，并公布之。

十二月二十八日 和叶剑英分别访问了傅斯年、贺国光、刘斐和林蔚。

△ 中共代表团在曾家岩设午宴，招待民主同盟政协代表及

在重庆的中央常务委员，交换对政协会议的意见。

十二月二十九日 和周恩来等以中共代表团的名义，宴请救国会方面的沈钧儒、陶行知、邓初民、李公朴、史良，交换对政协的意见。

△ 晚，和周恩来等以中共代表团的名义宴请第三党方面章伯钧等八人，交换对政协的意见。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中共代表团收到国民党关于停止军事冲突的复文。国民党方面表示原则上同意停战。

△ 下午六时，和周恩来、叶剑英、王若飞同国民党代表张群、王世杰、邵力子继续商谈。

一九四六年 六十一岁

一月一日 为立即实现无条件停战，中共代表团正式公布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无条件停止内战的三项建议。

△ 出席农业协进社招待出席政协会议各方代表的招待会，就农民问题作了发言。

一月二日 和中共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起，同民主建国会李烛尘等晤谈，交换对时局的意见。

一月三日 和周恩来、叶剑英、王若飞同国民党代表会谈，中共原则上同意国民党政府复文中的主张，提出了“军事冲突应立刻全面停止”等三点合理的希望，尤其是国民党军在热河的进攻应迅速制止。

一月五日 和周恩来、王若飞、叶剑英同国民党代表张群、王世杰、邵力子继续对停止军事冲突和恢复交通问题进行谈判，达成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协议》。其要点：（一）停止国内各地一切军事冲突，并恢复一切交通；（二）国共两党各派出代表一人，会同马歇尔迅即商定实施办法；（三）由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及政协会议各推出国共两党当事人以外之公正人士八人组成军事考察团，会同国共双方至发生冲突区域考察军事状况、交通情形及其他与国内和平恢复有关之事项。并规定在北平设军事调处执行部，由国、共、美各出一人为委员。

△ 中共中央致电中共代表团：（一）国民党企图抵制采用党派会议或政协的方式来解决国事，限制政协的职权及开会时间，我们必须坚持用党派会议来解决国事，这将成为我们及其他党派与国民党斗争的第一个问题，望你们对此点加以注意。（二）现在是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以后，全国停战问题也基本获得协议，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增加了。如果国民党被迫接受用政协来解决国事，那这次政协会议亦将可能解决一些问题。我们对政协应做解决一些问题的准备。（三）如果政协能够解决一些问题，那我们准备提出的纲领就应更实际一些，简单一些。

△ 和周恩来、王若飞、叶剑英致函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群、邵力子，正式通知国民党政府，我党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是：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七人。另外，还有顾问八人，即：李澄之、何思敬、王世英、沈其震、许涤新、张友渔、华岗、王炳南。

△ 中共代表团宴请无党派人士代表胡政之、王云五、郭沫若、傅斯年、李烛尘、缪云台、钱新之等。

△ 和叶剑英、邓颖超出席中国青年党政协代表曾琦、陈启天等五人为招待中共代表团举行的宴会，双方就政协会议的各种问题交换了意见。

一月六日 和中共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起，应邀出席冯玉祥为招待中共代表团举行的宴会。晚，又出席了孙科举行的招待会，席间就时局问题交换了意见。

△ 国民党政府公布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七条办法和各方面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会员名单，全部会员三十八人，国民党八人，共产党七人，民主同盟九人，青年党五人，无党派人士九人。

一月七日 根据《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办法》之规定，由

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张群、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组成三人会议，举行首次会议。

△ 下午三时，和中共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起，出席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代表茶话会。交换关于会议程序等问题的意见。

△ 中共代表团举行盛大鸡尾酒会，招待中外各界人士。国民党政府各院部长官、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各界知名人士，各国驻华使馆官员，国际友人，中外新闻工作者五百余人应邀到会，中共代表对他们表示热烈欢迎。

△ 和中共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起，出席政治协商会议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会议室举行全体代表茶话会，交换关于会议各项问题的意见。

一月八日 中共代表团在重庆招待东北政治建设协会的宁萝岩、阎宝航、宁承恩、王回波、周鲸文、徐寿轩、徐仲航、周维鲁、刘东轩、卢乃戩等，就有关问题交换意见。

△ 和王若飞出席民主建国会为招待政协代表举行的茶会，章乃器说明民建会对政治协商会议、内战必须停止、人民基本自由必须全部赋予、释放政治犯、政党合法化、解散特务机关等八项意见。董必武、于右任、邵力子、陈启天、郭沫若、梁漱溟先后发表意见。主张在政协开会前后要停止内战，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

一月九日 中共中央电示中共代表团：向美方提出，要求美国停止往东北和华北运送国民党军队。同日上午，周恩来访晤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要求美国停止帮助国民党运兵，并就停止中国一切军事冲突问题进行商谈。

△ 和叶剑英、邓颖超出席妇女联谊会为招待政协代表举行的茶会。会上，有人提出“政治协商会议的意见交政府执行，如政府不执行怎么办？”董必武当即回答：“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是有权

方交政府执行的，但如不执行，这不是代表应怎样，而是要问大家应怎么办？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是由各方面选举出来的，因此在执行决定上，是应由社会力量来监督的”。

一月十日 周恩来和张群分别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政府签署公布《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等。

△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布《中共中央停止内战冲突通告》指示各中央局、分局、各区党委：国共双方停战令已公布，双方统限于一月十三日二十四时停战完毕。我各部应遵守命令，停止一切进攻及破坏交通。但如国民党来攻，应坚决彻底消灭之。

△ 出席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蒋介石在会上致开幕词，他迫于政治形势宣布四项诺言：保证人民自由；各政党一律平等；推行地方自治、实行普选；释放政治犯。周恩来代表中共代表团在会上致词。对四项诺言表示欢迎，并说：“应痛下决心，不仅在今天下令停战，而且永远使中国不会发生内战。”“政治协商会议，就要请各党代表及社会贤达，一起来订出如何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的方案”。

△ 蒋介石一面电令国民党各军政长官“恪切遵守国共达成的停止军事冲突的协议”，同时密令国民党军队利用一月十三日午夜前的宽限期迅速“抢占战略要地”。

一月十一日 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第二次会议。

△ 为《新华日报》创刊八周年题词：“为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繁荣的新中国而奋斗。”

△ 在曾家岩五十号，接见中小工业界的代表，热情地表示：你们建立中小工厂联合会，维护民族工业的生存，我们积极支持。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它们崇洋媚外，卖国求荣，任意摧残民族

工业，无恶不作，无钱不要，你们的困难我早已知道，我决定同你们一道共商对付之策。

一月十二日 上午九时，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第三次会议。周恩来在会上阐述了在八年国共谈判中中共对许多问题的方针，并讲了四点经验教训：第一要互相承认，不要互相敌视；第二要互相商量，不要独断；第三要互相让步，不要独霸；第四要互相竞赛，不要互相抵消。

△ 和中共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起，应邀出席张治中举行的欢宴会，国民党代表吴铁城、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到会作陪。

△ 政协五方面代表陈立夫、董必武、梁漱溟、王云五、陈启天等协商，推出何基沣、林可矶、王葆楨、章元善、李德全、周炳琳、杜斌丞、陆观基八人为军事调查团团员。冷遹、林虎、张奚若、任鸿隽四人为候补团员。

一月十三日 政治协商会议推举董必武、陈立夫、陈启天、梁漱溟、王云五组成五人小组，负责协商会议议程、议题及分组办法等。

△ 中共代表团全体政协委员、顾问人员举行会议，研讨了改组政府和施政纲领问题。

一月十四日 在政治协商会议第四次会议上，代表中国共产党作关于改组政府问题的报告，提出：“应有一个共同纲领，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改组政府”；“结束训政，国民政府委员会为最高决策机关，最好有权决定人选”；“政府委员会人选应由政治协商会议协商产生”，“在政府主要职员中，大党所占地位不要超过三分之一”；“国民政府主席的命令要经过会议通过，防止手令制”；“政府的改组应包括国民政府下各院部会的改组，使各党派与无党派民主人士有广泛的机会参加政府工作”等八项主张。

一月十五日 在政治协商会议第五次会议上，代表中国共产党作关于共同施政纲领的报告，提出：和平建国基本方针，各党派长期合作，坚持避免内战，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结束训政，实施宪政；人民自由权利问题，应保障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罢工等自由；扩大政府民主基础，国民政府应成为全国各党派及无党派公平而有效参加的政府；筹备国大，制定宪法；实行地方自治，废除保甲制度；改组军事委员会成为各党派共同领导之机构；改革财政经济、取消苛捐杂税；改革文化教育，废除党化教育等十项主张。

△ 政协会议公布代表的分组情况和各组的召集人名单。董必武被大会指定为政治协商会议施政纲领组和国民大会组成员，并为施政纲领组召集人之一。

一月十六日 中共代表团向政治协商会议正式提出《和平建国纲领草案》。

△ 中共中央致电中共代表团：改组政府，各方委员应有一定的比例，国民党不得高于三分之一；应明确表示，非有广泛的代议制政府则军队无法统一，军队要国家化，国民党必须首先做到，应由各党派共同管理军事，不许排斥异党。

△ 中共代表团宴请张治中、雷震及国民党政协代表团，就政协会议有关重大问题进行了商谈。

一月十六、十七、十八、十九日 继续出席政治协商会议。

一月二十三日 政协成立综合委员会。为使各项议案经各方代表充分协商，达成协议，由国民党、共产党、民盟、青年党及无党派人士五方面各派二人组成综合委员会。和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参加该委员会，并出席第一次会议。

△ 中共代表团应邀出席蒋介石在国民政府礼堂举行的招待

会。

一月二十七日 和周恩来、叶剑英、王若飞、邓颖超、陆定一联名在政协会上提出《关于请政府报告四项诺言实现情形之提案》。

△ 应邀在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的集会上讲话，指出：“今后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二者必须并行才能解决问题。”

一月二十八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初步商定中共参加政府的名单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刘少奇、张闻天。二月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又决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参加政府名单为：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周恩来、王若飞、范明枢、张闻天。如范不能去，改提彭真。四阁员为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周恩来任行政院副院长。

△ 和吴玉章应邀参加陈铭枢为纪念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十四周年举行的招待会。并为十九路军抗日十四周年题词：“抗日先驱”。

一月三十一日 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第十次会议及闭幕式。在第十次会议上，逐项讨论并通过了政府组织、国民大会、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及宪法草案第五项决议。在讨论时，黄炎培提出成立“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的提议，得到中共、民盟代表的一致赞同，董必武当即表示希望这个委员会能很快成立，中共代表团决定全体加入为发起人。接着举行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式。会议自始至终斗争激烈，焦点是军队问题和政权问题。经中共和第三方面代表努力，会议通过了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案。规定成立联合政府，政府委员名额的半数由国民党人员充任，其余半数由其他党派及社会贤达充任。规定在六个月内，政府军队整编为九十个师，中共军队按五比一的比例整编，然后全国所有军队统一整编为五、六十个师；规定地方自治，这些地方可以保存人民的武装等项。

二月二日 和王若飞乘飞机返延安。下午,和王若飞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汇报了南方局关于整军方案和东北问题的意见,得到会议批准。然后,又飞重庆。

二月五日 中共中央致电中共代表团:力求采用和平方法解决东北问题。

二月八日 中共中央致电中共代表团,关于整军方针问题,不同意国民党提出的国共两党军队混编办法。

△ 和周恩来、吴玉章、秦邦宪、何思敬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政治协商会议设立的宪草审议委员会。

△ 在重庆中小工厂联合会举行的春季联谊会上讲话,严正驳斥了反动政府诋毁中小工业的种种澜言,明确指出:中小工业发生危机,并不是工业单位过多的缘故,而是由于政治问题,在一党专政的庇护下,养肥了官僚资本,摧残了民族工业,尤以中小工业受害最大。针对中小工联部分会员只着眼于要贷款、求救济等思想,告诉大家政治问题不解决,经济就没有办法繁荣。希望今后工业界要关心政治,从事民主运动。

二月九日 出席由政治协商会议决定组建的人民权利保障委员会第一次筹备会议,和冯玉祥、沈钧儒、邵力子等二十五人被选为筹备委员,并在大会上讲话,号召全国人民组织起来,靠自己力量保障人权。

二月十日 重庆各界在校场口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国民党反动派指使特务捣毁会场,打伤郭沫若、李公朴、施复亮、马寅初等,酿成校场口事件。当晚,政协各方代表举行紧急会议,推举周恩来、张君勱、陈启天、李烛尘四代表向蒋介石当面交涉,并带去沈钧儒、梁漱溟、章伯钧、张申府、罗隆基、张君勱、陈启天、李烛尘、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十一人联名给蒋介石的抗议信。因蒋介

石已于当日去上海，避而不见，未能面晤。

△ 下午五时，和王若飞由重庆飞抵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有关政协会议情况。

二月十一日 和王若飞就谈判整军问题向中共中央提出书面意见：（一）中国革命失掉军队就失去一切，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忘记控制在手；（二）力争和平，避免内战，但又要有不怕内战的准备，才能在内战发生时有力量制止内战，切记不能忽视掌握武装之重要；（三）力争全国和平民主统一是在不丧失解放区政权及军队根本上的统一，丧失了解放区的政权及军队的基础，全国民主也难争到；（四）马歇尔的整军计划是在用一种新的方法来消灭我们军队；（五）他的国共军队合编及分驻计划，有使我们军队被化掉的危险等等十一点应注意的问题。毛泽东阅后批示：“此意见书所取立场及态度是正确的，因而是可以预见与预防将来之危险的”。

二月十三日 上午十时，和王若飞、秦邦宪、冯文彬由延安飞抵重庆。

二月十四日 和周恩来、秦邦宪出席宪草审议委员会首次会议。会议议定，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及无党派人士五方面成立协商小组。

二月十六日 出席宪草审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讨论中央政制问题，并在会上发言，主张维持政协对于宪草的修改原则，各党派合作，采取议会制度，议会制度可使政局安定，并赞成以行政院为最高行政机关，对立法院负责。

二月十九日 和秦邦宪出席宪草审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讨论人民权利义务，选举及基本国策诸问题。

二月二十二日 和中共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起就暴徒行凶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的严重事件，致函国民党代表孙科、吴铁城、邵

力子、张厉生、陈布雷、王世杰、张群，提出强烈抗议，指出这次有组织的暴行，显系国民党内反苏反民主的反动派制造国内分裂，推翻政治协商会议之阴谋活动，要求：立即查办主凶，解散特务机关，赔偿损失，保证今后不再发生同类事件。

△ 晚，中共代表团举行记者招待会，周恩来发表声明，指出暴徒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和校场口事件，沧白堂事件都是一个来源，这点政府不是不知道的。我们认为政府必须采取适当的处置和负责的态度，在这件事上是考验政府有无决心与各党派合作，有无决心负责实施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协议，有无决心使中国走和平民主的道路。我们希望他们赶快表示自己的态度，负责处理此事。

二月二十三日 和周恩来、邓颖超、陆定一、秦邦宪出席苏联大使馆为庆祝苏联红军节举行的鸡尾酒会。

△ 和周恩来、王若飞、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秦邦宪为二月二十二日暴徒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事件，致函蒋介石，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立即惩办主凶，解散特务机关，对本报损失道歉和赔偿，并保证不再发生同类事件。

△ 和邓颖超以及各界人士代表赴医院慰问《新华日报》营业部受伤同志。

二月二十六日 致电中共中央并请转告林平、连贯、廖沫沙，因目前经济、人力不足，广州办报事，望即停止进行。在香港，《华商报》应保持群众面目，经费部分应由外筹，不能专靠党供给，请将香港每月各项开支的最低预算电告，必须得到批准才能开支。

三月一日至十七日 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多项推翻了政协决议、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决定。形势迅速逆转。

三月四日 叶挺获释。下午六时许，由邵力子陪送回到中共代

代表团驻地，受到董必武、王若飞、邓颖超、陆定一、廖承志等热烈欢迎。

△ 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香港创办的《人民报》题词“人民呼声”。

三月六日 和王若飞、叶挺等十余人到机场欢迎周恩来、马歇尔、张治中军事三人小组由武汉回到重庆。

三月七日 和中共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起再次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严正指出：继重庆《新华日报》营业部被捣毁后，又连续发生成都《新华日报》营业分处和西安十八集团军办事处被捣毁的严重事件，似此情形，使生命自由日在特务威胁之中，一切民主团结工作均难进行。

三月十一日 马歇尔返美述职。十二日，苏军全部离沈阳回国。十三日，国民党军进驻沈阳，以此为基地，向民主联军发动进攻。

三月十二日 和王若飞商定东江党组织所需经费数目，电报任弼时，并请核准。

三月十四日、十五日 和周恩来出席政协综合委员会、宪草审议协商小组联席会议。讨论关于各党派及社会贤达之国府委员及政务委员人选、国大代表及宪草问题。中共代表团在宪草修改原则问题上作出三点让步：（一）将无形国大改为有形国大；（二）取消政协商定的宪草修改原则第六项第二条；（三）省得制定省宪改为省得制定省自治法。

三月十五日 和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转新四军第五师、中原局：已同国民党政府粮食部协商，由张家口、上党、太行、山东卖二万吨粮食给北平、太原、新乡、济南，由国民党政府粮食部在武汉拨粮或款给第五师，以解决其困难。

三月十六日 国民党中央社发布消息时，对政协综合委员会及宪草审议小组联合会议的讨论情况加以歪曲报导。对此，和周恩来以及民盟代表张君勱、罗隆基、章伯钧等联名致函政协秘书处及立法院长孙科提出抗议，指出“中央社所添的字句，都是曾经在会上争论，而未得到协议的。”要求“中央社及各报立即更正、以正听闻而尊重政协之结果。”

△ 和周恩来致电叶剑英：现五师又遭蚕食与进攻，请催执行小组速回汉口，前往黄安处理冲突事件。

三月十七日 中共中央发言人就坚持政协原则发表谈话，指出，现在国民党内有许多人士，企图改变政治协商会议的若干原则决定，特别是关于宪法原则的决定。此举将不能得到中国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广大人民的同意。中共认为，坚守政治协商会议的一切决议，是各党派信誉与国家百年大计所关。中共坚持政协一切决议，必须百分之百实现，反对作任何修改，并呼吁民主人士及全国人民为此而奋斗。

三月十八日 中共中央致电中共代表团，不同意十五日政协综合委员会及宪草审议小组作出的关于修改政协决议的宪草修改原则。同时指出，国民党之六届二中全会是坚决反对国家民主化的，他们必然要坚持修改宪草原则，国大代表名额他们又擅自增加，我与民盟在国大保持否决权将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不能参加国大，参加政府，望与民盟商议，并在适当时机告知国民党。

△ 和周恩来、王若飞致函国民党代表邵力子、王世杰、张治中、张群，指出因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各项决议案，动摇了政协会议五项决议；政协闭幕以来，各地暴徒暴行层出不穷，人民自由毫无保障。请他们于十八、九日下午至中共代表团驻地商谈

实施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的具体办法。

三月十九日 针对国民党企图利用四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实现其二中全会所定的方针，中共中央电复中共代表团：同意中共参政员不出席即将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四届二次会议。

△ 和周恩来、王若飞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邵力子会谈立即实现政协全部决议问题，未获结果。

△ 和秦邦宪、吴玉章出席宪草审议会第七次会议，并在会上讲话。提出：“必须坚持政协的一切决议，目前应召开政协的综合小组讨论，保障原有政协决议不能有任何动摇。”

三月二十日 中共中央致电中共代表团：开展关于东北问题的宣传斗争。

△ 和周恩来、王若飞出席政协综合小组会议，商讨政协决议的实施问题。

△ 就中共参政员决不参加本届参政会事，答新华社记者问。指出：“因会中某集团占有极大数量，我们预料本届参政会对政协会议一切决议，一定会在各种掩饰下加以动摇”。“重复国民党二中全会之各幕活剧，以谋不利于团结”。故“认为出席本届参政会定将无补于事”。至于在意料中的各种造谣、诬蔑，我们准备在会外加以答复。

△ 国民党的四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中共参政员未出席。会议通过了攻击政协决议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许多议案。

△ 和王若飞、秦邦宪在中共驻重庆办事处，接待来访的黄炎培、冷御秋、江问渔，商谈江苏运河培修问题的进行办法。

三月二十一日 周恩来离重庆返延安，向中共中央报告工作。二十五日飞抵重庆。

三月二十二日 接到周恩来两次来电，电中告知中共中央决定：政协谈判应以宪草修改为中心，应力争立法、监察两院合为国民大会，而将省自治法改回为省宪，以保证解放区的地位。中央决定五师应争取全部合法转移，在未转移前，应接济粮食，如交涉不成，而遭大规模袭击，只有突围，我五师应有此坚定的准备。

三月二十四日 为帮助中原军区摆脱被国民党军队封锁围困的困难处境，由十八集团军、新四军驻武汉办事处主任郑绍文陪同，自重庆飞抵武汉，和有关单位商量解决中原军区的粮食问题。

三月三十日 下午七时，自汉口到宣化店，代表中共中央慰问抗战有功的中原军区军民，中原军区的军民异常兴奋，万分鼓舞。《七七日报》为此发表热情洋溢的长诗，欢迎董必武的到来。

三月三十一日 在中原军区举行的盛大欢迎会上讲话，异常兴奋地说：“新创这部队时，我曾尽了一份力量，现在又看到这支部队在故乡成长壮大，特别高兴。”在谈到中原军区目前处境时，愤慨地说：“你们在八年抗战和几个月的反内战中，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出了很大的力量，然而今天不仅未得到褒奖，反而被反动派封锁着围困着，受苦挨饿”。“党中央、毛主席及全国各地同志都很关心你们。”这次我就是“代表党中央来慰问你们，也可以说是代表全国各地的同志来慰问你们。”“虽然不能完全解除你们的困难，但我相信经过八年艰苦磨练的同志在李先念、郑位三和中原军区的领导下，是有办法克服困难的。”

四月一日 中共中央致电中共代表团：近日来我党代表坚决斗争的立场是很对的。只有如此，方能保卫政协决议，务望精心研究，密切注意。省自治法仍应改为省宪，如目前不便提，将来适当时机应提出。在宪草与国大等问题没有解决及中央没有最后

通知以前，我党原拟参加政府的名单不要提出。

△ 将中原军区财政困难情况电报中共中央及周恩来、叶剑英：目前中原最困难的是财政，粮食有钱还可以买到，除粮食外，每日油盐菜要钱。现经各方借来及送来的，可以勉强维持到五月底的伙食。唯夏衣全无着落，请周、叶在三人会议上提出。关于伤病员、家属妇女小孩及部队转移分几次出发等问题亦望尽快研究，详定计划。

△ 为《七七日报》题词：“和平民主团结统一是我们的国策”。

△ 蒋介石在国民党的四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上作报告，公开撕毁政协决议和东北停战协议。

四月二日 答《七七日报》记者问。着重回答了记者提出的关于政治协商会议及国民党二中全会后的国内形势等问题。列举大量事实说明：“国民党二中全会的目的是推翻政协会的决议。仍企图以“五五宪草”的体系来维持一党专政。这是今天民主潮流中的一股逆流，是中国法西斯分子的一幕丑剧，是值得我们全国人民警惕的。我们必须全力争取使中国成为一个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国家，而不是内战和独裁的国家。”

四月三日 参加中共中央中原局在宣化店创办的中原民主建国大学全体师生举行的欢迎会，并在会上讲了话。

四月四日 上午，参加宣化店士绅和临时参议会驻会代表举行的欢迎会，并在会上作关于政协决议的报告。

四月五日 中共代表团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秦邦宪联合致函国民党王世杰、邵力子、张群并转蒋介石，就四月三日北平军调部叶剑英委员的军事顾问滕代远寓所，北平新华分社和《解放报》社遭国民党大批军警宪特搜查，捕去滕代远的秘书李新、解放报总编辑钱俊瑞等四十四人的事件，提

出严重抗议。

四月七日 由宣化店返汉口。途中，在距汉口二十华里之戴家山，突遭当地国民党军警之无理检查，留难达一小时半，并将所带之《七七日报》、地图及照相机等扣留。至下午七时始抵达汉口。

四月八日 给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政委郑位三及全体军民写信，再次鼓励中原军区党政军民同志“发扬过去的优良传统，继续为中国的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而斗争。”

△ 王若飞、秦邦宪因国民党推翻政协协议，冒恶劣气候从重庆乘飞机回延安向中央报告请示工作，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和黄齐生等十七人同机遇难。

四月十四日 中共中央重庆局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中共四川省委委员及分工提议。

△ 和周恩来、吴玉章、叶剑英、陆定一一致函王世杰、邵力子、张群、张厉生，就十三、十四日报载立法院修正的国民大会组织法提出意见，指出政协关于国民大会问题获得协议后，原有国民大会组织法即需修改，我方曾于三月十六日提出修正草案送阅。但重要各点概未采纳，请设法补救。

△ 和周恩来、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致函王世杰、邵力子、张群、张厉生，要求转电北平当局停止查封《解放报》，指出蒋介石虽以四项诺言昭示天下，而至今人民出版言论尚无自由，如此则所谓宪政云云，政府改组云云，谁能置信。

四月十八日 由武汉返重庆。向记者谈宣化店之行的任务有三：“第一是代表中共中央慰劳边区军民；第二是向边区居民解释关于停止冲突的问题；第三是帮助解决军民的粮食恐慌。”指出：

“由于国民党军队的不断的蚕食进攻和封锁，边区军民的生活非常困难，无论军民，每天都只能吃一顿稀饭。”强烈抗议国民党撕毁政协决议，围困、进攻中原边区的罪行。

四月十九日 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悼念“四八”烈士的文章。指出：“王、秦、邓、叶诸同志及黄老先生是为了维护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而飞延安。为奔走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而遇险而死难。我们共产党人要把他们未竟事业一肩担负起来，争取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的实行，争取和平民主团结统一在中国早日胜利！”

四月二十一日 中共中央致电中共代表团，指出反对独裁是制宪最基本的原则，是我们的立足点。

△ 和中共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起发表严正声明，拒绝提出国府委员及国大代表名单，敦促国民党解决各项问题。指出：“内战蔓延，时局严重，国民党拒不实施各项协议，继续坚持一党独裁，在此种严重情况下，中共目前已无提出国府委员及国大代表之可能，只有各项问题解决后才能考虑。”

△ 下午二时，出席中共代表团、四川省委、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及重庆《新华日报》全体同志为“四八”烈士举行的追悼会，并在会上讲了话。

四月二十二日 代表中共中央重庆局出席中共四川省委成立会，宣布中共四川省委组成人员。

四月二十四日 出席东北政治建设协会、东北文化协会在重庆举行的招待政协代表的宴会，并讲了话，指出：“国民党军队对东北人民的进攻，已使东北人民感受无比的痛苦与灾难”。主张“东北应立即无条件停战”。

四月二十八日 和周恩来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宴请冯玉祥、李济深、陈铭枢、王昆仑、谭平山等各方人士，交换对时局的意见。

五月三日至十六日 周恩来、董必武先后率领中共代表团和重庆局同志飞抵南京。自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南部国民党统治区域革命斗争的指挥中心移到南京。随后，中共中央重庆局改称为中共中央南京局，领导四川、云南、贵州、西康、上海、武汉、湖南、广东、广西、闽粤边等及香港的地下党组织。南京局下设外事工作委员会、地下工作委员会、群众工作委员会、宣传部、组织部、党派组、军事组、资料组、办公厅、政治研究室。董必武分工负责地下工作委员会。为解决经费问题，南京局成立财经委员会，董必武为书记，钱之光为副书记。

五月四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指出：“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的环节”。各解放区根据《五四指示》，迅速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

五月十七日 致电张鼎丞、粟裕，询问苏浙军区吴兴支队政治委员等三人是否在途中被捕，望速详覆，以便办理。

△ 在记者招待会上指出：东北问题并不较几月之前更接近解决，国民党坚持军事三人小组恢复谈话之前，中共应先交出长春，此种立场，并无改变之象。中共坚决主张无条件停战。

五月十九日 和邓颖超、何思敬、廖承志等谒中山陵及先烈廖仲恺之陵墓，并献花致敬。

五月二十日 和周恩来、陆定一、邓颖超联名致函张君勱、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陶行知：“当前局势严重如此，吾辈惟有以“披发缨冠之心，为奔走和平之举”。“亟盼民盟方面，速有代表来京，共同努力”。

五月二十一日 和周恩来、邓颖超、陆定一、李维汉一起，应邀出席国民党政府代表邵力子及政协秘书长雷震举行的宴会。

五月二十二日 东北民主联军撤出长春。

五月二十四日 在梅园新村十七号接见中外记者，对当前时局发表谈话：“蒋介石曾谓拿下长春再说，现长春既已拿下，第二步之发展，端视蒋介石而定。”在回答记者问中共在长春为何不抵抗时说：“除接受民盟建议外，中共绝不愿因此而扩大内战，使东北人民继续遭受牺牲”。

五月二十五日 下午五时，和周恩来、陆定一同国民党政府代表王世杰、邵力子、张厉生、雷震等举行到南京后的首次会谈。

五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 和周恩来等同民盟人士会谈时局问题。

五月二十八日 和周恩来、陆定一、齐燕铭前往蓝家庄访晤当日到南京的民盟五代表张君勱、梁漱溟、黄炎培、沈钧儒和章伯钧，向他们介绍了近一个月来，同马歇尔商谈的经过情况，并就当前时局问题广泛交换意见。

五月二十九日 和周恩来、陆定一访黄炎培，长谈至深夜。

五月三十一日 和周恩来、陆定一、邓颖超、李维汉联名致函国民党政府代表王世杰、邵力子、张群、张厉生，抗议国民党政府当局勒令北平《新华日报》及新华通讯社停刊停业的非法行为，指出这是侵犯人民言论与出版自由。

六月二日 上午十时，在民盟办事处就当前时局答记者问。

六月六日 下午三时，应邀赴蓝家庄民盟办事处，就目前时局问题同民主同盟、中国青年党代表交换意见。

△ 和周恩来、陆定一、邓颖超联名致函马叙伦、陶行知，指出只有“停止武装冲突，民主团结方有途径可循”。

六月八日 和李维汉、齐燕铭夜赴民主同盟机关驻地，同民

盟代表就时局问题进行了广泛交谈。

△ 黄炎培为苏北宝应士绅鲍执之被当地民主政府拘捕一事，写信给周恩来、董必武，要求设法释放。董必武当即去电淮阴苏皖边区政府，并电告正在延安的周恩来。鲍执之被我当地政府释放后，通知黄炎培。

六月十日 和李维汉赴青年党办事处，访问李璜、陈启天，就时局问题进行广泛交谈。

六月十一日 和周恩来、邓颖超、陆定一联名复函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马叙伦、陶行知等。指出：“中国政事之败，民生之苦，于今已达极点，而国民党统治集团中之好战分子，犹然恃美国武装之资助，积极进行全面反共之内战。”重申中共“夙主无条件停止国内一切冲突”，“愿本一向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之职志，进行谈判”。希望“诸先生再接再厉，制止内战，挽救国运于阽危，张民主之大纛”。

六月十四日 中共代表团发言人对当前时局发表谈话：东北停战问题，休战命令发布近一周，按诸政府方面之行动，则内战部署仍在全面进行，显然不是以休战求和平，而是争取时间，进行休整，等待增援，以谋再战。关内冲突问题，国民党当局始终未认真执行过停战协定，近来更有变本加厉之势。希望全国人民督促国民党当局放弃这种破坏停战协定，煽起全国内战的企图。和平是中国的出路，也是大家的出路。内战的前途是毁灭，进攻的对面是抵抗，谁要玩火，谁就会先烧了自己。

六月十五日 和周恩来、李维汉应邀出席政协综合小组主席孙科举行的宴会。双方对各项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

六月十八日 上午十时，和李维汉应邀出席第三方面的集会，并在会上报告谈判恶化经过。向他们出示蒋介石的整军方案补充

办法，指出国民党在恢复交通、三人小组最后决定权及东北驻军等问题上仍坚持原议，我们决不接受。

△ 和南京新华社社长范长江一起到上海。

六月十九日 在上海邀请马叙伦、林汉达、郭沫若晤谈，商讨制止内战，进一步推动爱国民主运动问题。谈话后，随即返南京。

△ 和周恩来、李维汉同第三方面人士谈话，对国民党要求给美方最后决定权表示愤慨。

六月二十一日 和周恩来、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李维汉以中共代表团的名义致函国民党代表孙科、吴铁城、王世杰、邵力子、陈立夫、张厉生并转蒋介石，呼吁立即停战，实现和平，挽救当前之严重危机，提出（一）宣布东北长期停战，并重申全国停战命令；（二）立即协商恢复全国交通之具体办法；（三）定期商定全国及东北整军办法；（四）重开政治协商会议，迅速改组政府等四项具体步骤。

六月二十二日 毛泽东发表声明，指出美国对华军事援助，是武装干涉中国内政，以强力支持国民党独裁政府，继续陷中国于内战、分裂、混乱、恐怖和贫困，危害中国安全独立与领土完整。中国共产党坚决要求美国政府立即停止对华军事援助，立即撤回在华的美国军队。

△ 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代表团，应拒绝蒋介石所提整军方案补充办法，指出蒋介石的目的在废弃政治协商会议，打破整军方案。

△ 和李维汉、齐燕铭夜访民主同盟政协代表。

△ 下午三时，和邓颖超、李维汉应黄炎培、张申府、罗隆基、章伯钧、梁漱溟、郭沫若、曾琦、陈启天邀请，在中央研究院会晤，谈当前局势问题，并报告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最后决定权问题之主张。

六月二十四日 凌晨，和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滕代远深夜赶赴医院，慰问被国民党特务打伤的上海赴南京请愿代表马叙伦、雷洁琼、阎宝航等，对政府放纵暴徒行凶打人提出严重抗议，提出六项善后办法，并以备忘录形式分致徐永昌、俞大维和马歇尔。

六月二十五日 致函蒋廷黻，要求按有关黄河堵口复堤问题之协定，尽快发给黄河堤工所需工款。

△ 晚，和周恩来在梅园新村中七号宴请上海请愿代表。就当前时局交换意见。

六月二十六日 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调集三十万大军围攻中原解放区，从此发动了向各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全国内战爆发。

六月二十八日 和邓颖超、李维汉、齐燕铭在梅园新村接见上海学生代表陈立复，向陈立复介绍了谈判经过。

六月二十九日 和周恩来、滕代远、邓颖超、李维汉一起致函马叙伦、张纲伯、吴耀宗、盛丕华、雷洁琼等上海人民团体赴南京请愿代表。对他们“不顾特务暴徒之威吓毆辱，坚持呼吁和平反对内战，至诚至勇，曷胜感佩”。重申“中共对当前国事，主张要无条件停止内战、奠定长期和平，实施政协决议、整军方案，以实现政治民主化、军事国家化，而致中国于统一富强之基。目前为争取长期停战已作极大之让步，虽尚未获得协议，仍当与全国人民一致，继续为和平奋斗，不达目的，誓不休止”。请他们将此意转达上海各界团体人士，并望再接再厉，为实现和平民主而努力。

△ 和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滕代远一起，致函上海圣约翰大学学生陈震中、东吴大学学生陈立复，希望上海学生发扬“五四”传统，为和平民主奋斗到底。

七月一日 毛泽东、朱德发表声明：在任何地点，如果国民党

军队不攻击我军，我军不主动攻击国民党军队，但如遭国民党军队攻击，我军将坚决采取自卫手段。

七月二日 和周恩来同陈诚、王世杰、邵力子进行会谈，就历次商谈的问题，双方作全盘探讨。

△ 晚，和周恩来、李维汉在梅园新村，宴请燕京大学校长美国人司徒雷登博士。

七月四日 和周恩来同陈诚、王世杰、邵力子继续会谈，仍无具体结果。当邵力子将“国民大会”定期召开一事口头通知周恩来时，周恩来当即表示，对此一党决议，中共不愿受任何约束，并提出即刻重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一切政治问题。

七月五日 以解放区救济总会主席的名义，向联合国救济总署及远东分署发出呼吁“解放区受敌伪损害最大。难民占全国难民总数的五分之三，而所获救济物资仅占二百分之一”。“望联总采取适当措施，大公无私与合理的分配救济物资，以便及早救助解放区受灾深重的人民。”

△ 晚，和李维汉访晤民主同盟政协代表罗隆基、梁漱溟、张申府，商谈当前时局问题。

△ 和周恩来、邓颖超出席美大使馆庆祝美国独立一百七十年周年纪念日活动。

七月六日 下午四时，和周恩来同陈诚、王世杰、邵力子商谈整军及驻地问题。中共代表提出迅速召开政协综合小组会议，讨论改组政府、国大、地方政权等问题，遭到国民党代表拒绝。

七月七日 为国民党单独召开开国大事，和周恩来、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李维汉联名致函孙科、吴铁城、邵力子、陈布雷、王世杰、陈立夫、张厉生、张群并蒋介石提出书面抗议。指出：“此举完全违反协商精神，我党坚决反对”。并郑重声明：“关于

国大诸问题，在获得协议之前，我党不受任何片面决定之拘束”。坚决主张“迅速召开政协综合小组会议，商讨国大及有关问题。贵方如仍予拒绝，并因此而引起的纠纷，其责任应由贵方负之。”

七月十日 和周恩来同陈诚、王世杰、邵力子继续会谈，仍无任何进展。从此国共会谈停顿。

七月十一日 在记者招待会上，就解放区救济问题发表谈话。指出：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救济总署对救济物资的分配，完全违反了联总规定的不得因种族、宗教及政治信仰不同而有所歧视之原则。中国的救济工作就是由于受到政治的影响，致使救济物资不能分配到应该得到救济的解放区的灾民身上。

七月十三日 和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廖承志致电李公朴夫人张曼筠，吊唁十二日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李公朴先生。指出：“公朴的牺牲必然激起全国人民反法西斯暴行及争取和平民主运动的高涨，敝代表团誓为后援。”

七月十四日 周恩来飞抵上海。

七月十五日 向记者发表谈话：国共谈判症结，现在不在军队驻地上面，而在中共军队撤退后区域内之行政权问题。此问题本在蒋介石所颁布东北停战之三项问题谈判范围之内，因彼此原则距离甚远，故谈判遂行停顿。

七月十七日 和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廖承志致电闻一多夫人高真，吊唁十五日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闻一多先生。指出：“此种空前残酷、惨痛、丑恶、卑鄙之暗杀行为，实打破了中外政治黑暗之记录。中国法西斯的狰狞面目至今已暴露无遗。”“中国人民将踏着李公朴、闻一多诸烈士的血迹前进，消灭法西斯统治，实现中国之独立、和平与民主。”

△ 和周恩来、吴玉章、邓颖超、李维汉致函国民党代表孙科、

吴铁城、陈布雷、邵力子、王世杰、陈立夫、张群及蒋介石，为李公朴、闻一多惨遭暗杀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政府一面大举进攻解放区，另一面纵容、指使特务机关在大后方暗杀和平民主领袖，如此野蛮卑鄙手段，虽德、意、日法西斯政府所不敢为”。强烈要求：立即撤换昆明警备司令，重申四项诺言，保护各党派及一切民主人士安全，彻查各地惨案，严惩祸首，取消特务组织，释放一切政治犯。

七月十九日 由于某些民主党派成员，对于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不十分了解，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董必武，要向民主同盟人士说明中共的土地政策，只有实行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和政治协商会议“耕者有其田”的决议，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才能领导农民运动走入正轨，才能为国家民主化、工业化，造成巩固的基础。我们很愿意和他们共同研究这一重大问题。

七月二十日 中共中央发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示，从本质上分析了敌我形势，指出：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

七月二十五日 得悉陶行知为躲避国民党迫害，匿居友人家中不幸中风去世的恶耗后，和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廖承志电唁陶行知家属。

七月二十六日 赋诗悼念陶行知：“敬爱陶夫子，当今一圣人，方圆中规矩，教育愈陶钧，栋折吾将压，山颓道未伸。此生安仰止，无复可归仁。”

七月二十八日 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争民主的牺牲》一文，指出：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被特务暗杀“是反动派有计划、有组织的特务暴行”。“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民政府建立着各式各样的特务机关，纵容这些特务机关蹂躏人民，无恶不作”。但“无论反动派

怎样疯狂与残暴，都不能挽救它垂死的命运，一个坏政府想靠特务的恐怖来维持其黑暗统治是可能的吗？”号召一切爱好和平民主的人们要“更团结、更勇敢地继续举起民主主义的光荣旗帜前进！”

七月三十一日 和周恩来致函邵力子，抗议国民党当局垄断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指出：“在目前内战日益扩大之际，世界各国正注视我国制止纠纷之措施，但出席和会代表，贵党竟予垄断无遗，乃示天下以不公”。“望按照现时各国出席和会代表方法允予出席，以示团结。”

八月二日 国民党当局派飞机轰炸延安。

△ 致电方方、林平转告陈其瑗，因政局已逆转，暂勿回国。请他在港暂与彭泽民、李章达诸先生共商民主运动。由连贯和他联系，并给与必要的帮助。

八月五日 和周恩来再次致函邵力子，抗议国民党当局垄断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

八月八日 和周恩来联名致函黄炎培，对黄致函毛泽东所询两点，俟得便“面罄一是”。

夏 在周恩来与张克侠谈话的第二天，董必武派王冶秋通知张，把昨天在汽车上与周恩来谈的很有价值的有关国民党在徐州的布防情况等，写一书面材料交南京局。八月二十日，周恩来将张反映的情况电告中共中央。

八月十四日 电告张鼎丞、贺龙、粟裕、谭震林，并报中共中央转临沂陈毅：驻徐州市外围之国民党八十八师师长周繁渠派人来联系，表示决心反内战，袭取徐州，拟派人经利国驿韩庄间与我山东方面联络，另派人从泗县与我苏北方面联络。来人以二寸宽三寸长之白布上书“忠贞”二黑字为凭，可派人接洽，并协商布署办法。我处拟派人去徐州联络。

八月十九日 和周恩来电告中共中央：国民党的宣传斗争策略有所改变，在报上散布主和空气，并为进攻解放区制造借口，建议谈判中仍坚持停战和政协决议两原则。二十一日，中共中央电复：我们一贯力求和平。我在宣传上仍坚持要蒋停战，召开政协，主张和平。

八月二十日 廖仲恺忌辰，和周恩来、邓颖超、廖承志、廖梦醒到廖仲恺墓前悼念，并摄影留念。

八月二十一日 由南京赴上海，准备参加黄河堵口复堤会议。

八月二十二日 周恩来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指出中国正遭遇有史以来最大的内战危机。并指出：国民党军队尚无美国援助，决不能进行如此大规模内战，其实美国是共谋者。

△ 就时局问题向记者发表谈话：非正式五人小组已成尾声，美国作为调解人已变成一面倒，从帮助法西斯统治，摧残民主，一直到帮助打仗，出售大批剩余军事物资给国民党就是一个证明。

△ 和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廖承志致电中国民盟主席张澜，对他十八日在李公朴、闻一多追悼上遭特务围辱表示慰问，并指出：“不粉碎特务系统，中国人民不能安全，民主政制无法建立。为民主，必须反特务”。

八月二十六日 周恩来举行记者招待会。并在会上分发《群众》周刊的社论《立即无条件停战，实行政协决议！》。指出：内战正在扩大，国民党已投入二百万以上的兵力，这是二十年来空前规模的内战。国民党是拖中大打，美方增加军事援助，是鼓励国民党打内战。现在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立即停战，和平谈判，依照政协决议实行民主。但在谈判前必须弄清两个问题，“一是改组政府问题谈清楚时，是否马上停战。二是改组政府谈清楚后，政府是否放弃前次所提的五项条件”。

八月二十八日 和周恩来参加政协五人小组会议，讨论改组政府问题。

九月三日 和周恩来接待国民党方面出席五人小组的代表吴铁城、张厉生，提出国民党如何保证停战？他们完全拒绝考虑中共的要求，商谈无结果。

九月六日 就国民会议问题，向马歇尔提出备忘录。指出：由于参加国民会议的非党派代表如何产生至今尚未作出任何决议；河北、山东、察哈尔、热河等九省和北平、天津、青岛三城市的地区性和职业性的代表尚未选出；共产党的代表人数尚未协商确定，以及政府要求增加的国民会议代表的分配方案还没有讨论等情况，政府单方面决定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会议是不合情理的，中国共产党决不接受这种未经政治协商会议讨论的、单方面的决定。

九月十二日 上午，赴民盟代表团办事处，访晤梁漱溟、张申府，交换对时局的意见。

九月十六日 周恩来由南京飞赴上海。行前致函马歇尔：“一俟阁下决定召集三人会议，我接到通知，即可返宁。”

九月二十四日 将和琼崖代表讨论的琼崖党今后斗争之方针电报中共中央：我们认为应树立长期斗争的打算，留在琼崖坚持战斗，开展群众工作，隐蔽和缩小地方组织，开展游击战争。从打击敌人中解决弹药给养困难，反对和平隐蔽、大批离琼等错误思想。但组织认为必须离琼之干部，须由特委组成疏散委员会进行疏散，领导关系由中央直辖，在电台未通前，暂由方方及驻南京代表团领导。

九月二十六日 将对目前形势的分析电报中共中央：目前形势有三种可能：（一）三人会议与五人会议同时开；（二）先开五人会

议,随即开三人会议;(三)如他们军事上取得优势后(先打下张垣、哈尔滨),可能发动和平攻势,可能也提无条件停战,对蒋介石有利。我们宣传与谈判都需注意他这一着。并请中央指示事先应作些什么准备。

九月二十七日 对来访记者纵谈时局。从国共谈判、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政策,一直谈到国际形势。着重指出:国共谈判总是谈不成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中国的反动派顽固地坚持法西斯独裁统治,装出一付要民主的样子,但始终不肯真正实行民主。美国在调处中变成一面倒,从帮助法西斯统治,摧残民主,一直到帮助打仗。在内战扩大之时,出售大批剩余物资给国民党政府就是一个明证。

△ 同马歇尔、司徒雷登接洽,了解他们函请周恩来由沪回宁的真实意图。

九月二十八日 和周恩来、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致电张厉生:国方擅自召开“国大”,在未经协商以前,我方不能提出国大代表名单。

△ 和王炳南到美大使馆,将周恩来的复函面交司徒雷登。司徒雷登说,目前是可以停战的,蒋介石表示愿意停战,请周恩来回来商量停战问题。董必武立即反驳说:政府正大举进攻张家口、哈尔滨、安东及苏北,尤其是进攻张家口,在此种情况下,有何方法保证停战。随即将谈话情况电报中共中央。

△ 将蒋海军起义情况电报中共中央,并请即转粟裕、谭震林。电称:蒋介石第二、第九、第五十六、第四百五十号等四艘小军舰,开往苏北作战,每舰约有二十余人,并各有炮数门,我们已组织他们起义。地点在高邮或邵伯,时间在本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务望火速通知当地负责同志,即日布置予以援助。

九月二十九日 同马歇尔会谈目前时局。列举事实说明“政府现正走向扩大战争的方向，各处已经存在着战争状态的仍然继续。例如：苏北、山东及山西。就是原来休战状态的东北，政府已向安东及哈尔滨进攻，而在素无战争的察哈尔，政府也在向张家口进攻。至今无意退出”。“无论三人会议五人会议，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停战。周恩来所以提出三人会议，就是因为可以直接讨论停战。关于五人会议，我们也说过愿意参加，但条件就是在谈得有结果时，双方即下令停战。”接着又针对马歇尔关于出售大批剩余物资给国民党政府的辩解，严肃指出：“现在中国正处在内战局面中，而美国政府恰在这个时候，出售物资给交战的一方，这就必然增加处在另一方面的中共的困难。”因此，我们不得不提出抗议。会谈后，即将情况电报中共中央。

△ 中共中央指示各地党组织并告中共代表团：“当前的宣传口号，已不能只是无条件停战，无条件停战只能给予蒋介石以便利，巩固其三个月来的占领地区和争取时间，补充兵力”。“当前的宣传口号，要转到‘美军退出中国’，以打破和平攻势之欺骗”。

△ 中共代表团正式复函国民党代表，拒绝提出国大代表名单。

九月三十日 和周恩来、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李维汉联名致函孙科等国民党政协代表转蒋介石，严正指出：“如果政府不立即停止对张家口及其周围的一切军事活动，中共不能不认为政府业已公然宣告全面破裂，并已最后放弃政治解决的方针。其因此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当然全部责任均应由政府方面负之。”同时，向马歇尔提出备忘录。

十月一日 和王炳南往访马歇尔，面交周恩来致马歇尔的备忘录。指出：“自六月停战谈判停顿以来，政府即不断进攻解放区，

并已占领很多地区”。“昨天政府已公开宣布进攻张家口，其目的在以优势武力占领中共较大军事政治中心之一张家口”。故“延安指示周恩来送此备忘录。声明政府此次进攻破坏了政治解决途径，无异表示国共关系最后全国性决裂”。并郑重声明：“如果政府不停止进攻张家口，要负谈判破裂之责”。随即将会谈情况电报中共中央。

△ 周恩来在上海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发表谈话指出：最近马歇尔、司徒雷登又提出同时召开三人会议和非正式五人小组会议，我们认为一切问题的中心，都在停战。只有立即停止进攻张家口，才有和平谈判的余地。他表示：中共绝不屈服于国民党内战与奴役的政策之下。

十月二日 应司徒雷登之请前往访晤，并将周恩来致马歇尔备忘录内容面告司徒雷登。

十月四日 和周恩来接到中共中央来电指示：因国民党进攻张家口，应停止进行谈判。如要谈，就应使军队恢复一月十三日前的位置，否则周回延。要求马歇尔协助撤退我驻沪、宁、渝人员。对马歇尔、司徒雷登退出调处的姿态，不必表示挽留。

△ 就蒋介石所提备忘录中的有关问题，和王炳南同马歇尔会谈。指出：蒋介石在其备忘录中对停止进攻张家口的问题不回答，即表示无诚意。不仅如此，又把国大问题作为停战的先决条件，更加表明他们简直不愿意停战。说明中共对停战问题的基本意见，希望恢复一月十日停战协定的效力，并再次提出停止进攻张家口的问题。

十月六日 将国民党提出张家口休战十日的情况电报中共中央。

△ 访梁漱溟，就目前时局交换意见，并对国大代表问题取得

一致的主张。

十月七日 下午四时，和王炳南应约赴马歇尔官邸晤谈。马歇尔表示调处的努力已到终点，形势异常严重。董必武转告马歇尔：周恩来暂不回南京，周对蒋介石二日的两项意见将有书面答复。

十月八日 和王炳南一起同马歇尔、司徒雷登举行会谈。首先代表周恩来说明我们对政府提出的要以执行蒋介石十月二日的两项提议为休战十天的先决条件，坚持不能接受。因为这样的限期完全是战胜者对战败者所施行的强迫，而不是对等地位的讨论。接着指出，政府这项主张的实质：“在于利用休战得到补充。十天之后，如果我们不接受政府的条件，又继续进攻。”并再次重申我们的要求是：“完全停止进攻张家口及其周围，政府的部队退回到原来的位置，保证停战。”希望马歇尔、司徒雷登转告美国政府终止片面援助国民党的政策。会谈结束后，随即将情况电报中共中央。

△ 当晚，和王炳南访晤民主同盟秘书长梁漱溟，告以上午与马歇尔、司徒雷登晤谈情形。

十月十一日 国民党军攻占张家口。下午，蒋介石下令11月12日召开“国大”。

△ 致电中共四川省委：对全面破裂的可能性必须有足够的估计，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人员应再行精简。16日，吴玉章、张友渔复电，汇报四川省委的工作安排，已做最坏情况的准备与安排。

十月十四日 晚，接待民主同盟秘书长梁漱溟来访，商讨国民党政府提出的恢复和谈的方案。

△ 张澜在重庆发表谈话，宣布民盟不参加一党“国大”，决为争取和平、民主奋斗到底。

十月十六日 中共代表团齐燕铭、范长江、《新华日报》部分工

作人员及中共代表团办事处部分人员及眷属三十余人，分乘美军用飞机两架，首批离开南京返回延安。

△ 上午十时访梁漱溟。

十月十八日 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抗战结束以来，为实现和平民主，本党已做出艰巨努力，为此曾不惜再三让步。而国民党得寸进尺，于十六日宣布其八项条件。“在过去十四个月中，任何庄严的命令、诺言与保证，既可任意撕毁，则今日之协议明日又可成为废纸，今日有五项八项要求，明日又可以有五十项八十项要求”，“所以本党没有旁的要求，只要求首先恢复信义”。兹特郑重声明：今日一切会谈如欲其有真实结果，必须“承认恢复一月十三日国共双方军队位置为一切军事商谈的准则，承认实行政协一切决议为一切政治商谈的准则。”

十月二十日 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董必武，指示应依照中央声明关于恢复一月十三日国共双方军队位置及实行政协一切决议的两点，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并竭力说服第三方面不要提原地停战的主张，要向他们说明，那只有利于蒋介石的继续进攻。

△ 和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转吴玉章、张友渔，提出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馆应尽量缩小，多余人员回延安或赶快疏散，并和地下党切断联络，吴玉章、张友渔应坚持阵地。

十月二十一日 和孙科、邵力子等到机场迎接周恩来、李维汉及第三方面人士由上海返南京。

△ 中共代表团发言人发表谈话说：“蒋介石提出的八项条件无疑是最后通牒，中共碍难接受。”

十月二十二日 中共代表团发言人发表声明，仍坚持政协决议及恢复一月十三日国共双方军事位置作为继续谈判的基础，中共绝不接受蒋介石所提之八项条件为谈判内容。

十月二十四日 上午十时，和李维汉接见第三方面代表梁漱溟、李璜、莫德惠，商谈宣传休战问题。告以中共参加宣传休战的代表是李维汉、邓颖超。指出，国民党军队还进攻安东、烟台等处，请第三方面注意。

十月二十五日 和周恩来、邓颖超接待梁漱溟、李璜、莫德惠来访，商谈谈判中的若干重要问题。当得知安东被国民党攻占，周恩来气愤地说：不谈了，我们要回延安了。共产党员是不怕压的。

十月二十六日 和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接待民盟代表章伯钧、梁漱溟、罗隆基、黄炎培深夜来访，章伯钧等探询安东被国民党军队攻占后中共对谈判的态度，周恩来对国民党攻占安东愤怒地表示：同国民党继续谈判已无必要，他将率中共代表团返回延安。梁漱溟、黄炎培竭力挽留中共代表团，并表示今后民盟将加强同共产党的合作，如有重要主张和行动，必定同共产党协商。

十月二十八日 和周恩来、李维汉接待第三方面代表梁漱溟、莫德惠、李璜，得知他们已将内容为：（一）全国军队一律就地停战；（二）在东北中共军队仅驻齐齐哈尔、北安、佳木斯；（三）沿长春铁路各县政权除中共已接收者外应由国民党派县长和警察接收的方案送马歇尔、孙科时，周恩来非常愤怒地责备他们不遵守前约，并指出：这个方案是落井下石，蒋介石要把我们打倒在地下，你们还要再踩上一脚。在周、董、李严正指责后，第三方面代表醒悟，即到孙科、马歇尔处收回方案。

△ 和周恩来致电吴玉章、张友渔等：四川省委是公开的，必须与秘密党割断联系。

十月二十九日 晚八时，和李维汉到民盟访梁漱溟、黄炎培。

十月三十日 和周恩来、邓颖超等参加第三方面会议，说明中共对解决时局的态度。针对国民党所提必须交出国大代表名单方

可停战的阴谋，中共代表团说明：提出国大代表名单，并不能保证停战，必须实行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中共绝不以国大名单交换停战。次日，民盟也向国民党宣布，“中共不交国大代表名单，我们也不交名单。”

十一月一日 和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在陇海线及徐州附近国民党军队中开展工作的情况，建议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张云逸加强同这些部队的联系。

十一月四日 向记者发表重要谈话，指出：（一）中共以诚意渴望和平，对于恢复和谈并无何意见；（二）中共对政府先提出国大代表名单，然后始下停战令一点认为无考虑必要；（三）南京所传中共邀请马歇尔、司徒雷登大使调停一事，绝非事实。

晚，为催促行总拨款、拨粮，以进行黄河复堤工程，离南京到上海，在马思南路107号向来访记者发表谈话，说此次来沪系以解放区救济总会主席身份与联总、行总洽谈黄河堵口等问题。随即于六日到联总、行总当局进行交涉，未获结果。

十一月六日 中共中央致电方方、尹林平并周恩来、董必武、刘晓、吴玉章，指示南方各省党组织根据情况采取两种不同的方针：一、凡有可能建立公开游击根据地的应即建立。二、凡条件尚未成熟的地区，采取隐蔽待机的方针。后一种情况在目前占多数，但目标仍是积极发动公开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而不是不管条件是否成熟，一概采取长期隐蔽方针。

△ 在上海停留期间，与桂系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在白崇禧公馆谈话（当时白崇禧在南京）。韩练成当时按照国民党当局命令，正率四十六军从海南调山东莱芜一线。他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专程从南京赶到上海，找董必武请示到山东后的行动方针。董必武向韩练成分析当前形势，指出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

议，大举进攻解放区，新的全面内战已经爆发。向韩练成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坚决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军事进攻的指示，交代了任务以及与华东野战军联系的办法。八日，电告陈毅、张云逸、黎玉：韩练成已从华南调山东，不愿内战，请派人与之联系。韩率部到山东莱芜一线后，在一九四七年二月莱芜战役中举行起义，华东野战军顺利全歼国民党军共七个整旅（七万六千人），震动很大。陈毅曾赞誉：“莱芜战役第一功，应是恩来同志和董老。”

十一月九日 致函宋庆龄，转告延安已收到中国福利基金会今年上半年陆续寄运的救济物资，因而使解放区伤病员得到医治并恢复健康，儿童也得到了救济。对此，表示深切感谢。

△ 从上海返南京。

十一月十日 和周恩来同孙科、吴铁城、邵力子、王世杰、莫德惠、胡霖、曾琦、陈启天、张君勱、雷震举行非正式综合小组会议，讨论国大等问题。

十一月十一日 中共代表团发言人根据周恩来、董必武的授权，发表书面谈话：蒋介石决定国大延期三天，中共不予重视。国大开会日期及延期三天，都是国民党片面决定的，都是违反政协决议的。国民党如果还是尊重政协决议的诚意，那就不是延期，而是停开一党包办的国大。

十一月十二日 得知第三方面某些人经民社党张君勱、青年党李璜的活动，给蒋介石写信，准备要交出“国大”的名单的情况后，和周恩来、邓颖超出席第三方面人士会议。周恩来严正指出：二十多天追随诸位先生之后，一切都是为了实现政协决议及停战协定。现在国民党要分化中共与第三方面，用心是把中共踢开。现在有人要跳火坑，进“国大”，我们愿意谅解各位的苦衷，但我们也必须坚持政协决议。希望有一天仍能为和平民主奋斗。事后，章

伯钧、沈钧儒、张申府接受中共劝告，勾去签名。

△ 接中共中央电：蒋介石国大开会后，周即可回延安，留董必武在宁主持。

△ 下午四时，和周恩来出席第二次非正式综合小组会议。重申中共态度，国民党政府应停止召开违反政协决议的“国大”，否则国民党应负分裂之责。黄炎培说明除非按照政协决议完成国大开会以前的各项手续，民主同盟决不参加“国大”。

十一月十三日 出席非正式的综合小组会谈，并再度提出停开国大的主张。国民党态度毫无改变。当国民党提出要考虑宪草审议问题时，董必武当即反驳说：如果国大不停开，宪草的审议就无从进行。

十一月十四日 中共代表团设宴招待民主同盟代表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黄炎培、张申府、张君勱。周恩来向他们表示告别之意，并重申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愿望。

十一月十五日 国民党包办的“国大”开幕。

十一月十六日 周恩来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发表了对国民党召开“国大”的严正声明，在回答记者问题时宣布：国民党召开“国大”，已将和谈之门最后关闭，中共代表将于近日返回延安。

十一月十九日 上午八时，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李维汉、邓颖超等十余人，乘飞机返延安，董必武到机场送行。行前，周恩来向中外记者宣布：发动新的内战的人，不要很长时间，就将遭到彻底失败。此后，中共代表团驻南京、上海办事处的工作由董必武负责。中共代表团即日起，改为中国共产党驻南京办事处，由董必武任主任。

十一月二十二日 约章伯钧到办事处驻地来，长谈达三个多小时。向章提出三点意见：（一）民主同盟要好好保持调停人的地

位；（二）中共不放弃和谈；（三）民主同盟与政府人士务须照常保持往来，可谈论一些问题，但不必作结论。

十一月二十三日 和叶剑英接中共中央来电：力争在国统区的宁、沪、渝、平、长春五地保留公开机关，以便宣传群众，联系群众和教育群众。现在和平之门已关闭，国统区情况恶化，要求马歇尔在紧急时派飞机将我公开机关工作的同志送返延安，同时也要准备进集中营。

十一月二十四日 中共驻南京办事处发言人对民社党提名参加“国大”事发表谈话，指出：不管民社党与政府交换的文件中如何说要彻底实现政协决议，实为帮助国民党粉饰其彻底破坏政协决议的行动，民社党参加“国大”，并未改变国民党一党包办的所谓“国大”的实质。

十一月二十五日 中共驻南京办事处发言人表示：恢复国共两党和谈，必须：（一）停止冲突；（二）组织类似政协性质的各党派会议；（三）组织联合政府；（四）依据新基础召开国民大会。

△ 接周恩来电：上海办报事，除《联合晚报》外，潘汉年、胡愈之筹办《商务报》，请依情况给以投资。请告童小鹏给雅安王少春汇款。

十一月二十六日 就联总、行总在中国的救济工作发表声明。指出：“联总、行总在中国所进行的救济善后工作，违反联总理事会不歧视政策之决议”，“始终未按合理原则分配救济物资”。国民党政府“操纵了救济物资之分配与发放，利用该物资作为内战资本借以扩大今天中国的内战”。并代表解放区灾民要求联总“采取有效步骤以停止国民党政府对联总理事会不歧视政策之继续破坏与怠工，保证联总政策在中国彻底执行”。

十一月二十九日 向联总署长提出备忘录，指出：联总、行总

计划在中国施行一年以来，“已被利用为政治武器，充分暴露了政治歧视、无效率、不公平分配”及其他种种腐败现象，违反了联总与中国政府所签订的基本协定”。要求“联总应在共同协议下，直接与解放区救济总会合作，将分配给解放区的救济物资直接交解放区救济总会分配。”并提出解总应派代表参加联总理事会在华盛顿召开的会议。

△ 应约前往访晤司徒雷登。司徒雷登说国民党要打延安被美方的压力制止了，提议在召开“国大”的同时召开三人会议。董必武当即表示，我方对国民党当局要打延安的态度是：“我们不刺激他们打，但也不哀求他们不打。他们这样做将使恢复谈判更加困难。”“在‘国大’召开的情形下，三人会议无事可谈，也无保障。美国调停的作法要改变，否则将适得其反”。随即将谈话情况电报中共中央。

十一月三十日 为庆祝朱德六十寿辰，作《祝朱总司令六秩荣寿》诗二首。其一首：

革命将军老据鞍，豺狼当道敢偷安。
骨头生若铁般硬，胸次真如海洋宽。
要作主人不作客，甘为民仆耻为官，
乌延黎庶欣公健，此日江南一例欢。

十二月一日 和民主同盟沈钧儒、罗隆基等二千余人参加在南京举行的陶行知遗体公葬仪式。陶行知灵柩前挂着董必武手书挽诗，称颂陶行知为“当今一圣人”。

十二月二日 电告中共中央：日前，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人之一、“国大”代表阿巴索夫前来办事处见我，要求中共承认其同盟，向新疆派出政治、经济、军事人员，明确新疆政策。六日，中共中央电复：新疆工作以同盟为领导中心，中共愿与同盟建立友谊关

系，先派代表和机要员去新疆联络与观察。据中央指示精神，派电台台长韩国安带电台随阿巴索夫赴新疆。

十二月四日 致马歇尔备忘录；周恩来将军嘱我将下列电报递交阁下：“由于一党操纵的‘国大’的召开，政协协议已为蒋介石主席撕毁无遗，国共两党间已无谈判之基础。然为符合全国人民争取和平与民主之愿望，本党主张，如国民党立即解散正在开会的非法国大，恢复一月十三日停战令时之军队原防，则两党仍可重开谈判。乞将上述各点转致蒋主席。”

△ 中共驻南京办事处发言人向记者发表谈话，指出：中共对美国使者的和平调解，从未予以拒绝，自国民大会召开，国共和谈已告停顿，若要重新谈判，则必须基于解散“国大”的基础上。

十二月十一日 将上海经济危机情况及民主人士情绪电报周恩来：当前上海经济危机严重。有二十年历史的、最大的复兴面粉公司已倒，饭店、商行关闭之风盛行，即先施、永安、新新三大公司亦因亏本自动请求休业。各民主人士一般情绪甚好，最关心我们军事实力。民主团体纷纷集会，对你所讲的新条件，第三方面极感兴奋。他们决心健全本身机构，以配合未来新局面。在沪各团体深感彼此联系之重要，现在商量建立统一核心领导机构，即党派代表联席会议。此外，建议派一有力代表出席明年二月在印度举行之泛亚洲会议，以建立与东方各民族的密切联系。

十二月十三日 将关于黄河问题的意见电报周恩来及中共中央。电称：堵口势在必行，因联总要求交账。国民党也一定要作，汛区灾民也急于要求，社会上都赞成归故。我们除一面争取物资先发，以充分理由抗议，核准推迟堵口的完成，并继续宣传外，我们所辖下游，还应积极进行复堤及居民迁移工作，以免受灾。万一抗

议无效，人民自救运动应早准备。

△ 因联总不答应解总要求，再函联总署长，仍请将中共提案提交理事会，并作公正讨论。

十二月十八日 周恩来致电董必武并告陈家康：关于“国大”讨论的宪法，无论通过什么内容，我们都不承认其为有效。一旦“国大”闭幕，宣布宪法实施，我仍当发表声明驳斥。

十二月二十一日 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声明：蒋介石因为攻占张家口冲昏了头脑，胆敢在政治上走绝路，召开非法国大，彻底推翻政协路线，又要通过什么“民主宪法”，这是更加自绝于人民，中国人民绝不承认这个伪宪。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中共中央致电董必武，并转上海工委、吴玉章、叶剑英、刘晓等，指示发动国民党统治区北平、天津、南京、上海、重庆、昆明等十大城市，举行反对美军强奸中国女学生的游行示威，或请愿与组织后援会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要求美国兵犯罪由中国法庭按中国法律公开审判，进而要求美军全部撤出中国，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出卖军火，借款助蒋打内战及废除中美商约等。在运动中造成最广泛的阵容，采取攻势，使国民党不敢压迫，并达到暴露国民党的卖国及“国大”制完全系欺骗之目的。

△ 中共中央致电董必武、伍云甫、成润、叶剑英、饶漱石、滕代远、薄一波、王宏坤、刘伯承、邓小平、张云逸、黎玉，和国民党谈判黄河堵口的条件是：（一）五个月内完成复堤险工；（二）发足复堤公款；（三）发足居民救济费。“最后堵口日期必须有我方代表参加，经一致协议，始能决定。否则，我方即认为国方堵口放水，纯为淹我，我决向全世界控诉此残忍罪行”。随即派饶漱石到邯郸宣传，派赵明甫到京、沪，助董、伍、成按此方针宣传。

△ 为黄河堵口复堤事，写信给解总秘书长伍云甫等，指示他们对国民党违约堵口阴谋，要在南京、上海招待记者予以揭露，提出抗议，同时要抓紧工作，想尽一切办法推延堵口的时间。

一九四七年 六十二岁

一月一日 将国民党已决堤向黄河故道放水，拒发河道居民救济费以及破坏我方已完成工程的罪行，电告中共中央并转北平以及刘伯承、邓小平，希望延安、北平、冀晋鲁豫党委应在军事上、行动上作必要的准备。

一月二日 下午接待邵力子来访。

一月三日 为黄河堵口事，致函国民党水利委员会和行总，对国民党当局破坏历次黄河堵口复堤工程之协议，破坏我方工程之进行，抢劫我方治理黄河之物资，不顾人民死活向故道放水等严重罪行，提出强烈抗议。

△ 致函联总中国分署署长艾格顿，对国民党好战分子公然违背协议，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在花园口决堤，使黄河改归故道的罪行提出强烈抗议。指出：国民党在破坏修堤工程的同时，还违反协议，对应交付的工程费用及河床居民救济费一拖再拖，至今分文未付。大量事实说明行总是一个被国民党控制的机构。因此要求联总对解放区所提供的物资和材料，不经行总，直接运往解放区。

一月四日 致电中共中央，告知钱瑛在上海已与刘晓取得联系，建议由钱、刘合组领导机关。

一月五日 在梅园新村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关于黄河水患问题的讲话。谴责国民党当局撕毁有关黄河复道问题协议，

悍然导黄河入故道，淹毁下游大量居民的罪行。严正指出：“如政府不顾下游人民之生死，则将来发生任何严重后果，概由政府负责。”

一月六日 访晤张治中，对他帮助释放新疆被捕同志表示感谢。

△ 中共中央致电董必武、叶剑英、吴玉章、刘晓、方方、林平，指出此次平津京沪学生的反美示威，成绩甚好，影响甚大，民族工商业家及自由主义教授，一致同情这一运动，可见民主爱国运动的基础正日益扩大，与解放区自卫战争的胜利已渐能起着配合作用，而美蒋的统治则日益孤立，其政策则更加反动。指出：应尽量扩大民族爱国主义的宣传与活动，帮助在运动中产生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使少数领袖与广大学生群众保持经常联系，不致陷于孤立。更应尽量揭露美蒋合作破坏停战，打内战，推翻政协，继续独裁的阴谋，尤其要反对正在商讨中的美蒋借款及购械计划。

一月八日 由南京抵上海。

一月九日 和联总中国分署署长艾格顿整日会谈，讨论有关黄河堵口问题。

△ 将黄河居民迁移救济问题与联总协议要点，电告周恩来并转太行、山东。电称：该协议七日正式签字。原文十八条，主要内容有黄河河床居民善后救济工作由行总、联总、水利委员会各派代表二人、解总派代表二人，组成委员会，其任务为订定善后救济计划，接收物款。河床居民迁移费，皆作对中共区迁移河床居民善后救济费之用，不作他用。上海另设三人委员会，行总、联总、解总各派代表一人，负责采购、保管、运输等等。

一月十日 在政协周年纪念日，对记者发表谈话：“政协路线乃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路线，也是中国人民从封建主义和法西

斯主义桎梏下求得解放的路线。今后解决中国政治问题，仍非遵照这条有历史意义的路线不可。有人企图违反政协路线是行不通的。”

一月十一日 上午，同行总署长霍宝树、联总中国分署署长艾格顿等，就黄河堵口问题进行会谈，提出停止放水与暂停堵口工程五个月，均遭行总拒绝，下午，董拒绝出席，以示抗议。

一月十二日 为《新华日报》创刊九周年纪念题词：“说老实话，为老百姓说话，让老百姓讲他们自己的话，新华日报继续执行这种方针！”

△ 马歇尔即将返国。对马歇尔离华前的声明发表评论。指出：中国内战比赫尔利来华时规模大得多，百分之九十的国民党军已动员，美制之飞机、坦克、大炮现正与人民作战，如无美国之装备、运输，中国内战决打不起来。美帝国主义者应负中国内战之责任。马歇尔既赞成政协，又赞誉违反政协之非法国大制出的伪宪法为中国之出路，显系瞎说。

一月十三日 为黄河复道问题，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谴责国民党撕毁有关黄河问题的协议，不按照协议规定的时间引导黄河水入故道，妄图放水淹没在下游居住的解放区人民。

△ 接待黄炎培来访，并长谈。

一月十六日 中共中央致电董必武、吴玉章、叶剑英、刘晓、钱瑛、张明、方方、林平、潘汉年：为了更有力、更有计划地领导蒋管区爱国民主争生存的斗争，以配合解放区人民自卫战争的胜利，准备迎接全国革命新高潮，中央认为蒋管区党组织系统有调整的的必要：（一）南京局在中共代表团回延安后，应加入各地负责人组成之，由董必武在宁主持，直接管理上海工委、重庆分局、香港分局及一部分统战关系中的党员。（二）上海另设上海分局，统一管理刘晓、钱

瑛所管之秘密组织。分局下设上海市委。(三)上海分局由刘晓、钱瑛、张明及上海市委中一人组成,负责领导与发展蒋管区的秘密工作。下级组织仍采取平行的组织,单线联系,转地不转关系等办法,以保持其核心作用。(四)重庆分局除直接领导《新华日报》及统战关系外,对川、康、滇、黔党的工作仍应设法加强领导。(五)香港分局由刘长胜、方方、林平、潘汉年、刘宁一、梁广、章汉夫、夏衍、连贯组成,管理南方工作,下设香港工委、南方区党委、琼崖区党委、城市工委四个平行组织。(六)重庆分局、香港分局均直属南京局,但有关全局工作,中央给予直接指示。琼崖区党委属香港分局,但有关战略行动,中央军委给予直接指示。

△ 急电中共中央: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通知说国民党政府将派张治中赴延安商谈恢复和平谈判问题。

△ 当日接到中共中央复电:我们的方针应使这种欺骗性的和谈恢复不成。答复司徒雷登,仍是坚持恢复去年一月十三日军事位置和取消蒋宪。如他们同意,先由董必武洽谈,张不要来延安。复电并指示说周恩来评马歇尔声明已发表,望本此向民盟及第三方面多做解释。

一月十九日 将黄河堵复工程会谈结果电报中共中央,并转邯郸刘伯承、邓小平,临沂张霖之;经会谈,政府方面愿意考虑堵口问题。我方继续反对放水。关于堵口工程日期再讨论。联总、行总准备之复堤器材运往开封。

一月二十日 中共中央致电董必武、王炳南、叶剑英、徐冰、吴玉章、刘晓、钱瑛、方方、林平、潘汉年、章汉夫,对揭穿美蒋和谈真相的宣传工作的宣传应坚持两条主张,要理直气壮地向各方作广泛解释,说服民盟、民革、民联及民建与一般朋友,了解恢复一月十三日军事位置及取消伪宪政这两条为最低限度要求,使他们不仅敢于同

我们作同一主张，而且敢于进一步揭露美蒋和谈欺骗，坚持向他们斗争，相信人民胜利前途。

一月二十一日 电告临沂张霖之、黎玉、烟台李澄之：联总、行总在烟台人员多而且杂乱，遇事很少与我们商量，独断独行，如去年与行总谈判机构问题是组织三方面的混合办事处，现在他们却违反协定，在烟台设立行总独立办事处。我们要限制其人员，以后凡外来救济人员，如无此间介绍，请勿予承认。

一月二十四日 中共中央致电董必武、王炳南，指示董必武暂时驻上海，不要回南京。王炳南应对美蒋持冷淡态度，要求美蒋方面接受中共提出的恢复和谈的两项条件，否则不能开谈。

一月三十日 中共中央致电各中央局、分局和国统区各地党的负责人：美国撤出三人小组和军调部是我们的胜利。我们可表示：（一）美方撤出三人小组，表示美方自己最后破坏停战协定。我不受再其约束。但仍愿为一月停战协定奋斗；（二）美方撤出军调部，表示美方已公开退出军调部，我主张中国问题由中国人民自己来解决，美国应停止对蒋的一切援助；（三）要求美军退出在华一切海陆空及军事训练机构。

二月三日 和解总秘书长伍云甫将联总提出的解放区善后救济协议草案的主要内容电报中共中央。电称该协议草案规定：新行总、联总、解总三方面以平等地位订立协议，彼此保证不从事政治或军事活动；由行总、联总、解总各派代表一人组织三人委员会，总部设上海，各代表必须有充分权力，主要政策问题须经一致投票通过决定，此委员会名称为行、联、解委员会。并确定在烟台、临沂、长治、阜平等地设立办事处等等。

二月七日 将上海民主运动发展情况函报周恩来：“上海民主运动日在稳健开展中，各民主团体先求自身的健全与团体间的初

步联系,次准备形成公开的结合,即民主阵线。”“我们在前线打得愈好,这里干民主运动的人就干得愈有劲。”对国民党发动的和平运动,上海各民主团体与个人给予的回答是:“我们要和平,但不要说空话,要行动。不当兵,不纳税,是争得和平的最好方法,和平的保障是民主,大家要求四项诺言兑现”。结果使得国民党不得不另谋对策。现国民党正与民社、青年两党谈改组政府,青年党急于出马,民社党扭扭捏捏已决定参加。此外,还谈了联总分配救济物资及黄河堵口复堤、救济故道居民等问题。

二月九日 接周恩来电。根据郝鹏举起义后反叛的教训,来电指出:郝鹏举、张岚峰这批伪军绝不可靠,他们“不利时骗我求存,有机可投时便打我”。因此,对“这些伪军如不能彻底改造,不仅不能为人民服务,且必害人民无疑。望以张、郝两事详告(章)伯钧,(朱)蕴山及有关各方”。

二月十日 向联总中国分署呼吁,谴责国民党飞机故意轰炸运载救济物资至解放区救济口岸石臼所船只的暴行。指出:国民党这一行为是“蓄意封锁解放区之救济口岸,以此迫害山东解放区急待救济之难民。”

二月十六日 致函联总中国分署署长艾格顿。谴责国民党飞机故意轰炸联总运往山东解放区之救济供应品。要求“立即采取行动,停止轰炸联总赴中共管有的口岸的救济船。”

二月十七日 夜,同黄炎培、张澜、张东荪、华岗交谈。

二月十九日 致电联总署长鲁克斯,对联总中央委员会将“召开特别会议,考虑中国政府所提欲将价值二亿美元之救济物资在黑市上出售”一项,表示遗憾。抗议“国民党政府图售救济物资,充作内战资本的非法行为”。指出:“此项计划将助长目前对中共管辖区之进攻”。“联总义务在援救受灾的中国人,而不是一党政

府。”

二月二十日 中共中央发言人为国民党反动派企图胁迫我驻京、沪、渝三地联络处工作人员自动撤离事发表声明。指出：京、沪、渝三地中共联络处之设立与存在，以前为国美两方所请及国方所许可。其任务为与中外各方联络，除非国方决心从此以后不再谈判，正式通知中共撤销此等机关，或中共方面自行决定撤回，则决无取消之理。如果国方既无正式通知中共方面撤退，还要阴谋扣捕中共人员，则一切后果，自应由国方负责。

二月二十一日 和王炳南接到中共中央来电：蒋美逼我们自动撤退京、沪、渝机关，“是想从反面说明我们关死谈判之门。因此我们的方针，坚持保留京、沪、渝机关，表示决不由我关死谈判大门，但谈判条件，必须实行两条最低要求，断无价钱可讲。你们应本此向第三方面及群众广泛解释”。

二月二十三日 为解放区救济总会在北平设立联络机构问题发表谈话，指出：“北平之联络机构之继续存在与否，与华北数省中共地区救济工作之改善，关系至为密切，对北平中共解放区救济总会人员继续留平工作之任何阻挠措施，只能解释为对中共解放区救济工作之破坏行为。”

二月二十五日 致电中共中央：蒋介石已下手谕封闭《新华日报》，请即通知重庆准备。

二月二十六日 中共中央致电董必武、吴玉章等：一定坚持非赶不走的方针，并揭穿蒋介石的恐怖手段，以鼓励进步群众和中间人士同蒋斗争的勇气。同时也作最坏的打算。抓紧建立秘密据点，其任务主要做调查研究，必要时跟中央联系。

二月二十八日 中共中央致电董必武、钱之光、吴玉章、张友渔、方方、林平，对蒋管区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作重要指示，特别

要求吴、张在撤退前，尽可能将此意转告隐蔽的同志。

△ 京、沪、渝三地国民党警备机关分别通知驻该地中共办事处，勒令限于三月五日前撤退，并强令《新华日报》停刊，严密监视和强迫集中上述各地中共办事处人员。从今日起，办事处四周被大批军警特务重重包围。为抗议国民党此种暴行，董必武拟找上海市长吴国桢、警备司令宣铁吾交涉，被特务蛮横阻止。

△ 中共中央致电董必武、钱之光、伍云甫、王炳南、童小鹏等并转告方方、林平、章汉夫，对京、沪、渝三地我党代表办事机关撤退前的工作及应采取的斗争策略作了具体指示：（一）顷据蒋方广播渝、宁两地均已下逐客令，估计上海必跟着来，剩下解总联络处，为时必不会久。（二）蒋此次逐客，系用地方当局出面，不保护安全的形式。但我们须逼国民党负最后破裂之责，办法有五：（甲）由周电蒋；（乙）董（必武）、王（炳南）在沪、宁分别以口头或书面询问吴铁城、吴鼎昌或宋子文，国民党及政府是否知道京、渝两地当局此种行动，如知道，则请以正式公文通知中共驻南京代表董必武，我联络机关自当撤退，但必须限期延长。（丙）蒋若对以上（甲）、（乙）两项不答复，我则向中外公布。（丁）动员京沪中外记者质询蒋方人员，逼其答复，以明责任。（戊）董在撤退前发表谈话，并宣布交涉经过。（三）王炳南立即向美方说明经过。交涉撤退时所需全部飞机。（四）渝方撤退计划已告，凡无法疏散隐蔽者均撤退。一切均请董必武依情况决定。（五）解总人员将来撤退，应要求联总行总由海路送烟台或其他口岸。

二月二十九日 在办事处支部大会上讲话，对全体党员进行了革命气节教育。嘱咐大家，对国民党反动派不要抱任何幻想，要做最坏的准备，要坚持革命气节，宁死不屈，不泄露党的任何机密，同敌人斗争到底。

三月一日 中共中央致电董必武、吴玉章、王炳南、刘晓、钱瑛、方方、林平、章汉夫及晋察冀中央局转平津市委，指出目前“蒋管区群众运动，特别是群众斗争，在一个时期内，可能遭受极大压迫，”“为适应这一新变化，避免不必要的损伤”，城市的民主爱国运动，“应暂保持平静状态”，然后“有计划地转移到带地方性经济斗争中去，以深入和巩固群众斗争基础”。

△ 接周恩来电：请用明码报告吴玉章交涉回延安飞机，如飞机无着，汽车护送必须交涉国防部护照，以免胡宗南捣乱。晚，通过美国驻重庆副领事布德致电吴玉章，告知党中央同意撤退留渝人员，并告美将派两架飞机运送。布德收到董电后，当即把电报转给吴玉章。

△ 《新华日报》被迫停止出版。

△ 向上海市市长吴国桢、警备司令宣铁吾、警察局长俞叔平提出书面抗议。指出：“褫夺中共人员自由系非法活动。”要求“将包围办事处之军警撤走，以便我们办事人员得以摒挡一切，准备撤退事宜”。

三月二日 中共中央负责人就蒋介石强迫中共驻京、沪、渝代表及工作人员撤退事发表声明。指出：蒋方这一荒谬措施，无论是出于蒋介石本人的命令，或是地方当局的胡作非为，都表示蒋方已经决心最后破裂，放手大打下去，关死一切谈判之门，蒋介石这一荒谬步骤，如不立即改变和放弃，那真是他自己走到了绝路，一切后果由他负责。

△ 上午十一时，收到王炳南自南京来电，告以党中央指示：办事处人员可于三月七日撤退，董必武务于三月二日夜由上海返南京。

△ 向国民党送交撤退人员名单。三点三十分同上海国民党

地方当局交涉撤退事宜。

△ 在离开上海前，再次向宣铁吾提出书面抗议。驳斥了国民党对我党的诬蔑，指出：来件称我党拒绝和平谈判，绝非事实，我党上海、南京、重庆等地联络人员所以迄今未去，正表示为觅取和谈之方便。随即于晚十时半乘车赴南京。

三月三日 晨七时抵南京，下车后被国民党军警留难一小时，后被“护送”至梅园新村三十号。稍作休息，即往访张治中，询问国民党政府有无致中共关于撤除京、沪、渝三地办事处之正式公函，政府是否表示决心用军事方式解决国共问题。继访张群，商谈有关中共人员撤退问题。最后访邵力子。

△ 以中共代表团名义函复国民党首都卫戍总部：“美方协助之空运工具未能于你部限定之期内充分拨用，须延至本月七日，如气候无故障，我处留南京人员、眷属决于七日飞延。”

三月四日 中午，应邀出席司徒雷登为中共办事处人员饯行举行的宴会。

△ 将周恩来致民盟主席张澜的电文送交罗隆基，委托民盟代为保管宁、沪、渝三地中共办事处遗留全部房屋等一切财物。

△ 接周恩来电：京沪国特甚注意章伯钧、罗隆基、史良三人，应告他们速布置香港退路。

三月五日 上午十一时，在梅园新村举行记者招待会。会上最后表示：盼能与诸位重晤于南京。

△ 和王炳南、章文晋赴美使馆，向司徒雷登及其秘书傅泾波辞行。

△ 电告吴玉章，国民党政府准备四架飞机。七日载渝人员飞延。留两人等昆、蓉人员到渝后，政府另派飞机送郑州转邯郸。办公处财产可交民盟马哲民代为保管。

△ 中共上海办事处和《新华日报》办事处全体人员乘车来南京。

三月六日 电告周恩来及中共中央,宁、沪、渝人员明日飞延,将有七架或八、九架飞机降延安机场,请早作准备。

△ 出席中国民主同盟在南京的负责人罗隆基专为中共人士返延安钱行的午宴,对民主同盟慨然答允保管各地财产,深表感谢。

三月七日 中共代表董必武及宁沪两地中共代表团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全体人员发表启事:“政府当局既不惜最后决裂关死和谈大门,必武等惟有撤退一途,当此小别前夕,回念各方好友,过去热烈支持,近日殷勤慰问,必武等衷心铭感,暂在和平民主前线殚精尽力,以图报答,惟因行前时间匆促,行动不便,未能一一告辞,敬请曲予鉴喻。当此世界趋向和平,国人厌战已极之际,必武等虽与各方好友暂时睽隔,再见之期,当在不远。”

△ 以董必武为首的留南京、上海工作人员七十四人被迫撤离。在机场上,董必武发表书面谈话,指出:“十年来从未断绝之国共关系,今已为国民党好战分子一手割断”。国民党这一举动是“企图配合政府之改组,俾求得美国政府公开的大量援助,借以鼓励前方颓落之士气,安定后方动摇之人心,并残酷迫害日益猛烈之爱国民主运动”。“内战将继续,人民之灾害必将更大更深。然而此种以千百万人民性命为赌注之极大冒险,因其违反全体爱好和平人民之愿望,终必失败,好战分子将自食其果”。重申:“目前虽战祸蔓延,中共党员将一本初衷,竭力为和平民主奋斗到底。”临上飞机时,向送别的各界人士意味深长地说:“再见之期,当在不远。”

上午,安抵延安。朱德、周恩来、刘少奇、林伯渠、邓颖超、杨尚昆等到机场迎接。

八、领导华北人民政府， 支援解放战争

1. 2019年10月1日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取得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的，可凭发票上注明的税额，从进项税额中抵扣。

2. 2019年10月1日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取得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的，可凭发票上注明的税额，从进项税额中抵扣。

三月八日 延安各界万余人举行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动员大会，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林伯渠在会上讲话。

三月十三日 国民党政府集中三十四个旅二十三万人，分由南、西、北三面向陕甘宁边区进攻。这是国民党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转入向陕北和山东解放区重点进攻的开始。

三月十六日 朱德、刘少奇、任弼时撤离延安。在此前，董必武与叶剑英等率领中直机关部分工作人员东渡黄河，转移到山西。不久即暂驻临县。

三月十八日晚 毛泽东、周恩来从容撤离延安。

三月二十五日 就国民党政府违约实行黄河堵口事发表声明：“蒋介石于大举进攻延安的同时，为配合其在黄河故道南岸作战。竟不惜用黄河堵口办法，企图淹没黄河故道及两岸居民数百万，以达到军事上割断我解放区的目的。蒋介石政府这一滔天罪行，已彻底撕毁历次黄河协议”。斥责行总已沦为“蒋介石独裁政府的工具”。呼吁“全世界人民予以声援”。

三月二十九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清涧县枣林沟举行扩大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刘少奇、朱德东渡黄河；叶剑英、杨尚昆留在山西晋绥地区。

三月三十日 毛泽东、任弼时电告周恩来：中央决定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在少奇同志主持下进行各项工作。朱德、刘少奇明晚由石嘴驿动身去临县与董必武、叶剑英会合，经五台往太行。中央

直属机关人员已至晋西北者，照前议，一部往太行，一部就地疏散，由你告董、叶处理，以后听候中央工委指示。周早日回河西，河东事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叶剑英处理。

四月二日 和周恩来、贺龙、叶剑英、杨尚昆在晋西临县三交镇与朱德、刘少奇会合。

四月七日 自三交到临县后甘泉，晚餐后仍回三交。

四月十日 和叶剑英、李维汉一起到临县后甘泉。十一日仍回三交。

四月十一日 中共中央致电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叶剑英、杨尚昆：现在晋西北的中央工作机构应分为三部分，一部分回到陕北，一部分去太行，一部分暂留原地不动。中央工作委员会现由刘少奇为书记，刘少奇、朱德、董必武为常委。康生、彭真参加土地会议后，亦留中央工委为常委。准备由董必武担任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经五台转太行，参加财经会议。中央及军委大部工作机构暂留晋西北，组织后方委员会，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李维汉、邓颖超为委员。此后，中央书记处五人分散两地，刘少奇、朱德到华北领导全国土改和建设根据地。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陕北，行使中央、中央军委权力，指挥全国革命战争。

四月十六日 中共中央就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及董必武任主任的决定，向中共华东局、晋冀鲁豫中央局、晋绥分局发出通知：为着争取长期战争胜利，中央决定在太行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统一华北各解放区财经政策，调剂各区财经关系和收支，并决定董必武同志为办事处主任，由华东、五台、太行、晋绥各派一得力代表为副主任，并经常参加办事处工作。

四月十八日 被中央委任为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后，即电中共中央表示：“中央给我的新任务是很光荣的，但也是艰巨的，我对

华北各解放区财经情况不明,对这一部门的干部熟悉的很少,请中央为我挑选得力者三五人予以协助”。

四月十九日 随安子文支队出发往太行。

四月二十四日 和安子文将支队行进路线,电报朱德、刘少奇等。安支队共一千二百余人,除直属队外,尚有八个大队。除一、六大队已先行外,我们带二、三、四、五、七大队今日在东村附近集结。八大队由廖、钱率领今日宿营寨上村。东进路线决定经静乐宁化堡、东马坊、屯瓦。明日我们带直属队从东村出发。二十九日可到达屯瓦,八大队下月二日可到屯瓦。

五月四日 中共中央电告薄一波:同意你们产生一个决定,确定财经共同方针和各种共同政策。董老不久可到你处,如果来得及,最好待他到后再做最后决定。

五月十二日 和刘少奇、朱德电告滕代远、薄一波等,并报中共中央,决定中央工委及各机关留晋察冀工作一时期,不去太行。董仍去太行,以后回五台工作,华北财经办事处亦设五台。

五月二十七日 致电各中央局,要求各区党政军协助各区解放区救济委员会,对抗战中所受损失进行详细调查,以便要求日寇赔偿。调查材料于今秋土地会议时派人送太行交董必武。

六月一日 向晋察冀边区干部报告蒋管区一般情况及民主运动情况。列举大量事实说明蒋介石政治上坚持卖国独裁;军事上自去年六七月份向解放区进攻以来连吃败仗;财政经济危机重重,农民市民抢米之风风行各地,去年十二月发生摊贩斗争和抗暴斗争;国统区民主运动日益高涨,全国学生运动提出反饥饿、反内战、反独裁、要自由、要和平的口号。

六月初 到达河北阜平县城南庄稍作停留,又通过平汉铁路封锁线进入冀中、冀南解放区徐水、河间。

六月九日 在衡水约伍云甫等筹商召开解放区救济工作会议。

六月二十六日 致电周恩来及中共中央：由解总在衡水召开的各解放区救济会联席会议经三日研究讨论，圆满结束。确定分联会由解总领导，对联总、行总送来的物资妥为接收并分配。在适当时机可提出联总分配物资不公平。但对来解放区的联总、行总人员要好好招待。争取在给我定量物资中早来和多来。允许他们成立办事处，但要限定人数。承认他们可以视察，但地点由我们确定。我们现在既不与联总、行总成立什么协议，但也并非马上断绝关系。

六、七月间 经邯郸、武安到冶陶镇，与晋冀鲁豫中央局薄一波诸同志相会，就支援前线和统一华北财政经济等重大问题进行磋商，参加晋冀鲁豫中央局召开的土地会议，并在干部会议上作了讲话。

七月九日 致电任弼时并报中共中央：此间军委三局购材料需晋察冀钞二亿元，土地会议代表团回去车油费共需两千万元等，只能在各区缴中央额数内开支。

七月十二日 刘少奇电告各中央局，现朱德、董必武、康生、彭真等已到达建屏县，中央工委正式成立，各处情况及报告望即送工委。

七月十四日 致电中共华东局、邯郸晋冀鲁豫局、晋绥分局、西北局、东北局：华北财办即将正式开始工作，地点设在晋察冀建屏县峡峪村。请将你们对财经工作的决定，及各省区财办、财政、实业或建设厅处、银行、贸易公司等机关各种重要法令、工作计划、进出口贸易、币价比值等有关材料从速带来，以资参考。

七月十七日 出席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的全国土地

工作会议开幕式，与朱德、刘少奇等被推选为主席团常委，并发表讲话，指出：关于土地改革这个问题，在中国历史上两千多年前已提出了，历史上虽进行过三次试验，但都没有成功。当着中国共产党出世不久，便开始认识到了土地问题的重要性。这次来解决土地问题，是我们共产党要解决这历史上二千年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只有解决了土地问题，中国革命才能胜利。现在解决土地问题不仅主客观条件均已具备，而且我们有把握解决好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是革命的政权，这个政权是保障并满足农民的要求的”。“这个工作做好了，我们将来的一切工作就能做好。”他强调，要开好这个会，就要讲老实话。不要怕讲错话，“共产党员不是神，是各种因素组成的一个实体。每个人都有讲错话的可能，共产党员也不能例外”。“要大胆地讲，讲错了以后要受得住批评。不要紧的，我们不是天生的圣人，讲一句话就一字不错，任何时候也没有这样的圣人”。

七月三十日 收到中共中央六月二十七日催办统计对日战争损失的来电后，于今日致函黄敬：据解总工作人员反映，区村干部对调查抗战损失的意义认识不足，抓得不紧，数字不准确，要使干部明了调查抗战损失“不仅可以作为索取赔偿的根据，而且是国民教育的绝好材料”。“对调查工作消极不仅放松了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同时更助长了在美国支持下蒋介石独吞日本对华赔偿物资的欲念”。因此，调查必须抓。同时提出了调查的办法和措施。八月十三日，晋察冀中央局根据上述精神，正式发出关于加强对抗日损失调查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对这一工作要抓紧时机，认真领导。”

八月一日 将《华北财经办事处组织规程》电报中共中央。《规程》规定：华北财经办事处，在中央及其工作委员会领导下，统一华

北各个解放区（东北暂不在内）的财政经济政策，指导华北各个解放区财政经济工作的推行。财经办事处的任务包括审查各个解放区的生产、贸易、金融计划，各个解放区的货币发行、筹建中央财政及银行等。十六日，中共中央致电董必武及中央工委，同意董老所提华北财经办事处组织规程，望各中央局及各区财办施行。二十五日，向华东局、晋冀鲁豫中央局、晋察冀中央局等颁发了这个规程。

八月六日 收到中共中央八月三日关于蒋介石禁止救济物资进入解放区应循的方针指示电后，函告华东局并转胶东区党委烟台解总代表：联总已宣告暂停北纬三十四度以北的物资输送，并拟以烟台为专用港口，北运河由天津至泊头段在物资运动期间，国共双方都不得从事任何军事行动。对此，我们坚决不能接受。因为联总对蒋介石封锁烟台等港的有效对策应是全部停运对华物资，为什么仅停北纬三十四度以北的物资的输送，而蒋管区在北纬三十四度以南的仍可获得联总物资，是极不公平的；烟台为解放区港口，不能受任何约束。并嘱烟台解总代表，将上述情况通知林仲在上海继续斗争。如联总人员最后决定自烟台撤退，我方则要求联总先将林仲等在沪全部人员送回。

八月十四日 以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主任的身分发出关于对日索偿问题的通知。指出，对日和会问题已提到国际间的议事日程了。美帝妄图单独召开对日和会，蒋介石妄想独吞日本对华赔偿物资。我解放区人民受了日寇八年或十余年的蹂躏，损失惨重。若不迅速进行调查，并提出我们的索偿要求，这不仅是放松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放弃了防止蒋介石独吞日本对华赔偿的步骤，而且是放弃了对人民，尤其是对死难烈士应尽的责任。因此要求各地救济分会用全部力量去办理此事，组成调查团，选择各地受寇

灾最重地点进行详细调查,以获得全面真实材料。

八月二十五日 向华东中央局、晋冀鲁豫中央局、西北中央局及晋绥中央分局发出关于华北财经办事处组织规程的通知,通知中明确规定华北财经办事处的任务是:“制定华北解放区国民经济建设的方针;审查各解放区的生产、贸易、金融计划并及时作必要的管理与调剂;掌握各个区的货币发行;筹建中央财政及银行”等。

八月二十七日 在全国土地工作会议期间,受主席团的委托,负责组织一个委员会研究土地改革后的农村生产和负担问题。今日在会议上作《土地改革后农村生产问题》的报告。针对农村经过土改、农民分得了土地后,可能出现缺乏“其他生产资料,如耕畜、农具、种子、肥料”和“在新条件下从事生产的技术和经验”,以及“农民也有怕变天的思想”而影响生产等各种问题,提出了“使农民对目前生产的重要性有正确的认识”;“打破动摇怀疑的思想”;“提倡农村副业”等三项补救办法。“鼓励农民发家,走向丰衣足食”。着重论述了“在自愿原则下,把农村的全劳力、半劳力和辅助劳力组织起来互相变工的好处,和在自愿原则下鼓励农民组织合作社的优越性。”指出:“合作社在目前发展生产,支援战争,在将来争取非资本主义的前途,都是不可缺少的因素。”报告还就帮助贫苦农民解决生产资金、组织农业和副业的技术研究,加强农场对附近农村生产的援助,机关部队应当帮助驻地的农村生产,奖励农村的商业和运输,银行贸易部门应确定帮助农村经济发展的方针,兴修水利,植树造林,发展畜牧等问题,以及土改后如何公平合理地减轻农民负担的问题,都作了重要讲话。还着重提出:“领导和组织生产,为党和政府的主要任务之一”,强调党和政府一定要实行精简,厉行节约,严禁贪污,谨防腐化。最后还就土地改革后发展生产的方向,即中国经济发展的前途问题作了简明深刻的理论阐述。

九月一日 中共中央发出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的指示,明确提出:“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

九月四日 电告华东局、晋冀鲁豫中央局、西北中央局、晋绥中央分局及晋察冀中央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中央工委及华北财办领导下,先行统一各地兵工生产计划和领导,调杨立三同志主持其事,管理范围限于华北、西北等解放区,以晋冀鲁豫为中心来分配调剂各区的生产、器材、技术等,办公地点设在邯郸。

九月六日 中共中央电告中央工委:土地会议应该采取平分土地的方针,同意即由土地会议通过土地法大纲。

九月十三日 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闭幕,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

△ 电告华东局:联总将派赫特乘万益号来烟台办理驻烟台之联总、行总人员撤退事,可允其撤退。但我方亦要求联总要保障解总在沪人员安全撤退,经天津到解放区分联会,十四日又将上述情况电报中共中央。

九月十八日、十九日 在晋察冀边区财经会议上讲话。在分析了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后,明确指出:“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是我们财经工作的总方针,是一个大原则”。“当前的财经任务应当是动员现有的人力、财力、物力来支援空前大规模的近代化的长期性的战争。发展各种生产,特别是国民生产,实行精简节约,保障前线后方各部队机关从业人员业务和生活上一定量必需的供给。”强调了统一财经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指出,现在情况完全变了,各战区内部联成一片,各战区间也联接起来了,要发展生产,支援全国范围内的战争,特别是运动战,财经工作必须统一。最后强调了财经工作中、而且实际上也就是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群众观点

和群众路线问题。指出：“我们想问题和群众一同想，做事情和群众一同做，完全和群众融成一片，群众知道我们是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他们必然以全心全力来支持我们。他们将在各种工作中证明我们是和他们同安乐、共患难，休戚相关，生死可托的人”。

九月二十一日 赋诗《挽续范亭先生》两首，其中一首：

代郡多豪杰，先生更出群。

怀才能拨乱，许国已忘身。

血迹陵园在，勋名日月新。

遗书有深意，易箦亦归真。

十月二日 将山东财办提出成立银行的建议，电报中共中央：他们要求立即成立联合银行或解放银行。现已派南汉宸赴渤海商议建立银行的具体办法，银行的名称拟定为中国人民银行，是否可以？请复示。名称希望能早定，印钞票时要用。

△ 致电晋冀鲁豫中央局、华东局、西北中央局、晋绥中央分局并转各区财办，要求他们在明年预算中，除原定解款外，另拨一大部分款，作为华北财办的基金。

十月七日 接中共中央来电：联总鲁克斯不日抵沪，会将所有未分配物资移交蒋方，以结束联总在华组织。望告林仲准备在谈判中与联总作最后破裂，并由你出名向联总大会及各国人民提出控诉。现在衡水联总、行总人员不能再让其随便撤退，必须与解总在沪四人的最后撤退作交换。

十月九日 为纪念辛亥革命三十六周年，撰写《历史的惩罚》一文。文章列举大量事实说明“中国人民的公敌蒋介石集团，与清朝政府一样凶恶、一样腐败、一样卖国、一样反动。”“是封建的和法西斯的统治”。把“人民的一切基本权利都剥夺净尽”，把“中国的领土、领海、领空全部卖给美国”，并且“在美帝国主义鼓励援助之

下,撕毁停战协定,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大内战”。但是“不管美帝国主义怎样援助,决计挽救不了卖国贼集团覆亡的命运,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一定要受到历史的惩罚。”号召人们团结起来,一致反对美帝国主义殖民地化中国,反对美帝国主义帮助蒋介石打内战,打倒蒋介石!

十月十日 中共中央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

△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颁布口号,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联合起来,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十月十二日 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民主同盟西北支部负责人杜斌丞。董必武在悲愤中赋诗《闻杜斌丞先生在西安遇害,为长句吊之》:

大颡虬髯骨相奇,胸罗武库是吾师。

共推国土谋能断,屡作罪言安复危。

当路芳兰宁有幸?噬人瘦狗竟无知。

秋风惨淡西安市,万户伤心泪暗垂。

十月二十七日 中共中央发出“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指示。

△ 将杨立三提出的关内五大解放区统一财政收支的建议函报中共中央。认为目前财政统一的主客观条件尚未成熟,统一是必要的,应有准备、有步骤地去实现,决不能一蹴而就。

十月二十九日 致电中央军委代理总参谋长周恩来、副总参谋长叶剑英:工委及华北财办定于本年十二月十日至十五日召开华北五大解放区兵工生产会议。请派了解各该区兵工生产情况者,工厂管理技师及工会工作者各一人前来出席。

十月 在阜平温塘。

十一月一日 致电晋冀鲁豫中央局、西北中央局、晋绥中央分

局及华东工委：华北财办决定于十二日中旬在中央工委所在地召开华北交通会议。请各区派代表一人，携带发展水陆交通的计划、图表、预算及其他有关材料前来出席。

十一月十二日 晋察冀野战军攻占石家庄。

十一月二十九日 致电周恩来：（一）盼参谋部派人出席指导兵工会议和交通会议；（二）联总结束。已拟好一控诉书草稿，今日送五台新华分社转总社报中央审核，候林仲等离沪后发表。

十二月二日 中共中央发言人就蒋介石政府把中国海关当作向美国借款的抵押一事发表谈话，指出：“任何援助也不能挽救蒋介石政权的死亡”。“蒋介石匪帮与美帝国主义进行罪恶买卖所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由蒋介石与美帝国主义者负完全责任。”

十二月五日 闻国民党已于十月二十六日宣布解散民主同盟，沈钧儒、史良等设法赴港，现在港民盟中委多数主张在港恢复民盟总部等情况后，致电周恩来、李维汉，建议对赴港盟员个人生活困难者，酌予接济。

十二月十一日 将统一财经工作的情况函报中共中央及毛泽东：统一发行票币之议，早在邯郸华北财经会议时即已提出。土地会议中，各区代表谈到解放区财政问题时，又提出了这一要求。现华北财办正在努力筹备统一发行诸工作。统一发行票币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对于军队转移地区的便利，以及最高领导机关容易控制发行额，和财政统一道路的开拓等等都是有绝大意义的。但一定要把打通思想的工作做好，必须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准备好的情况下，选择适当的时机才能实现。关于统一发行的时间及建立银行等问题，要等明年二三月间召集的华北各区金融贸易会议上讨论确定。

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 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

召开会议。会议分析了国际形势,讨论和通过了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指出:人民解放军已转入了全国规模的进攻,“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崩溃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会议认为这个报告是“在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

十二月三十日 致电东北中央局并报中共中央。说明印制钞票的规格、图案、颜色及票面额等要求。并请东北局将开印时间及每月能印多少等函告华北财办。

一九四八年 六十三岁

一月四日 在华北交通会议上作总结报告。着重分析了统一交通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指出，在当前几个解放区已经联成了一大片的形势下，“各种工作，都要求统一，交通工作也要求统一。”现在我们的解放战争规模很大，这样大规模的运动战，如果没有大规模的交通运输工作与之配合，我们的战争是会遇到很大困难的。因此，应当按照今天的新的形势和发展前途来布置我们的交通工作。指出：目前交通运输建设的方针和任务同其他工作一样，一切为着争取战争胜利，一切服从于战争需要，交通工作不能例外。同时指出：“今天的交通建设虽然主要服从战争的需要，但同时也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所以，我们的交通建设，对战争和国民经济发展都有帮助，不必把两者机械分开”。还特别强调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处理公营、私营、合作经营者三者的关系，发展华北的交通运输。

△ 华北财经办事处发出《关于反贪污反浪费的指示》，文件指出：目前，贪污现象日益严重，这种现象如不纠正，将大大加重我们的财政困难，使我们战争难于长期支持；且日益腐蚀干部，腐蚀党员，损害党的政治影响，必须动员干部对各种贪污浪费现象进行斗争、批评和自我批评，揭发各部门的贪污浪费现象，引起全党警惕。《指示》强调：对教育无效或者犯罪行为超过一定限度的，就必

须执行纪律，不能姑息。

一月八日 致电中共中央并转西北中央局贺龙、习仲勋等：“兴县会议甚有成绩，晋陕两区财政统一、金融统一是一大进步，坚持独立自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极为正确”。“按照会议确定的精简节约增加生产的办法切实做去，明年困难当可勉强渡过”，“但由于两区地广人稀，养兵较多，困难较大，决定发动晋察冀、太行等友邻区帮助解决”。

一月二十九日 致电杨秀峰、张友渔等，对陈毅、粟裕及陈赓、谢富治所属部队的经费及军工费用的概算提出意见。

二月二日 出席中共中央工委会议。会议讨论了财经问题。议定：“石家庄之统一管辖问题，由董老以中央特派员名义统一之。”

二月二十一日 中共中央致电各中央局、各军区、各野战军前委及中央工委、中央后委，征求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军徽和臂章的意见。

二月二十九日至三月三日 西北野战军取得宜川、瓦子街大捷，歼敌五个旅，从根本上改变了西北战场的形势。

三月三日 出席中共中央工委会议。会议讨论晋冀鲁豫与晋察冀两中央局合并问题。董必武在发言中提出：晋冀鲁豫与晋察冀两中央局合并，应成为统一全国的开始。合并两局，华北财办现在力求货币、银行和对外贸易的统一。会议决定两局合并，成立中共华北中央局。

三月十二日 以解放区救济总会主席的名义，向全中国全世界呼吁，痛斥蒋匪蹂躏陕甘宁边区的罪行。要求救济灾民。“希望各界正义人士能给我们陕甘宁边区一百五十万受难同胞以同情的援助，以舆论的力量斥责蒋胡匪军的罪行，及斥责以金钱物资以至武器弹药鼓励蒋胡匪军坚持内战，屠杀中国人民的美国反动派”。

三月十四日 出席中共中央工委会议，在发言中认为：战争打得很好，成绩很大。现在主要问题发生在土改上，工商业政策也是由土改中发生的。建议：在军事上，建军治军的正规制度也须建立；部队的缴获确实归公；确定编制，建立预算制度；民兵不要到处检查商旅，那样对发展工商业影响很大。

三月十五日 华北财办决定在石家庄召开金融贸易会议，讨论华北各解放区统一货币及贸易问题。

三月二十一日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从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出发，经晋绥边区，于四月十三日到达晋察冀军区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

四月一日 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是任何别的革命，它只能是和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说，这个革命不能由任何别的政党充当领导者，只能和必须由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充当领导者。这就是说，由参加这个革命的人们所组成的统一战线是十分广大的，这里包括了工人、农民、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从地主阶级分裂出来的一部分开明绅士，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民大众。由这个人民大众所建立的国家 and 政府，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无产阶级领导的各民主阶级联盟的民主联合政府。

四月八日 将金融贸易会议情况电报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并中共中央：现各地工作报告已完毕。自今日起分组研究金融货币工作、贸易工作及商业政策。研究结果向大会报告，然后讨论总结。从各地工作报告中看到去年邯郸会议后，有些地区的财经工作是有显著进步的。

四月二十一日 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

四月二十三日 和刘少奇、朱德热烈欢迎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部分工作人员到建屏县西柏坡村来会合。

四月三十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在阜平县城南庄召开会议。会议由毛泽东同志主持，研究如何发展战略进攻问题，作出在长江以北中原黄淮地区大量歼灭敌人的决策。中共中央与中央工委完全会合。

五月一日 中共中央颁布“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打到南京去”、“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 毛泽东致电李济深、沈钧儒，提议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希望民革、民盟与中共共策进行。

五月五日 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在香港联名致电毛泽东并转解放区人民，认为中共“五一”劳动节口号“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允符同人本旨，”表示要通电国内外各界及海外侨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

五月九日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改变华北、中原解放区组织、管辖境地及人选的决定》，宣布：将晋察冀、晋冀鲁豫两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两中央局合并为中共中央华北局，两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两边区政府合并为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以刘少奇兼任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为第二书记，聂荣臻为第三书记；聂荣臻为华北军区司令员，薄一波为政治委员，董必武为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主席，中共华北局常委；邓小平为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陈毅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刘伯承为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并宣布：“中共中央

已与中央工委会合，中央工委即行撤销。”

五月十五日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致电各中央局、前委，通报中共中央和中央工委合并后，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人事的部分调整：杨尚昆为中央副秘书长；彭真兼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为副部长；陆定一为中央宣传部部长，徐特立、陈伯达、廖承志、胡乔木为副部长；董必武兼中央财经部部长；李维汉为中央城工部部长；李克农代理中央社会部长；邓颖超代理中央妇委书记；冯文彬为中央青委书记；李涛为军委作战部部长；杨立三为军委后勤部部长；苏井观为军委卫生部部长；傅钟为军委政治工作研究室主任。

五月十九日 和刘少奇、周恩来、叶剑英、杨立三、贾拓夫、薛暮桥等开会，商议解决西北财经困难等问题。

五月二十日 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边区政府实行联合办公。

六月十一日 和周恩来致电许涤新，询问中共在上海、香港两地的经济研究机关及工作状况，并指出：“我们需要全国资源，银行、工厂、矿产、交通、贸易、农林牧副渔及财政收支、官僚资本活动等系统的调查材料，有些材料应利用在官方工作的朋友代为搜集，并指定若干有研究兴趣的同志长期作经济研究工作，暂时不作政治活动，保证材料不受损失”。

六月 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华北财经办事处，成立中央财政经济部。董必武为中央财经部部长。

七月十一日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晋察冀边区行政区委员会联合作出《关于召开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及代表选举办法的决定》。《决定》指出：“两区参议会驻会参议员联席会议决议，为适应需要，迅速召开华北临时代表大会，产生新的统一的政府。决定：（一）华北临时代表大会的任务是，制定华北统一的民主联合政府的组织法；并选举华北政府委员会及政府主席、副主席，决定华北

政府的施政方针；制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法及选举法。(二)出席会议代表名额共541人，分区域、职业、团体三种代表。

七月十七日 致函谢觉哉等：“日前晤少奇同志，他说‘乡县政权组织纲要和选举条例及危害解放区治罪条例三草案都很好。希望赶快把民、刑两法草拟出来备用’。我认为他这个提议很好。望诸位同志考虑，以法学为人民服务。”

七月二十一日 中共中央致电各中央局：中央决定华北、华东两区货币固定比值后通用。为便于今后发展及目前晋中作战，华北、晋绥、西北三区货币也应采取同样办法。八月十五日开始通用。

七月二十五日 致电世界公谊会中国服务会会长及美国红十字会驻华代表，呼吁制止国民党军队阻挠人民抢修黄河险工。

七月二十七日 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确定由董必武执笔修改谢觉哉起草的《危害解放区治罪暂行条例》，条例名称改为《惩治反革命暂行条例》。

七月三十日 中共中央致电华北、华东、西北中央局、晋绥分局并转各政府党团和各财办，批准五月华北金融贸易会议通过的报告。报告中称：今后的经济建设，不但要发展农业，而且要发展工业，不但要建设乡村，而且要建设城市。我们已有可能和必要从分散的地方经济逐步发展向统一的国民经济。货币发行，首先保证生产建设，其次保证战争供给，同时要掌握发行数量，避免物价急剧上涨，必须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所有权、经营自由权及正当的营业利润，慎重处理工商业中的劳资关系。

八月一日 毛泽东致电各民主党派，就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时机、地点、召集人、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征询各界民主人士的意见。

八月二日 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就财经工作提出看法：（一）各地要求币制统一，财政也必须统一；（二）生产建设也应统一；（三）金融、贸易九月可统一起来，如果金融、财政、贸易统一起来，必须有统一的机构。

八月六日 在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接着又在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上被推选为大会常务主席。

八月七日至十九日 主持召开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有工人、农民、革命家、妇女、工商业家、自由职业者、新式富农、社会贤达、开明绅士以及民主同盟盟员、少数民族和国统区人民团体代表共五百四十一人。这是“中国民主革命历史中划时代的一次大会，在中国民主革命历史上将占有光荣的篇章。”

△ 七日在大会上致开幕词。指出：“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将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和雏型”，论述了苏联十月革命后，“劳动人民推翻了旧的统治，废除了剥削制度，人民才真正翻了身，自己管理自己的事，真正实现人民的民主”。“崭新的人民政权的建立，是二十世纪政治上的特色”，“我们现在的人民代表大会正体现了二十世纪是人民的世纪”，“体现了我们解放区的政权是革命的政权，是人民的政权，是新民主主义政权。”并指出：“现在能召开这样一个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是：华北解放区已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与解放战争的胜利，华北纵横千里的地区完全打成了一片。”“晋察冀行政委员会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在过去战争环境下，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领导人民支持战争，完成土地改革，完成了他们所负的历史使命，奠定了优良的工作基础，使我们可能在这一基础上从事更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诸般建设。”“代表大会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制定将来政府的施政方针”。

八月十一日 主持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第三次会议。会议通过了《华北解放区施政方针》、《华北人民政府组织大纲》、《村县(市)人民政权组织条例》以及《农业税则》等各审查委员会名单。被推选为《华北人民政府组织大纲》审查委员会召集人。提出：“要抓紧时间，深入讨论，以争取原定日期(十天)结束会议。”

八月十四日 在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党员大会上讲话，阐述了团结党外人士的必要。指出：“今天民主革命已进入更复杂的情况，必须注意团结党外人士。”“要真正彻底消灭国民党，还要费很大力量争取更多的人们”。同时又强调了必须发扬民主的问题，指出：“过去在农村中，我们讲民主很少，在政权中还有军政府的形式，这一套不行，必须善于运用政权团结人民，现在将来都要用民主方式，发扬民主精神”。“要倾听不同意见，不要一听不同意见就不耐烦；要坚持说理态度，说得使人心服；要坚持少数服从多数。”

八月十五日 在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第四次会议上提出两项议案：(一)“关于在今后两年时间内正式召开华北人民代表大会”；(二)“在华北人民政府委员名额三十九人中，本届大会只选二十七人，保留十二人，责成华北人民政府在新解放区，在新解放城市，在蒋管区及在可能统一联合之兄弟解放区中随时聘请之”。两项议案均被会议通过。

八月十八日 在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上，被选为华北人民政府委员。十九日，大会胜利闭幕。

九月七日 致电冯玉祥夫人李德全，吊唁冯玉祥遇难不幸逝世。

九月八日 电告西北局、晋绥分局、华北局转太岳、北岳区党委；中央决定华东、华北与西北财政经济统一，在未发行统一货币前，定北海币与冀钞为一比一，西北农币与冀钞、边币为二十比一

及二比一，比值固定不变，可以互相通用，由华北及晋绥张贴布告，定期实行，公布日期再告。两区货币比价规定后，应严防商业投机和货币投机，应竭力维护比价，防止市场物价波动。

九月八日至十三日 出席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预定在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会议上，董必武就财政统一、学习工业和做生意、建立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和文化教育问题等作了重要发言。指出：我们的财政是在战争需要、供给标准和减轻人民负担三个矛盾中跳舞，战争需要必须满足，供给标准必要时还可降低，人民负担已很重，我们今天不一定实行军事共产主义，但也很难不要捆紧肚子，财政必须统一起来。关于学习工业和做生意问题，建议中央组织一个考察团到东欧学习工业管理、工商及行政工作，可派二三十人。关于建政工作，建议改变不善于运用政权、什么都是党委一马当先的状况，并尽快搞好县、村、市人代会条例草案，党中央批准应由政府通过颁布。关于教育问题，建议赶快恢复整顿中小学、训练师资、提高教员的政治和物质待遇，各级党委要经常讨论教育工作。

九月十七日 应约赴石家庄，同公谊服务会赫思进等人谈医疗队与黄河抢险问题。在谈到黄河问题时，针对赫思进等提出的只要我方表示在险工处休战，他们就可以募集些救济物资运进来等问题，立即予以反驳。指出：“黄河下游水灾是联总帮助蒋介石造成的，下游故道受灾人民没有得到联总的救济”，“解放区人民在自己的区内、在非战争区域内抢险，怎能用得上‘休战’？而且解放区人民久经患难，国民党反动派想用飞机在他们头上打雷般地轰炸，要他们‘休战’，那是违反解放区人民的要求的。”之后，又针对赫思进等奉司徒雷登之命劝说和谈问题发表郑重声明：“我们共产

党人也希望和平，但希望的是真和平，不是假和平，我们也要求民主，我们要求的是真民主，不是假民主。”“中国内战，没有美国片面帮助蒋介石是打不起来的。要中国实现和平，最要紧的是美国政府立即停止援蒋。”随即将所谈情况函告伍云甫，并请即转报周恩来及党中央。

九月二十日 以临时召集人的名义召集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被选为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薄一波、蓝公武、杨秀峰当选为副主席。

九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 主持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华北人民政府各部、会、院、行、厅、局组织规程草案”及各部、会、院、行、厅、局的负责人选，听取了“工商金融条例”、“农业税暂行税则”、“战时邮件检查条例”等各审查委员会报告的审查意见。会议还决定了各部、院长，主任，银行经理和秘书长人选名单。在九月十三日会议审查《关于华北私营银行业管理办法》(草案)时发言。认为：总的方针是在发展工商业的方针下，允许私人银行业存在，保护其合法利润，但限制其投机倒把活动。

九月二十六日 率当选的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及全体干部就职视事，宣告华北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并在就职大会上讲话，指出：现在人民解放战争正引向蒋管区，华北土地改革已基本完成。今后华北人民政府中心任务，是要建立各级人民政权，建立各级人民代表会议，主要是村县两级，要从各方面发展生产，国营的、私营的、合作社的诸种经济都要发展，要发展文化教育，没有正规教育，则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指出这都是为了我们的力量更大，支援前线更好。还特别指出：“这个政府是由游击式过渡到正规式的政府，首先要建立一套正规的制度和办法。”“我们是人民选举出来的，我

们要向人民负责，人民要求我们办事要有制度、有纪律，无纪律无制度一定办不好事情。政府规定的制度一定要遵守，不遵守就是违反纪律。”

△ 和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薄一波、蓝公武、杨秀峰联名致电民主同盟，答谢其对华北人民政府成立的祝贺。

九月二十七日 和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联名致电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及中国致公党，答谢他们对华北人民政府成立的祝贺。

十月一日 和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薄一波、蓝公武、杨秀峰联名颁布合并原晋冀鲁豫之冀南银行与原晋察冀边区银行，成立华北银行的通令。

十月四日 和薄一波向中共中央报告，华北财经会议决定自明年一月一日起发行中国人民银行券，现即开始准备工作。

十月五日 和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薄一波、蓝公武、杨秀峰联名发布将华北与山东两区所发行之货币固定比价，互相通用的通令。

十月六日 为统一华北、华东、西北的财经、经济、金融、贸易、交通等工作，中央发出成立华北财经委员会的决定，任命董必武为华北财经委员会主任，薄一波、黄敬为副主任，方毅任委员兼秘书长。

十月十日 和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联名发布关于成立华北税务总局、建立华北各级税务机关的通令。

十月十六日 在人民政权研究会上作《论新民主主义政权问题》的报告。报告首先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和革命政党夺取政权的极端重要性。指出：共产党人“要把妨碍经济、政治发展的旧的制度推翻，建立新的、人不压迫人、人不剥削人的政治经济制

度”，“非夺取政权不可”。接着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性质，是“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民主爱国人士共同组成的人民民主政权”。新民主政权的机构“不能沿用旧的”，“要打碎旧的，建立新的，适合我们自己需要的机构。”强调指出：“建立新的政权，自然要创立新的法律、法令、规章制度。一定要建立新的。否则就是无政府主义。如果没有法律、法令、规章制度，那新的秩序怎样维持呢？因此新的建立后就要求按照新的法律、法令、规章制度办事。这样新的法律、法令、规章制度，就要根据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来拟定”。还强调指出：“新民主主义政权的组织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号召大家要研究“人民代表大会怎样产生”以及“怎样发扬民主，开好人民代表大会”。

十月十八日 在华北水利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讲话。指出：“治水必须有统一的计划，必须用科学的方法。只看到一个地方的利害，而不顾其他地方的利害是错误的；只是抱狭隘的经验，不研究近代治水方法或只照书行事，不重视过去的经验，也是错误的”。“工作中要虚心地向群众学习”。

十月十九日 主持华北人民政府第一次政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统一规定各行署市府名称、组织机构，并任命正副主任及市长，以及成立以谢觉哉为主任委员的华北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等决议。

十月二十日 和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联名发布将华北与陕甘宁、晋绥两区所发行之货币固定比价，互相通用的通令。

十月二十一日 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毛泽东呈报《华北财经办事处工作结束的报告》。《报告》说：华北财办从一九四七年五月成立，到一九四八年五月撤销，期间所作的工作主要有：调整了各解放区间的相互关系，减轻了各区财经工作的矛盾，如：撤销了各区

间的关税壁垒,规定了两区货币兑换比较合理的办法,增进了各民间贸易工作的往来;协同各战略区负责人,调剂了贫富区的财政;在财政工作人员中开始传播了毛泽东思想,以发展生产保障供给为财经工作的总方针,确定了战时解放区财经工作的基本路线,使战时脱离生产人数、供给标准和人民负担三个基本矛盾得到调剂;反对了在财经工作人员中相当严重的山头主义,本位主义,在思想上物质上为统一作了准备工作。

十月二十二日 在华北局常委会上针对“认为财经委员会一成立,政府党组便没事可做”的思想,说明政府党组与财经委员会的关系。指出:财经委员会“是政府的一部分,对政府负责,根据政府方针政策去工作”。“党组是党在政府中体现党的政策的组织”,“党组有权讨论财经工作,有权提出不同意见,甚至在政府委员会上提,但因事忙可与财委会分工”。

十月二十三日 和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联名颁布关于复核死刑案件的通令。令各行署、各直属市专署及各县、市政府处理死刑案件的审判工作,必须遵守毛泽东所指示的三个条件,即一、禁止肉刑;二、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三、不得指名问供。研究案情决定判罪,得由该政府各级负责人组成司法委员会,但必须有审判负责人参加研究与决定。

△ 和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联名发布关于统一各行署司法机构名称及审级的通令。规定县司法机关为第一审机关,行署区人民法院为第二审机关,华北人民法院为终审机关。

十月二十五日 向中共中央、毛主席呈报《中财部工作报告》。说明自华北财办成立以来,我们的主要工作,一贯是促成华北(包括华东和西北)财政经济的统一。在华北财办时期,因为问题的根本解决条件尚未成熟,所以只能枝枝节节的解决。中财部成立四

个月以来，主要是遵照书记处的指示来统一华北、华东、西北三大解放区的货币。决定华北与华东的货币于十月五日起，华北与西北的货币于十月二十日起，固定比价，互相通用。在财政工作方面，主要是审查了各地区的财政收支概算，作出了概略的调剂计划；在贸易工作方面，主要是处理了华北和山东进出口政策上的许多纠纷，制止了各地互相征税的现象，进出口的税率则大体上已一致等等。

△ 在华北局各部联席会议上作关于教育问题的发言。指出：中学教育必须正规化，但要有步骤、有重点。政府教育部门应考察一下，确定先在哪几所中学哪几个班进行。

十月二十九日 和薄一波、蓝公武、杨秀峰致电已到达东北的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朱学范等民主人士，欢迎他们到华北来。电称：“诸先生为民主解放事业艰苦奋斗，欣闻北来，快何如之，关山匪遥，承教如渴，已扫榻待驾。专电奉复，并祝健康。”

十一月一日 主持华北人民政府第二次政务会议。通过了任命太原市长及组织太原军事管制委员会等决议，为从事战备行动，决定华北人民政府自十一月二日起迁往平山城暂驻。

十一月二日 东北野战军乘胜直下沈阳、营口，历时五十二天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九日，锦西、葫芦岛之敌从海上逃跑，东北全境解放。

十一月十二日 和薄一波联名函复冀中行署主任罗玉川。对罗在来信中勇于提出意见给予极大的鼓励。指出：“你的信写得很好，不论所提问题，内容曲折如何，有意见勇于提出，对上下级关系采取郑重负责的态度，这一点就是好的，今后像这样的信，愿你多写一点，以便我们研究改进”。接着便对所提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答复和解释。

十一月十四日 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评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宣布中国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占有优势。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

十一月十八日 主持华北人民政府第三次政务会议，提出两项议案：（一）为适应华北军事形势的胜利发展，准备接管华北各大城市、特别是接管平津的市政干部，应早日抽调，并计划成立市政干部训练所，分批加以短期训练；（二）为培养华北工业建设及职工运动的骨干，拟成立华北职工学校。议案被会议一致通过，并决定成立委员会负责筹划。

十一月二十一日 和华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黄敬将修复津浦、平汉、同蒲路计划电报中央。中央将此计划转发华东局及晋绥分局。要求他们充分动员当地民工，在地冻前完成筑好路基的任务。

十一月二十二日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结束，全歼敌军黄百韬兵团。

十一月二十五日 和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及华北军区司令员联名颁布关于组织保定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命令。

十一月三十日 和华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将对货币统一的意见，电报中共中央：为统一华东、西北、华北三区货币，决定先将东北钞与华北钞规定币值，按银行牌价，互相兑换，互不流通，在重要口境普设兑换所。中州农民银行钞亦照上述办法，按银行牌价互相兑换，互不流通。发行人民币，统一各解放区货币，无论在军事上和经济上均有必要。但事关重大，关涉问题颇多，建议中央召开一个会议，集合各区财经工作负责人解决。

十二月二日 和**华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黄敬**联名电告各**区**党委并转各行署主任及**石家庄**、**阳泉**市委：一九四九年春季**华北**即可完全解放，财经建设将成为我们的首要任务。为此，**华北财经委员会**决定：（一）一月十日召开专署以上财经会议，讨论**华北**区财经建设的方针与一九四九年的计划；（二）经济建设方面，要研究**华北**经济结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方针、合作社的以及城市与农村联系的方针；（三）在计划方面，要从国民经济出发，研究如何恢复与发展大中城市的工业，特别是轻工业，恢复与发展交通，恢复与发展农业等等。

十二月八日 在**华北人民政府**草拟施政纲领和计划专门委员会会议上讲话，着重补充说明组织供销合作社的必要性及其办法，指出：“根据现在农村情况应采取供销合作社的办法，以前因游击环境，各**区**农村分割，不可能大量供销农民物品，并且只靠公营机关，力量很不够”。“现在财经委员会决定组织供销合作社，由政府拨款办，由上到下有组织的推行”“合作社要尽量供给农民必需品，收买农民出卖的物品，社员大会定期召开，合作社应向农民报告工作，社员买东西要便宜，卖东西可以推销，还可以设立农民仓库及其他帮助农民的工作，以实际利益联系农民”。

△ 和**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薄一波**、**蓝公武**、**杨秀峰**联名颁布“为接收**平津**必须统一筹划抽调干部”的命令，规定抽调任何部门或地区的干部，须一律于事先呈报主席审核批准，不得不经请示而直接抽调，防止在抽调干部中发生混乱现象。

十二月十五日 主持**华北人民政府**第四次政务会议，提出并经会议讨论一致通过“关于整饬政风，克服无组织无纪律及祛除浪费现象”的决议，要求各部门负责同志以身作则，推动进行。此外，还通过了关于成立**华北专门教育委员会**、**华北文艺工作委员会**等

各项决议。

△ 淮海战役第二阶段胜利结束。全歼敌军嫡系精锐黄维兵团。

一九四九年 六十四岁

一月一日 毛泽东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宣布：中国人民一定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将革命进行到底。

一月四日 和 华北人民政府薄一波、蓝公武、杨秀峰副主席联名颁布取缔反动会道门的通令及具体办法。

一月六日至八日 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决定在北平解放后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召集没有反动派参加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共同纲领，成立新中国。

一月十日 淮海战役结束。至此，蒋介石军队的精锐师团丧失殆尽。

一月十四日 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批驳蒋介石的元旦求和文告，提出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改编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协并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八项条件，表示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上述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

一月二十日 出席华北人民政府和中共中央华北局为欢迎新近由国民党统治区和海外来到华北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

团体代表及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的欢迎会，并即席致欢迎词。

一月二十三日 在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上讲话，向自然科学工作者提出应考虑的两个问题：“（一）我之技术在何种环境中加以利用”；“（二）我之研究成果为何人服务”。指出：“在过去反动政府下，科学工作者甚少发挥自己所长”，“而在新政权下，使每个人都能发挥自己的力量”。“我们必须团结一切力量，互相学习，交流经验，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

一月二十六日 和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天津卫戍司令员聂鸿钧在六国饭店招待上海和平代表团。

一月三十一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入北平城内，北平市和平解放，平津战役结束。

二月一日 在华北各界庆祝解放平津伟大胜利大会上讲话。指出：“平津解放，华北基本解放，全国解放亦为期不远，全中国人民就要彻底翻身了，是中国人民一百年来为自身解放奋斗，特别是近三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英勇奋斗的结果。人民胜利了，人民的敌人失败了，全中国全世界都不能不承认中国人民的这个胜利”。要争取彻底胜利，争取和平，就要“彻底执行毛主席的八项条件，缺一条都不行”。最后，号召华北各界人民要“努力生产，积极支援前线，加紧学习，在中国共产党和华北人民政府领导下，为全国的解放而奋斗”。

二月三日 和华北人民政府薄一波、蓝公武、杨秀峰副主席联名发出对干部进行鉴定的通知。要求从执行政策指示、立场观点、工作和学习态度以及群众关系、上下级关系等方面对科长以上干部每年考核两次。

二月六日 致函华东工委，提出对旧邮政人员的政策问题：“今后解放城镇，一般的应取消原有邮局，建立我们自己的邮局。”

“对旧邮政人员，应经审查分别处理，对普通国民党员及其他邮政人员，可以征求他们自己意见，如愿留解放区工作者，可个别吸收，如要回去的，经审查谈话后送出境”。

二月十四日 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华北局及平津两市委：中央派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前往沈阳，迎接在东北的民主人士到北平。原到华北的民主人士多数已去北平，现在将在东北的民主人士接去，是为了集中起来协商大计，准备新政协筹备会的建立，在各方民主人士汇集北平之后，应召开一次隆重的欢迎大会。

二月二十日 和罗荣桓等在北京饭店，设宴招待已到北平的民主人士，并即席发表演说。

二月中旬 华北人民政府移北平办公，成立两个委员会，以研究筹划调整华北行政区划和变更华北人民政府组织问题。

二月二十一日 在华北人民政府第二次委员会会议上，作《关于本府成立以来的工作概况》的报告。在报告了支援前线、经济建设、政治建设以及整饬政风等六个方面的工作成绩以后，接着对物价波动的原因作了分析和说明，指出：“物价和物资吞吐，货币发行，战事进行等都有关系”，“原因很多，而新币发行又犯了急躁与草率的毛病”。“我个人同时负责中财部及华北财经委员会工作，所以应负较多责任。”“这里还可以引起我们注意，处理问题应当照顾全面，注意相关连的一系列问题，同时注意研究思想方法问题”。报告还提出了华北人民政府当前的工作任务：（一）必须把巩固建设华北的任务与解放全中国的革命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二）在城市和农村进行可能的新民主主义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三）有计划地开展文化教育建设工作；（四）新区的土改要围绕生产进行，老区普遍召开村级人民代表会议等。

二月二十五日 在华北人民政府第二次委员会上致闭幕词，

着重讲了定好财经计划的重要性。指出：“华北解放区除几个敌人孤立据点外，都没有战争了。”“今后主要任务是生产，因此经济计划便成为我们工作中最重要与最基本的问题。”“在今年经济计划中，主要恢复轻工业，同时注意重工业的设置。”“我们要有计划的发展国营经济，使其居于领导地位，逐步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经济问题不是主观愿望的问题，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不是两三年，而是一二十年的事，经济计划定好了，只要我们实事求是地努力干，就能成功。”

△ 和薄一波等前往车站欢迎李济深、沈钧儒等三十五人安全抵平。

二月二十六日 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欢迎民主人士大会上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在进行解放战争中，曾得到各方民主人士的支持，现在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目前，除了革命战争以外，还面临着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极为繁重的任务，我们更应团结起来，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而奋斗。”

三月五日至十三日 出席在平山县西柏坡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会议集中讨论彻底摧毁国民党统治，夺取全国胜利，在新形势下把党的工作重心实行战略转移，即从乡村转到城市的问题，研究和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指出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号召“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规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防止对个人歌功颂德”。

三月二十三日 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林伯渠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及人民解放军总部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二十五日到达。下

午五时，在叶剑英、聂荣臻陪同下，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出席在西苑机场举行的阅兵式，受到北平各界群众代表和民主人士的热烈欢迎。

三月二十四日 南京国民党政府决定派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为与中共谈判的代表。二十九日，加派刘斐为代表，并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

△ 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话。赞扬中国妇女，特别是解放区妇女对于解放战争作出的伟大贡献。指出：“要把革命进行到底，必须进行各方面的建设，特别是发展生产。”要求“广大妇女和全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在一起，争取全中国解放，努力建设政治、经济、文化的民主自由生活。和国际民主妇女携起手来，参加世界和平运动，打击国际和国内的反动派以及各种各样的战争挑拨者的阴谋，保卫世界和平”。

△ 下午三时，在北平各大学教授举行的讨论中国文化界拥护世界和平宣言及出席世界和平大会事宜的茶会上讲话。指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获得最后胜利。全世界人民的政治觉悟也日益提高，拥护世界和平的力量是空前强大的，新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制止的。

三月二十五日 上午十一时，前往火车站欢迎民主人士黄炎培、盛丕华、俞寰澄从天津到达北平。

三月二十六日 中共中央通知南京国民党政府：中共中央决定和国民党政府的和谈，定于四月一日在北平举行。中共方面代表为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周恩来为首席代表。谈判以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对时局的声明及八项条件为基础。四月一日加派聂荣臻为代表。

三月三十一日 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林伯渠等一

起接见并宴请第四野战军师以上干部，欢送他们“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 和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薄一波、蓝公武、杨秀峰联名颁布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及一切反动法令的训令。指出：“国民党反动统治阶级的法律，是广大劳动人民的枷锁”，“它和世界各国资产阶级的法律一样，为着缓和劳动人民的反抗，不能不假装‘公正’掩盖其阶级实质”。因此“反动的法律和人民的法律，没有什么‘蝉联交代’可言，而是要彻底地全部地废除”。训令明确规定：“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及其一切反动法律。各级人民政府的司法审判，不得再援引其条文”，“各级司法机关办案，有纲领、条例、命令、决议等规定的从规定，没有规定的照新民主主义的政策办理。”要求各级人民政府，特别是司法工作者，要“用全副精神来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国家观、法律观，学习新民主主义的政策、纲领、法律、法令、决议，制定出新的较完备的法律”。

四月二日 在华北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首届代表大会上讲话。指出：“目前青年团的任务，是要在中国共产党总方向的领导和总任务的号召下，用各种方式发动、团结和组织广大青年，并配合各群众团体，具体实现支援前线，提高生产的总任务。”

四月十六日 在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临时会议上讲话中指出，在即将取得全国范围胜利的形势下，“华北人民政府需要考虑两个问题：一个是目前华北行政区划，考虑在原有省的区划基础上加以调整的问题；二是华北人民政府组织机构可能变更的问题。”在谈到目前政府工作问题时指出：首先是如何执行毛主席“生产长一寸”的号召，各地要根据当地情况做到尽可能提高生产；其次为组织各级人民代表会议，人民代表会议必须建立，目前在几个地区试办，这项工作也要围绕着生产去进行；同时要渡荒救灾，加强治

安等。

四月十九日 和薄一波等致函保定军管会，请通知有关机关妥为保存伪河北医学院存有的药品及医疗器械，以利恢复建设。

四月二十一日 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 和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薄一波、蓝公武、杨秀峰联名发布关于成立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的命令。

四月二十三日 第三野战军占领南京，宣告国民党二十二年反动统治的灭亡。

△ 复函世界科学文化界拥护和平大会主任伍德先生，对其欢迎中国解放区派遣代表参加三月二十五日在美国纽约举行的世界科学文化界拥护和平大会的邀请，表示感谢。说明“因信迟至四月十二日始行收到，以致不能派代表团前往参加”。对该会“为世界和平所做的努力至为钦佩并表示拥护”。深信中美人民之紧密团结，乃是争取世界和平所必需。

四月二十七日 和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薄一波、蓝公武、杨秀峰联名颁布《华北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及《华北区私营银钱业管理暂行办法》，以稳定金融，安定人民生活，保护人民财产，防止走私倒买金银。

五月四日 代表华北人民政府向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致祝词。指出：跟着共产党、毛主席走，就是青年的正确方向。要有实现总方向、总目标的适当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希望这次大会要交流经验，建立全国性的领导机构，把青年工作提高一步。

五月十日 在华北人民政府全体干部会议上讲话时，向全体工作人员提出四项要求：（一）要重视政权工作，安心政府工作，不要过分考虑地位、兴趣、待遇；（二）要注意学习新鲜东西，学习不会的东西，新参加工作的特别要注意学习政策，老干部也要学习新同

志的知识，同级和上下级也要互相学习；（三）注意节约物力、人力、时间，反对浪费；（四）新老同志要团结。

五月十四日 在华北干部举行的庆祝华北全境解放的晚会上讲话。指出：“华北能取得彻底胜利是因为有人民解放军英勇奋战和广大人民发展生产支援前线的结果。胜利以后要很快地进行全面建设工作，现在要先行建设新华北。”

五月十八日 在中共中央华北局举行的欢迎华北职工代表会上，作关于华北建设工作的报告。指出，为了尽快地恢复发展生产，“不但大力扶植发展公营工厂，也扶持私营工厂”，要求“大家多多向政府提意见，关心政府，把政府工作做好。”

五月二十日 和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邓颖超出席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小民革）举行的冷餐会。

五月二十一日 在华北小学教育会议上讲话。指出：“目前革命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华北地区已经完全解放。今后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从事各种建设，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建设，教育工作在建设中要占很重要的地位”。过去为了适应游击战争的分散环境，各地区在小学教育工作上，不能不各自多想办法，建立不同的制度，今天情况不同了，全区联成一片，摆脱了战争，这就要求我们研究一个较为统一的办法和制度。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要把教育工作提高一步，这就需要首先充实教育行政人员和教员，提高教师质量。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强调指出：“怎样办教育不是由几个人主观上来决定的，而是应根据广大人民的要求，我们的教育是为老百姓服务的。适应新的环境就需要新的教育方针和方法，旧的教育方针和方法必须有所改变”。希望“大家为了适应新中国的需要，应当主动的多想办法。中国是一定要大变的，不管你愿意或不愿意”。“我们共产党人争取革命的胜利，并

不是要把国家大事都拿来自己包办,而是把我们的主张拿出来,请大家来商量,大家来办。在教育方面,也是如此”。

五月二十五日 为邯郸烈士塔题诗:

血染沙场气化虹,捐躯为国是英雄。

四民安享新生活,奠酒供花岁祭隆。

△ 和周恩来、林伯渠、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等到北平火车站欢迎以郭沫若为团长的出席世界拥护和平大会的代表团归来。

五月二十八日 在华北财经委员会上作关于《经济建设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特点,指出:现阶段的经济结构是:(一)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二)合作社经济;(三)个体经济;(四)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五)国营经济。要首先发展国营经济;使个体经济组织起来发展到合作社道路上去,私人资本主义要向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现阶段的任务是用大力发展生产,按照毛主席所说的四面八方去努力,完成建设事业。

五月二十七日 上海解放。

五月二十九日 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收到民盟主席张澜的来电。电称:“兹值战后,困难较多,如何安定,如何建设,想早在诸公运筹策划中。澜不久将与罗努生(即罗隆基)兄等来平聆教。”六月一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电复张澜:“革命战争迅速发展,残敌就歼为期不远,今后工作重心在于建设,亟盼各方友好共同致力,先生及罗(隆基)先生准备来平,极表欢迎。”

六月一日 为统一实施高等教育方针、计划、指导学术研究及图书文物之管理,华北人民政府决定成立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董必武当选为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主任。

六月四日 和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联名发布命令,指令冀东行政公署注意唐山市花柳病之防治及促使该市娼妓改业,从事生

产,以根除旧社会之恶习。

△ 和林伯渠、叶剑英等到北平火车站欢迎华侨民主人士陈嘉庚、庄明理、王雨亭等抵达北平。

六月六日 主持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说明成立高等教育委员会的意义与任务。会议研究讨论了成立招生委员会、招考原则;毕业生的训练与分配;文物图书管理;私立大学院系调整及课程改革等问题。

六月十一日 在华北人民政府各部与北平市人民政府处长级以上干部座谈会上讲话。针对一些同志不愿作政府工作的思想,着重阐述了政府工作的重要性。指出:“政府是政权机关,是掌握国家权力的。”“马克思、列宁一再指出,革命要夺得的正是政权。如果没有政权,我们共产党的政策再好,也不过是一篇不能实现的好文章。”要求政府工作人员提高和加强自己的能力,提高效率,克服困难,搞好工作。此外,还阐释了团结、教育留用人员的必要性以及有关政策等问题。

六月十五日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正式成立并开幕。

六月十六日 出席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和《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选出了筹备会常务委员会,推选毛泽东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董必武被推选为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案组组长。

△ 致电上海军管会主任陈毅,请协助查清伪河北省卫生处在沪是否尚存有救济物资和医疗器材,如确系伪河北省府存沪物资,请协助启运来平。

六月十八日 主持新政协筹备会拟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案组第一次小组会议,决定成立“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组织机

构提纲草案委员会”，被推选为该委员会委员，负责起草“讨论提纲”。

六月二十一日 出席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第二次会议，被指定为发起与组织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的成员。

六月二十三日 出席拟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案组起草讨论提纲委员会会议。作了《政府组织纲要中的基本问题》的报告。对国家名称、国家属性、最高政权机关及其组织原则等提出了初步意见，经讨论一致同意，并决定以起草讨论提纲委员会的名义，提交拟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案组全体会议讨论。

六月二十四日 在华北首次防汛会议闭幕式上讲话。指出：“华北境内的河流长期以来害多利少，在目前财力、人力、物力还不可能从事大的治本工程的情况下，把防汛工作做好，避免重大灾害，就是很大的成绩。”勉励新老水利工作者，“从事水利工作，就是为人民服务，要总结过去防汛的经验，搞好今后的工作”。

△ 和林伯渠、李济深、郭沫若等到北平火车站欢迎张澜、史良、罗隆基、郭春焘、王葆真来北平。

六月二十六日 出席中国新法学研究会发起人大会，当选为新法学研究会筹备委员会委员，并在大会上讲话。指出：“今天虽然废除了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但要完全粉碎旧法律的思想体系，则还须加以彻底的批判。目前我们虽无完备的法典，但解放区已有很多单行条例、纲领、命令、法律大纲、决议等提供我们研究学习。”希望“大家学习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社会观与法律观，共同努力，建设新法律完整体系”。

△ 主持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和钱俊瑞、林砺儒、孙起孟等十一人被推选为干事，组成干事会，并为召集人，负责起草筹备会简章草案。

六月三十日 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二十八年的主要经验，阐明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各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以及新中国内政外交的基本政策。

△ 主持全国教育工作者会议发起人干事会第一次会议，讨论、通过筹备会章程草稿。

七月一日 在中华全国铁路职工临时代表会议上讲话。向全国铁路职工提出目前要学习的三件大事：第一学习管理生产技术及行政工作；第二学习管理国家的本事；第三学习世界各国管理铁路的先进经验。

△ 下午八时，出席中共中央华北局及中共北平市委为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八周年举行的纪念大会，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在大会上讲话，详细叙述了党一经创立就由“一个很小的团体”在中国闹个天翻地覆，就能迅速发展为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党的历史条件和党在二十八年中艰苦曲折光辉的斗争历程。阐述了党的历史经验，论证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是全人类继十月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最伟大的胜利。同时告诫：“我们千万不可由于胜利而冲昏头脑”，“我们必须经常保持高度的对国内外敌人的警惕”。“我们每个人必须好好检点自己”，“我们必须继续保持和发扬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

七月二日 在中华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讲话。指出：“过去那种以为文学艺术是可以超阶级的看法是不对的。在阶级社会里，阶级立场、阶级观点不能不反映到文学艺术里面。”希望文学艺术工作者“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充分反映人民的斗争，表现人民的思想和感情，在正确的政治方向的指导下，做好现在和将

来的工作。”

七月三日 主持全国教育工作者会议发起人干事会第二次会议，初步提出了关于筹备委员会的委员名额及其分配原则；拟订了中华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的章程草案。

七月四日 和李维汉就关于召开基督教中学会议问题致函吴耀宗、沈体兰；我们提议，在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会后，再考虑基督教中学会议问题。在全国教育者代表会中，应吸收一些教会学校教育工作者参加。

七月五日 主持全国教育工作者会议发起人干事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章程修正草案和筹委名额分配办法及部分名单，确定干事会的分工，被推举为总干事。以后又多次举行干事会，进行了大量筹备工作，到七月十九日，各地区各方面参加筹备会议之代表相继前来报到，发起工作乃告完成。

七月六日 在华北党政军负责人招待在平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的宴会上讲话。首先庆祝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庆祝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成立。接着指出：“应根据波茨坦协定早日召开四国外长会议，商谈对日和约问题。”并说：“只有召开新政协以后所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才是中国唯一有权派遣代表的政府，任何人不得加以阻挠或反对。”

七月七日 出席北平各界人民纪念“七七”抗战十二周年大会，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并在大会上讲话。精辟地论述了“对日本侵略者进行的伟大爱国战争，经过八年的苦战，终于取得最后的胜利”的由来，指出这一胜利，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各民主党派和中国人民拥护的人民战争路线，克服国民党政府所实行的积极反人民、消极抗战路线的胜利的结果，加上盟友的帮助，苏联直接出兵，迫使日本侵略者投降。”“抗日战争胜利了，但是中国人民

在抗日战争中的种种要求没有得到实现，这是因为美帝国主义代替了日本侵略者，蒋介石取代了汪精卫，他们坚决地与人民为敌”。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善战，由于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和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协力，仅仅三年时间就打败了美帝国主义者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反动军队，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所没有在全国范畴内实现的种种要求，开始实现了。最后指出：“抗日战争胜利了，人民解放战争也基本胜利，对日和约问题就应当摆在我们的议事日程上，我们中国是抵抗日本侵略最早，而又牺牲最大的国家，我们有权提出处理日本的意见。”“新政治协商会议将要产生新的民主联合政府，将要派出全权代表，参与按照波茨坦协定所规定的处理日本问题的会议”。

七月八日 出席拟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案组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政府组织纲要中的基本问题》。决议：（一）国家名称：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二）政府组织纲要中得表明国家属性，由起草委员会参考原提议拟定其内容并斟酌情形列入组织大纲之总则或前言中。（三）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采取民主集中制。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未产生前，由新政协产生之人民政府委员会为国家最高政权机关。（四）最高行政机关可称为国务院（或其他适当名称）。并决定由董必武、张奚若、阎宝航、王昆仑、张志让五人组织起草委员会，董必武为召集人。

七月九日 主持政府组织大纲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被指定为起草人，其他委员书面提供意见。草案拟出后再详细讨论。

七月十日 被中共中央确定为由二十一人组成的新政协筹备会党组干事会成员，并负责政法工作。

七月十七日 在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上致闭幕词。指出“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指导下，

我们的社会科学工作才真正可能有助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还指出：“有许多朋友过去在追求真理的路上走过许多弯路，甚至把虚伪当做真理，现在有了重新学习的热诚”，称赞“这无疑地也是极好的事情”。鼓励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把中国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提高到应有的高度，我们更要努力做普及工作，把马列主义基本知识广泛地在人民中间传播。”“要认真研究中国历史中许多尚未经仔细研究的问题”，“也要根据每天在发展着社会政治中的新现象不断地从事研究”。“在大规模的国家建设事业中发挥社会科学的作用。”

七月十五日 致函中共中央统战部，对佛教“改革草案”提出处理意见，认为：改革内容主要在促进僧尼参加生产劳动，禁绝流为封建迷信道门会帮等活动。各地寺院的封建财产要妥善处理，对寺院之古迹经卷文物及一切公物，应加意保护不得变卖或损坏。

七月十六日 出席中苏友好协会筹备会，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及筹备会委员。

七月十七日 在致堂侄董良坝的信中，对另一堂侄董良焱“想到武汉行政界去工作的想法提出意见，信中说：“我却劝他好好在乡村办小学，把小学办得适合于当地农民的需要，过去没有可能。过去当小学教师只是为了饭碗或首先是为了饭碗，现在当小学教师首先是为人民服务，也因而解决着个人的生活问题。”信中还特别谆谆教育家中人要懂得：“我们社会上有一种很陈腐的甚至很坏的旧观念就是鄙视劳动，认为不劳动而能生活，生活得比劳动者还好才算享福。革命了，必须纠正过来，我们应该以劳动生活为光荣，不劳动除了疾病老弱不胜者外，就不得食。现在还做不到，逐渐是要这样做的。”还说：“做行政工作并不是做官。”

七月十八日 在华北农业生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农业发展

的道路是“必须合作化”，同时还必须“运用科学”，“把科学知识与农民的实际经验密切结合起来”。

七月二十三日 在中华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上致开幕词。指出：今后我们的工作，“重点要放在建设方面，就是要放在经济建设上面”。“新文化和新教育应该是而且必须是新的经济关系的正确反映，应该是而且必须是推动新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政治建设的强有力的武器。”“因此，今后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事业，就成为十分重要的工作了。”“教育工作的方针，必须服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方针。”“我们的教育思想必须以无产阶级思想，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我们的教育工作必须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澄清了所谓“为教育而教育”及“教育与政治无关”的观点，强调“我们的教育必须是为人民服务的，必须是为革命的政治服务的”。鼓励教育工作者“都应该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全心全意地、同心同德地为人民大众服务。我们必须在人民利益第一的前提下，团结一致地从事人民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完成我们的伟大而又艰巨的建设任务，使我们几千年来苦难重重的祖国，得到完全的翻身”。

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七日 同各省主席、行署主任连续谈了三次关于农村建政问题。反复强调：“我们所讲的民主是人民的民主”，“人民民主只能建立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基础之上，因此建政工作只能在土地改革已经完成的基础上去做，没有经过土改的地区，封建的生产关系未改变，民主建政是没有基础的”。“现在就是要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组织形式，也就是说小村可用村人民大会，大村可成立村人民代表会议，产生村人民政府的形式，县一定要用县人民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制度，产生县人民政

府”。“要实行民主建政，我们首先就是要和群众商量”。此外，还强调了建政工作必须要加强党的领导，指出：“没有党的领导什么也做不通。”“党如何领导政权，以及党员如何在政权中工作，最主要的就是要发扬党内民主，使党内的民主和群众的民主互相影响，党决定的事情，除关于党内问题者外，一定要经过政权来办，遇到和群众生活有关的事情，就和群众去商量讨论，党的脉搏要和群众的脉搏息息相通。”

七月二十五日 在华北人民政府第三次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华北政府这一时期的工作：一是“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但不忽视农村”；二是“开始着手和平建设，但不放松对战争的注意与支援”；三是“积极参加准备成立中央政府的工作”。同时指出主要缺点是“表现在某种程度上的官僚主义倾向和政治麻痹思想”，以及“对民主建政工作没有用足够的力量去进行”等。

七月二十七日 在华北人民政府第三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做总结发言。再次指出必须克服政府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作风；农村民主建政工作中，注意克服形式主义；政府干部中的党员与非党员应团结合作，共同努力。

△ 出席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闭幕式，并致闭幕词。

七月二十八日 出席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被推举为主任委员。

七月二十九日 主持政府组织大纲起草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报告了拟定政府组织大纲初稿的经过，并对内容进行了说明。决定由起草人依据会议讨论情况斟酌修改初稿，作为拟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案组起草委员会修正稿，提交全体会议讨论。

七月 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向留用的原国民党政府机关人员讲话，详细阐明了人民政府对留用的原国民党政府机关人员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鼓励他们改造世界观，努力为人民服务。说明中国共产党对留用的原国民党政府机关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方针，要大家安心工作，不会失业，最后鼓励大家说：只要你们跟着共产党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八月五日 向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呈报“中央财政经济部的报告”，汇报了中财部从成立到结束所做工作有：（一）初步统一了各地区的货币；（二）调剂了各地区的财政；（三）统盘筹划了各地区的贸易；（四）审查了各地重要经济法规；（五）收集、整理和研究了有关财政经济方面的材料等。今年三月会议检讨了过去中财部的工作，决定在分区管理的基础上，逐步实行可能的和必要的统一，并建立健全的中央财经委员会来统一领导全国财经工作。并报告中央财经委员会成立后，中财部的工作实际上已结束，全部人员和资料案卷都已移交中央财经委员会接收。

八月九日 在北平各界代表会议上讲话。指出：“北平市军管会和人民政府已经学会了运用民主形式管理北平，许多从前的反动政府所不能解决的问题，都经民主政府运用民主方式和人民商量，得到人民的协助而获得解决，消除了发展生产的障碍。”要求进一步“发展城市生产，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供给农村以工业品，减轻农民的负担，改善城乡关系。”

八月十日 在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讲话。着重说明“今天文教事业尚在恢复阶段，还不可能大大地发展。目前国家财政困难，人民负担极重，各文教机关和学校必须厉行精简节约。”

八月十三日 和周恩来、林伯渠、李维汉、聂荣臻、黄炎培、傅

作义、邓宝珊等，应邀参加在张治中寓所举行的“八一三”纪念晚会。

八月十七日 在农业生产会议上讲话。指出：“中国农业的地位必须依靠工业的发展来提高，农业要用机械耕作，将来要电气化。要使农业更发展，非发展重工业不行，孤立地发展农业是没有前途的”。“工业化、合作化才是农业发展的健全道路，才能保障农民彻底解放。”

△ 主持政府组织大纲起草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报告了修改“初稿”的情况。

八月二十五日 对华北人民政府科长以上党员干部作《关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及团结民主人士问题》的报告，在阐述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性质、任务和职权以后，着重指出：“建立统一战线是我们党的基本方针”，“我们怎样把革命进行到底呢？怎样把帝国主义势力、封建残余势力、官僚资本主义势力及三者结合而成的反动统治消灭干净？”“用人民解放军的武装力量，肃清一切反革命，这是主要的，但不是唯一的，我们应该而且必须采取各种方式，争取一切可能争取到的人士归向革命，以孤立反革命。”“我们联系得愈广泛愈紧密，我们的敌人愈少空子可钻，我们就能愈快愈便利地完成现阶段的革命任务。”“不团结民主人士，不争取可能争取的朋友，我们便会犯关门主义的错误，我们便陷于孤立，便不能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说明统一战线的内容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联盟”。因此，“我们从中央到地方将要建立的政府，一定是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一定要有民主人士在内。”

八月二十七日 出席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作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拟经过的报告。会议经过讨论，修改了《中华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会议推定由董必武、黄炎培、李立三、马叙伦、张奚若组成小组,进一步专门研究有关问题,董必武为召集人。

八月二十八日 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一同前往车站,欢迎宋庆龄由上海抵达北平。

九月三日 在华北人民政府新闻发布室召开的报导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人民政府做的是人民的工作,因此,就应当向人民经常做报告,大家要重视而且要负责做新闻报导工作。”

九月六日 出席中苏友好协会筹委会全体会议。

九月七日 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李济深、郭沫若、聂荣臻、王维舟、罗瑞卿到车站,迎接在湖南举行起义,由中央军委任命为湖南省军政委员会主席的程潜到达北平。

九月十三日 出席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又作文字修改后基本通过。

△ 在致堂侄董良坝的信中,谆谆教育家人要懂得“目前战争很快可能结束,但还没有结束,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支援战争。革命的胜利只是把阻碍社会向前发展的东西扫除了,社会上想合理生存和发展的人都获得一条宽广的道路。这条道路也许还是曲曲折折的,还有不少的荆棘,但路基总算开辟出来了。”还指出:“社会上的‘劳少酬多的现象,是要逐渐革掉的,寄生生活更不能延长下去,那是不待言的’。”说“我在政府工作地位很高,但我们都是供给制,除个人穿吃住宅不成问题外,不能额外开支。说明这点,使你们知道我们共产党人所领导的革命,和过去的改朝换代不同”。

九月十六日 和陆定一、钱俊瑞、黄炎培、杨卫玉、江问渔等共商职教社问题。董必武表示:职教社总社可迁北平,其他问题待中

央教育行政机构成立后,再商具体办法。

九月十七日 出席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提请新政治协商会议审议。

九月十八日 出席新政治学研究会发起人会议。讨论通过发起人名单、新政治学研究筹备会组织法及中国新政治学研究会暂行简章。明确指出:本会为全国性的、学术性的群众团体,以配合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建设,走向社会主义的前途为宗旨,团结进步知识分子,研究马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的政治学,努力于政治理论与实践之相结合。并协助于人民政府在人民中进行普及政治知识。

九月二十一日 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式。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宣布:“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

△ 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九月二十二日 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的委托,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草拟经过及其基本内容》的报告。报告了草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经过,并对主要内容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关于国家名称,为什么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说明:“因为共和国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二字在今天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指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及爱国主义分子,它有确定的解释,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关于国家的性质问题,说明:“国家是统治阶级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工具,所以必须把今天人民民主专政中阶级间的关系

讲清楚。‘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和‘四个阶级联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的特质”。关于政府的组织原则，说明是采取民主集中制，具体表现是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关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说明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付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选出后，人民政协选出的全国委员会即成为国家政权以外各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协议机关。此外，还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署等基本问题，以及中央人民政府和政务院的有关问题，作了解释和说明。

九月二十九日 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候选人名单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候选人名单，被提名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候选人。会议决定于九月三十日下午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十月一日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

九月三十日 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当选为副主席。董必武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委员会委员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九、为新中国的政权建设 和法制建设呕心沥血

十月一日 下午二时，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就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议决定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施政方针；选举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

△ 下午三时，和党与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李济深、张澜等出席首都三十万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典礼，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十月二日 出席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宣言，选举郭沫若为和大主席。

十月三日 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听取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的报告，通过了任免事项。

十月五日 出席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大会通过协会章程，选举刘少奇为会长，宋庆龄、吴玉章等为副会长，董必武等被选为理事。

十月九日 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毛泽东为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席，李维汉为秘书长；通过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名义，向中央人民政府

建议：十月一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

十月十日 在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大会上，被选为中国文字改革协会理事。

十月十六日 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向华北人民政府干部作《关于政协会议的几个问题》的报告。阐明了政协会议确定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等方面的制度和方针政策；论述了对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应有的认识和态度等一系列问题。

十月十九日 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为政务院副总理；任命董必武为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陈云为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郭沫若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谭平山为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任命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程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徐向前为总参谋长；同时任命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各署署长，科学院院长，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十月二十日 出席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第四次常务委员会及最后一次全体委员会会议，并在会上作报告。

十月二十一日 上午，主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第一次委员会会议。彭真、张奚若、陈绍禹、彭泽民副主任和张志让、李云如、蓝公武、谢觉哉、武新宇、陈其瑗、罗瑞卿、杨奇清、史良、李木菴、张磐石、许德珩、陈瑾昆、乌兰夫、刘格平、赛福鼎、吴玉章、廖承志、章士钊、陶希晋等委员出席。在致词中宣告政法委员会成立，说明政法委员会隶属政务院，任务是负责指导内务部、公安部、司法部、法制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工作，并受主席毛泽东和总理周恩来的委托，指导与联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人民监察委员会。

△ 下午，出席政务院第一次扩大会议。周恩来宣布政务院

成立并对政务院组织机构职责分工作了说明。董必武在会上报告了政法委员会成立的经过。

△ 晚上，出席政务院第一次政务会议。讨论接收前国民党政府中央各机关人员、档案、图书、财产、物资等问题；还讨论了政务院及其所属机关的办公制度、办公程序等问题，决定成立小组具体拟订规章，由副总理董必武负责召集。

十月二十五日 出席政务院第二次政务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指导接收工作委员会工作条例的几项原则，决议由副总理陈云、董必武，政务委员邵力子等人组织政务院指导接收工作委员会，陈云为召集人。会议决定接管华北人民政府所属的各省市，所辖各部、会、院、行。

十月二十七日 晚上，主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为扑灭察北鼠疫的紧急会议。会议分析研究了十月上、中旬东北及华北地区鼠疫蔓延情况，决定组成中央防疫委员会，董必武任主任委员；决定中央设立防疫总队，分赴察蒙边境，察北、张家口、绥远等疫区，封锁东北和关内的交通，防止鼠疫继续蔓延等各项紧急措施。

十月二十八日 出席政务院第三次政务会议，在会上报告紧急防疫会议情形。会议批准了该报告；还通过了政务院指导接收工作委员会工作条例；推选副总理陈云为政务院指导接收工作委员会主任，董必武等为委员。

△ 向毛泽东和周恩来呈报：华北人民政府已电令河北、山西、平原、察哈尔、绥远等五省人民政府及京津两市人民政府均于十一月一日起改归中央直属，并已通知所属各单位分别与中央机构接洽交接事宜，限于月内将手续办理完毕。

△ 以华北人民政府名义发出通知，传达中央人民政府命令：“从十一月一日起，华北人民政府停止办公，所属部门移交政务

院。”“中央人民政府的许多机构，应以华北人民政府所属有关机构为基础迅速建立起来。”

十月三十一日 出席华北人民政府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正式办理移交的会议，并在会上讲话，指出：华北人民政府自去年九月成立迄今共十三个多月，在全体工作人员努力下，完成了支援前线及发展生产两大任务。号召全体工作人员总结以往经验，加倍努力，完成今后更艰巨的建设任务。

十一月三日 主持中央防疫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会议通过聂荣臻、李德全、贺诚三委员为该会副主任；听取了该会办公室关于疫情及工作报告，对防治鼠疫工作进行了研究。

十一月四日 上午，主持政法委员会第二次委员会会议。会议听取关于《政法委员会组织条例草案》起草经过的报告，经修正，通过了该条例。

△ 下午，出席政务院第四次政务会议，向会议作关于中央防疫委员会工作的报告，说明察北鼠疫情况；还向会议作关于政法委员会所属各部、会成立情况和已进行的工作情况的报告。

十一月九日 中共中央颁布《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由朱德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十一月十一日 上午，出席各解放区水利工作联席会议，并讲话，号召专家学者们贡献自己的才能和力量；指出水利工作的前途是无限的，但是必须逐步前进；说明今天的迫切任务是使水利的危害逐渐缩小，利益逐渐扩大，以致发展到将来做到有利无害。

△ 出席政务院第五次政务会议。在会上作了关于防疫工作的报告，说明了防疫工作情况，指出鼠疫已停止蔓延和缩小的趋势。会议还听取了陈云关于指导接收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由于南京是国民党中央所在地，上海为我国最大商埠，决定组织中央人民

政府政务院指导接收工作委员会华东区工作团，由董必武领导，统筹指导和处理华东区有关前国民党政府各机关人员、档案、图书、财产、物资等接收事宜。

十一月十五日 就察北鼠疫已停止蔓延，开放京绥铁路大同南口段交通一事，致函铁道部；并对记者发表谈话。

十一月十六日 致函察哈尔省防疫委员会、张家口市防疫委员会、中央防疫委员会防疫总队，指示京绥线恢复交通并不是察北鼠疫完全扑灭，不应放松防疫工作，而要加强。

十一月十七日 主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指导接收工作委员会华东区工作团全体团员大会，并在会上作报告，说明华东区工作团的组成和任务，指出任务是艰巨复杂的，要作好思想准备，同时传达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指导接收工作委员会的指示。

十一月十八日 出席政务院第六次政务会议，会议讨论了政法委员会所属各部、会组织条例修正草案，决议将以上条例统交法制委员会，按政务院指示，再行审核修正，呈中央批准；会议还讨论了政法委员会所属各部、会的编制及目前工作以及政务院指导接收工作委员会华东区工作团的工作等问题。

十一月十九日 主持政法委员会第一次委务会议。陈绍禹、彭泽民、谢觉哉、武新宇、陈其瑗、罗瑞卿、杨奇清、史良、李木菴、张曙时、许德珩、陈瑾昆、乌兰夫、刘格平、陶希晋参加会议。会议讨论了政法委员会所属各部、会组织条例(修正草案)；并决议：要求各部、会尽快定出最近的工作计划；配备干部；对政法委员会无固定工作的十余名委员，拟分别邀请参加和帮助所属部、会的工作研究；推定彭泽民参加政务院金融物价问题专门研究小组。

十一月二十二日 上午，主持中央防疫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听取苏联医学专家关于防治察北鼠疫的报告和原在东北服务的苏

联防疫队长关于今年扑灭东北鼠疫情况的报告。

△ 下午,主持由中央防疫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外交部和中苏友好协会总会联合举行欢送苏联医学专家和苏联防疫工作人员的大会。在会上致词,代表中央防疫委员会等感谢斯大林和苏联政府对中国防疫工作的关心和帮助。并和卫生部长李德全代表中央防疫委员会向苏联专家和防疫工作人员授旗、授纪念章和礼品。

十一月二十九日 签发政法委员会为组织灾民移送事宜给内务部的通知,说明财经委员会已批准铁道部为便利移送河北、平原两省灾民往东北安置的乘车优待暂行办法,并指示内务部派员与铁道部商洽办理,将办理结果报告政法委员会。

十一月二十九日、三十日 两次列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一九五〇年全国收支预算概算书》、《关于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草案)》、《省、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组织通则(草案)》,分组协商各大行政区及几个省市负责人员的任命问题。

十一月三十日 向陈云报告华东区工作团组织情形及如何进行接收工作的意见和各组提出的问题。

十一月 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组织中国共产党党委会的决定》和《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建立中国共产党党组的决定》。

十二月二日 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会议通过由董必武领导修订的《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所属各机关组织通则》;前三个通则对省、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性质、职权、组织等做了明确规定,要各地迅

速召开地方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以发扬民主，加强人民政权建设，使已经成立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更加密切联系并依靠各阶层人民推动各项工作。第四个通则对政务院所属机构的设置、人员的职称、任免权限、会议制度、职权范围做了具体的规定。会议还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根据政务院的提议，任命了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和华东、中南、西北、西南、绥远五个军政委员会的正副主席。

△ 下午，主持政务院第九次政务会议。会议讨论修订并通过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及其所属各机关组织条例；通过任命事项。

十二月三日 主持政法委员会第二次委务会议。会议讨论了《社会团体登记暂行办法(草案)》、《关于各级地方政府政法部门的组织的意见》和其他事项。

十二月五日 出席政务院指导接收工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会议指派南汉宸为华东区工作团副团长；决定在南京或上海设立一临时办事处，处理以后有关工作；通过华东工作团经费概算等。

十二月八日 向毛泽东、周恩来报告政法委员会成立以来的工作概况，说明已布置各部门拟定最近工作计划及在年内开展的业务工作。

△ 和南汉宸率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指导接收工作委员会华东区工作团首批人员启程前往南京，十日抵达。

十二月十日 向周恩来和陈云主任报送政务院指导接收委员会华东区工作团第一号函报。报告在南京了解的有关档案、图书、物资、人员及其接收的情况。

十二月十一日 率领华东区工作团人员三十余人晋谒中山陵，并献花圈致敬。

△ 应邀在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讲话。指出：

“中央人民政府对前国民党政府机关人员的政策是慎重负责的政策，凡是有一技之长愿意为人民服务的旧公务人员，我们将尽可能加以录用；即使一时无适当工作可以分配的，也已经决定遵照毛主席指示的原则，三人饭，五人吃，负责照顾其生活，不使流离失所，并设法使其获得改造机会。”强调：“中国大陆的全部解放，愈来愈近完成，从全国范围来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将要随着全国解放而逐步成为过去，必须的大规模的经济恢复和生产建设工作，将要逐步发展。我们目前暂时的财政经济困难，是相当严重的，广大军民生活是很困苦的。这种暂时的胜利中的困难，中央人民政府毫无掩饰。”“我们的人民政府根本区别于反动的反人民的政府的基本特点，就是不掩饰任何困难，并且遇到任何困难一定提出来同人民商量，共谋解决。这不仅是对人民负责的一种表示，而且是克服和战胜困难的一种最有效的办法。根据我们的经验，凡是经过与人民很好商量，有政府与人民的共同努力，任何困难都是能够克服的。”

十二月十二日 和南汉宸率华东区工作团二十余人由南京抵上海。

△ 向周恩来呈报对内务部所起草《社团登记暂行办法（草案）》的研究意见和情况。

十二月十五日 向周恩来和陈云寄发政务院指导接收委员会华东区工作团函报第二号。报告到上海后的工作情况；在上海了解的档案、器材、人员的情况；华东区负责同志对中央指导接收工作委员会的意见以及华东区工作团人员到南京后生活情况等。

十二月十六日 毛泽东抵达莫斯科访问苏联。

十二月十七日 向周恩来和陈云寄发政务院指导接收委员会华东区工作团函报第三号。报告工作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的意见。

十二月十九日 在南京市党员干部大会上作《目前统一战线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指出：“统一战线问题乃是中国革命的一个基本问题，特别在今天的形势下，就更明显地成为决定我党成败问题了。”“我们一定要把革命的对象缩得很小，把我们团结的对象尽量扩大。统一战线就是孤立敌人，扩大我们自己力量的政策。”讲话还指出，我国经济落后，今后，我们想把生产力提高一步，就需要尽可能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所以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仍然需要，必须建立。在建立统一战线时，必须知道我们和各个统战对象间，特别是和民族资产阶级还有相当距离，但这并不妨碍统一战线的建立，而且不是在一切问题上距离都很远。在政治主张上虽然严格说是有距离的，但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主张上都是一致的。在思想意识方面，彼此距离虽然很远，有些地方简直是不可接近，但并不能阻碍相互在政治上的接近和建立统一战线。我们不能将思想意识问题放在第一位去考虑。在生活习惯方面不能过高要求；在工作作风方面我们党二十多年来创造了一套优良的工作作风，和其他阶级完全不同的。但是资本主义的一些工作制度，并非是一概要不得的，如工厂的管理制度，只要废除它剥削的一面，我们就可以采用。只有依照一般政治原则来建立统一战线，这样，统一战线的组成才能最广泛。

十二月二十一日 出席中苏友好协会南京分会为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举行的祝寿晚会，并在会上讲话。

十二月二十二日 在华东地区前国民党政府中央各机关人员大会上报告，阐述我党在财政经济存在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对他们也还是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号召他们加强学习与改造，同人民群众一道，为恢复国民经济而努力奋斗。

十二月二十四日 签发政法委员会向周恩来请示成立中央救灾委员会，加强救灾工作的组织领导的报告。说明因救火工作与财经委系统各部门密切联系，非本委或内务部力所能及，为统一组织领导加强救灾工作起见，拟请政务院批准成立中央救灾委员会，由内务、财政、水利、农业、铁道、交通、卫生等部及贸易公司、合作、银行等单位派员组成，以便迅速统筹计划，开展工作。

十二月二十六日 在华东区工作团各项接收工作均已布置就绪并取得相当进展后，先行返京。

△ 在南京期间，身边随行人员发现了原中共驻南京办事处用过的一辆旧汽车，认为很有纪念意义，动议把它带回北京，董必武得知后立即予以阻止。并对身边工作人员约法三章：不许向地方要东西；更不许以他的名义在任何部门搞工作以外的活动；不许接受礼物。

十二月二十七日 向政务院报告政法委员会对司法部呈报政务院关于司法警察之服装、帽徽、领章等问题的意见。

十二月二十八日 向周恩来报告《中央政法公报》编委会组织简则及编辑办法。说明政法委员会第四次委员会议决议：《中央政法公报》由政法委员会统一出版，以彭泽民为主任、陶希晋为副主任，由十一人组成中央政法公报编辑委员会。

十二月二十九日 向周恩来、陈云呈报《政务院指导接收工作委员会华东区工作团报告》，报告说明了关于旧人员的安置和暂时不能安置的六千人的训练计划以及档案、图书、物资的清理、运输等问题的部署情况。

△ 出席政务院指导接收工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会上作华东区工作团工作情况报告。会议讨论了华东区旧人员的训练改造与安置问题：档案、图书、物资器材进一步清理与处理和运输

问题等。

△ 致函南汉宸副团长和叶澜，强调指出“我们此次工作团的工作对象，是华东各地军管会已接收的伪中央机关人员材料。凡军管会未接收之机关，如工作团同志发现或发觉者仍由军管会处理。军管会对其应该接收之机关觉有问题，向本团提出者，本团只提出意见，最后决定应接管与否仍为军管会。”

十二月三十日 出席政务院第十三次政务会议。在会上作关于政务院指导接受工作委员会华东区工作团工作报告，会议讨论批准该报告并作了相应的决议。

十二月 写诗题赠北京私立聋哑学校。诗云：“使聋能听哑能言，造化无端自惹烦。科学神奇天可补，不平社会要推翻。”

一九五零年 六十五岁

一月二日 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希望周恩来于一月九日乘火车来莫斯科，由董必武代理政务院总理。

一月三日 函告南汉宸，告知政务院指导接收工作委员会和政务院批准了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报告；传达周恩来的有关指示，提出对今后工作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及意见等。

一月四日 在中国新法学研究院作《旧司法人员的改造问题》的讲话。指出：中国新法学研究院的任务是改造过去旧的司法工作人员、律师以及在学校教授法律的教员。讲话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着重论述了旧司法人员改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指出：以往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法律都是统治阶级御用工具。一切旧的国家都是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一切政权机关都是为少数人服务的，法律也定是这样。现在我们把少数人的政权推翻了，建立了我们人民自己的政权。我们的国家，同过去旧的国家有本质上的不同，法律也就非从本质上加以改变不可，决不能率由旧章，以为在新法未完全订出以前不妨暂用旧法的观点，完全是错误的。国家本质改变了，法律也改变了，旧司法工作人员、律师和法学教授不改变怎能站得住脚呢？所以他们要继续担任起原来所担负的工作，就必须经过改造。我们认为这些人员是一定可以改造的。世界上的事物本身即在不断地

改造中,人也是一样,不改变的人,是没有的。但是也不能把改造看成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人的改造是有困难的,其中最困难的,也是最重要的,是思想改造。对于思想改造的困难,我们应予以足够的估计,了解这一点,就会懂得改造思想不是性急的事情,它的进度是很缓慢的,不要以为看了马列主义的一些书籍和毛主席的许多著作以后,就自以为懂得了马列主义。思想改造,不等于是读书,而是要把所读的书适当地贯彻到实践中去,要能从实际生活行动中表现出来,才算是真正改造了。因此思想改造,需要经历一个实践过程。实践以什么为标准,就是一切以广大人民利益为标准,也就是一切以广大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这个标准,这个出发点,就是我们所谓的观点,也就是我们参加革命事业的关键。只有从广大人民的利益着想,解决了广大人民利益的问题,个人利益也就在其中了。我们如从广大人民利益出发,看一切问题,就能采取比较正确的态度。我们如能这样改造自己,并用克己的功夫不断地提高自己,在改造思想方面,一定有很大的裨益。

△ 在内务部《关于生产救灾的补充指示》上批示,强调:“高级政府负责人虽不可能走遍灾区,但应在其所属灾情最严重的地区视察和指导。”

一月五日 分别致函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和教育部长马叙伦,说明政务院指导接收工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议,请他们各自派人赴南京协助工作团安排旧人员和处理图书资料。

一月六日 出席政务院第十四次政务会议。会议通过了《省人民政府组织通则》、《市人民政府组织通则》和《县人民政府组织通则》,通则规定在省、市、县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省、市、县人民政府为行使政权的机关。

一月七日 就司法部拟批复同意河北省设立县人民法院分庭事，报告周恩来总理。

一月八日 致函齐燕铭，说明“政法分党组干事会第一次会议同意政务院总党组干事会所提之内务部、司法部、公安部、法制委员会及民族事务委员会等部会之党组小组及组员名单；并通过建立政法委员会机关党组，暂由陶希晋、易家驹、叶澜三同志组成，以陶希晋同志为书记，请政务院总党组干事会审查批准”。

一月九日 出席政务院总党组干事会全体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指定的政务院总党组干事会和各分党组干事会成员名单：政务院总党组干事会十一人，书记周恩来，副书记董必武、陈云，干事罗瑞卿、薄一波、陆定一、胡乔木、刘景范、李克农、李维汉、齐燕铭。政法委员会分党组干事会九人，书记董必武，干事彭真、陶希晋、谢觉哉、罗瑞卿、陈绍禹、李木菴、张曙时、乌兰夫。

一月十一日 致函内务部长谢觉哉，指出《冀察两省代耕暂行办法》以不作为指令颁发为宜。可由内务部抄发冀察两省核议，并将意见报来。如果两省同意，则可暂时试行。并应注意检查催询两省施行经验，以便及时总结，推广华北其他各省。

一月十二日 主持政法委员会第三次委员会议。报告了政法委员会近期工作情况和参加华东区接收工作团的工作情况；听取了关于筹备出版《中央政法公报》、筹组灾区视察小组、人事方面的报告以及关于政法委员会和所属部会考绩暂行办法、请假暂行办法的说明；讨论了政法委员会所属各部会的春季工作计划（草案）和《人民法庭组织通则（草案）》等。

一月十三日 主持政务院第十五次政务会议。会议听取和讨论关于处理老解放区市郊农业土地问题指示的报告，关于全国邮

政会议的报告、关于钢铁会议的简要报告、关于新参加工作人员薪金待遇标准规定的报告，并作了相应的决议。在总结发言时指出：社会主义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共产主义社会才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十月革命后，苏联曾执行平均工资制，对生产妨碍很大，后来改成计件工资。我们不能搞平均主义。

一月十四日 主持各有关政法部门同志参加的座谈会。首先讲话：今后为加强各单位的联系，各单位要经常采取座谈方式，互通情况，会商解决彼此有关联的重大问题。此项座谈，由政法委员会不定期召集，遇有重要业务问题须待共同商洽，或行政工作必须会商解决时，即行召开。各单位可因讨论问题性质不同，由各单位负责人或指派代表出席。座谈同意事项，由各单位分别执行。

△ 致函平原省晁哲甫主席，告知为了解平原省灾情及救灾工作，已由政法委员会及内务部、农业部、卫生部、政务院合作事业管理局等部门合组的平原省视察组，前往视察。

△ 致函苏北专署主任，告知为了解苏北灾情及救灾工作，已由政法委员会及内务部、农业部等合组视察组，前往视察。

一月二十日 周恩来同志到达苏联访问。

△ 下午，主持政务院第十六次政务会议。会议讨论批准河南省土地改革条例和政法委员会所属各部、会一九五〇年春季工作计划报告，修订通过中央直属机关新参加工作人员工资标准的试行规定等。

△ 晚，主持政法委员会第五次委务会议，讲话指出：政法委员会各部会一九五〇年春季工作计划业经政务院政务会议审查批准，各部会即应该按计划进行工作。会议讨论了组织干部参加京郊土改工作问题，和《人民法庭组织通则(草案)》等事项。在讨论《人民法庭组织通则(草案)》时，发言指出：“通则”应尽量简明，列

举也不必太多。最需要以简明东西解决人民最迫切的东西。

一月二十三日 出席归侨联欢会并讲话，指出华侨对祖国的革命事业作了宝贵的贡献，尽力保护华侨是新中国国策之一。华侨当前的任务是把华侨中各民主党派、各侨团、各阶层在共同纲领基础上，紧密地团结起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一月二十六日 致函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请将全国灾情概况及急赈问题材料分送中央政治局诸同志。

一月二十七日 主持政务院第十七次政务会议。会议讨论批准天津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总结报告；原则通过《全国税收实施要则》、《全国各级税务机关暂行组织规程》、《工商业税暂行条例》、《货物暂行条例》和政务院《关于关税和海关工作的决定》。

△ 和南汉宸联名向周恩来、陈云报告华东区工作团工作，报告详细总结了在南京、上海、杭州等地接收档案、图书、物资和处理旧人员的成绩。说明工作团基本结束，留干部六人组成办事处，继续督促整理图书、档案及训练人员等事宜。

一月二十九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署四项规定的通报》，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委接电后，即先将各大行政区所属之省、市的检察机关有重点地次第建立起来。

二月三日 主持政务院第十八次政务会议，会议讨论批准了关于中苏邮政、电信两协定草案的报告、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召开第二次全体委员会会议准备工作的报告，讨论通过了《印信条例》、《政务院关于一九五〇年航务工作的决定》、《政务院关于一九五〇年公路工作的决定》等事项。

△ 向政务院报告，说明对司法部批准河北省土改区成立县人民法院分庭一电的修改意见。

二月五日 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报

告,阐述我国政治、军事和外交等方面的方针和概况。

二月七日 主持政法委员会第六次委务会。会议在听取和讨论了有关救灾、律师制度、人民法庭组织通则(草案)修改情况后决定:(一)关于律师制度问题,旧的律师制度必须废除;但必须在人民司法制度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律师制度,责成司法部继续与有关方面研究商讨;(二)关于民族事务委员会举办藏民研究班问题,研究内容主要依据《共同纲领》,要注意研究藏、汉共同反对英帝国主义之侵略,加强民族间的平等与团结、宗教信仰自由,互相尊重民族风俗习惯;(三)会议修正后,通过《人民法庭组织通则(草案)》,作文字修改后,报政务院核定施行。董必武在发言中说:关于救灾工作,中央已决定组织救灾委员会,要做好工作,避免饿死人。关于律师制度,以现在社会复杂的情况看,律师制度还是要的,再请司法部召集有关人员商讨一下。

△ 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为杨虎城将军西安下葬在北京举行的遥祭会。

二月八日 代表中央人民政府致电慰问遭国民党反动派滥炸的上海市人民。

二月十日 主持政务院第十九次政务会议,讨论批准了关于华东区军政委员会工作任务的报告、关于目前生产救灾的报告、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保守国家机密办法要点草案的报告、政务院指导接收工作委员会华东区工作团的报告等。在总结发言时着重指出:有些地方“对群众困难了解不够,要派主要负责人去组织领导群众生产救灾”。

二月十三日 在致堂侄董良垠的信中说:“我忙的情形,你们是难以想象的。别人在星期六下午、星期日一般不办公,夜晚只有我们党内少数人办公,夜晚办公的,白天往往不办公。我呢,早晨总

是七点多钟起床，晚上总是两点多钟才睡觉，无所谓星期六下午，无所谓星期日，随我工作的秘书和警卫人员都拖得很辛苦。”又说：“我现在应当忙的，不是单想着我们自己家中怎样生活的问题，而是怎样组织全国工农军民人等生产的问题；是怎样解决几十万几百万灾民的生活问题；是怎样恢复上海被敌机轰炸毁坏了的生产机关的问题；是用什么方法去消灭舟山群岛、台湾及海南岛上的敌人问题。把一个个人家中生活问题和我上面所说的问题相比较，你们就知道家中生活问题是渺小不足道到何程度了。”

二月十四日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莫斯科签订。同时，还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

二月十六日 主持政务院第二十次政务会议，通过了《政务院关于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保守国家机密的指示》，修正并批准了《华东军政委员会组织条例》。批准了关于华东军政委员会各单位人选的审查报告等。

△ 为新疆省人民法院请示沿用塔城、伊犁、阿克苏三区所用之法律事致函周恩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与法制委员会的机关首长联席会议讨论并一致同意，将塔、伊、阿三区法律先行送呈中央审核。在未奉批复前，为适应新疆省迫切需要，暂沿用塔、伊、阿三区所用之法律。

△ 致函周恩来：由内务部代政务院拟就《严禁鸦片烟毒及其他毒品令》稿，业经政法委员会研究修改，请核发。

二月二十日 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在全国电业会议上讲话时，阐述了国内外形势，肯定了一年来电业生产的成绩，指出了电业发展的前途，号召从事电业的工人、技术员、工程师和管理人员紧密地团结起来，克服困难，发展电业生产。

二月二十四日 主持政务院第二十一一次政务会议。会议讨论通过政务院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及征收公粮的指示、关于中苏通邮通电两协定签订经过的报告、政务院严禁鸦片烟毒及其他毒品的通令等。

二月二十七日 主持召开中央救灾委员会成立会，被推为中央救灾委员会主任。在《深入开展生产救灾工作》的报告中指出：“我们的救灾方针是：生产自救、节约度荒、群众互助、以工代赈，并辅之以必要的救济。”根据这一方针，阐述了当前应大力发展副业生产，运用灾民的劳力从事建设，各级政府和部队以及灾民实行节约等具体办法。强调，我国的人民是勤劳而勇敢的，我们的干部和人民在一起已经克服了严重的冬荒，加上我们已有战胜灾荒的丰富经验，克服目前严重的春荒，是有充分信心的。我们一定要实现“不要饿死一个人”这一政治任务。

二月二十八日 为报请审核婚姻法条例(草案)致函周恩来：法制委员会商同全国民主妇联及有关机关拟定的婚姻法条例(草案)已根据各方意见反复讨论修改补充，由政法委员会第四次委员会议讨论修正通过。

三月二日 向毛泽东、周恩来报告中央救灾委员会成立概况和该委员会的组成与急需进行的工作。

三月三日 主持政务院第二十二次政务会议。会议讨论通过《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规定统一国家财政收支、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由国家集中使用。为贯彻这一方针，并决定成立以薄一波为主任的全国编制委员会，以陈云为主任的全国仓库物资调配委员会。讨论并批准《中南区军政委员会组织条例》及中南区一九五〇年的工作任务。讨论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三月四日 前往车站欢迎毛泽东、周恩来等访问苏联后返回北京。

三月七日 在全国劳动局长会议上作报告。指出：劳资问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目前我们正是开展工农业大生产的时候，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能发展生产”。自从有劳资关系以后，就有劳资纠纷和矛盾，要想取消这个矛盾，那是不可能的。可是，在一定的时期，一定的地点，即工人在自己的政权下边，在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的前提下，劳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各地劳动部门有很好的经验，提出了不少解决办法，如仲裁的办法，协商的办法，订立集体合同采取民主的办法，还有在公营工厂里搞工厂管理委员会（私营工厂里也有），有什么问题，大家商量着搞。在私营工厂里搞劳资协商委员会，这也是解决劳资问题的一个方式。

三月九日 就周恩来去苏联访问期间，代理政务院总理和政务院总党组干事会书记两个月来工作的情况，向周恩来作书面报告。

三月十日 主持政务院第二十三次政务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报告外交问题；讨论通过《政务院关于春耕生产的指示草案》和《政务院关于统一全国国营贸易实施办法的决定草案》等。

三月十一日 主持中央救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听取了内务部关于目前救灾情况的报告，通过了中央救灾委员会组织简则。决定再派两个视察组赴灾区协助工作，还决定发起城市节约劝募救灾运动。

三月十八日 主持政法委员会第七次委务会议，听取内务部报告最近救灾工作情况、公安部关于北京最近破获间谍的报告、政法委员会及各部会工作情况报告等。

三月二十三日 为公安部请示交通警察发两套夏季服装问题

致函周恩来总理。

四月一日 以中央救灾委员会主任名义，就全国最近灾情及救灾工作发表讲话，阐述了中央人民政府积极从事救灾工作情况，指出我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团结奋斗的伟大力量，任何困难都是能克服的。

四月十一日 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其他协定经过的报告，通过了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协定的决议。会议还听取了其他报告，通过了任免事项。

四月十三日 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的新婚姻制度。会议还听取了陈云关于财政状况和粮食状况的报告。

四月十六日至五月一日 人民解放军解放海南岛。

四月二十五日 出席中国人民救济代表会议。宋庆龄、董必武等三十一人被推举为主席团。宋庆龄致开幕词。

四月二十六日 在中国人民救济代表会议上作《新中国的救济福利事业》的报告。指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是中国人民贫穷和灾难的总根源。”美帝国主义“过去既是制造灾荒的罪魁，现在又想借口我们的灾情来幸灾乐祸趁火打劫地进行恶毒的宣传和活动，并运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从事阴谋破坏的工作”。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阴谋早已熟悉，已经战胜了美国武装的中国人民是会同样地战胜它的每一个政治阴谋的，不管那阴谋是包藏在什么样的外衣里边。报告还指出“我们的救济福利工作是我们政府和人民同心协力医治战争创伤，进行和平建

设一系列巨大工作中的一部分”。我们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救济福利事业，应该是“在人民政府领导之下以人民自救自助为基础而进行的人民大众的救济福利事业”。还说：救济福利事业之所以是为人民大众的，因为过去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重重压迫下的正是人民大众，而其中灾难最深、穷困最甚的又为工农大众，故今后新中国的救济福利事业，必以人民大众为对象。救济福利事业之所以要以人民自救自助为基础，是因为人民大众的救济福利事业，必须依靠人民自己，才能得到解决，绝不可能依靠人民以外的任何救济。救济福利事业之所以要在人民政府领导下，是因为人民政府是依靠人民，为人民服务的。只有它，才能够动员全国人民，组织人民力量，从事救济福利事业。新中国的救济事业，应该吸收个人和团体参加，自然并不拒绝国际友人的真正援助。

四月 为纪念任锐同志逝世一周年作诗：“五十年来变故多，人生甘苦味如何？夫死毒谋儿战歿，身逢胜利染沉疴。”颂扬任锐为革命奉献，受到人民的爱戴，“慈祥恺悌流风远，春日坟前共献花。”

五月一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结合总结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党内首先是领导干部中居功自傲情绪，命令主义作风，以及少数人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违法乱纪等错误，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

五月八日 患“痛风”脚疾，坐久脚下垂就增加肿痛，行走困难，治疗休息。

五月十九日 为制止和处理违反预算制度，滥支与贪污农村救济款事，代中共中央草拟指示电。电稿着重指出：“为了顺利地

完成政府各项工作任务，必须按照财政归口原则，执行预算制度。对于滥支与贪污现象必须制止。对其中情节严重的并应加以严肃处理。”

五月二十二日 致函周恩来总理，对内务部所拟关于褒扬在蒋介石统治时期牺牲烈士之指示提出意见。

五月二十七日 主持政法委员会第九次委务会议，听取陶希晋秘书长关于政法委员会及部、会工作情况的报告和关于召开全国经济保卫工作会议情况，关于全国少数民族情况及目前工作，关于准备召开全国民政会议等报告。

五月三十一日 出席政协全国委员会政法组座谈会，讨论政协全国委员会开会前应该进行准备的提案等问题。

六月二日 出席政务院第三十五次政务会议，在讨论内务部工作计划时发言强调：对民主建政要作广泛深入宣传。民主建政的基本障碍有二：第一是县、区、村干部们对民主建政的信心不足；第二是区、村干部文化低。所以无论在城市或乡村中，只靠报纸和广播去宣传不够，还要干部下去对老百姓进行解释。等到人民明白了，民主建政工作才好进行。区乡民主建政目的在使人民有权，形式不必完全一致。

六月三日 中央防汛总指挥部成立，兼任总指挥部主任，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和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李涛兼任副主任。

六月六日 主持政法委员会第十次委务会议。会议听取司法部部长史良关于赴东北视察司法工作情形的报告，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格平关于筹备组织西南访问团的报告等。董必武在发言中指出：司法部这次赴东北视察发现的问题更切实际。对于东北所采取的制度，各地要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分别采用。监狱工作是目前的一个大问题，涉及教育改造犯人，要努力解决好。

六月六日至九日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在全会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而奋斗》的书面报告，并作了《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会议强调必须稳步前进，调节同各个方面的联系，团结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以及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集中力量向国民党残余势力、封建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进攻，而不要四面出击，树敌太多，造成全国紧张。

六月八日 为送审关于正确执行惩治反革命政策与清理积案指示稿致函政务院秘书长李维汉转周恩来总理：本指示稿经政法委员会在京委员及最高人民法院分别提出修正。关于反革命案犯判决批准执行机关并未作肯定，请考虑决定。

六月十四日至二十三日 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刘少奇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经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土地改革法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道路。”

六月十五日 就中南军政委员会有关建设监狱等问题提出意见，报请周恩来核示。该报告对犯人管理及监狱制度、新区的囚粮问题、监制编制问题及清理积压案犯问题等提出了明确具体的改进意见。

六月二十日 出席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法院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并为该组召集人之一。在讨论发言中指出，法院工作的三个问题是：法院组织法、组织机构与干部问题、法的制定，并对这三个问题提出了意见。

六月二十三日 就甘肃省监所迭次发生匪犯脱逃暴动事件致

函周恩来总理：发生这些事件的“主要原因在于各级监所领导上思想麻痹，防范不严，同时因为设备简陋，易肇事端，我们已告司法部会同公安部通报各地责令注意建立监狱的严密制度和必要的设备。妥筹防卫办法，以资防范。”

△ 就甘肃监所迭次发生匪犯脱逃暴动事件指示司法部：“应由你们会同公安部拟一通报，责令各地注意建立监狱的严密制度和必要的设备，并应与当地公安部门经常紧密联系，妥筹防卫办法，以资防范。”

六月二十五日 朝鲜战争爆发。二十七日，美国派出海军和空军武装干涉朝鲜内政，并命令海军第七舰队向中国领土台湾沿海出动，以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威胁我国安全。二十八日，周恩来代表我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政府侵略朝鲜、台湾及干涉亚洲事务的罪行。

六月二十八日 上午，出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划分阶级成分问题的讨论会。在发言中指出，要正确划分和对待富农阶级问题。主张“我们要根据土地法来讨论，要下决心不动富农。不论你是封建剥削也好，资本主义剥削也好（我不是说一切富农都是资本主义的）。地主与富农必须有确定的界限，标准是土地及生产工具的占有，劳动及剥削方式。若把剥削量作为标准，势必把富农划入地主。”

△ 下午，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等事项。

六月二十九日 出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划分阶级成分问题的讨论会，在讨论发言中着重指出：“对富农与富裕中农的划分，则须根据剥削量，因为剥削方式相同。”

六月三十日 出席政务院第三十九次政务会议,并报告《关于正确执行惩治反革命政策与清理积案的指示(草案)》。报告中特别提出请大家考虑惩治反革命犯和惯匪的死刑的上诉权问题和批准执行问题。

七月三日 向周恩来报告六月二十九日政法分党组干事会第四次会议情况,说明会议主要检查了全国治安会议、全国民政会议及全国司法会议的筹备工作,政法委员会党委整风的计划草案和各部第三期工作计划等。

七月六日 主持政法委员会第六次委员会议,听取关于第五次会议决议执行情况,关于召开全国民政工作会议、全国治安行政工作会议、全国司法工作会议的筹备情况等报告。会议同意上述三个会议的筹备工作报告,并议决政法委员会在这时期应加强对这三个重要会议的及时指导。

七月七日 主持政务院第四十次政务会议。会议讨论和批准了人民监察委员会半年工作初步总结及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和关于中央代表团平原工作视察组的工作报告。并对上述两项议程作了总结发言,着重指出:“监察工作不能只限于事后检查,应有事先检查,事先检查的主要作用是敲警钟,告诉应该注意什么”。“监委要吸收技术人员参加工作。”“除制定惩戒条例外,还要制定考绩条例,要有奖有罚,有表扬有处分。”

七月九日 就内务部甘重斗到陕北视察建政工作发现的问题报告政务院总党组干事会。指出:陕北建政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把政权建设与各中心工作对立的思想严重存在;“县乡政府的重大工作和活动中心,不是经过人民代表会议,而是经过党政干部一揽子会决定和实行”;“县政府委员会很不健全,政府工作上民主合作是空的”。

七月十三日 列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会议讨论修改《农民协会组织通则(草案)》及《人民法庭组织条例(草案)》。

△ 为政法委员会精简办事机构、由赵登禹路(旧顺承王府)搬到政务院附近办公问题,以书面通知分别征求政法分党组干事会诸同志的意见。

七月十四日 出席政务院第四十一次政务会议,会议听取李维汉关于《农民协会组织通则》和《人民法庭组织通则》主要内容的说明后,通过两个组织通则;听取劳动部部长李立三说明召开全国战斗英雄大会与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大会的决定,决议成立小组审查修改此决定。

七月十五日至八月五日 内务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民政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作了《目前民主建政的主要形式》的重要讲话,指出:“全国民政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民主建政问题”。“建政工作乃是目前一切民政工作的中心环节,只要把建政工作做好了,其他工作就容易推动。过去我们没有这样做,曾吃了不少亏。”强调: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我国现时实现人民民主专政一种最合时宜的组织形式。不要急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但只要条件成熟,就应立即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好了,也就走上开好代表大会的路。操之过急反而不好。目前建政工作重点在县,应首先把县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好,以示范区村,并带动区村;大城市的特点是集中,应普遍开好区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以联系全市人民。特别告诫干部必须懂得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说:“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乃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而统一战线是我们党的基本政策之一。”“不仅应该倾听代表的意见,而且要善于照顾少数,一定要学会善于同别人商量问题的作风,懂得除反

革命分子外，人人都有说话的自由”。“人民不仅是有权过问国家的事；而且是有权做国家的事。”

七月十八日 为政法委员会搬到政务院附近办公问题致函周恩来总理，说明政法委员会分党组干事会一致同意政法委员会搬到政务院附近办公。

七月二十日、二十三日 两次召集出席全国民政会议的各大行政区民政部正副部长汇报座谈工作，听取他们的意见，研究民政工作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办法。

七月二十四日 主持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届第二次全体会后召开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问题的小组讨论会。

七月二十五日 主持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问题讨论会第一组会议。在会议开始时发言指出：现在正在训练干部，准备土改。所以关于怎样划分阶级的文件很重要。这个文件在政协第二次全体会后作了些补充修改，政协常委会决定，召集政协委员、政府委员、政务院参事及对土改有经验的人再作一次讨论。希望大家提出审查意见。

七月二十六日 上午，主持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问题第二次讨论会第一组会议，讨论富农问题。

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十一日 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了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刑法大纲、诉讼程序通则、犯人改造暂行条例、公司法等草案；听取了司法部部长史良、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李六如、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吴溉之等人的报告。在二十六日下午的开幕会上，董必武作了《要重视司法工作》的重要讲话，指出：社会一经脱离了战争的影响，司法工作和公安工作，就成为人民国家手中对付反革命、维持社会秩序最重要的工具。忽视司法工作在国家工作中的重要性，显然是很不应该的。废

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这是我们司法工作的重要方针。当前建立人民司法工作必须:(一)要建立一系列的司法机构,如各级法院、检察署,才便于进行工作;(二)要准备培养各级司法工作干部;(三)要有法律。目前我们已经有了类似宪法的共同纲领和政府组织法等。制定完备的法律,需要长期的工作,先有一个基础,逐渐发展,逐渐充实,就会趋于完备。强调在司法工作初建之际,思想建设特别重要,必须把它视为司法工作建设的前提。

七月二十七日 上午,主持召集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法制委员会四机关首长座谈会。会议讨论了政法部门的相互联系通力合作问题。建议恢复过去四机关联席会议,其目的是互通声气,便利工作。

下午,列席政协全国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会议讨论《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草案)》。

七月二十九日 代表政务院出席文史研究馆成立大会。在讲话中指出:到馆的先生都在六十岁以上,有的超过九十,平均七十多岁,都是耆年硕学的,有的是全国知名,有的是一方之望,就这一点说,比“香山九老”“洛社耆英”毫无逊色,而由人民政府根据敬老崇文精神组织起来,则是根本不同的。文史馆工作的基本指导原则应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研究题目,根据各人情况自愿选定。

八月四日 政务院举行第四十四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为在土地改革中正确划分阶级成分提供了明确的政策依据。

八月六日 和傅作义、李涛联名发布关于防汛工作的指示,动

员各地紧急防汛,检查补修堤防,反对麻痹大意;对已发生水灾地区应努力抢救,为彻底战胜洪水而奋斗!

八月十日 出席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为欢迎西北各民族参观团举行的集会。

八月十一日 向周恩来报告政法分党组干事会第五次会议情况,说明会议主要听取罗瑞卿关于全国治安行政工作会议进行情况及其准备向大会所作总结报告的内容。

八月十二日 对参加全国司法会议的党员干部讲话:(一)“人民司法的基本精神,是要把马、恩、列、斯的观点和毛泽东思想贯彻到人民司法中去”;“人民司法基本观点之一是群众观点,与群众联系,为人民服务,保障社会秩序,维护人民的正当权益”。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其他问题解决了也不能称作人民司法工作,这次会议有收获,就是指会议解决了这个最基本问题,取得了一致认识。“我们的人民司法工作,是一项伟大艰巨的工作”。(二)监狱是惩罚机关又是教育机关,惩罚与教育相结合。在监狱中对犯人应该进行教育,但不光是教育而无惩罚,如果没有惩罚,与学校有什么两样?要又教又罚,给以教育,而又强迫劳动。监狱就是要剥夺犯人的自由或某种程度的自由。(三)有些领导机关有非党人士作领导工作。要经会议讨论的问题,除在党内事先很好地考虑研究外,还必须提到正式会议与民主人士商量研究,尊重他们的意见;民主人士负责领导的单位,党员同志一定要尊重和服从他们的领导。有的问题意见一致可以解决;有的问题意见不一致,应当继续研究考虑,将来解决。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革命工作向来是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由简到繁,一步步搞起的。我们党员同志提出问题,一定要考虑到实际需要与客观的可能条件,不要把客观上一时不容易实现的问题或超越我们现实能力的问题,提给民

主人士,使他们为难。

八月十六日 就政法系统民政、治安、司法三个会议的情况书面报告周恩来:政法系统三个会议均已结束,都开得很好。会议过程中,我们均着重引导以解决中心问题的认识问题和任务为前提:民政会议着重解决民主建政的认识与统战思想的贯彻;治安会议着重解决划清界限、分清敌我、加强对敌斗争问题;司法会议着重解决对人民司法的认识和对反革命“宽大无边”、对犯人“以教育为主”的不正确观念。周恩来在董必武报告中有关“民政部工作范围”一节中批示:“民政工作应以开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及逐渐做到经过协商推选各级人民政府为中心。城市民政工作亦应以民政部门为主管部门。”十七日,周恩来将董必武的报告连同他的批示意见送中共中央书记处各同志阅。九月十三日,周恩来又将这个报告报送毛泽东主席。

△ 《人民日报》发表经董必武多次修改,并经周恩来定稿的《目前人民政权建设的主要任务》的社论。

八月十八日 出席政务院第四十六次政务会议。在讨论内务部长谢觉哉关于全国民政会议综合报告时发言,强调指出:“应把民主建政即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定为制度,召开并开好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为省民政部门在目前的中心工作。”

八月二十一日 致函周恩来,报告最近皖北灾情的变化、救灾工作存在的问题等。

八月二十二日 列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在讨论《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草案)》时发言:“按阶级征税,过去并不成功。在土改完成后,税收就不累进,现在为的发展生产,累进税抽象的讲是合理一些。但怕冒尖的情况直到现在农村中尚未完全消灭,因此我们现在要注意到这个问题。”

八月二十三日 主持新法学研究院教学领导问题座谈会。会议肯定了过去的成绩，对今后的新法学研究院的领导、教学方针、机构、人员、学员的安置等问题进行讨论。

八月二十四日 主持政法委员会第七次委员会议。会议讨论通过全国民政、司法、公安会议的综合报告。在总结发言中指出：这三个会议的召开，在政法部门均属首次，获有相当成绩，主要收获是取得了对中心业务及政策观点上的一致，初步拟定了一些工作上必要的条例、通则草案。

八月二十五日 出席政务院第四十七次政务会议。在讨论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情况的报告时发言说：“希望帮助解决几个问题：（一）请各级人民政府加强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二）调配一定的老干部和训练些新干部；还有经费、编制、房屋等问题也希望帮助解决。”

八月二十六日 《人民日报》发表《系统地建立人民司法制度》的社论。社论指出，必须建立便利人民，联系人民，便于吸收广大群众参加活动的人民司法组织和制度。为了联系和教育群众，各级人民法院应实行公开审判制，陪审制等制度。社论要求各级政府要健全司法机关，调配一定数量与质量的老干部作骨干，大力培养新干部，改造好旧司法人员。

八月二十八日 列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听取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关于外交情况的报告；继续讨论《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草案）》。

九月一日 出席政务院第四十八次政务会议。会议讨论关于第一届全国治安行政会议的报告和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彭泽民关于中央慰问团的工作报告。

△ 向周恩来报告八月二十六日政法分党组干事会第六次会

议的情况。说明：会议主要讨论政法系统各部门的整风问题和《中央关于调整若干工作关系问题的指示》。分党组干事会的意见是：“调整工作关系的关键，是改进党政关系的问题。党应集中注意全面工作的照顾，注意原则的领导，注意中心工作的推动和组织力量的配合，应避免具体工作上代替。党在政权工作中的党组制度和原则应有规定。”

九月三日 为河南请拨麦种事，以中央救灾委员会主任名义致函财经委员会和农业部。说明河南原请拨麦种一亿斤，经各方详细核实，实需五千万斤，特将情况转告，请考虑处理。

九月五日 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外交问题报告；讨论通过《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及增设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华北事务部的决议等事项。

九月六日 主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政协全国委员会联合组织召开的政法草案审查会议首次大会，并作报告，阐述了组织政法草案审查会议的目的、任务、参加的单位与人员、分组办法与工作方式等。

九月十二日 向周恩来报告关于政法委员会机构精减与人员配备问题。说明政法委员会迁至政务院内办公后，将原有机构大加裁减，人员压缩，以及精减人员的工作分配等问题。

九月十三日 毛泽东为督促政府各部门向中央报告事致函周恩来：“政法系统各部门，除李维汉管的民族事务委员会与中央有接触外，其余各部门，一年之久，干了些什么事，推行的是些什么政策，谁也不知道，是何原因，请查询。”

九月十五日 向中国人民大学师生作《关于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的长篇讲演。讲演分三部分：（一）共同纲领的历史背景与社会背景；（二）共同纲领的实质；（三）共同纲领的几个要点。讲演阐述

了中国人民近百年革命斗争的历史进程和历史经验，指出：“人民政协的共同纲领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革命斗争的总结，是我们目前革命奋斗的总目标，它的每一条条文，都是与全国人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有关联的。共同纲领是我们现阶段统一战线的纲领，它既照顾到四个朋友，又划清了敌友界限。”共同纲领是中国人民革命现阶段要实现的纲领，也就是新民主主义纲领，它既不同于旧民主主义，也不同于社会主义，这个纲领既对资本主义发展有其限制，对于无产阶级也有一定的限制，这些限制都是为了要保证新民主主义的实现和完成。共同纲领是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纲领，它与共产党的最低纲领相符合。报告还指出，“革命最基本的问题就是要使生产力能够发展，一个历史唯物论者必须要从事物的发生发展与其死亡中间去观察它的规律，因此我们看问题不能形而上学地断定某一现象是绝对好或绝对坏。”还特别阐明了共同纲领规定“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问题：“我们知道资产阶级最怕说民主集中，但实际上世界上政治制度没有只有集中没有民主，也没有只有民主没有集中的。因为国家原本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产物。但要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这是资产阶级所无法做到的。”

九月十六日 向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报告关于大城市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及区人民政府组织通则的审查修正情况。

九月十七日 向毛泽东报告全国民政、治安、司法三个会议的情况。

九月十八日 向周恩来报告皖北、苏北、河北、河南四省区的灾情。并报告：中央救灾委员会决定要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与红十字会筹备成立四省区寒衣劝募总会，推定董必武为主任，张治中、

杨立三等为副主任,并在各大行政区及华北各省市成立分会,募集灾民迫切需要的大量寒衣。

△ 向周恩来报告政法分党组干事会第七次会议检讨过去执行报告制度和讨论政法各部门的整风工作的情况;讨论大城市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及区人民政府组织通则和农村区、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及区人民政府组织通则以及京、津、沪三市律师试行办法的情况。

九月二十二日 在欢迎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及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代表时讲话,指出: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们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都有显著的功劳。召开这两个会议来交流和总结经验,进一步巩固国防,恢复经济事业,推动新中国的伟大建设工作。

九月二十三日 主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协全国委员会联合组织召开的政法草案审查会议第二次会议。讨论审查大城市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及区人民政府组织通则。

△ 和傅作义、李涛联名发布指示,催促各地加紧进行堵口排水种麦工作。

九月二十五日 向毛泽东主席、朱德、刘少奇副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呈送区(农村的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及区人民政府组织通则(修正草案)、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及乡人民政府组织通则(修正草案),请指示。

九月二十七日 出席政务院、政协全国委员会联合召开的政法草案审查会议第三次会议,讨论审查《区(农村的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及区人民政府组织通则》、《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及乡人民政府组织通则》。

九月三十日 下午三时,出席中国人民政协会议举行的干部

会，听取周恩来所作《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的报告。此前，周恩来曾将报告稿送董必武提意见，特别请董看看“政法部分有否错误”。董阅后，建议在政法工作部分加写“制订了人民法律”，或加写“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婚姻法和一批建立革命秩序的法令。”周恩来采纳了董必武的意见。

△ 夜，同朱德、刘少奇、宋庆龄、张澜、林伯渠、周恩来、陈云、郭沫若、黄炎培等出席毛泽东主席举行的国庆宴会。

十月一日 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李济深、张澜、林伯渠等参加首都四十万人庆祝国庆大会。

△ 在《人民日报》发表《一年来中央人民政府在政治法律方面的几项重要工作》的文章，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文章总结了在同灾荒作斗争，建立人民代表会议制度，镇压反革命活动，建立革命秩序，加强民族团结等方面工作取得的成就。阐述了政务院政法委员会指导下的各部会今后的工作方针。

十月二日 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闭幕式，讲话勉励代表们在保卫和建设伟大祖国的事业中获得更大成就。

△ 和朱德、李济深、张澜、林伯渠、黄炎培、聂荣臻、罗荣桓等出席解放军战绩与劳动模范成绩展览会揭幕式。

十月三日 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林伯渠、周恩来、陈云、郭沫若、黄炎培等出席来京参加国庆的各民族代表向毛泽东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献礼大会。

十月七日 和朱德、陈云、郭沫若、黄炎培等出席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同尼·维·罗申大使代表中苏两国在北京互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其他五个协议书的仪式。

△ 应邀出席民主德国大使柯尼希举行的国庆一周年招

待会。

十月八日 毛泽东发出《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十九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到达朝鲜前线，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

十月十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要求坚决纠正镇压反革命中的“宽大无边”的偏向，全面贯彻党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在各地镇压反革命的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了大规模的剿匪作战。

△ 和政务院、全国政协联合召开的政法草案审查会议负责人许德珩联名致函周恩来，说明《大市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草案)》及《大市区人民政府组织通则(草案)》，已经政务院、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政法审查会议讨论通过，请周恩来和政务院审核。

十月十三日 和许德珩联名致函周恩来，说明有关优抚工作的五个条例已经政法草案审查会议通过，文字上已经内务部最后修正，请周恩来和政务院审批。

十月二十日 出席政务院、政协全国委员会联合召开的政法草案审查会议第四次会议，讨论农村区、乡人民代表会议和区、乡人民政府四个组织通则。

十月二十四日 列席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讨论当前时局问题。

十月二十五日 和许德珩联名致函周恩来，说明农村区、乡人民代表会议和区、乡人民政府组织通则已经政法草案审查会议修正通过。请审核。

△ 向周恩来并中共中央报告农村区、乡人民代表会议和区、

乡人民政府组织通则的起草修订经过,着重说明“重要修改的地方是:认为原草案中乡人民代表大会组织通则规定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提出普选,目前均属过早,故改为仍以召开乡人民代表会议为主,而以简单易行为群众所乐用的选举方式产生代表”。请周审阅,以便政务院审核批准时作最后核定。

十一月四日 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联合发表宣言,“誓以全力拥护全国人民正义要求,拥护全国人民在志愿基础上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

十一月六日 因身体不好经请示中共中央批准休养。为此,致函周恩来并中共中央;在休养期间,政法委员会及政法分党组干事会的工作,均拟由彭真副主任代行。

十一月二十四日 为朱璉《新针灸学》作序。指出:“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我国的针灸术,剥掉它神秘的外衣,研究和解释它的合理的内容,加以发扬光大,在医学和医务上不是无益的事,特别是在我国医药两缺的今日,把工农劳动人民所习知的针灸术科学化发扬光大,尤为必要。”

十二月二十八日 政务院发布《关于管制美国在华财产冻结在华存款的命令》。命令说:鉴于美国政府已宣告管制我国在美国的公私财产,加剧对我国的敌视破坏活动,决定管制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在华的一切财产,冻结一切美国在华公私存款。

是年 为武昌中华大学恽代英陈列馆题词:“恽代英同志是我们党最善于联系青年和劳动群众的领导者之一,他经常正确地反映青年和劳动群众的意见,引导他们前进。同时不断地向他们学习了许多东西。”

一九五一年 六十六岁

一月至四月 经中共中央批准,继续休息。

一月六日 以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的名义,和宋庆龄联名致函内务部社会司,指出: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的性质复杂,应先进行调查,暂不准该总会及其分支会登记。

一月十二日 为转报《全国劝募灾民寒衣工作报告》致信刘少奇,说明“劝募寒衣工作,蒙中央通电地方各级党委帮助,得他们的努力,已基本上完成任务。”

一月二十三日 致函周恩来,报告一月十五日政法委员会分党组干事会第十次会议情况;说明同意党中央调整政法委员会分党组干事会的指示,增加彭真、罗瑞卿为干事会副书记,增加吴溉之、李六如、刘景范、伍云甫为干事会干事;同意各地法院检察机关当前应由中央与地方政府双重领导,以逐渐走向中央统一领导的原则等。

二月九日 以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副主席名义致函祝贺中国福利会第四届年会、上海中国福利会第四届年会。

二月十三日 复信给堂弟董贤煦:“农村在土改后需要建设的工作很多,乡村人民代表会议要开好,要组织乡村人民政府。政府要领导和组织农业和副业的生产,要蓄水积肥,要耘草除虫,要植树蓄林,要组织好合作社,要组织民兵自卫,要防止坏人造谣生

事，要领导人民交公粮，要组织乡村小学，要组织干部学习文化，要帮助成人教育和识字运动；农村妇女运动，乡村政府也要帮助；至于农村卫生问题，需要政府努力的地方更多。”希望家人理解：“革命的目的是求得人民的解放，特别是工人农民劳动大众的解放。假使我上面写的许多事情在农村办得不好，革命的果实农村就不完全享受得到。”劝董贤熙不要到北京，勉励他和家人努力生产，帮助政府完成各项工作。

二月二十一日 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

二月二十六日 北京市召开第三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刘少奇在会上讲话指出：要使各级人民代表会议成为各级政府一切工作和一切活动的中心环节。

三月一日 就关于筹备中央政法干校问题，致函周恩来。

三月十二日 政法委员会举行第九次委员会议。内务部部长谢觉哉报告《全国各级各界代表会议建设情况》。

四月二十四日 政务院发布《关于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必须按照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的规定，按期召开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各级人民政府的一切重大工作应向人民代表会议提出报告，并在会议上进行讨论和审查，一切重大问题应经人民代表会议讨论并作出决定。

五月一日 出席首都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举行的群众大会。

五月十一日 召集各大行政区秘书长座谈会，就省以上设立政法委员会，重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定期召开并形成制度，训练政法干部等问题交换意见。座谈中，对上述问题详细地谈了个人意见，着重指出，没有民主基础，不能巩固工业化基础，人代会是我国的基本制度，非要不可。

五月十八日 出席政务院第八十五次政务会议。在讨论《教育部一九五〇年全国教育工作总结和一九五一年教育工作方针和任务》时发言：解放后，政法方面人少了，学生也少了。由于过去学政法的多走上反动道路，所学的六法全书，资产阶级议会政治到现在无用了，这种不景气的情况是可以理解的。但长此下去，就不好了。各地需政法干部很多，因之教育部在文件上对政法教育工作要说几句话才行，不然趋势扭不过来。教育部要帮助政法部门训练政法干部，相互经常取得联系。关于政法教育的课程设置，提出要设立阶级论、国家论、国家法、司法政策和行政管理四门课，特别强调指出：行政管理学很重要，在资本主义国家这就是一门专门学问，我们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复杂，更应有这门功课。还提出筹备政法干校等措施，以加快政法干部的培养。

五月二十日 向政法六机关视察组发表讲话。指出：创法是先有问题，然后去解决它，取得了经验然后加以综合，才有了法。有人说过去的法是超阶级的，这是不对的，法本是阶级斗争的产物。

五月二十一日 主持政法委员会第十一次委务会议，在讨论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建立政法委员会问题时，认为该委员会的任务是负责指导与联系民政、公安、司法、检署、法院、监委等机关的工作并协调相互间的关系。

五月二十三日 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在北京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签字仪式，宣告西藏和平解放。至此，除台湾以及一些沿海岛屿外，实现了全国大陆各地各民族的大统一和大团结。

五月二十四日 下午，先后参加班禅额尔德尼和达赖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献赠哈达和礼品仪式。

△晚 和朱德、刘少奇、李济深、陈云、郭沫若、黄炎培、李维汉以及班禅额尔德尼、阿沛·阿旺晋美等出席毛泽东主席为庆祝达成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举行的宴会。

五月三十日 出席全国政协为欢送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和阿沛·阿旺晋美等举行的宴会。

△ 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发布《关于省(市、行署)以上人民政府建立政法委员会的指示》，规定省以上人民政府内设政法委员会，负责指导和联系民政、公安、司法、检署、法院、监委等机关的工作，委员会对各该级人民政府委员会负责，组织机构应以精简为原则，组织条例和组成人员人选需呈报政务院或中央人民政府核准。

六月一日 致函周恩来并政务院总党组干事会，报告政法委员会分党组干事会关于训练政法干部问题、关于加强政权建设和政法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工作的分工等事项的决定。

六月二日 和政法分党组干事会副书记彭真、罗瑞卿联署向毛泽东及书记处诸同志呈送《最高人民检察署试行组织条例》，报请审核，并说明该条例的修订情况。

△ 到车站欢送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和阿沛·阿旺晋美等人。

六月初 为呈送政法委员会分党组干事会向政务院总党组干事会的请示，致函刘少奇并转毛泽东及中央书记处诸同志，谈了对中央政法干部学校校务委员会委员名单以及召开华北县长会议研究如何加强县级建政工作的意见。

六月八日 主持政务院第八十八次政务会议，并作关于防汛工作的报告，说明去今两年成立防汛指挥部后的工作情况。在讨论关于第一次全国监察工作会议经过的报告时，作了总结发言，着

重指出：“处分不是件容易的事，处分不适当，不但不能起教育作用，甚至还有坏影响，处分中有教育，要由专门机构去研究掌握好。”

六月九日 为送审《关于没收反革命罪犯财产的规定》致函刘少奇。说明了该规定的起草经过与内容要点。

六月十五日 应中共中央宣传部要求，就胡乔木撰写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提出修改意见，并根据回忆，写了出席党的“一大”代表名单。

六月十八日 主持政法委员会第十二次委务会议，在会上报告了关于准备召开华北区首届县长会议问题。会议还讨论了关于组织政法机关临时学习委员会和筹设中央政法干校的方案；修订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没收反革命罪犯财产的规定（草案）》。

六月二十二日 出席政务院第九十次政务会议，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没收反革命财产的规定（草案）》作了说明。

六月二十五日 出席政协全国委员会政法组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暂行组织条例（草案）》座谈会。

六月二十九日 出席政务院第九十一次政务会议。在讨论水利部部长傅作义视察淮河的报告时，发言指出：“治淮的方针应是：上下游统筹兼顾，根治淮河，上游以蓄为主，中游蓄泄并施，下游以泄为主”。

六月三十日 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的领导人出席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大会。刘少奇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

七月四日 在华北首次县长会议筹备委员会视察组举行的座谈会上讲话，指出目前政权建设应以县为重点，必须开好县各界人

民代表会议，使代表会议真正成为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基本制度。此外对人民代表的选举问题、领导思想问题以及此次视察的任务与方法问题等均作了详细指示。

七月六日 出席政务院第九十二次政务会议，并在讨论审查关于《惩戒违法失职公务人员暂行条例》等草案时发言，指出：“撤职并非永不任用，只是停用多少时间，减薪也是如此，也要规定减薪多少时间。”

七月十一日 函请周恩来审批关于筹设中央政法干校方案，说明该方案已经政法委员会第十二次委务会议通过。

七月十六日 就最高人民检察院署为了准备审判日籍战犯及伪满汉奸的工作，最近派人到东北了解这批案犯的情况以及需要进行的准备工作等，函报周恩来。

七月十八日 主持政法分党组干事会第十二次会议，讨论了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年内召开民委扩大会及其筹备工作的报告；《关于各级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的分工及其相互联系暂行规定》草案；《关于刑罚原则统一适用的指示》草案和《全国犯人劳动改造条例》等。

△ 前往八宝山人民公墓参加任弼时的安葬仪式。

七月二十日 主持政务院第九十四次政务会议，并作关于筹设中央政法干部学校方案的说明：“国际、财经、文教等方面建设工作虽皆在开始，但在干部上皆已作了些准备，而政法方面的干部，比较最缺乏”。“过去对政法干部的培养问题注意不够，政法建设就很困难了。为了培养干部，展开政法建设工作，拟筹办中央政法干部学校。”现在，全国急需政法干部二万人，要求这些干部“初步懂得国家法令政策，并懂得如何去组织执行”。这些干部只靠中央集训是不成的，“故规定中央政法干部学校，一方面训练在职干部，

同时培养一部分政法教育工作的师资，并取得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经验，以便推动与协助各地政法干部训练工作的开展”。

七月二十七日 出席政务院第九十五次政务会议，在讨论一九五一年上半年农业生产工作报告时发言指出：我国蚕业原本甚有基础，但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受了打击，今天只要我们稍加改良，蚕业就会振兴，见效即大。

七月 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法制委员会负责同志谈准备召开第二次全国司法会议的问题。指示会议应集中力量解决司法工作中当前思想工作方面的几个问题，那就是：（一）讨论新颁布的人民法院组织条例及最高检察署组织条例和各级地方检察署组织通则，把这三个文件的基本精神贯彻到司法界。（二）检查第一次全国司法会议后肃清六法全书观点的情况。（三）讨论训练司法干部问题。（四）全国各地各级司法机关目前在工作上必须紧密联系、互相通气，通力合作。强调，开好会议必须作好会前的准备工作，不要仓促应战。四个机关要用共同力量作好筹备工作。

八月一日 向周恩来函报处理日籍战犯与伪满汉奸的准备工作的情况，请示关于法律准备、调配干部、建立统一领导等项工作的组织问题。

△ 函复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李六如、蓝公武，要求抽调干部和建立统一组织领导，以处理日籍战犯问题。

八月二日 致函人事部部长安子文：最高人民检察院准备处理日籍战犯，拟请人事部暂从中央各机关（除政法部门外）借调干部帮助工作。

八月三日 出席政务院第九十六次政务会议，在讨论关于镇压反革命工作报告时指出，这次运动的发展过程是正确的健康的，

其主要因素是设了两道防线：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杀可不杀的，不杀。尤其是“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劳动改造，以观后效”的政策，使判处死刑的许多人获得了出路，使镇压与宽大进一步地密切结合起来。

八月九日 函报周总理关于出席国际民主法律协会柏林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组成人员和工作人员名单。

八月十日 出席政务院第九十七次政务会议。在讨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时发言，对增加小学教师、小学经费、小学教师的待遇等问题提出了改进意见，建议责成大行政区、省政府在地方经费中确定若干教育费，小学经费问题即可得到保障。

八月十五日 晚，应邀出席朝鲜驻华大使李周渊为庆祝朝鲜解放六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八月十六日 致函周恩来，报告关于民政、治安、司法三个会议筹备情况。

八月十七日 主持政务院第九十八次政务会议。在讨论华北农业生产和抗灾情况时指出：农业生产和抗灾工作等“一切中心问题都应拿到人代会去讨论。现在有些人民代表对人民的提案不理，使得人民感到不是自己在当家，这种现象是值得重视的”。

△ 函请周恩来审核《关于清理积案的指示(草案)》。说明该指示由司法部起草，经董必武和彭真修改后，又广泛征求过意见，最后由董必武修订定稿。

八月二十三日 应邀出席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鲁登科为庆祝罗马尼亚解放七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八月二十四日 为请天津市政治学校代中国人民救济总会训练干部事致函黄敬市长。

八月二十八日 主持召开政法委员会第十三次委员会议。会议听取关于视察华东区镇反运动情况的报告；关于目前各地灾情的报告以及关于筹备华北区首届县长会议情况的报告等。

八月二十九日 为准备召开第二次全国司法会议，再次召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法制委员会四机关党员负责人谈话，着重指出第二次全国司法会议的目的“是集中力量解决司法工作中当前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方面的几个问题”。

八月三十日 列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草案)》、《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院暂行组织条例(草案)》。

九月三日 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听取了周恩来作的外交报告、陈云作的财政报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条例》等。

九月七日 出席政务院第一百〇一次政务会议，并在讨论全国各地灾情时，报告了灾情和救灾工作情况，建议组织东北灾区慰问团，由傅作义率领。

九月九日 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决议指出：土改后农民中存在发展个体经济和实行互助合作的两种积极性，党一方面不能忽视和粗暴地挫伤农民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要在农民中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原则，发展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要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与可能的条件而稳步前进的方针，在农村发展互助合作运动，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

九月十日 就准备召开第二届全国司法会议的主要问题，报周恩来并中共中央审查。

九月十一日 在政法部门干部大会上作形势报告，在阐述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概况和三大运动与政法工作关系后，着重指出：目前政法工作应以加强民主建政和训练政法干部为工作重点。加强民主建政工作，县级又是重点所在。提出：“共同纲领规定政权机构是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人民政府是在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时选举出来的办事机关。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要做的事情，它就要做，如果不做就是违法；同时，人民代表大会决定不做的事情，它就不能做，如果做了也是违法。只有这样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才是我们国家的根本制度。”我们要把这种制度逐渐建立起来，首先在县建立起来。当然开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使其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并不是建政工作的完结，而仅是它的第一步，政府的机构还要建立起来。报告最后嘱咐政法部门干部，不要一天到晚没头没脑地去干事务工作，要挤出时间想问题，摸清工作方向，要正确看待成绩和荣誉，不应该因为某些人不重视政法工作，我们自己也不重视它，要将理论学习提高到应有高度，加强学习；并要求政法各部门要贯彻通力合作精神，做好工作。

九月十八日 和刘少奇、李济深、周恩来、黄炎培等出席宋庆龄获斯大林和平奖金的授奖典礼。

九月十九日 出席政务院华北事务部召开的华北第一次县长会议开幕式。

九月二十日 《人民日报》发表《加强政权工作是国家建设的中心》的社论，祝贺华北第一次县长会议开幕。

九月二十三日 在华北第一次县长会议作题为《论加强人民代表会议的工作》的讲话。指出：“革命者所以重视政权，因为他们只有夺取政权，才能开始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摧毁旧政权机关，

依照革命人民意志建立起新政权机关并加以巩固，这些都是建设新社会的先决条件。”强调解放后要注意把人民获得的民主自由用适当形式巩固起来，“全国各地人民解放后获得了空前的民主自由，但人民享受的民主自由的实质，必须有一个民主的组织形式把它固定下来，否则民主生活是不巩固的。”依照共同纲领的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或代行它的职权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及其选出的各级人民政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指出：目前我们国家加强政权建设工作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代表会议。“人民代表会议如果开得好，就能广泛地动员人民起来管理国家和他们自己的事务，就能使广大人民积极地和我们一道去完成当前的诸般工作任务，同时也使广大人民能监督我们的工作，批评我们工作的缺点，以便及时加以纠正。”关于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认为：“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人民革命就不可能胜利，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就不可能建立；建立了，也不能维持和巩固下来。”“党经过在政权机关中的党员的工作，使政权机关接受党的政策，来实现领导。”“党领导着国家政权但这决不是说党直接管理国家事务，决不是说可以把党和国家政权看做一个东西。”“党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不应把党的机关的职能和国家机关的职能混同起来。党不能因为领导政权机关就包办代替政权机关的工作，也不能因为领导政权机关而取消党本身组织的职能。”主张，“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正确关系应当是：（一）对政权机关工作的性质和方向应给予确定的指示；（二）通过政权机关及其工作部门实施党的政策，并对它们的活动实施监督；（三）挑选和提拔忠诚而有能力的干部（党与非党的）到政权机关中去工作。”

九月二十七日 为建立律师制度，向毛泽东、周恩来建议，在

京、津、沪三个司法工作较好的城市，试行律师及群众团体辅助人的制度。

九月二十八日 在共产党情报局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上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年》一文，指出“在过去两年中，中国人民无论是在抵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在消灭国内反革命残余势力的斗争中，在恢复和建设人民的经济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斗争中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和成绩。”“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年来的伟大胜利和成就，雄辩地证明了，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团结起来了的中国人民，能够战胜一切国外国内的敌人，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建设通向社会主义的强大的繁荣的人民民主国家。”“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中国人民的前进。”这篇文章又发表在十月一日的《人民日报》上。

九月三十日 和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林伯渠、周恩来、陈云、郭沫若、黄炎培、陈叔通、沈钧儒、罗荣桓等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为欢庆国庆举行的宴会。

十月一日 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林伯渠、周恩来等出席首都各界人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周年大会。

十月五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〇五次政务会议，在讨论轻工业部一九五一年一月至八月工作报告时发言指出，轻工业部的工作方针应是“一般恢复，重点发展”。

十月七日 出席周恩来总理为招待应邀参加我国国庆节庆祝典礼的外宾举行的茶会。

△ 晚七时，应邀出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华外交使团团团长为庆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两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十月十二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〇六次政务会议，讨论批准

中央防汛总指挥部关于一九五一年防汛工作报告，东北灾区慰问团慰问工作的报告。

十月十三日 主持政法委员会第十二次委务会议，将起草的拟向周恩来总理报送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各地政权建设及民政工作的一些问题》草稿提交会议讨论。会议还就关于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选举的指示、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及常务委员会经费的暂行规定等进行了研究。

十月十五日 向周恩来报送《关于进一步加强各地政权建设及民政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报告》。报告总结了建政工作的成绩和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指出：两年来，全国各地已普遍地召开过了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联系群众和推进政府工作上，一般都起了很大作用。但还存在以下三个问题：（一）不少干部尚未明确认识人民代表会议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不善于充分运用人民代表会议的组织形式充分集中人民意志，依靠全体人民的力量，以保障各项任务的完成，所以，人民代表会议尚未普遍地真正成为经常的巩固制度。（二）许多干部对政权建设缺乏发展观点，多数县人民代表会议还停留在开始阶段，没有使它更加完备起来以代行县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三）各地党、政领导上对政权工作的领导必须进一步加强起来，同时必须克服党政不分的现象。报告强调，随着革命运动的深入展开，加强和发展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已成为目前全国各地的重要任务。为解决政权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以便进一步完善国家政权制度，报告建议推广最近召开的华北县长会议的经验，广泛开展对人民民主政权建设的宣传，在各阶层人民中间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教育。在已经完成土地改革或完成了剿匪、反霸、减租、退押斗争的地区，亦即全国大多数县或相当于县的人民代表会议，大体上均已具备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条件，亟须

规定一个关于代表选举的办法，并须重新修订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县人民政府组织通则，以便统一思想并使县政建设进一步巩固起来。关于民政工作，报告提出“必须明确民政部门工作的方针任务，建立和健全必要的工作机构”。“各级民政部门的目前主要工作，应是建政、优抚和社会救济三项，其中尤应以建政为中心。”

十月十八日 就县、乡政权建设问题写信给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饶漱石，提出：党委“亲自去领导这种工作，这是对的，很必要的。”但“党委领导建政工作时，必须经过政权机关去做。”我认为“加强下级政权建设的工作，可以而且应该经由上级政权机关领导着去做，当然领导各级政权机关是各级党委的责任。各级党委对各级政权机关的领导，应经过在政权机关中工作的党员来实现；其中如有党员三人以上，应组成党组以保证党的领导。党直接做政权机关的工作是不好的。”并建议：“华东局如果要加强县乡建政工作，最好是指令省以下各级党委挤出时间来讨论党领导政权机关如何才能使它强化，检查督促政权机关中党组及党员的工作和组织专门小组研究县乡建政问题”，以使“各级政权机关发挥其应有的相对独立作用。”

十月十九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〇七次政务会议。在讨论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防疫工作报告时指出，两年来卫生部在防疫方面做出了成绩，各级政府都应注意卫生工作。

十月二十二日 在政法委员会约集人民大学法律教师举行的座谈会上讲话，阐述了新中国成立后在政权建设和法制建设方面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任务，指出“人民大学是新型大学”，“要与各机关联系得更好，以便使理论工作更适合于中国需要”。

十月二十三日 出席全国救济总会执监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在讲话中总结了救总一年半来的工作，指出了开展爱国增产节约运动是改善我国财政经济状况的必要环节，在救济机关内也必须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十月二十三日至十一月一日 出席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指出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今天中国人民的中心任务。会议听取了周恩来的《政治报告》、彭真的《关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的报告》、陈云的《关于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报告》、郭沫若的《关于文化教育工作的报告》及陈叔通关于政协常委会的工作报告等，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号召全国各条战线展开增产节约运动。

十月 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并决定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的方针。

十一月四日 在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召集的建政工作座谈会上再三强调：“建政关键在县。”开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县自己不好，也不能对区乡起领导作用。故搞好县人民代表会议，是推动建政工作的重要一环”。指出：“目前县级政权建设的中心是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人民代表会议主要是发动人民自己起来当家做主，所以不要规定许多条件来束缚他们，怎么样便利人民就怎么做。我们必须尊重代表意见，给予答复。代表会上决议的一定要执行，不许做的就不做。代表讲错话，只可教育指正，不能打击。”开好代表会议是建政工作的第一步，“还得要依照县乡政府组织条例，建立和健全人民政府各个工作机构。”关于人民政府工作中党的关系，强调指出：“党是领导政权机关的，是经过在政权机关中的党员来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但并不是直接指挥国家政权，而是采取同各方面协商的方式，大家来谈，大家

来商量。”讲话还就省以上人民政府建立政法委员会及建立和充实各级协商委员会等问题做了说明。

△ 为政法部门秘书工作座谈会筹办反对文牍主义的公文展览会一事写了通知，要求各部门首长积极支持秘书工作人员的这项工作。

十一月五日 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会议听取了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部长安子文关于《中央人民政府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暂行条例草案》的说明，通过了该条例，还讨论了其它事项。

十一月七日 应邀出席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为庆祝十月革命三十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十一月八日 主持政法委员会第十三次委务会议。会议听取了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的赴中南访问团正副团长李德全、费孝通、马杰的汇报；讨论了《惩治贪污条例(草案)》。

十一月九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一十次政务会议，在听取讨论华北事务部部长刘澜涛关于华北县长会议的经过报告时发言指出：华北县长会议之所以开得好，主要原因是：（一）领导人对此次会议的思想认识很统一；（二）会议筹备工作充分；（三）解决了当前工作的各项问题。强调：开好县人民代表会议是目前建政工作的关键。在这个问题上要进一步统一认识，只有县搞好了，才能更好地推动区乡。这样做，看起来好象矛盾，但实际上只有这样才能行得通，做得好。

十一月十六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一十一次政务会议，讨论了中央民族访问团访问中南各民族的总结报告。

十一月二十日 给中央政法机关反对文牍主义展览会题词指出：“文牍主义是官僚主义的支流，文牍的层转手续多，旅行的范

围广，拖延时日不解决问题，这不是对人民负责的应有方法和态度。”“我们反对文牍主义，必须简化机关组织的层次，简化公文的手续，才能提高这方面的工作效率。”

十一月三十日 《人民日报》发表董必武反对文牍主义的题词和中央政法部门举办反对文牍主义公文展览会的新闻报导，同时发表《反对文牍主义》的短评。短评说：展览会已吸引了成千机关人员的注意力。各级政府机关，尤其一般高级政府机关，应该对文牍主义作一次普遍的检查，以便改进工作方法。中央政法部门用展览的实例，来启示和教育一切机关人员注意改进工作的方法，值得广为推行。我们必须把一切旧的、腐朽的工作作风加以彻底清除。

十二月一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作为贯彻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这一中心任务的重大措施，要求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检查贪污浪费现象。八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三反”运动在全国开始。

十二月三日 就县乡政权建设问题写信给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说明十二月十八日曾以一个党员的身份，向饶漱石写了一封信，最近又将此信内容征求一些同志意见，他们认为是建政工作的一份可以参考资料，特送请核示。次日，毛泽东回信说：“信的内容是正确的，可以抄发华东以外各中央局负责同志一阅，促其注意这件事”。又说，可将“我答复你的几句话，一起抄发”。

十二月四日 就中央政法部门的整编方案向周恩来报告。报告说明了业经十一月十五日和十二月一日两次讨论研究的拟议中的整编方案内容，请示核准。

十二月七日 出席政务院第一百一十四次政务会议。在讨论政务院关于调整机构、紧缩编制的决定及开展增产节约、“三反”运动的报告时发言，阐述了政法各部门调整机构、紧缩编制的情况。

十二月十日 主持政法委员会第十四次委务会议，说明中央政法部门精简机构、紧缩编制的实施办法，提出按照“合署办公、简化层次、调整分工、机动用人”的原则，立即研究具体方案。在讨论《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草案）》时发言，认为：解决民族问题，只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才能保持相互平等。这样，进步思想才能发展起来。这个问题在学理上还要很好地研究，这是比较复杂而深刻的问题。并提出，做民族工作，要先通过其领袖人物。

十二月十四日 主持召开政法委员会所指导的政法五机关首长第一次联合办公会议，讨论五机关合署办公的初步方案。

十二月十五日 出席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并在会上作关于提倡和推动增产节约运动的报告。

十二月二十一日 主持召开政法各机关联合办公会议。会议讨论五机关合署办公问题。经讨论，同意陶希晋秘书长关于联合办公厅的组织方案及目前工作的意见，并对五机关的“三反”运动作了讨论，确定：鉴于浪费现象更严重更普遍，目前可以以反浪费为运动关键，从而揭发贪污和官僚主义。

十二月二十二日 在五机关召开的精简节约、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动员大会上作报告。指出：“节约，到共产主义社会也仍需要。要使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走向富强，非要节约不可，它是积累资金，使国家走上工业化，支持抗美援朝的主要方针。”强调：“浪费及贪污对国家财富损害很大，并且破坏了我们简朴风俗，贪污的人都是浪费的，浪费的人虽不一定贪污，但却助长了贪污。因此，要增产节约，非要反贪污反浪费不可。而官僚主义表

现一方面是不检查，一方面是不重视群众意见，这也是很普遍的。”号召大家端正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的态度，防止地主资产阶级的腐化堕落思想对我们队伍的侵蚀，积极参加“三反”运动。

十二月二十八日 上午，主持中央政法各机关联合办公会议，听取和讨论关于中央政法机关开展“三反”运动的情况，并作了进一步开展“三反”运动的决定。

△ 下午，主持政务院第一百一十七次政务会议，讨论关于中央赴察、绥、内蒙古灾区慰问团工作报告和关于筹设政务院华北行政委员会经过的报告。

十二月二十九日 和彭真、罗瑞卿联名致函周总理转毛主席、中共中央，报告中央政法部门中五个机关的实行合署办公和动员“三反”的初步情况。

十二月三十日 应邀出席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鲁登科为庆祝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一九五二年 六十七岁

一月一日 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团拜。毛泽东致祝词，号召大张旗鼓地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斗争。

一月二十六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在大中城市，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

二月二十三日 致函周恩来并转毛泽东、中共中央，报告拟将中国新政治学研究会与中国新法学研究会合组为中国政治法律学会。说明鉴于这两个学会性质相近，经多方协商，现已成立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筹备会，由董必武负责主持。

三月四日 在生日前夕，作诗《病中见窗外竹感赋》：“竹叶青青不肯黄，枝条楚楚耐严霜。昭苏万物春风里，更有笋尖出土忙。”

三月十日 主持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筹备会议。会议讨论了在召开成立大会前的筹备工作。

三月十一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

三月二十八日 政务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

四月二十二日 以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筹备会主席的名义致电奥地利政府教育部部长，抗议奥地利政府解除世界和平理事布兰德魏纳在格拉茨大学的教授职务的迫害行为。并致电布兰德魏纳教授，深表同情和敬意。

四月中下旬 致函周恩来并转毛泽东、中共中央，报告政法分党组干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的情况：会议决定把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造全国司法机关，作为政法委员会当前的中心工作。会议还讨论了中央政法机关中的统战工作，党内思想整顿工作和审查通过政法各部门工作计划要点等。

四月二十三日、二十六日 先后主持政法委会第十四、十五次会议，讨论关于中央政法各部门“三反”运动情况报告。

五月一日 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李济深、张澜、林伯渠、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首都五十万人民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举行的游行大会。

△ 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的名义，致电祝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五周年。

五月七日 主持中央政法各机关联合办公会议，为准备召开第二次全国司法会议，决定组织四个视察组，分别到华东、中南、东北、西北，对当前司法工作有重点地进行调查研究，并对如何进行调查研究作了指示。在发言中还提出，对旧司法人员，不要一概除掉，要分别对待。同时要吸收工人参加政法工作。

五月八日 以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筹备会主席名义，对香港英国当局非法迫害香港《大公报》提出抗议。

五月九日 出席政务院第一百三十五次政务会议。在讨论人

民监察委员会一九五二年四月至十二月监察工作要点时发言指出：“为了适应当前需要，应该加强监委机构”。“关于监察通讯员工作，必须很好地继续加强，发挥更大的作用。”

五月十三日 致信堂侄董良俊，称赞他对农业生产很认真、很勤劳，特别是对他辞谢人民政府对他家拨工优待，愿意自己劳动，感到很高兴。指出：“人民革命的胜利，就是要使劳动人民不受剥削，能享受自己劳动的果实。”“在人民革命胜利开始，有些人还想不劳而食，甚至不劳动的人想比劳动的人享受的更好些，这是大错特错的想法。劳动是光荣的，劳动人民享受自己劳动的果实是应当的。”信中还向董良俊介绍了李顺达不仅个人单干得好，而且组织互助组引导其他农民也干得好的先进事迹，鼓励他和家人同村里的农民商量，彼此自愿，在乡人民政府领导下，试办一下劳动互助的组织。还再三说：“彼此不愿意，彼此家里有人不愿意，千万不要勉强干。”

五月十六日 出席政务院第一百三十六次政务会议。在讨论一九五一年农业税的征收情况和一九五二年新解放区农业税税率方案时两次发言，指出：农民的生活和过去比是好的。应该以过去的基础看农民的生活，不能以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比。要改善农民的生活，应该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个体生产的基础上不能解脱贫困。

五月二十三日 出席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举行的纪念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签订一周年庆祝会，在讲话中指出：西藏人民在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已获得解放，在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等方面都取得了初步成就。藏汉民族间、藏民族内部的团结已逐渐增强，西藏人民愿意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彻底实现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逐步实现民主改革，建设繁荣幸福的新西藏。强

调：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阴谋虽然屡遭挫败，但他们破坏中国各族人民团结的活动，并未丝毫放松。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族人民，特别是西藏的藏族人民，必须提高警惕，坚决地团结在中国各民族互相友爱的大家庭中，在毛主席领导下，同帝国主义的破坏阴谋进行坚决的斗争。

△ 致函各中共中央局主要负责人。指出“三反”运动暴露出各地人民法院程度不同地存在组织不纯情况，因此整顿与改造各级司法机构，成为进一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措施。但各地干部缺乏，调配不易，建议各大行政区从工人、店员中吸收一些适合做司法工作的和从全国革命残废军人学校中抽调一些学员，充实法院机构。

△ 致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任王维舟并转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院长和司法部长，指出彻底整顿司法部门和其他部门的组织和思想作风，大力进行司法机关及其工作的改革，已成为今后迫切的中心任务之一。说明为准备召开第二次全国司法会议，中央政法部门已联合组成四个视察组及不派视察组去西南的原因，要求西南按视察组的视察要点寄来详细材料。

△ 被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为中央防汛总指挥部主任，傅作义、张震为副主任。

五月二十四日 为呈报《政法委员会一九五二年下半年工作要点(草案)》，和彭真联名致函周恩来并转毛泽东及中共中央，提出要利用“三反”“五反”运动所造成的有利形势，对各级法院进行彻底改革。

五月二十七日 主持政法委员会第十八次委务会议，讨论政法委员会一九五二年下半年工作要点，推定史良等五人组成筹备委员会，筹开政法干部训练会议。

五月三十日 出席政务院第一百三十八次政务会议，作政治法律委员会一九五二年下半年工作要点的说明，阐述了关于政法委员会五单位合署办公、机关整编、改进工作制度、提高工作效率问题。会议批准了政法委员会一九五二年下半年工作要点。

六月一日 致函政法五机关华东视察组负责人王怀安，指出人民革命胜利果实之一的人民法律，是便利维护人民自身权益和对敌斗争的武器，这种锐利的武器，不应操在不可信赖的人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但因过去革命胜利太快，在新解放区我们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大量的旧司法人员包藏在我们司法机关内，特别是在新解放区的法院内“三反”运动中暴露出旧司法人员不少问题。因此，“加强各级法院的领导骨干和输入大量新的血液，才是彻底改造和整顿法院组织的根本办法。”提出在法院中不能让旧司法人员担任审判工作。认为：“领导同志有这种决心，定出计划，逐步实施，是不难达到我们预期目标的。”

六月三日 就福建省人民法院关于召开福州市临时人民司法代表会议总结的书面报告，致函王怀安。指出司法部门是人民政府的组成部分，各级人民政府的司法部门的工作应向各级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应受各级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这是我们的国家制度。司法部门联系群众、改进工作有许多渠道和制度，不一定要靠“人民司法代表会议”。司法部门是人民政府的工作部门，各部门如都开这样的代表会议，人民代表会议的名称未免多而且滥。这样的会议，称为有计划的有组织的公审大会更适当，因此，提出对这个经验应当进一步研究，但不要代表司法部发表意见。

六月十五日 在全国政法干部训练会议上讲话，阐述这次干部训练会议主要是解决司法干部和民政干部训练问题；说明司法部门

旧人员情况及解决干部问题的办法等，强调指出，县的政法部门主要领导干部必须懂得马列主义的国家与法的理论，必须具有基本的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

六月二十日 主持政法委员会第二十次委务会议，就司法部门的整顿和改造；政法干部来源、训练机构、师资和教材问题，以及司法改革的重点等问题发表了意见。着重指出“人民的法律，是便利维护人民自身的权益和对敌斗争的锐利武器，不应操在不可信赖的人手中”。旧人员不经改造就使用，对我们说来是等于自杀政策。过去这个方针贯彻不够，因此有的地方做起来，就将旧人员视为骨干，工作亦依靠这些人，甚至把旧人员当成领导骨干。当然，对旧人员只要不是采取一脚踢开的办法，只要我们不操之过急，在这个问题上是不会犯错误的。反过来，把武器交给不可信赖的人（不管他有多大才能和学问），那是要犯错误的。

△ 和中央防汛总指挥部副主任傅作义、张震联名发布一九五二年防汛工作指示。

六月二十一日 在致堂弟董献之的信中说到正在进行的“三反”运动，勉励董献之积极参加，努力学习。

六月二十四日 在全国政法干部训练会议上，作《关于改革司法机关及政法干部补充训练诸问题》的讲话。指出，政法委员会今年下半年的工作，要把司法改革放在中心位置。抓住主要环节，切实地把政法工作加以整顿与提高。要解决政法工作的问题，必须联系到干部，特别是司法干部。司法工作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镇压反动派保护人民的直接工具，是组织与教育人民群众作阶级斗争的有力武器。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果实是经过艰苦奋斗而得来的，我们必须珍惜它，爱护它，必须在“三反”运动胜利的基础上，彻底改造与整顿司法机关，使各级司法机关从政治上、

组织上、思想作风上保持与提高纯洁性。因此，应当将司法人员中的坏分子从审判部门中清除出去。凡恶习甚深不堪改造者，应坚决清除，但仍应给以生活出路，不使流离失所。

六月二十五日 致函刘少奇并转毛泽东和书记处诸同志，报告曾以党员的资格向各大行政区党委书记写了一封信，建议他们考虑吸收工人和荣誉军人参加司法工作；还提到另外给司法部王怀安的一封信，着重说明法院中不能让旧司法人员作审判工作。并将此二信附送，请核示。

七月二日 为彻底改造和整顿中南区各级人民法院事致函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子恢等，指出中南区各级法院在组织上和思想作风上严重不纯，要彻底改造和整顿各级人民法院，没有中南局大力支持，仅中南的政法党组去办就不会收效。

七月六日 将和彭真联名批发的政务院政法分党组干事会关于司法改革和司法干部补充训练问题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报送周恩来并毛泽东、中共中央审核。

七月十一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四十四次政务会议，并在讨论燃料工业部一九五一年来工作总结与一九五二年工作要点时指出：中国电力发展，单单依靠大型电站是较慢的，搞小型站虽然有浪费，但是免不了。否则农村就无法使用电，还强调要注意安全问题、工人住宿问题等。

七月十三日 向政务院总党组干事会、中共中央统战部报告同沈钧儒等谈话情况。在报告中强调指出：“我们党决定的某种工作，要经过某一政府部门去作，一定要征询某一部门负责人同意，直接做了，那是错误的。不仅如此，政府部门负责人对党决定的某一具体工作，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甚至提反对的意见。”

七月十五日 主持政法分党组干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介绍了

政法分党组当前工作和组织状况,提出了对司法改革、民主建政、贯彻婚姻法等工作的意见。还提出在第二次全国司法会议时,应紧接着召开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成立会,通过会章,选举学会领导机构,发布成立宣言,结成中国民主政法工作者的统一战线,参加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推动世界和平民主运动。指出:“政法学会的工作,将根据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对会员进行思想改造,研究政治法学理论,介绍苏联的法学理论和政法工作经验,批判旧的资产阶级的政法观点,阐扬我们人民共和国国家法律法令的新精神。”

七月十六日 在政法五机关处长级以上党员干部会上讲话,指出:“我们的政权,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当然有非党人士作领导人,即使过渡到社会主义时,也还是这样。所谓工人阶级的领导,是指政策上,政治路线上的领导,并不是说每个部门都必定要共产党员作领导人。”统一战线工作“就是把那些拥护我党的和不很拥护我党的人团结在一起,为我们共同的目标而奋斗。”在统一战线的成员中有宇宙观、人生观和宗教信仰等等的不同,我们的政策未必每个人都能了解和接受,这就需要我们做耐心的说服工作。说服的过程就有斗争——原则上的斗争,但斗争是为了团结,而不是为了不团结;团结又不等于迁就,但不迁就也并不是每事必斗争,在非原则问题上我们也不一定要坚持意见。一味的迁就或一味的斗争都是不对的,都会破坏统一战线。对民主人士的某些错误进行原则的斗争,在方式上应和党内斗争不同,同时还须掌握分别对待的原则,就是说要详细了解分析不同对象的社会经历、社会关系、生活环境、个人特性等等,分别对待而不是一律对待,才容易达到团结的效果。讲到党的团结问题时,指出,我们党内的团结,是在原则基础上的斗争的团结,是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础上

的团结。自我批评不是把自己臭骂一顿，扣上一大堆大帽子，那样毫不解决问题。只有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才能解决问题，才能进步。又说：“我们党所以进步，就靠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能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是自杀。”

七月二十日 和谢觉哉离京去大连休养。

七月二十一日 致信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并转中央诸同志，报告路过沈阳与到达大连的情况。

八月十日 致函朱德总司令，同意他对《关于进一步加强政权建设及民政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报告》所提的“人民民主政权以领导生产为中心”的意见，表示做政法工作的同志必须在思想上确实认清这一点，在实际工作中应经常贯彻这种思想。信中还希望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在地方党的负责同志来京报告工作时，问问他们那里的民主建政工作，并问他们党组织领导生产是否经过地方政权机关的领导去实现。有了中央领导同志不断地注意、提示，加强民主建政的工作就较容易做了。

八月二十五日 复函政法委员会办公厅并转陶希晋，介绍了各地方报纸对司法改革的重视情况，指出司法改革内容包括了批判旧法观点，但对改革的目标不要提得过高。

△ 和中共中央东北局的负责同志交换政法工作的意见，谈话中强调民主建政工作中开好县级人民代表会议的极端重要性，政权工作中要以领导生产为人民政权的中心工作。

八月二十九日 为贯彻政务院政法分党组干事会决定，把全国第二届司法会议开好，约集司法四机关党内负责同志，讨论关于会议应研究的主要问题及会议的准备工作，与会同志取得一致意见。九月十七日，将讨论意见书面报告毛泽东、周恩来及中共中央书记处诸同志，请核示。

九月二十七日 为报送司法部党组《关于律师制度问题的报告》，致函毛泽东并转告中共中央书记处诸同志，说明政法分党组干事会于本月十七日曾讨论此问题，大家认为目前我们的法律尚很不完备，旧律师又未经改造，私人律师制一旦试行起来，未必能办好事，一致认为此事以缓为宜。现在不妨在京、津、沪三个司法工作较好的城市，试行公律师及群众团体辅助人的制度，司法部党组研究后亦同意我们的意见。

九月三十日 晚上七时，出席毛泽东主席举行的国庆宴会。

十月一日 出席首都人民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庆祝典礼。

十月四日 向政务院总党组干事会并毛泽东、中共中央，报告政法干训会议商定的政法干部训练工作的意见，以及若干具体问题，请示核准，以便发交各级党委参照施行。提出：加强政法干部训练、教育工作，逐步提高在职干部的质量，并不断补充新的力量，是政法工作很重要的一项任务。具体提出：（一）各大学的政法院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国家和法的观点，对青年知识分子作系统的训练；（二）除中央设立政法干校一所外，各大行政区亦须办一所，训练县级以上政法部门的负责人。周恩来阅后批示：我同意，待与董老面谈。

十月中下旬 向周恩来报告并转毛泽东、中共中央书记处诸同志，请示关于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由中国筹办开会事。

十月 在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第三次筹备会上讲话，主张要参加国际民主法律协会，建立法学界的反帝统一战线。指出：法律战线在中国过去是很弱的。现在参加到国际民主法协去，就是参加到反对帝国主义的战线。现在除了科学工作者要组织外，在法学界也要加以组织。在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者下面，是组织了一部分人来专门同我们搞的。我们法律工作者方面就比较散漫，今后

大家要组织一个法律界打倒帝国主义的阵线。要把帝国主义国家内拥护和平的人团结起来。美帝国主义实际上就怕这些。要对国际反帝战线用全力来支持。

十一月九日 为加强国家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以迎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政务院准备就关于改变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机构与任务做出决定。董必武致函政务院总党组干事会，对该决定草案提出了多方面的修正意见。

十一月十五日 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改变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机构与任务、调整省区建制、增设中央人民政府机构等问题的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定与其他事项。

十一月二十八日 就成立政法干校问题写信给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对各地由革命大学负责培养政法干部而不设政法干校问题提出意见，认为革命大学对干部训练仅作一般性的政治训练，各部门工作的业务训练，恐非革大能胜任。因此，赞成教育部提出的不仅在各大区办政法干校，而且大区还可办政法学院的设想。

十二月二十四日 列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三次（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和赞同政协副主席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提出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建议。

十二月二十七日 在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上发表《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伟大胜利》一文。文章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已经在约有一亿二千万农业人口的解放区，完成了土地改革，但还有极为广大的农业地区仍保持着旧的土地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公布了土地改革法，“用法律形式确定了土地改革的原则，具体规定了没收、征收和分配土地的办法，并组成了广泛的反封建

的统一战线。”使得广大农村中的土地改革可以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党和政府在这场斗争中给予农民以有力的支持，并进行了巨大的工作以启发农民的觉悟和帮助农民组织起来，这就使农民群众有了必然胜利的保障。“在发动农民群众斗争中，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是：以雇农和贫农为骨干、团结中农、中立富农。”还指出：土地改革给农民带来巨大的利益，分配给农民的耕地约在四千七百万公顷。土地改革使劳动的农民真正成为农村的主人。农民群众的政治觉悟、组织力量和爱国热情空前提高。他们经过土地改革的斗争后，普遍地认识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自己利益的真正保护者。文章最后说：“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既然曾经领导农民群众取得伟大革命战争的胜利，又领导农民完成了土地改革的胜利，而逐渐走上富裕的道路，也就一定能够伴随着国家工业化的事业的进展而领导劳动农民向着社会主义的远大前途前进！”

十二月 指示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办公厅和中央司法部办公厅，为准备从司法方面迎接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要联合组织工作组到工矿区 and 铁路、水运方面以及几个城市、农村去进行调查研究的。

△ 应陈嘉庚之请，为集美解放纪念碑题词。在序文中说：“陈君嘉庚侨居新加坡，经营橡胶业，获利不自封殖；领导华侨，热爱祖国；斥资于其故乡集美创建学校，逾四十年。”“全国人民解放后，陈君亲回梓里，将中小学、师范及诸专科学院修复而恢廓之，学校规模，始符初志。”

△ 为武昌东湖九女墩吟诗并题写《九女墩碑记》，称赞太平天国是中国近代农民起义中最大的革命运动，代表了当时的进步思想；颂扬我国妇女在争取解放斗争中，牺牲很大，人民将永远纪念她们。并说：“现在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建

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年来人民政府所实行的政策和取得的成绩，不仅为太平天国所冀求达到的境界，奠定了真正的基础，而且有些远远地越过了它。这是根据马列主义，扬弃了我国革命诸前辈，包括太平天国前辈在内，理论和实践的结果。”诗中说：“九女有灵如不昧，亦当含笑享明裡。”“群众最怜英烈女，口碑传出足千秋。”

一九五三年 六十八岁

一月一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迎接一九五三年的伟大任务》的社论，提出一九五三年全国人民的任务是继续抗美援朝斗争、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 和毛泽东、朱德、李济深、林伯渠、陈云等出席中央人民政府举行的团拜会。

一月五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和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全国各地开展“新三反”运动。

一月十三日 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的说明，并通过相应决议。会议还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朱德、董必武等三十二人为委员；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起草委员会，周恩来为主席，邓小平、安子文等二十三人为委员。

一月十四日 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会议听取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八一”勋章、“荣誉”奖章条例草案的说明，通过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批准海关与对外贸易管理机关实行合并的决议》。

二月四日至七日 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

员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听取了周恩来的政治报告，陈叔通的会务报告和郭沫若关于世界和平大会的经过和成就的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毛泽东在闭幕会上讲话强调：“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就必须克服官僚主义，密切联系人民群众。”

二月六日 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作《关于召开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的乡、县、省（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问题》的报告。指出：过去三年多的时间，由于国家初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所遗留给中国人民的创伤急待恢复，巨大的政治运动和社会改革有待进行，人民群众还没有充分组织起来，因此，采取一些过渡办法完全是正确的，必要的。但在现在，过渡办法已完成了它自身的历史使命。现在大陆上的军事行动早已经结束，革命秩序已经稳定；全国土地改革已经基本完成；各界人民已经在全国规模上进一步地组织起来了。因此，实行普选，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已经具备。还讲：“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人民政协，只是它的全体会议不再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它本身仍然是各民主党派、各民众团体、各民族、国外华侨和爱国民士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它在我国政治生活中是有积极意义的。人民需要它，它会存在下去。”

二月八日 下午，出席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欢迎新任苏联驻我国特命全权大使库兹涅佐夫举行的酒会。

二月九日 列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七次（扩大）会议。会议听取财政部部长薄一波关于一九五三年国家预算的报告等。

二月十一日 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会议听取邓小平代表选举法起草委员会作的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起草说明的报告。通过《中华人

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和中央选举委员会名单。

二月十二日 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会议听取了财政部部长薄一波关于一九五三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并通过《一九五三年国家财政收支预算》。

二月十五日 中共中央把曾以草案形式发给各级党委试行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作了修改，通过为正式决议，进一步推动了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全国各地开始普遍试办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二月十八日 致函周恩来，详细阐述了关于成立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的意见。

二月十九日至二十六日 人民监察委员会召开第二次全国监察工作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刘景范副主任作的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二年监察工作总结及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朱德总司令、邓小平副总理在会上讲了话。

三月五日 斯大林逝世。

三月九日 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陈云、林伯渠、李济深、张澜等出席首都各界六十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为斯大林逝世举行的追悼大会。

四月三日 出席政务院第一百七十三次政务会议。会议讨论通过周恩来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报告，邓小平关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为准备普选进行全国人口调查登记的指示（修正草案）》的报告。

△ 致函彭真并政法委员会分党组干事会。说明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筹备会的工作已大体就绪。建议政法委员会分党组干事会最近开会讨论政法学会的工作，并将政法学会的成立问题报告中

共中央。

四月十一日至二十五日 第二届全国司法会议在北京召开，总结司法改革运动的经验，讨论今后司法机关的主要工作及自身建设的问题。

四月十一日 在第二届全国司法会议上作《论加强人民司法工作》的讲话。讲话回顾了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以来的司法工作以后指出：“总结我们三年以来的经验，就是：确认人民司法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武器；人民司法工作者必须站稳人民的立场，全心全意地运用人民司法这个武器；尽可能采取最便于人民的方法解决人民所要求我们解决的问题。一切这样办了的，人民就拥护我们，不然人民就反对我们。”“司法改革运动使中国的司法工作踏上了新的一步，成绩很大。”指出：哪个地方的司法机关中有组织不纯、政治不纯和思想不纯的现象存在，哪里就表现出不是失掉人民立场，就是没有采取最便于人民的方法去解决人民所要求解决的问题，那时人民就责备我们，反对我们，说我们的人民法院：“不是共产党领导的法院，而是国民党的法院。”反之，如果我们在司法机关中纠正了思想上的错误，清除了组织上的不纯，清除了坏分子，改变了坏作风，听取了人民批评我们的意见，改正了错判的案件，人民就说：“这才是真正的人民法院”。“在司法改革运动中，组织上不纯、政治上不纯的现象，凡是发觉的都清除了，至于思想不纯，旧法观点虽然还没有完全、彻底肃清，但自上而下地从中央司法机关到各地方司法机关对政务院的指示进行了一次比较深刻的学习，划清了敌我界线和新旧法律观点的界线。思想问题的彻底解决，则不是一个运动能解决的，一个运动只能使他认识深刻一点，因此今后要继续逐渐来做，并且还要采取许多具体办法。讲话特别强调：为着配合已经开始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要总结我

们的经验，研究建立便于人民的审判制度。我们过去实行的陪审制，巡回审判制以及法院设问事处、接待室等都是人民所欢迎的。现在要选择重点，开始试办工矿企业中的专门法庭。这种法庭建立起来，首先是跟破坏经济的犯罪分子作斗争，同时也要教育劳动人民遵守劳动纪律。只有用这个东西去教育，收效才能很快，没有这个东西，仅仅靠开会、批评、登报是不行的。如果认为革命以后劳动纪律就会很好那是错误的，一定要有国家的强制的机关来保证。关于这一点，我们完全没有经验，只能来重点试验。讲话中还特别告诫司法部门的同志，必须重视当前司法工作中存在的错捕、错押、刑讯、逼供和错判、错杀两个严重问题。对乱捕和刑讯要严禁，三令五申再犯的要受法律制裁；对错捕、错押的人，应该采取迅速的步骤去查明释放，不要迟延。处理错判、错杀案件，关系人民生命财产和党与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政治影响问题，那种简单、粗暴、鲁莽的态度是有害无益的。

四月十五日 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向第二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致词，指出中国妇女对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国家的建设事业，作了极其巨大的贡献。同时也根本改变了中国妇女的地位。号召全国广大妇女群众积极地支持抗美援朝和争取和平的斗争，热烈地参加全国的普选运动，积极地参加工业和农业生产。把生产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也是妇女的长期任务，因为妇女只有在经济上取得独立的地位，才能获得彻底的解放。

四月二十二日 出席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章程和成立宣言。董必武当选为主席，沈钧儒、谢觉哉、王昆仑、柯伯年、张志让、钱端升当选为副主席，史良等三十八人当选为理事。

△ 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郭沫若等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

蒙古艺术团团长奥云并观看演出。

四月二十四日 中央防汛总指挥部、中央生产防旱办公室联合发出关于恢复与建立防汛、防旱办公室的通知及关于一九五三年防汛、防旱工作的指示。

四月二十六日 主持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第一届第一次理事会议。建立了办事机构并确定了负责人。

五月一日 上午十时,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李济深、张澜、林伯渠、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首都各界五十万人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举行的游行大会。

五月六日 向毛泽东、中共中央及政法分党组干事会报告召开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成立会和第一届第一次理事会议的情况。

五月八日 政务院举行第一百七十七次政务会议,批准司法部史良部长在第二届全国司法会议上作的《关于加强人民司法工作的报告》及《第二届全国司法会议决议》。

五月十四日 《人民日报》发表《加强国家建设时期的人民司法工作》的社论。强调:必须建立和健全必要的机构和工作制度,必须认真加强党和政府对人民司法工作的思想上政治上和业务上的领导,迅速提高现有干部和培养新的干部,才能及时地发现和纠正工作中的偏向和错误。

△ 因病离京到南方治疗和休养。由彭真代理主持政法委员会工作。

五月二十日 致函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说明十四日离京后,经南京、镇江,十九日到达无锡的沿途情况,并请转报中央其他领导同志。

六月十五日 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

表述。会后中共中央宣传部着手起草关于总路线的宣传提纲。毛泽东在修改这个提纲时，把它完整准确地表述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了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错误。”

七月二十七日 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正式签字。至此，历时三年多的朝鲜战争宣告结束。

九月八日至十一日 列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九次扩大会议。会议听取和讨论政协副主席周恩来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及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的报告，陈云关于财政问题的报告等。

九月十日 政务院发出《关于执行第二届全国司法会议决议的指示》。强调：加强司法行政工作，建立和健全省市以上人民法院司法行政组织，培养和训练干部，特别是补充基层法院和配备专门法庭的审判人员，是目前司法工作基本建设中的一项重要任务，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是加强司法工作的重要环节。

九月十二日 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会议听取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关于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给中国人民志愿军慰问电》。

九月十四日、十五日 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五、二十六两次会议。会议听取和批准陈云关于财政经济工作的报告等。

九月十六日、十七日 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听取并批准了彭真关于政法工作的报告和郭沫若关于文化教育工作的报告。

九月十八日 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会议听取中央选举委员会委员邓小平关于推迟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问题的说明并通过相应决议。

十月一日 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林伯渠、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周年在首都天安门举行的武装部队和四十万人民的游行庆祝典礼。

十月十六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决议》。十一月五日，又作出《关于在全国实行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后来国家又对棉花、棉布实行了计划收购和供应。

十月二十二日至十一月十三日 第二次全国民政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内务部部长谢觉哉做了工作报告，朱德到会讲话。

十月二十三日 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出席中华全国工商联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并在会上致词，着重阐述了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重大意义与基本任务，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和办法。号召私营工商业者爱国守法，消除五毒，纠正唯利是图思想和作风，正确地发挥私营工商业的积极作用，为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而努力！

十月三十一日 在第二次全国民政工作会议作《认真领会过渡时期总路线，做好民政工作》的讲话。指出：要使总路线实现，就必须加强人民民主政权建设。经济建设现已成为我们国家和人民的中心任务，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必须有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来领导和保障，没有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不能有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即不能有以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为领导的五种经济成份相结合的经济。还阐明：“抽象地说要经济建设和国家工业化是有危险

的。旧民主主义的政权所领导和保障的经济建设和国家工业化，必然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建设和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这对国家和广大人民都不利。资本主义的经济建设和工业化只对于资产阶级有利，而对于劳动人民只有加重压迫和剥削，前途是贫困和死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人民自己的政权，这种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不容许我们的社会经济向资本主义方向去发展，当然这并不是说现时不容许资本主义的经济有所发展，这是另一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经济；我们国家工业化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因此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愈强化，就愈能有力地领导和保证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的工业化的完成。关于民政工作的范围问题，特别指出“我们民政工作范围是一个大家纷纷讨论很久的问题。第一次民政会议确定了建政、优抚、救灾是工作重点，政务院批准了，《人民日报》也曾为此发布过社论；但这次会议仍有这一问题。我想这次会议必定会把民政工作范围较第一次会议确定的更加明确。”民政工作也是实现总路线需要的工作，例如我们做好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就是配合了总路线。再三强调，“政权建设工作，是由党领导政府来执行这一工作。作为政府的一个部门，我们应该是收集材料，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供领导机关参考。要真正保证总路线的实现有广泛的民主基础。”最后指出：“几年来，民政部门在建政、优抚、救灾各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这些工作是有成绩的。是在遵循着总路线前进的，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与各级领导以及各级民政部门的努力分不开的。但不可否认我们的工作还有不少缺点与错误，有的是与政法委员会指导不周分不开的，这主要应由我负责。”鼓励大家：“我们共产党人经历了许多困难，从来没有为任何困难所吓倒，而且要迎接困难并克服它。”

十一月六日 晚上,和刘少奇、朱德等出席首都各界在怀仁堂举行的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六周年大会,吴玉章副会长在大会作长篇讲话。

十一月十一日 主持政务院第一百九十三次政务会议,并在讨论贯彻婚姻法运动的总结报告时发言,阐述了贯彻婚姻法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工作,指出:这次贯彻婚姻法运动主要是训练干部,帮助人民搞好婚姻问题,今后贯彻婚姻法这件事要转入正常工作。

十一月十二日 下午三时,和周恩来等到机场迎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率领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访问中国代表团。二十三日,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签订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的签字仪式;并出席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招待金日成及其率领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问中国代表团举行的宴会。二十五日,和周恩来、陈云、郭沫若、黄炎培、邓小平等及各界群众二千人到车站欢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和他率领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访问中国代表团离京返国。

十二月四日 函报周恩来,说明十一月十五日和十二月一日两次召开政法委员会分党组干事会拟议的政法各部门的整编方案,强调“合署办公,简化层次,调整分工,机动用人”的原则,说明整编方案的具体内容。

十二月八日 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所在地北京市西单区中南海选区,投票选举西单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我国第一次基层民主选举。

十二月九日 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一九五四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等。

十二月十日 政务院举行第一百九十七次政务会议，听取内务部部长谢觉哉作关于第二次全国民政会议的报告，并批准了《第二次全国民政会议决议》。

十二月十六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决议总结了全国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验，进一步指出引导个体农民经过具有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再到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这是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正确道路。

十二月二十一日 出席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欢迎苏联新任驻华特命全权大使尤金举行的酒会。

十二月二十四日 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会议揭露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

十二月二十九日 就外甥王俊生的来信要求帮助调到国营商店去工作一事复信指出：“你如果是青年团员，想调动工作，应向团请求，不应当向我个人请求。”并说：“现在想凭借私人力量，以介绍方式去找工作，那是直接违反中央的政策。”谆谆教育他们兄弟：“革命是为人民谋利益，决不应该把革命作为谋个人利益的手段。”

十二月三十一日 晚上，出席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招待应邀参加鞍山钢铁公司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第七号炼铁炉开工典礼的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冶金工业部部长捷沃西安及其率领的代表团举行的宴会。

一九五四年 六十九岁

一月一日 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名义在苏联《真理报》上发表《中国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一文，论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年来所进行的一系列社会改革，为中国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准备了必要的条件，阐明了中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以及一九五四年的具体任务。十一日，《人民日报》全文予以刊载。

一月五日 应邀出席苏联驻我国大使尤金为欢迎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冶金工业部部长捷沃西安举行的宴会。

一月十四日 出席政务院第二百零二次政务会议，对提请会议审批的《一九五四年政法工作的主要任务》做了说明。指出：“政法工作主要任务是保障经济建设顺利进行，经济建设有计划，政法工作没计划不行。”过去搞运动，我们不能等着法律定好了再搞，是在运动起来以后才订法律；现在与过去比较起来，一般可以先订出法律然后按法律办事，这是合乎目前情况的。指出：“为什么把立法问题摆在前面？因为立法工作特别是保卫经济建设的立法工作，相应落后于客观需要，今后如果按法律办事，就必须着重搞立法工作。”强调，加强法制和法纪教育，是长期的斗争，在工人阶级内部外部都要做这个工作。在干部训练工作上，除办干部学校和大学培养干部以满足需要外，强调干部要丢掉旧东西，真正学到马列主义，

才能办成事情。

一月二十二日 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名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为《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而撰写的《列宁主义——劳动人民解放事业的战无不胜的旗帜》一文，指出列宁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列宁主义是劳动人民解放事业战无不胜的旗帜，中国共产党执行列宁对东方各民族共产主义者的指示使革命取得了胜利。纪念列宁，就要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原则，学会运用马列主义。

一月二十八日 主持政务院第二百零四次政务会议，在讨论将绥远省划归内蒙古自治区的报告时发言指出：“把游牧民族变为定居这是件大事，需要较长的时间。”“农业要顾及牧业，要使农业和牧业都发展。”“要在蒙古族中培养干部，依靠他们做工作，才能事半功倍。”

二月二日 以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名义，向各大区、各省市及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政法委员会转发中央内务部关于山西省第四次民政会议情况的报告，希根据当地情况参照山西省的作法领导开好省、市民政会议，并希将此件转发县级。

二月五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和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的联席扩大会议做出决定，组织全国人民慰问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团，推举董必武为慰问团总团长。

二月六日至十日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刘少奇代表政治局和毛泽东主席在会上作了报告，会议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一致通过了毛泽东建议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八日，董必武在大会上发言，同意刘少奇代表政治局向大会作的报告和《关

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着重指出：“增强党的团结是克服党内某些不健康情况的基础，决议草案中的六项规定，只要我们党的高级干部认真地执行，我相信我们党内某些不健康的情况是可以克服的”。

二月十四日 晚上，应邀出席苏联驻我国特命全权大使尤金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定四周年举行的酒会。

二月十六日 在首都各界人民欢送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总团和志愿军代表赴各地慰问的大会上，代表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致答词，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多年来英勇作战、艰苦奋斗、流血牺牲分不开的”，“如果没有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保卫，我们要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是不可能的。”号召全国军民，团结一致，努力奋斗，向着伟大的社会主义目标前进！

二月二十日 出席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在首都举行的慰问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大会，并代表总团致词，指出人民解放军是保卫祖国安全、保卫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顺利进行的可靠力量。要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提高警惕，巩固国防，提高军事现代化、正规化的水平。会上，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以及贺龙、陈毅、聂荣臻佩戴慰问纪念章。

三月 主持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总团全体人员大会并讲话，指出慰问团“所担负的任务是极为重大和光荣的”。号召“所有代表和文工团员、工作人员应当学习解放军艰苦奋斗的精神，积极完成慰问任务。”

三月十五日 代表中共中央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为欢迎昨日到达的朝鲜人民访华

代表团举行的宴会，并致词，指出中朝两国人民曾为共同利益两度作战，打败了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者和美国侵略者，在这共同的斗争中，结下了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我们深信，在我们两国人民坚强团结的基础上，在制止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保卫自己祖国的独立和安全，保卫远东及世界的持久和平的斗争中，一定能够继续取得伟大的胜利。

三月十七日至四月十日 第二届全国检察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过去工作的总结和今后检察工作方针任务的报告》和《第二届全国检察工作会议决议》。

三月十八日 主持政务院第二百零九次政务会议，并在讨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春耕生产的指示》草案和一九五三年灾情和救灾工作的总结报告后，发言指出：我们要突破一环，先把粮食控制起来，然后再解决其它问题，相信社会上产生的一切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

三月十九日 出席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为招待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和各艺术团举行的宴会。

三月二十二日 主持中央军委、政法委员会、法制委员会、内务部、政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及民主人士二十余人参加的座谈会，征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草案)》的审查意见。

三月二十三日 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

三月二十四日 主持参加宪法草案分组座谈会的共产党员大会并讲话，说明这次大家参加分组座谈讨论会，是和非党人士共同讨论，共同发表意见，不是要我们去领导他们。指出：“发动大家讲话，就会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我们要学会分析什么是正确的，

什么是不正确的，这对我们自己也是一个锻炼。”

三月二十五日 主持政务院第二百一十次政务会议，在讨论四年水利工作总结与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后发言，肯定了四年水利工作取得的成绩，着重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对待自己做的工作应该这样：成绩应该估计到，但不能过分强调。”

三月二十九日 在第二届全国检察工作会议上讲话。讲话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后检察机关的创立和发展过程，指出：检察机关的职责是保障国家法律的执行。国家和人民需要检察机关维护人民民主法制。国家存在，它的法纪必须存在，维护法纪的机关也必然存在。讲话又指出：国家将这一监督法律执行的重大责任交给检察机关，检察机关的责任是很重大的。国家对检察工作人员的品质要求是很高的。强调检察机关必须遵循列宁提出的“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原则；同时，遵循中央提出的需要和可能的原则，对检察机关的发展将会更顺利。讲话还指出，肃清全国违法的现象，只靠检察机关是不够的，检察机关首先必须依靠群众，教育群众守法和揭发违法事情，同时与各有关部门取得联系，得到他们的配合和支持。

三月 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进一步加强经济建设时期的政法工作》。社论指出，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要求我们必须加强政法工作。“进一步健全人民民主制度，健全和运用人民民主法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保障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顺利进行”，是政法工作的总任务和总要求。文章强调：经济建设已成为全国中心任务，这并不意味着要削弱政法工作。“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强有力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如果我们完全埋头于经济工作，迷醉于经济建设的胜利，忘记了美帝国主义对我们的侵略，忘记了一切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忘记了今后社会主

义改造过程中的复杂的阶级斗争,以为经济工作就是一切,那就要在政治上犯极大的错误。”为了保障和推进经济建设事业,政法工作部门“首先是要完成普选工作,实现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是我国人民民主政治的进一步的发展,它将使人民民主制度进一步健全和完备起来。”“人民群众管理国家事务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已经大大发扬起来。”但人民群众自下而上的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的批评和监督还开展的很不够。”“开展政府工作人员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提倡与支持人民群众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批评与监督,这不仅是为了发挥人民群众在管理国家事务上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是为了发挥人民群众在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上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国家的总任务成为广大人民自觉的奋斗目标。”社论提出:“今后必须从立法方面、从健全人民司法、公安和检察制度方面,对人民的民主权利给予充分的保护。”同时“保卫经济建设的立法工作、公安工作和检察工作也需要加强。”“一方面要继续严厉镇压反革命的破坏活动,另一方面对于其他危害国家建设和人民民主秩序的犯罪分子也要实行必要的法律制裁。与此同时,要加强对于全体国家工作人员和全体国民的守法教育、劳动纪律教育,逐渐使所有的人都能自觉地遵守法律和纪律。”

四月一日 主持政务院二百一十一次政务会议,讨论劳动部提出的工作总结及改进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并发了言。

四月五日 代表中共中央向中国铁路工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致词。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起就很重视动员与组织铁路工人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铁路工人在全国工人运动中曾起过火车头的作用。号召铁路职工继续发扬光荣传统,为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作更有组织更有纪律的斗争。铁路工会应进一步地团结全体职工,真正成为共产主义学校。

四月十五日 出席中央选举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和政务院第二百一十三次政务会议联席会议，听取和讨论中央选举委员会秘书长邓小平关于目前全国基层选举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通过《中央选举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召开省、市、县人民代表大会的几个问题的决定》等。

四月二十日 邀集中央军委、政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及民主人士举行第二次座谈，征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草案)》的审查意见。在此前后还与中央军委同志三次商量并修正兵役法草案。

△ 和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陈云等前往机场欢送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和其他代表。

四月二十七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秘书长，谭震林、马明芳、宋任穷、刘澜涛、林枫、杨尚昆、胡乔木为副秘书长；邓小平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四月二十九日 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在北京签订中印两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签字仪式。

五月一日 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首都各界五十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举行的大会。

△ 为中国政治法律学会主办的《政法研究》题写刊名，撰写《祝〈政法研究〉创刊》的创刊词。文章指出：“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的宗旨就是这个刊物应遵循的基本方针。我们政治法律工作者的总任务应该是竭尽全力，协助国家进一步健全人民民主制度，加强和运用人民民主法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保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顺利进行。”强调“为了巩固我国人民

民主法制,需要全国人民和国家工作人员自觉地遵守国家的法律。因此,在总路线的照耀下,广泛地进行爱国守法教育,普及法律知识,并组织 and 展开对国家政治法律问题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这是我们学会的中心任务之一,同时也正是我们这个刊物所必须努力做好的一件主要工作。”希望通过《政法研究》的出版,“全国政治法律工作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伟大科学理论指导下,更进一步地团结起来,对国内国际重大政治法律问题进行共同的研究。”在学术问题研究上如有不同的意见,欢迎提出来自由讨论,以达到互相砥砺、互相攻错的目的。

五月三日 和刘少奇、朱德、陈云等出席首都各界青年在怀仁堂举行的“五四”三十五周年纪念大会。

五月十八日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作《关于党在政治法律方面的思想工作》的重要讲话。指出:法律是政治的一种手段,也就是政治。所以,那种把政治和法律对立起来的看法是完全不对的。但是,法律仍有它本身的范畴,不能说党把群众的政治意识提高了,就等于把群众的法律意识也提高了,所以那种把政治和法律完全混淆起来的看法也是不对的。讲话系统地阐明了必须注重培养人民群众的守法思想这个重要问题。劳动人民已经取得了政权,就必须建立革命秩序,遵守按照自己的革命意志定下来的法律秩序。强调教育人民守法,首先要共产党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守法。“共产党员必须以身作则,对国家法律的严肃性要充分的理解。”“加强培养法律工作干部,是我们党领导法律思想工作方面的迫切任务之一。”

△ 出席政协全国委员会组织的宪法草案座谈会。

五月二十一日 新华社公布三月十七日至四月十日第二届全国检察工作会议通过的关于今后人民检察工作方针任务的决议。

《人民日报》发表《加强检察工作,保障国家建设》的社论,指出人民检察工作是国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人民检察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武器,它的任务是对政府机关、公务人员和全国人民的违法行为实行检察。

五月 出席政协全国委员会组织的宪法草案座谈会第一组会议。

六月二日 在第六次全国公安会议上,作《关于政治法律工作方面几个问题》的报告,阐明了我国宪法草案起草的经过和我国宪法的特点,指出我们的宪法包含着人民已争得的东西,用宪法的形式肯定下来,但也包含一部分人民尚未得到的东西,即人民的愿望,将来要得到的东西。阐述了进一步提高群众政治法律思想的重要性,指出我国的法律是保护人民利益的,人民也一定要遵守法律,目前培养群众守法思想的工作是很迫切的;要群众守法,首先要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守法,机关首长更应以身作则。

六月三日 主持政务院第二百一十八次政务会议,讨论签订中印两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经过的报告、内务部一九五四年工作计划要点,并作结论性发言。

六月四日 致函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和党委书记胡锡奎,请人民大学法律系调一适当干部担任北京大学法律系副主任,以加强领导。

六月九日 对江西省法院错判一责任事件案作具体指示。指明了为什么是错判,提出了解决办法。

六月十一日 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并决定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审议。

六月十四日 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会议

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关于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决议》。宪法草案于本日公布。

六月十六日、十七日 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会议听取和讨论财政部部长邓小平关于一九五四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并通过了一九五四年国家预算。

六月十九日 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会议听取和通过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刘少奇《关于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决定》的说明,听取中央选举委员会秘书长邓小平关于基层选举工作完成情况的报告等。

六月二十日 在中央政法干部学校作报告,强调要进一步加强法律工作和群众的守法教育。指出:“国家进入有计划的建设时期,各方面都要逐步走上正规化,也就是健全法制生活,按法律办事。”“在我国现今的国内条件下,加强群众的守法思想,有着极端重要的意义。”报告在详细分析了培养群众守法思想的艰巨性之后,同时强调指出“我们的法律集中反映了人民的意志,是完全符合人民的利益的,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完全一致。因此,进行法律宣传教育工作,培养人民群众守法思想,虽然是颇为艰巨的任务,但这个任务是一定能够很好实现的。”报告还指出:“我们强调法律的严肃性,但我们决不是法律的拜物教,我们并不迷信法律万能,而是要用实践去启发群众的自觉。”报告反复强调“要使群众守法,首先就要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者以身作则,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对法律、法令有充分的理解,才能正确地推行和模范地遵守法律”。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滋长着一种不把法律、法令放在自己的眼里,以为这些是用来管人民群众的,而自己可以不守法,或不守法也不要紧的极端危险的骄傲自满情绪,提出

了尖锐的批评。

六月二十一日 为内务部所拟《户口登记暂行规定办法（草案）》报请政务院并致函中共中央，报告该《办法》起草情况和政法委员会邀请各有关部门审查修改的经过。

六月二十四日 主持政务院第二百一十九次政务会议。在讨论人民监察委员会关于第三次全国监察工作会议的报告和《政务院关于在铁道部建立人民监察局和加强监察工作的决议》、《铁道部人民监察局工作条例》时作了发言，指出，这次会议，对监察的任务规定很清楚，第一是监察国家机关执行政策，第二是保障经济建设，第三是处理好人民来信。强调：有问题应该揭发出来，可能发生的问题应该敲个警钟。我们的监察工作应该向这个方向提高。对训练监察人员的要求，强调一要提高政治警惕性，二要学习有关政策法规。监察人员作事要小心，不要过早地下结论，不懂可以请教专家。业务部门发生事故，要依靠党委、青年团、工会、合作社等组织，但主要是行政，因为它负有直接责任。针对责任事故无人负责的现象强调：今后我们对责任事故一定要追究。过去只要不是政治问题就不追究责任。我们要慢慢转变这种作风。我们已经搞了五年，不能再说没有经验，工厂不按操作规程办事，死了人又影响生产。再有事故，不要按过去的办法办了，处理要重些。该撤职的撤职，该开除的开除。现在不单是靠良心办事，还要有责任，只劝告也是不行的。

△ 致函中共中央，报告审查修正兵役法《草案》的情况，说明自接受审查兵役法（草案）的任务后，即组织了政务院、军事委员会、法制委员会和内务部五个机关的干部共二十余人于三月二十二日、四月二十日召开了两次座谈会，并将参加研究的人划分为三个小组，进行研究，提出修改意见，说明了修改情况及没有被采纳

的意见。

六月二十六日 应邀出席朝鲜人民共和国驻我国大使徐哲为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访问我国举行的宴会。

六月二十七日 前往车站欢送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和随行艺术团离京返国。

六月二十九日 主持中国政治法律学会一届五次理事会，并讲话。会议听取了我国出席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理事会议代表团的报告，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通过了拥护宪法草案的决议。

六月三十日 致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法律组，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草案)》已经政法委员会主持修改过，请法律组组织研究后报政协常委会商定意见，以便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颁布。

六月 为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进攻滕县时牺牲的红军战士王麓水赋诗纪念。

七月二日 对《中国青年报》记者发表谈话，阐述在宣传宪法和法律中如何尽量通俗一些的问题。认为，所谓通俗就是联系群众本身的体验把道理说得清楚一些。不要企图以几篇文章或几次报告就能让大家完全了解宪法，要一步步经过长期的宣传解释。指出：宪法并不是空洞的东西，与每个公民都有极密切的关系。宪法写的就一定要做。每个公民都有权利管国家大事，但也要尽义务。列宁说：只有按法律生活的人，才是文明人。

七月五日 致函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报告关于法院、检察机关、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三个组织法草案修改情况。同时说明近来健康情况不好，请准予休养一个时期。

七月六日 和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林伯渠、陈云等到车站欢迎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归来。

△ 致函彭真、罗瑞卿并转政法委员会分党组干事会，说明经报请中共中央批准赴北戴河休养。在休养期间，政法分党组干事会书记和政法委员会主任职务，均请彭真代理。

七月八日 主持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总结会议，决定将慰问工作情况写成书面总结报告，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和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常务委员会和全国人民汇报。

△ 下午，列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听取周恩来总理就出席日内瓦会议以及访问印度、缅甸和举行中越会谈等项问题的报告。

七月九日 和林伯渠、陈云等到机场欢送周恩来总理前往日内瓦为争取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实现继续开会。

七月二十日 被湖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八月一日 到机场迎接周恩来总理参加日内瓦会议后又访问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苏联、蒙古等国后归来。

八月二日 到机场欢迎前来我国访问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副总理兼代理外交部部长范文同。并出席范文同副总理及其来访人员对我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和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拜会。晚，出席周恩来总理招待范文同副总理举行的宴会。三日，应邀出席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临时代办为范文同副总理访问中国举行的招待会。四日，到车站欢送范文同副总理一行离京返国。

八月十一日 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会

议听取和批准周恩来的外交报告；通过《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关于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决议》等。

八月二十二日 出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五十八次(扩大)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解放台湾联合宣言(草案)》。

九月一日 应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邀请，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离京，参加保加利亚国庆十周年典礼。

九月四日 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乘飞机到达索非亚。

九月五日 上午，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在保加利亚部长会议副主席达米扬诺夫等陪同下，拜谒季米特洛夫陵墓并献花圈。随后，又在瓦·科拉洛夫的墓前献了花圈。

九月六日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成员李书城、曹祥仁、阎宝航与保加利亚部长会议主席契尔文科夫、第一副主席特莱科夫等会见。

△ 同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格达米扬诺夫等会见。会见后，应邀出席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举行的招待宴会。

九月八日 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出席保加利亚解放十周年庆祝大会，并在会上致词。代表中国人民、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主席，向保加利亚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和敬意。

九月十日 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乘飞机离开索非亚返国。到机场欢送的有保加利亚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特莱科夫、副主席达米扬诺夫以及外交部部长、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等，在机场检阅了仪仗队。

△ 中国政府代表团除参加保加利亚解放十周年庆祝典礼和国事活动外，先后在索非亚、季米特洛夫格拉德和普罗夫等地访问

了工厂、农村，参观了名胜古迹，同各地劳动人民进行了接触，受到了热烈欢迎。

九月十三日 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回到北京。

九月十四日 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临时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九月十五日至二十八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董必武出席并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大会听取了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经分组会议和大会热烈讨论，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大会还听取了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等重要法规。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宋庆龄等为副委员长，董必武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鼎丞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

九月十九日 晚，和李济深、黄炎培、陈叔通、贺龙、陈毅、叶剑英等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保加利亚人民军迪亚科夫中将及人民军歌舞团负责人与部分演员。在观看演出后，主持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主席团为招待保加利亚人民军歌舞团举行的酒会，并致欢迎词，赞扬从“保加利亚人民军歌舞团的精彩演出中，听到保加利亚人民和平劳动的欢乐声，他们坚定地走社会主义胜利和保

卫世界和平事业的步伐声；同时也看到了富有民族色彩的保加利亚的音乐、舞蹈，在歌扬劳动、歌扬和平的主题下达到的辉煌成果。”

九月二十四日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五年来政治法律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和加强守法思想问题》的发言，指出“五年来的政权建设的经验证明：凡是认真发扬了民主，把人民政府的一切重大问题都提交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在大会和小组会议上展开讨论，并且充分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地方，那里人民的积极性就能得到发挥，政府工作就有朝气，就可以少犯官僚主义的错误。”“在我们人民民主国家中，任何不重视人民民主权利，违反人民民主制度的现象都是不能容许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只有虚心接受人民群众的批评和监督的义务，没有拒绝和抵抗批评和监督的权利。任何掩盖缺点和错误，拒绝批评的行为，都是错误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批评者实行的压制和报复，不仅是错误的，并且是一种犯法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容许的”。“事实证明，革命法制对于维护革命秩序，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利益，保障国家经济建设是有决定意义的。”提出：“现在国家已进入有计划的建设时期，我们的宪法已经公布，今后不但可能而且必须逐步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以更有效地保障国家建设和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利”。“为了保障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顺利进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利益不受侵犯，进一步加强政治法律工作，已成为我们当前的重要任务。”

九月二十五日 和刘少奇、宋庆龄、周恩来等陪同毛泽东接见应邀来我国参加建国五周年国庆典礼的以格·阿波斯托尔为首的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代表团。

△ 下午五时半，和刘少奇、宋庆龄、周恩来等陪同毛泽东接见应邀来我国参加建国五周年国庆典礼的以政府副总理瓦·柯别茨基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代表团。

九月二十七日 上午，到机场迎接应邀来我国参加建国五周年国庆典礼的以扎·桑布为团长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和刘少奇、李济深、周恩来等陪毛泽东接见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

△ 下午五时半，到机场欢迎应邀来我国参加建国五周年国庆典礼的以达米扬诺夫为团长的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

△ 晚上九时，和刘少奇、周恩来等陪同毛泽东接见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

九月三十日 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陪毛泽东接见应邀来我国参加建国五周年国庆典礼的以赫鲁晓夫为团长的苏联政府代表团。

△ 和毛泽东、朱德等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周年国庆招待会，刘少奇主持招待会，周恩来作报告。

十月一日 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国代表团，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周年庆祝大会并检阅了武装部队和群众游行队伍。

十月二日 和刘少奇、周恩来等及各界群众六千多人参加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的开幕式。

△ 晚，和刘少奇、宋庆龄等出席周恩来总理为招待应邀前来的各国政府代表团举行的宴会。

十月三日 出席毛泽东为招待各国政府代表团举行的宴会。

十月四日 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及赫鲁晓夫等一起出席观

看苏联国立民间舞蹈团在怀仁堂举行的演出。

十月五日 致函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并转刘少奇，建议在中国科学院成立法学研究所，筹备工作由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担负。

十月七日 应邀出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我国大使为庆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五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十月十一日 为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将召开各省、市以上法院院长和司法厅长座谈会报告中共中央，说明该座谈会主要研究法院组织法，统一思想认识，并研究法院的设置和各项制度的典型试验问题。

十月十二日 应邀出席苏联驻我国大使尤金为前来我国参加建国五周年国庆典礼的苏联政府代表团举行的招待会。

△ 到机场欢送蒙古、匈牙利、保加利亚三国政府代表团回国。

十月十三日 到机场欢送苏联政府代表团回国。

十月十九日 出席周恩来总理为招待来我国访问的印度共和国总理尼赫鲁举行的酒会。二十日，出席周恩来总理为招待印度总理尼赫鲁举行的盛大宴会。二十二日，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朱德副主席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刘少奇委员长为尼赫鲁总理举行的茶会。二十三日，出席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为欢迎尼赫鲁总理举行的宴会。

△ 就苏联专家鲁涅夫的工作情况向中共中央作报告。

十月二十四日 在致董贤煦的信中，针对他要求介绍找银行贷款的事，指出：“请你注意，现在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在国家机关工作的人，必须为人民服务，除了法律规定的职权外，任何人没有特权。”并说：“我在国家机关中负一部分领导责任，我的生活还是供给制。这就是说，政府只能就一个高级干部生活所必需的

予以供给，对同级的高级干部给予同样的供给，也没有特殊的供给。为了救你之急，在我们生活费里拨二十万元^①给你用。这点当然不能解决你当前的困难，但我又有什么更多的力量来帮助你呢？”

十月二十五日 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伯渠、彭德怀、彭真、邓小平等一起，参观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

十月二十六日 给政法分党组干事会所属各部委党组发出通知，说明自十月二十五日起政法分党组宣告结束，停止工作。

△ 应邀出席尼赫鲁总理在北京举行的告别宴会。

△ 因病请假休养。

十一月十六日 就最高人民法院建立新的党组成员问题向中共中央报告。

十一月十九日 在全国省(市)以上法院院长和检察长参加的司法座谈会和检察座谈会上讲话，指出召开这两个会的目的是研究对法院组织法和检察院组织法的贯彻执行问题，这两个法的基本精神都是为了“便利人民”。阐述了法院组织中规定的“合议制”、“陪审制”、“辩护制”、“公开审判”、“审判委员会”等制度对防止错判的意义。并强调为了防止错判，还要一解决立法问题，二解决人的问题。指出“如果办案没有法律的根据，光凭审判员处理，对于同样案件的处理标准可能悬殊很大。”“有了法，还必须具有具备起码法律科学知识的人去运用，否则就不可能不判错案。这是一个比立法更不易解决的问题。”“要解决人的问题，须靠各方面

^① 指解放初流通的旧人民币，折合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起发行的新人民币为二十元。

的努力。”

十一月二十六日 和陈云、李济深等应邀出席蒙古人民共和国驻我国大使奥其尔巴特庆祝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十二月二日 和朱德、刘少奇等出席周恩来总理欢迎前来我国访问的缅甸联邦总理吴努和夫人举行的宴会。三日，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朱德和夫人康克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为缅甸联邦总理吴努和夫人举行的茶会。

十二月五日 前往吊唁中国人民解放军财政部部长杨立三逝世。

十二月十日 应邀出席缅甸联邦总理吴努和夫人在北京举行的告别宴会。

十二月十一日 出席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为缅甸联邦总理吴努和夫人举行的宴会。

十二月十六日 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预备会议，听取和讨论政协副主席陈叔通的报告。

十二月二十一日 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并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主持本日大会。大会听取陈叔通所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工作报告》；章伯钧所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的说明。周恩来在会上作政治报告，指出：由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已经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政权机关的作用已经消失，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本身的统一战线作用仍然存在。

十二月二十二日 继续出席全国政协二届一次全体会议并发言，阐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性质和作用，肯定政协成员的进步，着重指出：政治思想上的一致是巩固我国团结的基础，为了求得政治思想上的一致，必须深入群众，在实践中提高自己，以宪法为标准，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认真地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工作。“由于宪法的公布，建成幸福、繁荣的社会主义社会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目标。因此，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关’，我们大家正在过而且还没有过完，前途的光明是毫无疑问的。”

△ 出席政协二届一次全体会议主席团第二次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改选和设名誉主席的说明。讨论通过候选人名单、选举方法及监督人名单等。

十二月二十三日 出席政协二届一次全体会议主席团第三次会议，讨论修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宣言(草案)》，会议原则通过《关于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等。

十二月二十四日 出席政协二届一次全体会议主席团第四次会议，讨论关于增加常务委员的人选问题；关于推举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的问题；关于大会提案的处理问题等。

十二月二十五日 出席政协二届一次全体会议主席团第五次会议。会议听取彭真说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草案)》的修改情况，周恩来说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言(草案)》的修改情况等报告，并讨论通过两个草案。

△ 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

会名誉主席，周恩来当选为主席，宋庆龄、董必武等当选为副主席。

十二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 出席中苏友好协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九五五年 七十岁

一月四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决定了关于颁发中共中央管理的干部职务名单的通知等文件。

一月十二日 出席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时局问题的报告。

一月十七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统战工作的指示和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

一月二十六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了罗瑞卿关于文化保卫工作和中央军委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

二月二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了进一步加强市场领导、改造私人工商业、改进农村供销工作的报告等文件。

二月七日 同最高人民法院华东、东北工作组全体同志谈关于搜集各法院现行诉讼程序的实际资料问题。日前，为准备在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会议上谈搜集整理全国各大中城市人民法院怎样进行诉讼和审判的经验，草拟了发言提纲，指出法院依法审判，包括依实体法，也要依程序法。“诉讼程序应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在没有制定之前，各级法院自定诉讼程序是很好的，是对工作负责的，并且为国家处理了七百多万件案子，工作有成绩。现在搜集各级法院自定诉讼程序的资料，不是为着批评，而是为着学习，如能总结出一点什么东西出来，对法院审判工作有很大益处。要大家

不要怕，不完全也不要紧，有错误也不要紧。”在谈话中，向两个工作组全体同志指出进行这项工作的目的是：（一）给国家立法机关提供草拟诉讼程序法的可靠资料；（二）督促各级法院实施法院组织法；（三）总结各法院自身实行的诉讼程序的经验，以求得大体一致。还指出这一工作必须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必须如实地反映客观的真相，搜集各法院在诉讼程序方面的真实材料。他们怎样做的，照原样记录下来。

二月十二日 出席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和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联席扩大会议。听取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郭沫若作《加强和平力量，粉碎原子战争威胁》的报告。会议通过《关于发动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签名运动的决议》。和到会人员一起在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签名册上签名。

晷 为帮助黄维一（一九三八年经董必武介绍由蒋管区赴延安的青年）的亲属寻找黄维一，写信给《人民日报》，询问可否代登寻人启事，同时附上代拟的寻人启事，并请告知需费多少，以便照付。启事刊出后，收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三〇六团政治处来信，告知黄已在一九四五年上党战役中牺牲。当即转告烈士家属，请与有关部门联系办理优抚事宜。

△ 指示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政策研究室，搜集建国以来全国各类刑事案卷，就罪名、刑种和量刑幅度进行调查研究，并准备作出初步总结，一是为给国家立法机关起草刑法提供资料，二是设想在我国刑法颁布之前，提供各级人民法院进行刑事审判定罪量刑之参考。

三月十日 出席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举行的孙中山逝世三十周年纪念大会，并讲话。高度评价孙中山“是近代中国伟大的民主

主义革命家”，在无数为了实现在当时所能提出的进步理想而英勇奋斗的先行者中间，是“一个最卓越的代表人物”。孙中山虽曾遭遇多次失败，但是他对自已的事业的正义性始终抱着坚强的信心，任何失败都没有使他退却。认为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帝制，它虽然最终失败，但是“对于推动中国广大人民的觉醒，对于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秩序，是起了重大作用的”。强调指出：“在近代和现代的中国的历史条件下，真正的爱国者，一定要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任何人，如果害怕帝国主义，不敢同帝国主义的利益发生冲突，而同帝国主义妥协，甚至企图巴结帝国主义，那就不可能做出任何真正对中国有益的事情”。“帝国主义是很强大的势力。为了彻底地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就必须找到一种能够对抗帝国主义的强大力量来做依靠”。“孙中山终于找到了一种强大的革命力量，依靠这种力量就能够对抗帝国主义的强大势力。这种力量就是国际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就是中国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还指出：“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在这时候放弃了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型来改造中国的计划”。“他已经看出了只有依靠工人农民群众的力量，才能够把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境地中挽救出来，才能够给中国人民创造自由幸福的道路”。现在中国人民已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枷锁，正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社会主义对于我国已经不是一种理想，而是生活中的真实。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中国人民大众是中国历史上一切进步事业的继承人。我们的伟大祖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一天天更加繁荣强大，就是对于孙中山先生的最好纪念。

三月十一日 主持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宣布审判委员会正式成立，说明了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指出人民法院

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这一宪法原则和审判工作集体领导的原则是完全一致的。

三月二十一日至三十一日 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全国代表会议还选出了以董必武为书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

三月二十八日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了《司法工作必须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发言。指出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和中央各司法部门在结束了司法改革以后，在一九五三年四月第二届全国司法会议的决议中，就强调提出司法工作必须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方针。党的总路线提出后，也就更明确了这个方针。通过审判活动，配合公安工作和检察工作，镇压危害国家安全和破坏经济建设的罪犯，审理了大量有关案件，并针对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工作中的漏洞，向主管部门提出改进工作和预防犯罪的建议。为了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还建立了铁路运输法院和水上运输法院，最近人民法院设立了铁路、水上运输审判庭，各省市法院设立了经济建设保护庭或组，公证机构也在一些大、中城市和县里成立起来，这些机构的建立和公证工作的开展，在保障经济建设的工作上起了一定的作用。还指出：“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草案经过中央批准，再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计划就成为法律。”“司法工作人员应根据两年来为经济建设服务的经验，大力克服本身存在的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提倡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从审判方面配合其他各个部门的工作，保障五年计划的完成。”最后提出在政府部门和较大企业设立法律室、公断机构以保障各种经济合同顺利执行的设想。

四月四日 中共七届五中全会批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三项决议和选出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人选。

四月十五日 主持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听取文字改革委员会负责人报告文字改革问题。

四月二十五日 主持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讨论有关总结诉讼程序实际经验的问题。

四月下旬、五月上旬 先后两次接见被美国政府无理囚禁又被驱逐出境、经历无数艰辛自海外归来的著名电影工作者王莹和她的丈夫谢和赓。第二次在家中接见时，设便宴欢迎王、谢归国，并请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志让以及李克农、田汉等作陪。席间，建议王莹将她们在美国的遭遇写出来，以揭露美国当局迫害中国留学生和美国监狱的黑暗情形，以及美国所谓“民主”、“自由”、“正义”的真相；同时告诉人们美国人民的绝大多数是同中国人民友好的。

五月二十七日 在全国司法座谈会上讲话。首先介绍了国际和国内政治形势，然后向到会人员提出座谈会的两项任务：一是检查各地学习和贯彻人民法院组织法的情况；二是研究十四个城市法院审判程序的经验总结。

六月一日 出席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向大会表示热烈祝贺并讲话说：建国以来科学事业有了空前发展，但还远赶不上国家建设事业的需要，科学家要继续奋斗，协力合作，广泛团结，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发挥学部的领导作用，做出新贡献。科学家还要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进一步开展学术讨论和批评与自我批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批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想，提高学术水平，为完成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

六月十六日 复函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来信，指出二十年代初武汉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主办的《武汉星期评论》由刘子通、黄负生担任编辑，并说明自己不是《武汉星期评论》的主持人。

六月二十二日 在《人民日报》发表《旧金山会议十周年》一文。回忆了参加旧金山会议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经过，叙述了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指出在十年以后的一九五五年，联合国并没有尽到它维持世界和平安全的重大责任。中国一贯支持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在纪念联合国宪章通过十周年的时候，应该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地位和权利，应该使联合国真正成为一个有效的国际组织而在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的事业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成为名符其实的联合国。

七月二日 主持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讨论《关于北京、天津、上海等十二个大中城市法院民事案件审理程序的初步总结》和《关于北京、天津、上海等十四个城市法院刑事案件审理程序的初步总结》。

七月三日 向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最高人民法院自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以来的工作》书面报告，并附上《关于北京、天津、上海等十四个大城市高、中级人民法院刑事案件审理程序的初步总结》。报告说，各级人民法院学习和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是有很大成绩的，“凡是已经开过了人民代表大会的地区，都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分别选举了当地的高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的院长；有的人民法院的组织机构也有若干加强；建立了或正在建立着各项审判制度；提高了干部的政治觉悟和法制观念，并丰

富了法律知识；初步改进了审判作风，提高了审判工作质量。”指出：“审判委员会的活动，对加强审判工作的集体领导起着重要作用”。“实行合议制不仅能充分地发挥集体智慧，保证办案的准确性，而且能加强审判员的工作责任心和工作计划性，审判案件的效率不仅没有降低，反而逐步提高了。”“实行案件的公开审理，可以把我们人民法院审判活动置于群众监督之下，并便于向旁听群众进行生动具体的法制教育。”在贯彻“两审终审制”后，“上诉第三审案件大为减少。这就可以避免诉讼拖延，以致影响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各级人民法院，必须加强政治思想领导，认真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国家政策、法律、法令，严格掌握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实事求是，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原则，以改善审判作风。

七月九日 写信给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负责人，指出五月二十七日《在全国司法座谈会上讲话》以及副院长马锡五《关于刑、民事案件审理程序经验总结的说明》两个文件在下发前，应请副院长张志让和三位非党员顾问过目审阅，看有无异议或需补充修订之处。

七月二十二日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发言指出：人民法院和公安、检察机关，在保障实现五年计划方面，具有非常重大的作用。总结了两年多来各级法院在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方针指导下，通过审判有关的案件，起到了积极配合作用，但也存在一些缺点和困难，有待今后逐渐克服。恳切希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以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严加监督和批评，以便法院能够消弭缺点，纠正错误，不断改进工作。

七月三十一日 中共中央召集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九月八日 和苏联法律专家鲁涅夫谈话，介绍中国法律机构的设置，法律工作的历史情况、现时情况和前景。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摧毁了旧政权，建立了新政权，摧毁了旧法院，建立了新的人民法院、检察等司法机构。建国之初，当时最中心的是恢复经济和生产，接着就是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运动相继展开。接着又进行了三反运动和五反运动。这说明我国建国以来一直是在紧张的运动中。“运动不是依靠法律，而是依靠广大群众搞起来的。运动有一个特点，就是突破旧的法律。”“我国的法律都不是事先想好，写好法律再去做，而是先做起来，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制成了法律。”强调指出：我们必须向健全法制的方向去努力，同法制不健全的混乱现象作斗争，要同违法现象做斗争。“我们从旧中国接收下来的是那样的遗产，在这几年有了这样的成绩，照我看，今后中国法律工作是有远大前途的。”

九月十九日至十月三日 代表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到乌鲁木齐市参加祝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成立活动。二十日，在新疆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讲话，赞扬新疆各族人民解放后几年来各方面取得的进展，指出这是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列主义制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以维吾尔族为主体成立自治区是符合国家的民族政策的。强调“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这个政策，这不仅是因为我们必须尊重各民族应该享有的平等地位和权利，而且只有这个政策，才能不断增进各民族间的互相信任和团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后新疆各族人民的任务是，积极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国家计划中规定的新疆地区的建设任务，发展自治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继续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大量培养干部，坚持广泛的统一战线，巩固国防，建设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指出“十分认真地在干部中和人民群众中进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防止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倾向，不仅过去是并且今后仍然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党和人民政府的重大任务”。号召各民族加强互相合作，巩固民族团结，提高革命警惕，防止敌人破坏，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为完成祖国和人民交给的建设新疆、建设祖国的任务而奋斗。在新疆期间，还先后视察了工业、农业、部队、学校的一些单位，接见了部分工业牧业劳动模范、民主人士和宗教界人士。

十月一日 出席乌鲁木齐市各族人民庆祝建国六周年和自治区成立大会，在大会上讲话，勉励新疆各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一起，努力巩固和建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祝贺新疆各族人民在实行区域自治和建设事业中获得光辉的成就。

十月三日 离乌鲁木齐。夜宿酒泉。

十月四日 返京途中到达兰州。在兰州停留期间听取了甘肃省政法部门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后，发表讲话。指出：办案要特别注意的两个界限，一是要弄清无罪还是有罪，不能把无罪的判成有罪；二是要弄准该杀不该杀，不该杀的杀了就严重。还给政法干部写了题词：“有反必肃，有错必纠。”

当听到宕昌县的一个案件因为群众求雨谢神唱戏，干部强行制止，一个乡文书挨了打，因而被认定为现行反革命活动，有四人被判处死刑，一人被判处无期徒刑、两人被判处有期徒刑时，当即发表意见说：农民有封建迷信思想，只靠政府下命令，强行干涉是不行的。天不下雨，庄稼枯萎，农民急得要死，干部强行干涉挨了打，这怎么能算是反革命活动？怎么能判死刑和徒刑？当场书写一副对联：“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冤枉一个好人”。随后，甘肃省有关负责人组织了省、地、县三级工作组

对此案进行了调查,由省法院作出裁定,除一人判处劳役半年外,其余六人宣布无罪释放。当地干部群众说:“董老一副对联救了四条人命。”另外,武都县有一起案情与宕昌案件大致相似的案件,也得到纠正。

十月七日 回到北京。出席中共十月四日至十一日召开的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全会还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关于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办法的规定》,基本通过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

十月二十二日 主持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听取了周恩来关于目前时局问题的报告以及农业负责人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试行草案修正稿)的说明。

十一月十四日 出席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召开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筹备工作的报告。

十一月十七日 主持全国政协和各民主党派同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访华团(团长片山哲)共同召开的座谈会,致欢迎辞并在座谈中解答了访华团提出的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和选举方面的问题,以及中共党员能否参加民主党派、民主党派成员能否参加中国共产党等问题。

十一月十九日 主持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八次会议,讨论《关于铁路责任事故案件的审判经验总结》。

十一月二十五日 出席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扩大)会议,讨论召开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有关问题。

十二月七日 写信给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并报毛泽东，建议在党中央设立法律委员会或法律工作组，以加强党中央对国家法律部门的统一领导。

十二月二十二日 和张鼎丞、罗瑞卿联名向中共中央写信建议，各地原有的军管会历史任务已经完成，目前以一律撤销为宜。

十二月二十六日 在最高人民法院邀请司法部、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法律室刑法组、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等有关单位负责人举行座谈，研究关于罪名、刑种、量刑幅度等问题。

一九五六年 七十一岁

一月十日 出席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讨论向即将召开的政协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提出的委员增补名单以及常委的工作报告等问题。

一月十一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了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一月二十二日 给中共红安县委写信，对他们制定该县一九五六~一九六二年农村生产规划草案表示高兴。但强调要注意实事求是。指出规划中列入发展棉花和山羊的项目，红安不是我国传统产棉区和养羊区，规划中棉花平均亩产由一九五五年的十六斤，发展到一九六二年的一百五十斤，山羊由一九五五年的一千五百只，发展到一九六二年的四十万只，可靠性如何？另指出由初级社转高级社的期限问题，也值得研究。

一月二十四日 主持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会议听取了秘书长徐冰关于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筹备情况的报告，并通过关于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会期、议程、常委会工作报告等项决议。

一月二十五日 出席最高国务会议。讨论中共中央提出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一月三十一日 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

作《关于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从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三年进行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扫除了一大批比较暴露的反革命分子，狠狠地打击了国内外阴谋破坏我国人民民主事业的敌人，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为了彻底粉碎残余反革命分子的活动，保障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顺利进行，我们从一九五五年夏天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在详细阐述了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活动特点和政府对反革命分子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后强调指出：“总之，要使处理完全符合于实际情况，完全符合于国家的政策，实事求是，以达到惩罚犯罪，保护善良的目的。”

二月六日 出席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关于政治报告、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以及关于提案审查报告的决议。

二月八日 对法院审判人员提出必须“随处留心观察”的要求，阐述了重证据不轻信口供是人民审判员审判时必须遵守的原则。但仅仅遵守这一原则是不够的，还必须从案件的各个侧面观察，找出它们之间的关系和发展，才能作出比较客观的判断，最忌的是粗枝大叶，漫不经心。还引用《聊斋志异》的《折狱》篇中几句话的意思说：事情没有什么难办的。重要就在要随处留心观察。办案随处留心观察，便是绝大本领。

二月 最高人民法院根据董必武的指示，整理出《关于刑事案件的罪名、刑种和量刑幅度的初步总结（初稿）》，送北京、上海、天津等二十三个高级人民法院、部分中级人民法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铁路运输人民法院和中央政法干部学校、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北京大学法律系、北京政法学院征求意见。

二、三月间 因病,由何连芝陪同,到杭州作短暂休养。二月十二日,到上海参观中共“一大”会址,并题词:“作始也简,将毕也巨。”“马列主义只要有人会在劳动人民中传播,革命的道理就会在群众间生根,群众的革命运动就会发荣滋长起来。”病稍好,即听取浙江省委负责同志介绍浙江情况,并进行视察。

三月五日 赋诗《七十自寿》五言绝句七首。并作序:“一九四四年一月在重庆,友好为我六十生日称觞,多赐诗祝寿。当时重庆政治空气恶劣,友好晤面不易。借祝寿集会为避禁网之一法,实则彼时我距六十尚有两年,故漫应之。酬诗中借用东坡“我似老牛鞭不动”一句,今忽忽十二年,我已届七十矣。回忆坡翁句,仍符我状。特用为韵,得小诗七首以自傲。”诗中有:“出身旧家庭,世网重重裹。冲决诸网罗,首要在忘我。”

三月五日至八日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在北京举行第二次年会。继续被选为中国政治法律学会会长。

三、四月间 由杭州到武汉视察。

四月十四日至十六日 自武汉回红安。这是解放后第一次回到故乡。在红安和地方知名人士座谈了解放前后的情况,听取了县委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当听到红安在历次革命战争中共牺牲八万多人,七里坪、紫云等区不少村庄,人都被敌人杀绝;现在有人证实的烈士就有一万多人时,深为感叹。对县委负责人建议修复旧居一事,再三劝说:“过去多次讲过不要修,现在再讲一遍,还是不修为好。红安是个老苏区,当年为革命牺牲的烈士很多,要修就修个烈士祠,或叫作革命博物馆也可以。”在红安期间,还对保卫工作发表了意见,说:“想和群众见见,是我的本意,和群众在一起机会难得嘛!”“人民群众是国家的根本。我们党的干部,包括中央的干部,都是从群众中来的,是为群众服务的。所以我们的保卫工作要

立足于群众，这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过去打江山，我们是依靠群众；现在搞建设，我们同样依靠群众。国以民为本，人民群众是革命的本钱！”临行前，在县城接见了老红军和部分烈属、干部、群众的代表，还接见了老学友、老邻居；回家探望了嫂嫂和亲属。

五月四日 根据视察浙江、湖北时听到看到的情况，写信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转中共中央各负责同志，希望党中央考虑不要把许多事情都推在省委书记个人身上，中央各部门会议的决定，应由党中央或国务院批准后再下达执行，免得给下面造成很多困难。建议对文史馆员和参事室人员的退休待遇问题考虑一个办法，使他们的生活不发生困难，各地可组织这些人编写地方志。信中特别提出老区人民生活仍很困难，建议组织工作组到这些地方工作一个时期，增加对这些地区的救济工作，请内务部会同有关省人民委员会普遍调查一下老区人民生活问题，帮助老区人民解决生活困难。

五月五日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上作《关于第三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同时提出了《一九五五年肃清反革命分子斗争审判工作经验初步总结》。

五月八日 出席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和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的联席会议。

五月十日 主持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扩大会议，听取了华侨事务委员会负责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侨务工作报告。

五月十一日 接见以阿德南·库阿特利为团长的叙利亚法律工作者代表团。

六月二日 主持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讨论《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对日籍战争罪犯的审判程序》（修

正稿)和“判决书格式”(试拟稿)。

六月十五日至十六日 同各省、市法院院长谈话,指出:法院是专政的工具,法院专政的职能是针对反革命的,实行各种审判制度就是为了专政得更好些,用更民主的方法维持社会秩序,在社会秩序安定的条件下,生产建设就能更好的进行,这就是为经济建设服务。我们搞社会主义,敌人不会睡觉,我们的脑筋要经常清醒。还着重谈了改善审判作风的问题,批评审判作风中存在的“先入为主”、“强迫命令”、“诱供逼供”、“变相肉刑”等现象,再次强调:法院在肃反中,要认真贯彻法院组织法;在具体工作中一方面要查清楚是不是反革命,防止捕错了;另一方面抓紧弄清楚该不该杀,以免错杀。并提出:“遇有经党委确定要杀的案子,法院发现确有可不杀的事实根据时,应向党委提出意见,党委确定还要杀时仍可声明保留意见向上级党委反映。这是对党负责,不是闹独立性。”

六月二十二日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就人民法院执行国家有关处理反革命分子的政策、法律、法令的问题,人民法院在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执行法律制度的问题以及审判监督的问题,作了系统的发言。关于执行法律制度问题,着重指出:“在这次肃清反革命分子斗争的审判工作中,各级人民法院都是遵照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所规定的审理程序进行的。人民法院组织法所规定的公开审理、陪审、合议、辩护、回避等项审判制度,已成为各级人民法院审理刑事案件的通常制度;从审查起诉、开庭审理、合议到审判的全部审判过程,是在群众监督和被告人获得辩护的情况下进行的。”各级人民法院还大大加强了对审判工作的监督活动,包括受到来自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发言还指出:人民法院继续保持警惕,运用审判职能,依法惩治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仍然是一个重要任务,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人民

法院为了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保护公民的权利和合法利益，还必须继续努力同一切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违法和犯罪行为进行斗争。强调指出：“完成上述任务的关键在于加强法制建设，提高审判工作质量，保证办案的妥当，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日益蓬勃发展的需要。”

七月六日 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成立，任委员。出席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确定法律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办理中央交办的工作，研究法律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部门的分工制约等问题。

七月九日 在最高人民法院第六十六次党组扩大会上发言指出：在我们执行职务时，如果怕当事人自杀，就不敢下判决，或者不按照法律判决，那都是不对的。法院判决案件不应受当事人以死相威胁的影响。有些人对判决不满意，经过各种办法说服仍然要乱闹，就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不然，我们这个国家机关就将一件事情也不能办了。因为判决很难使双方都满意。不能说我们执行了法律就脱离了群众。只是为了把社会生活放在一定的秩序上去，就是在人民内部也应当遵守一定的秩序。至于说要取得意见一致，首先是取得法院内部的意见一致，其他机关的意见仅仅是一种意见，就是法院判决的意见也是少数服从多数，没有必要等意见完全一致后才判决。

七月十一日、十二日 连续出席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扩大会议，听取公安部负责人关于处理城市反革命分子的办法(草案)说明，并进行讨论。

八月二十二日 出席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会议通过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准备向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政治报告。

九月八日 出席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会议通过了第七届中央

委员会准备向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党章修改草案和修改党章报告。

九月上旬 在中共八大召开前夕，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采访，回忆了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成立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情况。最后谈了对中国青年的几点希望：要有理想，要实事求是；避免主观片面性；要认真学习，专一门，在自己的岗位上学习好，工作好。

九月十三日 出席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会议通过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准备向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草案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 出席中国共产党在北京举行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十五日，被选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十七日，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向大会作关于代表资格审查的报告。十九日，在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言，在叙述了人民民主法制的形成和作用、工作的基本经验之后，指出了法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党内不重视、不遵守法制的根源。又指出：我们还缺乏一些急需的较完整的基本法规，如刑法、民法、诉讼法、劳动法、土地使用法。认为法律不完备的状态，在新建的国家内是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时候的，但是，现在无论就国家法制建设的需要来说，或者是就客观的可能性说，法制都应该逐渐完备起来，法制不完备的现象如果再让它继续存在，甚至拖得过久，无论如何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必须建立健全的法制，才能更有效地发挥国家的职能和保护人民的权利。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有少数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对国家的法制有不重视或者不遵守的现

象,并且对于这些现象的揭露和克服,也还没有引起各级党委足够的注意。”并严肃指出:“不重视和不遵守国家法制现象的发生,既然有深厚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加以现在新干部数量很大,他们的经验较少,而我们对于宣传教育工作又做得很不够,所以对于这些现象我们就更不能等闲视之,必须努力设法加以清除。也许清除这种现象需要较长久的时间,但是现在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方法着手清除,而等待以后去清除,那就给予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损害将会更大。我们国家法制是人民意志的表现,所以违反国家法制,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提出,为了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党就必须采取积极的措施,健全我们的人民民主法制。公安、检察、法院和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依法办事,这是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的中心环节。依法办事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是必须有法可依,我们党应赶快把国家尚不完备的几种重要的法规制定出来,限期写出草案,经中央审核后提请立法机关审议制定;第二是有法必依。“今后对于那些故意违反法律的人,不管他现在地位多高,过去功劳多大,必须一律追究法律责任。”二十七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九月二十八日 在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当选为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

十月中旬 在欢迎苏联法律工作者访华代表团的会上讲话,向客人介绍了最高人民法院的组织情况、活动情况和我国法制建设情况。

十月二十二日 出席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会议讨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的筹备工作。

十一月十日 出席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听取刘少奇报告不久前访问苏联，就波、匈事件等问题同苏联领导人会谈的情况；以及周恩来关于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发展和财政预算控制数字的报告。

十一月十六日 出席人大常委第五十一次会议和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的联席会议。会议讨论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视察工作的安排等问题。

十一月十七日 代表中共中央在全国烈军属、残废军人、复员军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上讲话。称赞烈属、军属、残废军人和复员军人在中国人民的伟大解放斗争中贡献过巨大力量，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又作出了许多成绩，是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勉励和号召他们：要严守岗位，安心工作；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刻苦学习，努力掌握新的科学技术；虚心向群众学习，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勇敢、忠实地保卫祖国，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为革命事业奋斗到底。指出党和政府要进一步做好优抚和复员安置工作，关心烈属、军属、残废军人、复员军人的生活、生产和工作，切实解决他们的困难。

十二月二十日 离北京赴武汉。

十二月二十八日 出席湖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开幕式。

十二月二十九日 《人民日报》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一九五七年 七十二岁

一月六日 在湖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讲话，认为争取农业丰收的决定性因素是农民组织了合作社，发展农业生产，要发挥合作社的优越性。还谈到节约粮食、增产节约，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加强人民法制等问题。

一月九日 在武昌接见一千七百多名湖北省各界青年和共青团干部代表，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也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社会主义包括两个任务，一是改变生产关系，一是进行技术改革发展社会生产力。要进行技术改革就需要科学知识。因此青年人必须更加努力地学习科学知识，攻破科学堡垒。他告诉青年：我们的社会主义还有很多困难。第一个困难是我们对国内的资源情况还不够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求人们考虑问题要合乎客观情况，不了解情况做事情是很困难的。第二个困难是工作没有经验。我们可以借助于别人的经验，但不能生硬地搬过来，要靠我们去摸索。克服上述两个困难，需要较长的时间。长期的困难要克服，眼前的困难也要渡过。指出：“常常把革命过程中的困难问题提出来加以考虑，对于建设社会主义事业是有很大帮助的。”他告诫青年注意：“现在有些国家的青年想不依靠共产党的领导自搞一套，我认为那种搞法是不利于青年、不利于革命的。因为不依靠共产党，青年得不到正确

的思想领导,就会在五光十色的社会现象中瞎摸,徘徊瞻顾,迷失方向,误入歧途,甚至被人利用走上反革命的道路。”殷切期望青年学习革命的思想方法——唯物辩证法,“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观察世界事物,就会正确地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要教育团员和青年积极分子,继承党的革命传统,发扬共产主义的忘我精神,克勤克俭,艰苦奋斗,戒骄戒躁,稳步前进。

一月 为在一九二三年“二七”大罢工中被军阀吴佩孚、肖耀南杀害的施洋烈士墓题诗:“二七工仇血史留,吴肖贻臭万千秋。律师应仗人间义,身殉名存烈士俦”。

△ 在武昌东湖为即将出版的《辛亥首义回忆录》写《读辛亥首义回忆录》:“辛亥武昌首义,推翻满清皇朝,结束我国数千年帝制,是中国革命史上一桩大事。对此大事,我国史书虽有记载大都语焉不详,私人著述亦不甚多,读者每以为恨。今幸首义诸人中之健存者多在武汉,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之请,写出回忆录若干篇,虽事隔幾五十年,人之记忆有限,回忆中不周不尽者容或有之,然各自叙述亲身经历要不失为第一手资料,阅者合原有资料比而观之,参稽互证,不难于其中窥见全豹也”。这篇短文被作为该书的卷首语。

二月上旬至中旬 赴广州和海南视察,并慰问海军官兵。

二月十五日 在海南赋诗《慰问海南岛国防将士》。

△ 游览五公祠和苏公祠,赋诗《游五公祠》。

二月二十日 赋诗《万宁道中望六连岭》,赞颂海南人民坚持革命战争二十三年的业绩。访问藩茅黎族合作社时,赋诗称赞“黎民合组藩茅社,生活年年正向荣”。

二月二十一日 由海南返广州,转到从化温泉作短暂停留。二十二日离开温泉。不久,由广州返回北京。

二月二十七日 出席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

三月七日 出席政协主席、副主席会议。讨论并议决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决议的起草等事项。

三月九日 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最高人民法院一九五六年工作报告》，着重报告最高人民法院一九五五年肃清反革命斗争审判工作的经验总结、《关于罪名、刑种、量刑幅度的总结》草稿和各级人民法院刑事、民事案件审判程序的经验和指导下级人民法院进行审判工作的情况。指出：鉴于国家还没有制定出刑事、民事诉讼法，各级人民法院审判案件的程序极不统一，对人民法院和当事人都带来很多困难，因此，在一九五五年总结十四个大、中城市法院刑事、民事案件审理程序经验的基础上，继续完成了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刑事、民事案件审判程序的总结，经本院审判委员会审定后，除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外，发至全国各级人民法院试行。根据试行的情况看，这个总结虽然不尽完善，但在审判实践中已经显示出它的作用，使各级人民法院在国家尚未颁布诉讼法之前有了一个比较切合实际、大体一致的办案程序，从而能够有效地克服目前各地人民法院在审判程序方面存在的一些混乱现象，给在审判工作中正确贯彻执行人民法院组织法和进一步改进审判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可能性，并为国家立法机关加速进行刑事、民事诉讼法的起草工作，提供了一个便利的条件。

三月十一日 一月九日在武昌接见湖北各界青年和共青团干部代表时的讲话，由《中国青年报》以《目前形势和青年》为题予以发表。

三月十二日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

三次全体会议上作题为《当前政法工作的任务》的报告，指出无论从全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和工作方面看，从肃反斗争等方面看，我国人民民主生活的发展和法制的健全，都取得了新的成就。同时也还存在一些错误和缺点，必须加以纠正。“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经常强调一切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应该成为守法的模范，但应当指出我们有些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忽视和不尊重法制的现象是有的，甚至在有些地方和有些事情上还相当严重。”报告最后强调：“进一步加强我们国家的法制建设的一个迫切任务，就是要大力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使大家都知道什么是合法和什么是违法，使大家都知道严格遵守国家法制就是维护自己的民主权利，就能受到国家的保护。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法制切实地贯彻执行，也才能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对法制执行情况的监督”。

三月十三日、十五日 连续出席政协主席、副主席会议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会议。会议讨论了常委会工作报告和增产节约决议，决定延长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会期。

三月十八日 出席军事检察院检察长、军事法院院长会议，并讲了话。指出：“人类从进入文明社会以后，说到文明，法制要算一项”，“国家没有法制，就不能成为国家。”认为，“对待我们过去所做的工作，要有历史的观点，要从解放生产力的观点来看我们过去所做的工作。过去我们为了解放生产力，就要搞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是一种风暴式的革命运动，它主要是依靠群众的直接行动，而不是依靠法律。”对反动势力，“如果不发动群众起来把它们扫荡掉，那么生产力就无法解放”。“现在的情况变了，国家的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我们要保护群众运动的果实，要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就必须进一步健全人民民主法制。”“我

们的法制体现了我们国家最大多数人的意志”。再三强调我们必须依法办事：“目前我们法律工作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法制不完备，一个是有法不遵守。这两者哪一种现象较严重呢？应当说有法不守的现象比较严重”。“在国家机关工作的人员如果不守法，问题就更加严重。”指出“有法不依就等于无法”。讲话还指出：“部队里要设置军事法院，它的作用在于巩固人民解放军。”“为了巩固人民解放军的纪律，军事审判机关也要按照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进行审判活动”。还指出：“法院的工作是审判，而审判工作的重心是公开审判。军事法院的案件与一般法院有所不同，它常常涉及国家机密，法律规定不公开审判的案件当然不公开，但依法应该公开审判的案件，必须公开审判。”“通过公开审判，可以进行法制宣传教育，使当事人知道犯什么罪，为什么犯罪，使旁听人深刻认识犯罪行为的危险性，从而警觉起来，预防犯罪。”

三月二十八日 在第二次全国党的监察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党在监察工作方面的方针仍然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和七大、七届四中全会文件的精神是一致的，不是严了、宽了的问题，而是对党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还指出做监察工作要执行“严肃谨慎”的方针，要勇于找人家的岔子，同时要实事求是，区别对待，自己犯错误，也要准许别人找岔子。要注意少数民族的特点。机构的设置要注意干部质量，要根据实际需要，暂时不需要的地区，可慢一点设置。还要注意反对监察机构本身的官僚主义。

四月二日 出席政法部门负责人讨论肃反和打击流氓问题的会议，讲话主张不要再用群众运动的办法，我们可以加强司法工作做这件事。

四月三日 出席人大常委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和政协全国委员

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的联席会议，讨论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外出视察工作的情况和问题。

四月五日、六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并批准了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计划，提交国务院会议进行讨论。

四月二十日 为欢迎以浅沼稻次郎为团长的日本社会党访华亲善使节团和日本妇女访华代表团举行酒会，并致欢迎词，希望日本朋友对中国的建设提出意见，对缺点提出批评。

四月二十四日 中共中央批转了董必武关于农村治安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指出：从今年收到的各地材料说明，各地党委对农村治安工作是很注意的；但也可以嗅出有些党委和司法机关有对人民内部问题和敌我问题混淆不清的情况。有的地方成立了“打击现行犯政法联合办公室”、“反破坏指挥部”，把公检法干部组织起来共同办案，取消了司法机关分工负责、按照法律程序办案的制度。有的“先捕起来再说，行使威风，错了再检查”，这样解决社员互相争吵、打架斗殴等人民内部矛盾，是与党中央现时的方针政策相抵触的。

四月二十七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重点讨论通过了《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五月一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

五月十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央关于各级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和召开青年团“三大”问题。

五月十四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西藏工委关于今后西藏工作的决定，中共中央军委关于裁减军队数

量加强质量的决定。

六月八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反右派斗争开始。

六月二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听取和讨论了周恩来《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通过了一九五七年度国家预算和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

七月二日 为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起草发言稿。指出一九五五年以来社会的大变动,在各地刑、民事案件方面,有显著的反映:案件的数量下降;案件内容属于人民内部问题的增多;刑事被告中劳动人民占绝大多数;农村中的犯罪纠纷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各地人民法院从一九五六年对刑事案件进行全面检查以来,政策、法律水平有显著提高,法制观念日益增强,处理刑事案件一般是稳妥的。但审判人员对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和正确处理的方法,是缺乏明确认识的。各级法院有些审判人员在审理刑事案件过程中,不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人民内部问题当作敌我问题处理,也有的把劳动人民犯罪案件当作单纯的人民内部是非问题不依法严肃处理。针对这种情况指出:“首先严格区别敌我问题和人民内部问题,对处理人民内部犯罪案件,还必须切实分析案情,认清事件是否构成犯罪,应否处罚;行为错误而不违法,或违法而非犯罪的,不能用司法手续处理。”同时又指出:“人民内部犯罪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人民内部是非问题,它在不同程度上侵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因而是必须依法惩罚的问题”。“人民法院惩罚犯罪并以此教育公民,能产生维护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作用,因而也能产生调整人民内部矛盾的作用。所以人民法院对人民内部犯罪案件应当依法正确审

判，不应当因犯罪者是劳动人民而不予严肃处理。案件如不正确处理，就不但不能产生调整人民内部矛盾的作用，反而会产生促使矛盾复杂化、尖锐化的作用。”还指出：现在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虽结束，但国内少数残余反革命分子仍待继续肃清，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仍将存在。因此，人民法院在注意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严加区别的同时，仍将继续保持警惕，同反革命势力进行坚决斗争。报告强调：“人民法院还必须在它的审判活动中进一步坚决地贯彻法制。”“审判人员尤其必须对每一案件认真进行具体分析，正确地运用政策、法律。只有真正根据事实，按照法律作出的判决，才是正确的判决。”

七月三日 为纪念建党三十六周年，对苏联听众发表广播讲话，谈十月革命对自己的影响及中国共产党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建立的情形。

七月二十三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了毛泽东的《一九五七年夏季形势》的报告，并通过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关于劳动教养的决定》。后两个文件交国务院并转送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公布。

八月八日 在北戴河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

八月二十一日 在北戴河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基本通过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九月二日 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基本上通过了第三次妇女代表大会的报告，拟调到大专院校工作的第一批干部名单等。

九月十七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基本通过

了邓小平准备在八届三中全会上的报告稿。

九月二十日 在各省市高级法院院长、司法厅、局长会议上作报告。反复说明毛泽东谈夏季形势的精神，阐述了法院必须接受党委领导；公检法三机关既要相互制约，又要互相配合；以及审判工作中存在的该判不判、重罪轻判，怎样才能做到既要合作又要及时等问题。根据到会同志的要求，还讲了申诉方面的问题。

九月二十日至十月九日 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全会听取和讨论了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陈云关于改进国家行政管理体制问题和农业增产问题的报告，周恩来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并基本通过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以及其他几个有关的规定（草案）。

九月二十六日 出席人大常委会第七十九次会议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五次会议的联席会议，就死刑复核问题作了发言。指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对此问题通过的决议，和法院组织法第十一条第五款的规定不同。建议人大常委会对这个问题作一决定：由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的死刑案件还要经过高级人民法院再转最高人民法院。在这次联席会上，被推举为中国人民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筹备委员会委员，接着出席了筹备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

十月十六日 出席人大常委会第八十次会议和政协常务委员会第四十六次会议的联席会议。听取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作关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说明。

十月二十二日 出席人大常委会第八十一次会议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七次会议的联席会议，讨论全国农业发

展纲要。

十一月六日 在《人民日报》发表《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努力前进》。文章赞扬了十月革命的伟大世界意义，指出中国人民将满怀信心地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胜利前进。

十一月十九日 因病，由何连芝陪同，出发去广州休养。在广州期间曾视察佛山、虎门、中山等地。

十一月二十六日 拟定《关于“审判独立”问题的研究提纲》。提纲内容包括：

(一)必须使司法干部对“审判独立”的概念有比较正确的理解。

(二)“审判独立”词汇的来源。

(三)各资本主义国家宪法采用三权分立的情况。

(四)十九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除法国一八七五年宪法和某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初期宪法外，都有“司法独立”、“法官独立”、“法院独立”或“审判员独立”的文句规定。

(五)社会主义国家规定审判独立的条文很不相同，表达的概念并不一致。

(六)为什么社会主义各国宪法都规定有“审判独立”的文句，最基本的意义是法院专门于审判工作，不受行政机关的干涉。

十二月八日 赋诗纪念广州起义三十周年：“广州起义继南昌，旗帜鲜明见主张。只有人民救中国，更无道路是康庄。将成即毁原尝试，虽败犹荣应赞扬。岗上红花开满地，卅年前事永难忘”。

十二月十一日 在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参加广州起义三十周年纪念大会。

△ 夜。写信给刚升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暂住招待所的长

子董良羽，勉励他在正式入学前，“时间切记不要浪费掉，要自己找点什么东西自修，找点自己最缺乏的东西自修。自修中遇到不懂的地方记下来，同你们同住的人研究，有可以请教的人就向他请教。学问学问，问就是学的不可缺少的条件”。信中还说：“这次离京是养病，每天除看地方报纸和《人民日报》外，写方楷六十四个，小楷一百四十四个，这二十天来，因病因事耽搁了几天没有做到，绝大多数日子就是这么过的。你妈妈每天也是写二百个小楷字，丁玉奎、周德志、小江都是这样，我们总不让我们的日子白白地过去。”

一九五八年 七十三岁

一月 到广州军区医院探视患病中的一机部部长黄敬。

二月十一日 向黄敬遗体告别。

三月十日 随湖北省委检查团到红安县视察。先后到马鞍山水库工地、杏花乡建苏农业生产合作社、县委第一书记的试验田、社员群众与干部试验田比赛丰产岗，以及水利自流灌溉工程察看，并与社员干部进行交谈。

三月十二日 在红安县七里坪，同烈军属、区乡社干部、劳动模范以及天台林场的湖北省下放干部共七百多人见面并讲话说：党中央对老区十分关怀。大家要发扬革命传统，贯彻党中央反浪费、反保守的精神，人人动脑筋挖生产潜力，推行技术改革，把农业生产搞得更好，把老区建设得更好。

三月十三日 在红安县两千多人参加的干部会上讲话。着重讲了要把当前春耕生产工作彻底做好。还瞻仰了烈士祠。

三月十四日 写《访红安七里坪》诗一首。返回武昌。

三月十九日 出席武汉市公布一九五八年全面支援农业生产工作纲要以及该市和孝感专区、红安、麻城签订城乡互相支援协议的大会，并讲话指出：武汉市支援农村的力量不小，定出纲要，签订协议书，是必要的，签了字，要负法律责任，要具体贯彻执行，希望努力完成纲要和协议。还号召搞沼气发电。指出这件事作成了，

农村电气化就有把握了。会后接见孝感地区的农业劳动模范，同他们进行了谈话。

四月十六日 给最高人民法院下放河南长葛县劳动锻炼的干部写信，勉励他们在当地党政机关领导下，密切联系群众，积极参加生产，争取在劳动战线上取得重大成就，并希望注意总结基层法院怎样组织才便于人民群众诉讼等经验。

五月四日 主持由文化部、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高级党校联合举办的卡尔·马克思诞辰一百四十周年纪念大会，并致开幕词说：近百年来的世界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逐步胜利的历史。我们今天纪念马克思，必须学习他生前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不调和斗争的精神，同离开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现代修正主义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为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纯洁性、为争取共产主义的胜利进行坚决的斗争。

五月五日至二十三日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大会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其基本点。

五月二十五日 同在京全体中央委员一起参加修建十三陵水库的劳动。

五月二十七日至六月十一日 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离京赴索非亚参加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六月三日代表中共中央在保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致贺词。在保加利亚期间，参观访问了瓦尔纳、特尔诺沃、普列文市的工厂、农村，同保加利亚劳动群众见了面。还接见了我国留学生，并同他们谈了话。

六月十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的通知》。通知指出，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属中央政

治局和书记处。政法小组组长为彭真，董必武是这个组的成员。

六月十二日至七月六日 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离保加利亚，到布拉格参加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十九日，代表中共中央在捷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致祝词。在捷克斯洛伐克期间，参观访问了卡罗维发利、赫布、奥斯特拉法、欧洛茅茨、哥特瓦尔多夫、布拉迪斯拉法等城镇，访问了工厂和农村。接见了我国留学生，同他们进行了谈话。

六月十四日 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祝中国福利会成立二十周年》的文章，赞扬中国福利会在宋庆龄领导下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祝愿它在保卫世界和平促进人民福利事业中取得更辉煌的成就。

七月六日至二十四日 到柏林，代表中共中央参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统一社会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八日，同乌布利希会晤。十日，出席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五大”。十二日，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致祝词。在德期间，访问了斯大林市、波茨坦、莱比锡、德累斯顿等地。参观访问了工厂、农村。接见了我国留学生并进行了谈话。十六日在柏林二十万群众庆祝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胜利闭幕的盛大集会上讲了话，代表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德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七日 回国途中访问苏联。在莫斯科访问了苏联最高法院。参观访问了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伊尔库茨克等城市。

八月上旬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马锡五在第四届全国司法会议作书面发言，谈到董必武明确指示总结审判程序的指导思想是：“从实际出发，大体相同，略加提高，使之接近法院组织法”；“不束缚革命手脚，便利人民，不求完备”；“以中国的实际经验为基础，适

当参考苏联经验”。

八月十三日 在第九届全国公安会议、第四届全国司法会议和第四届全国检察会议的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我们立的法应便民，法是人民的意志，应该使人民懂得，易于遵循。强调立法要破除迷信，打破陈规，我们立法一定不能束缚革命的手脚，一定要清除资产阶级的东西，包括封建社会以至奴隶社会的东西。不能让它们束缚社会主义革命，妨碍人民群众。我们立法要依靠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地总结经验，总结一条就是一条，两条就是两条。逐渐积累起来，不讲形式。我们就是这样做的，不能笼统地要求完备。

八月十七日至三十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的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一九五九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以及当前的工农业生产、商业工作和农村工作等问题。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

八月二十一日 在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第三届年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国政治法律学会会长。

九月十五日 写信给董良羽，勉励他学习科学的基本原理，“应手脑并用，敢于创造”。希望他“在学习专科时，必须常常学习政治，必须服从共产党和共青团的领导。要学习辩证唯物主义”。

十月 到四川视察工作。在成都，听取中共四川省委负责人介绍四川情况。

△ 游武侯祠，赋诗赞诸葛亮。

十一月二日至十日 毛泽东在郑州召集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

十一月六日 在成都接见阿联埃及地区法律工作者代表团。

十一月九日 重访重庆曾家岩周公馆，作诗咏抗日战争八年间在此同戴笠特务机关为邻的复杂斗争。

十一月十日 重访红岩村。在红岩村回忆了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六年在重庆时的战斗生活。写《红岩村题诗》。

十一月十九日 同重庆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十余人见面，询问了他们的生产和工作情况，然后，同三百余青少年见面。

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 出席在武昌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六中全会。会议主要讨论和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全会还决定同意毛泽东提出的他不作下届国家主席的建议。

十二月中下旬 到广东、福建视察。

十二月二十七日 游新会崖门。归途赋诗《游崖门返舟中望风山龙子塔》。

十、为人民造福，鞠躬尽瘁



一九五九年 七十四岁

二月 在广州，获悉广州何济公制药厂女工、共产党员向秀丽奋不顾身抢救国家财产，保证了群众安全，而她自己因烧伤严重，经抢救医治无效，于一月十五日牺牲的感人事迹，赋诗《纪念向秀丽同志》，赞颂向秀丽“纵身扑火不犹疑，忘我仪型永世垂”。

二月十七日 由广东赴广西。二十四日，赋诗《游阳朔》，以纪此行。

三月二日 到湖南长沙视察。

三月三日 偕聂荣臻参观韶山毛泽东故居。

三月七日 离长沙北上。

三月九日 回到北京。

三月二十五日 写信给中共中央，再次请求中央考虑自己的能力和体力，不再安排担负国家机关的任何实际职务。

三月三十日 到上海。

三月 赋诗《读革命烈士诗钞》：“战友音容永世违，斗生业绩有光辉。如同馨欬精神振，展诵遗篇识所归”。

四月二日至五日 出席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的八届七中全会。全会检查了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

四月七日 离开上海回北京。

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八日 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除对周恩来所作《政府工作报告》等分别通过决议外,还通过了撤销司法部、监察部的决议。大会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朱德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谢觉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鼎丞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四月三十日 在北京接见湖北省出席二届人大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宋庆龄接见各国驻我国的大使和代办。

五月一日 作四言绝句十四行《书赠小学生》,殷切期望我国小学生在社会主义的红旗,下,专注学习,做三好学生。

五月五日 在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职务离开最高人民法院时,出席了该院全体工作人员举行的欢送大会并讲了话。

五月中旬 收到红安县群众几封来信,反映农村粮食不够吃的情况。分别回信说:“来信所提春耕期间粮食供应不足,可能影响生产,全国有些地方情况确实如此,不仅红安有这类现象。”“政府已采取具体措施勉渡春荒”,“所提意见甚好,当转县人民委员会,请其注意”。“望克服困难,努力作好夏收工作。”

五月十六日 出席全国公安、检察、法院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讲了话。指出:总结工作,历来是我们党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方法,我们党的一切路线、方针、政策,包括我们政法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从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产生的。我们国家的法律,也都是实事求是地总结了人民斗争的经验,经过一定的立法程序,制定出来的。我们要学会通过总结工作,找出工作做得成功或者失败的原因,从理论上、政策上和方法上,逐步提高自己,使我们从

不自觉的被动的状态，进到自觉的、主动的状态。总结工作的过程，就是学习和提高的过程，就是认识和掌握事物客观规律的过程。

五月十九日 出席全国残废军人、烈、军属、复员军人积极分子大会并讲了话。赞扬烈、军属、复员、退伍、转业军人在解放战争和民主革命斗争中是积极分子，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是积极分子，并将永远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积极力量。讲话阐述了优抚、复员工作的重大作用，号召采取更多形式加强拥军优属活动，最后祝全体烈、军属和残废、复员、退伍、转业军人在工作中取得更优异的成绩。

五月二十八日至六月二十三日 和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副委员长林枫一起到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视察工作。六月一日，参观抚顺大伙房水库，并题词。十二日，参观大连造船厂、水产养殖场。十三日，参观旅顺，登长春舰看望海军战士，为舰题词。乘长春舰返大连。十四日，参观大连罐头厂、玻璃工厂。六月二十四日回北京。根据在视察中了解到的问题，于六月二十日和二十九日，和朱德、林枫联名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辽宁省工农业生产情况”，“在长春了解到的情况和问题”以及“东北地区的情况和问题”等三个报告。在报告中向中共中央反映：（一）辽宁工业因原材料不足，影响配件生产以至产品不成套，不能出厂，大量积压；工厂设备维修工作差；全省煤炭减产；农业落后于工业，不适应工业发展需要。（二）吉林省对于种大豆吃不到油有意见，不利于发展出口大豆的生产，建议对大豆产区的农民在食用油供应方面给予照顾；另建议“山区生产必须从山区的特点出发”，确定“以林业生产和多种经营为主”的方针，这一方针“不仅适用于吉林省的山区，而且也适用于全国其他山区”。（三）要积极安排黄金生产；加速边远山区森林

铁路的建设；注意林业工作的多种经营和综合利用；加速发展黑龙江省的轻化工业、交通运输和城市市政建设；鼓励和帮助群众自建房屋；鼓励机关、工厂、学校养猪、养鸡、种菜，以缓和三省副食品供应紧张的局面。

六月二十五日 在北京。为延安延河大桥建成题诗。

七月二日至二十日 出席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七月八日 在庐山，陶铸赠送《陶铸诗词选》。阅读后，赋诗《读剑寒同志过汤坑有感步原韵》，诗咏：“自身实践应回顾，牯岭林中静燕香。”

七月十三日 给中国科学院武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有关人员复信指出：编纂湖北武汉地区大革命史是一件重要的工作。在整理革命历史的工作过程中，收集材料很多，其中必有不一致和矛盾的地方。有时找不出更确实可靠的材料，孔子所说“多闻阙疑”的意见就用得着了。

七月二十日 由庐山返回北京。

七月二十二日 在北京出席波兰国庆招待会并讲话。

八月一日 接到中共中央参加八届八中全会的通知后，再上庐山。

八月二日至十二日 出席在庐山举行的八届八中全会。全会进一步开展了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

八月二十四日 应《中学生》杂志编辑部之约，赋诗《题赠中学生》。作序：我国中学生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必须充分利用时间，刻苦学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热爱劳动，锻炼身体，立志老老实实地学好一种本领，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服务。写一首

小诗以寄我意。“逆水行舟用力撑，一篙松劲退千寻。古云此日足可惜，吾辈更应惜秒阴。”

九月三十日 出席我国领导人为庆祝建国十周年招待来我国的各国贵宾和各界人士的宴会。

十月一日 出席首都七十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建国十周年庆祝大会。

九月三十日至十月四日 参加接待为庆祝我国建国十周年前来北京的苏联党政代表团的各项活动。

十月三日 上午，接见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代表。

十月四日 约冶金部有关负责人谈我国黄金生产问题，在了解了我国解放后黄金产量变化的情况后说：在国际市场上，黄金是最自由的外汇，增加黄金生产，是扩大积累、扩大进口的一个简捷便宜的办法。各地凡有条件生产黄金的，都应积极安排黄金生产。建议规定超产提成制度，允许地方在提成范围内从国外进口一些需要的物资，藉以鼓励发展黄金生产。

十月八日 中央档案馆正式开馆。和朱德、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等去参观，并题诗一首，勉励档案馆工作人员努力做好工作。

十月十日至十四日 陪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道比到四川成都地区参观访问。随后到云南昆明，因患感冒而休息治疗。道比由其他人陪同在昆明等地参观访问后返北京。

十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 到贵州省视察。视察了贵阳郊区花溪人民公社。听取了贵州各种地下资源分布、勘测、开发情况。参观了贵州省十年经济建设成就展览会，听取了贵阳市远景规划汇报。

十一月二日 赋诗两首《赠日本友人平野义太郎》。

十二月二日 在武汉接见湖北省农、林、水战线和各型水利工程负责人，谈了话，了解了灾情，对湖北省的农业基本建设、农业技术革新、发展多种经营、利用沼气和勤俭节约工作，都提出了重要意见。湖北省省长张体学等参加接见。

十二月十日 在广州，赋诗《奉和毛主席读报有感七律一首》：“垂危阶级乱鸣蛙，既反列斯又反华。覆辙欲寻希特勒，来车曾遇卡秋霞。恶风纵使推前浪，正气终能慑百邪。可鄙叛徒多助虐，颀颜求宠作专家。”

十二月 和吴玉章一起接见《中国青年》杂志记者，谈青年立大志问题。指出青年要立大志，就是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懂得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世界、认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掌握和运用它，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去改造客观世界。要建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就要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政治，又红又专。青年是建设事业中的生力军，应在祖国建设事业中贡献更大的力量。要搞建设，没有学问、没有健康的身体是不行的。青年时期正是精力最充沛的时期，应该抓紧时间学习和锻炼身体，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理论水平，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增强自己的体质，为党为人民更好地工作。

一九六零年 七十五岁

一月十三日 在广州。赋诗《再为长句奉和毛主席诗韵》。

一月二十四日 在广州赋诗《步谢老〈读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发展公报〉》。当日，再赋《再步谢老读公报韵》。

一月二十八日至二月四日 偕谢觉哉视察海南岛。参观了华南热带作物研究所、华南热带作物学院，了解了橡胶的科研和生产情况，还参观了海南钢铁公司、莺歌海盐场和榆林港，询问了生产和群众生活情况。一月二十九日在海南岛赋诗《偕谢老同行海南西道八首》。

二月二十三日 在武汉会见了湖北省武汉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全体代表；同代表、列席代表中的红旗手、先进生产者 and 劳动模范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三月一日 视察了蒲圻水利枢纽工程。赞扬了施工进度和民工的干劲，并详细询问了民工生活情况，要求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工作效率，抓好生产，抓好生活。还视察了武昌区属工厂，对武昌圆木厂等开展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的情况表示满意。在参观原材料、燃料节约展览会时强调要广泛推广沼气利用。

三月四日 在武昌东湖百花村客舍，赋诗《三月四日夜枕上口占》。

三月五日、六日 视察武钢，听取了汇报，看了职工食堂。还

观看了歌剧《洪湖赤卫队》的演出。

三月七日至十一日 在张体学陪同下，到丹江口水库工地视察。途径安陆、枣阳，听取了两县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在丹江口视察了丹江大坝施工现场和附属工厂，参观了工地的展览，听取了工地党委的汇报，对工人的干劲和高速施工深表赞扬。在水库工地接见了县、社、队干部和劳动模范。在返回武汉途中，经襄樊、随县、云梦、孝感，听取了各地负责人的工作汇报。

三月十六日 视察武汉重型机床厂，询问了工人住宿、副食品供应和副业生产情况，看了职工食堂。还视察了武汉低压锅炉厂，看了四个车间和职工食堂，赞扬该厂职工高速度改变面貌的雄心壮志，指示他们要制定十年远景规划。

三月十七日 夜，在武昌，观赏宜昌京剧团演出《茶山七仙女》。

三月二十日 在武汉和湖北省沼气利用研究小组人员进行座谈时，指出沼气很有用，有了它农村电气化的实现就能更容易些，更快些。今年到湖北看到沼气工作有进展，只是成绩和效果还不大。建议农村推广沼气分两步走：第一步用沼气代替炊事和照明燃料，第二步再用沼气发电。用沼气做饭和照明，可以节省大批柴草、稻麦秸、棉麻杆、煤炭、煤油和植物油，还可以积肥和搞卫生，是一件大好事。生产沼气，修池是个关键，修池需解决材料、人工、技术三方面的问题。最后指出：搞沼气是一件一举多得，其利无穷的事，应当积极行动起来，省里要大力给予帮助。

三月二十六日 在北京出席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第十三次双周座谈会。会议听取了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委负责人介绍西城区城市人民经济生活的情况，然后进行座谈。在座谈中发言谈到高级知识分子家属和工商界家属参加人民公社问题时，指出：

“街道工作同志不要强迫。”

四月二十二日 出席中共中央举行的列宁诞生九十周年纪念大会。

四月二十五日 请农业部负责沼气工作的科技人员和管理干部介绍沼气利用的推广情况。

四月二十六日 将三月二十日在武汉了解沼气利用情况的谈话记录以及三种利用沼气的技术书籍分别寄给中共湖北省红安县委、云梦县委和随县县委负责人，供他们在推广沼气利用时作为参考。

四月二十九日 出席政协召开的第十四次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双周座谈会，座谈城市人民公社问题。在会上讲了话，指出城市人民公社主要目标是组织家庭妇女，把闲散劳动力组织起来参加生产。是否参加公共食堂必须根据自愿，参加人民公社不一定参加公共食堂。

五月九日至十九日 专程到安徽阜阳县了解沼气的生产使用情况，顺便还视察了合肥综合化工厂、合肥工业大学、合肥特殊钢厂、针织厂、蜀山人民公社、淮南煤矿、蚌埠造纸厂等单位。

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 到河南视察。视察了洛阳拖拉机厂、滚珠轴承厂、洛阳敬事街小学勤工俭学工厂等单位，在拖拉机厂详细地询问了生产情况。还视察了三门峡水库工程。

五月二十四日至五月三十日 到山西视察。视察了晋祠人民公社、太原钢铁厂、重型机械厂、工业技术展览馆、煤炭工业革新展览馆、大众机械厂、大同煤矿等。在大同期间，适逢大同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亲到矿务局进行慰问。

五月三十日 得悉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林伯渠逝世噩耗，即刻动身回京。和朱德一起，同首都各界人民一万多人到灵前致哀。

三十一日参加守灵。六月二日参加公祭仪式并任陪祭。

六月二日至六日 接待来我国进行正式访问的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列希，参加各项接待活动。

六月七日 给中共红安县委负责人写信，对红安县委重视沼气工作，半年来推广利用沼气取得进展表示高兴，并着重介绍了五月中旬到安徽阜阳地区视察沼气工作看到的情况。希望红安县委研究、参考安徽办沼气的经验。

六月十四日 赋诗《奉和毛主席一九六〇年六月十三日的读报有感韵》。

六月十四日至十八日 出席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国际形势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补充计划问题。

七月五日至八月十日 出席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的工作会议。会议研究国际问题和国内经济调整问题。

七月十二日 给湖北荆州一位因肺病失学对前途悲观失望来信求助的青年复信，指出肺病是可以养好的，鼓励他要乐观、充满信心地与肺病作斗争，建议学习邓颖超在《中国青年》上发表的文章，学习她与疾病作斗争的顽强精神。

七月十七日 对苏联政府突然单方面决定撤走专家、撕毁合同的背信弃义的行为，深感愤慨，赋诗《时事有感》。

七月二十五日 给来信请求安排进学校学习的侄外孙复信说：如果你工作做出成绩，组织认为有培养前途自会送你去学习。只有依靠组织，按组织系统办事，才能解决问题。依靠私人关系，是一种旧社会的落后思想，这种思想应该改变。

九月十一日至十五日 接待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来我国进行访问，陪同出席首都人民的欢迎大会，在武汉访问和参观，并在

武汉送行。

九月二十九日 陪同毛泽东接见来我国访问的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法律工作者,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九月三十日 中共中央批转经周恩来审定的国家计委党组的《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报告中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十月十五日 离北京赴湖北、江西、福建视察工作。

十月十六日至二十二日 在湖北,视察了黄冈地区的工农业生产情况。二十日听说共青团员、大冶赤马山铜矿搬运工人汪英华在七月十九日矿坑发生瓦斯中毒事故中,奋勇入坑六次,救出五人,而他自己则中毒致死的英勇事迹,赋诗赞咏汪英华“赴汤蹈火原无畏,舍己救人信可嘉。”

十月二十二日至十一月四日 在江西,先后视察了南昌、吉安、赣州、抚州、景德镇等地以及井冈山地区。十月二十八日,访问茨坪,赋诗一首。在井冈山,同革命老人亲切谈话。十一月一日,访问瑞金,赋诗四首。

十一月五日至十二日 在福建,视察了福州、泉州、厦门、漳州等地,听取了福建省委、晋江地委与龙岩地委的工作汇报。十一月九日,到鼓浪屿,赋诗《游鼓浪屿日光岩》。

十一月八日 夜宿泉州。

十一月十三日 由福建抵广东汕头。

十一月十五日 途中在罗浮山休息。赋诗《宿罗浮山朱明洞忆亡友林伯渠同志》。

十一月十六日 抵达广州。

十一月二十日 根据在湖北、江西、福建三省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和问题,给中共中央写报告,对减少江西粮食上调、纠正各地木

炭炼铁的浪费现象以及由国务院一办和内务部、公安部共同召集有关省开会解决外流人口问题,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

十一月二十九日 在广州继十月十六日在武昌阅读了中国青年出版社送审的杨植霖著《王若飞在狱中》书稿之后,赋诗《再读王若飞在狱中》。寄托对烈士的无限怀念。再次仔细阅读此书稿,作了认真的校改,不仅对有的政治评价作了重要改正,连语法修辞方面的错误以至错、别字,都仔细作了修改,使作者和出版社的有关人员都深受感动。

十二月十五日至二十日 在广州,接待来我国进行访问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

一九六一年 七十六岁

二月十六日 当听说有的省委书记不关心群众疾苦，弄虚作假，虚报浮夸的情况后，深感愤慨，向身边人员说：一个共产党员不关心人民群众生活，甚至不关心人民群众死活，他的思想、立场都有问题。所谓“共产风”的刮起，上面也有责任。上面号召完成任务要“千方百计”，“想尽一切办法”，这“一切办法”中就包括有“不择手段”、“一平二调”。所谓“白手起家”办工业是不可能的。

三月三日 在广州，赋诗《一九六一年三月三日为连芝同志五十晋一诞辰为小诗祝之》：“赠我含笑花，报以忘忧草。莫忧儿女事，常笑偕吾老。”吟抒相依生活的深情。

三月十五日至二十三日 出席中共中央在广州举行的工作会议。会议讨论和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的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对于纠正社、队规模偏大、公社对下级管得太多太死，民主制度和经营管理制度不健全等方面的问题，都作了比较系统的规定。

三月二十日 获悉陈赓不幸逝世噩耗，赋诗《挽陈赓大将同志》，赞颂陈赓“从军原是为人民，百战勋劳总不矜。矫捷沉雄谁得似，票姚差可望神鹰。”对“国栋何期早作仙”，表示深切哀悼。

三月二十五日 到北京中山公园中山堂吊唁陈赓逝世。

四月十八日 接见巴西联邦最高法院院长梅洛。

四月二十九日 赋诗悼念恽代英被害三十周年：“抓住青年进取心，手书口说万人钦。血腥刀俎君菹醢，卅载难忘此恨深。”

五月四日 和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一起接见来自非洲和拉丁美洲十八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宾，并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五月八日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四十周年，同身边工作人员沈德纯等谈中共“一大”的主要问题。

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十二日 出席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的工作会议。会议在中央和各地负责人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改草案）》。会议决定调整当年钢产量，由原定的一千八百万吨降为一千一百万吨。会议还决定对几年来受批判过分的党员和干部，进行实事求是的甄别平反；并规定以后在不脱产干部和群众中，不再开展反右反“左”的斗争，也不许戴政治帽子。

五月二十九日 出席政协召开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第二十六次双周座谈会。在会上讲了话，阐述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谈到“大跃进”时指出：有些事本来是好事，如密植，搞试验是可以的，提出越密越好的口号，实际上行不通，应该是合理密植。还有一个口号是土地增产无限制，这也是不行的。我们是唯物主义者，这样就变成唯心论者了，唯条件论是不对的，但马克思主义是讲条件的，只讲主观条件，不看客观条件就达不到目的。我们有些同志学习苏联是抄袭的办法，后来提出破除迷信，但敢想、敢说、敢做要合乎科学。有一个时期胡说八道也没有人批驳，这种情况是不对的。

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十二日 参加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的工作会议。

六月十三日至十五日 参加接待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对我

国的访问活动。

六月三十日 为纪念建党四十周年，特请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到家中聚会，并合影留念。晚，参加庆祝大会。

七月一日 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同时开幕。参观了革命博物馆后，写《为中国革命博物馆开幕题诗》七言绝句三首。诗中写道：“群英结党救中华，脱颖人来焕彩霞。星火燎原谁料得？卅年成就浩无涯。”

七月十日 出席中共中央监委召开的会议。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讲到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问题时，指出：要好好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弄清什么叫共产主义，什么叫社会主义；有了哪些条件才叫社会主义，有哪些条件才能到共产主义，马列主义不是不讲条件，这两年有些人不讲条件是错误的。马列主义从来是条件论者，任何存在都是有条件的。任何存在都有时间、空间，这就是条件。在讲到调查研究问题时指出：调查不能只找几个干部，这不是不相信他们，因为确实有人封锁消息，突破封锁很不容易，要直接联系群众，同群众生活在一起，不然就容易受蒙蔽。在讲到群众路线问题时指出：我们的党是为群众利益服务的，如果不为群众服务，还要组织共产党干什么？建设社会主义为了什么？就是为了群众不受剥削，不受压迫，提高生产和生活水平。可是一九五八年以来，有些人不听群众意见，不考虑实际情况，不讲按劳取酬，不讲价值法则，提出粮食过了关，吃饭不要钱，这实际上是不懂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是脱离群众、违反群众利益的，结果吃了大亏。在谈学习问题时，指出要好好学习中央关于退赔问题的指示，平调是剥夺农民，农民剥夺不得，剥夺农民就要妨碍工农联盟，影响政权的巩固，不改正是不行的。

八月十三日至十八日 接待来我国访问的巴西副总统古拉

特，参加各项活动。

八月十四日至十九日 参加接待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对我国的访问活动。

八月二十一日 由北京乘京汉火车南下，到庐山参加会议。途中，回忆一九二一年参加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山东代表王尽美和贵州的邓恩铭，赋诗《忆王尽美同志》：“四十年前会上逢，南湖舟泛语从容。济南名士知多少，君与恩铭不老松。”

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十六日 出席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的工作会议。会议讨论工业、粮食、财贸及教育问题。

八月三十一日 在庐山，为即将出版的《辛亥革命回忆录》，题诗五首。题为《写在辛亥革命回忆录前面》。

九月六日 给山西煤矿设计院一助理技术员复信，指出他能向党反映工资级别方面存在平均主义的问题，很好。这类问题不仅存在于山西煤矿设计院，其他部门也有。已转中央有关部门研究。

九月十四日 赋诗《庐山秋雨》：“镇日风和雨，庐山秋意多。溪流喧激石，林叶撼危柯。密雾添凉湿，沉阴欲醉歌。小窗开不得，展卷莫如何。”

九月十五日 经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担任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并在纪念大会上任报告人。

九月二十二日至十月三日 接待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来我国访问。

九月二十九日至十月六日 接待尼泊尔国王和王后来我国访问。

十月七日 出席在政协礼堂举行的辛亥革命老人座谈会，同

来自全国各地的、曾参加辛亥革命的老人会面。

十月九日 上午，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下午，设便宴招待曾参加辛亥革命、自各地来京出席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活动的老人。在讲话中赞颂“辛亥革命的胜利，是成千上万的志士用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争得来的，他们的英雄的业绩，将永远为后人所尊敬。”辛亥革命“在广大人民中造成了民主精神的高涨，为新的革命斗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讲话指出，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政权，但是“在革命中产生的政权落到了反革命手里”，“中国人民仍然生活在帝国主义走狗封建军阀的统治下。革命并没有成功。”“资产阶级共和国制度在西方行得通，拿到中国来就行不通，帝国主义决不允许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建立什么资产阶级共和国，独立自由地发展资本主义”。他赞扬孙中山，“晚年思想的发展，说明他确实是卓越的政治家，不愧为我国历史上的伟大的民族英雄”。

十月二十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十一月六日 出席首都各界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的集会。

十一月二十一日 主持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第二十九次双周座谈会。

十一月二十七日 在人民大会堂主持高级民主人士座谈会。会上由周恩来作报告，主要谈苏共二十二大问题。

十一月二十八日 下午，出席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执行局会议。

十二月下旬 在北京出席中共中央会议。

十二月二十五日 陪同刘少奇一起接见出席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的越南政府代表团特别顾问黄文欢等，进行了谈话。

是年 分别接受加纳、刚果、几内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马里、阿尔巴尼亚、苏联和芬兰驻华大使递交的国书，并进行谈话。

一九六二年 七十七岁

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 出席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的扩大的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

一月二十五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和基本通过了刘少奇准备提交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董必武针对“大跃进”中高指标高征购问题发言说：“这个报告我完全同意，尤其增加了经验教训部分，很好，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可以写得更清楚一点，就是任务与政策矛盾的时候服从政策。违反政策的任务就不行，应当依照政策。”

二月一日 赋诗《挽李克农同志》，赞李克农“知君才调擅中华”，“能谋颇似房仆射，用间差同李左车。”深切悲叹“天不慈遗兹一老，人如可赎岂千家”。

二月十二日、十三日 到中山公园吊唁李克农逝世，并参加公祭。

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 出席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一九六二年国家预算和整个经济形势问题，分析了农业生产下降，市场紧张，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和国家存在大量财政赤字的情况，认为我国的财政经济形势是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必须确定一个调整恢复时期，以农业为基础，全面地调整国民经济。

三月十二日 同王树声谈大革命前黄安、麻城农民运动发展情况，告诉王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五年是黄安、麻城农民运动的起点；一九二四年武汉中学第一班毕业的学生多半回黄、麻搞农民运动；一九二四年以前，只是寒暑假去做些工作，有些影响。

三月二十一日 出席最高国务院会议。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刘少奇、周恩来就当前形势和工作中的主要问题，分别讲了话。

三月二十七日至四月十六日 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届三次会议。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

四月十一日 向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马锡五遗体告别。

四月十九日 到湖北视察。

四月二十日 听取中共中央中南局负责人陶铸、王任重等汇报中南局扩大会议情况。二十一日，听取广东省省长陈郁和李一清汇报工作。二十九日，同秘书谈二十年代创办武汉中学的情况。修改湖北省博物馆有关人员写的《武汉中学遗址》一文。

四月三十日 出席武汉各界人民庆祝“五一”劳动节游园晚会。晚会前，和湖北省以及武汉市党政负责人一起会见了武汉市工业、交通、基建、手工业、财贸、文教、卫生、体育等各个战线的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二七”老工人、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地方组织负责人以及武汉地区科学技术界的代表。在会见劳动模范时说：我们国家各个方面的工作，都以你们作为榜样，照你们的样子来做。这几年你们的工作是大有成绩的，要再接再厉，不骄不躁，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创造新的成就。

五月一日 上午，听取湖北省交通厅厅长和中共红安县委书记的工作汇报。下午，参加湖北省委统战部举办的茶叙会，和出席的各界人士进行了谈话，阐述了最近闭幕的二届人大三次会议和政协三届三次会议的重大成就和意义，分析了当前形势，勉励大

家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共同克服困难,迎接新的胜利。

五月八日 到麻城视察。赋诗《麻城》,记“一九一一年春,余曾执教麻城小学,尔来五十有一年矣。再到麻城,则面貌大改,喜而有咏。”从八日到十二日,了解了人民战胜自然灾害和当前生活情况。在视察龟峰山时,赞扬了龟峰山产的云雾茶。还视察了麻城福田河区及麻城师范学校(五十一年前曾在此教书,当时是小学校),同该校教师进行了座谈。在麻城期间,接见了县里的民主人士;了解了文教卫生工作情况;接见了驻军干部、退休军人,了解他们的工作和生活;还接见了麻城县干部四十余人。

五月十二日至十四日 视察红安。先后视察了城关镇、博物馆,瞻仰了烈士祠,听取了县委汇报,向县机关干部讲了话,接见了退休长征干部。临行时到觅儿公社,同公社负责人交谈了有关抗早夺丰收和本年群众生活安排等方面的一些情况。十四日,在红安赋诗《三次回红安感而有作》。

五月三十一日 返回北京。

六月十七日至二十九日 参加接待以朴金哲为团长、康良煜、朴信德为副团长的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团的活动。

八月二十三日 接受马里大使递交国书,并进行了谈话。

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 出席中国共产党在北京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二十五日,在全体会上发言说:对我们最危险的,一个是帝国主义跟我们打仗;再就是我们共产党内部出问题。我们共产党内部要团结。并指出,阶级分析是马克思主义分析社会问题的根本。分析社会问题,要从阶级出发,这一点如果马虎了的话,那就很容易走到错误的路上去。

十月十四日 以中国政治法律学会会长名义致电在几内亚科纳克里举行的第二届亚非法律工作者会议,祝贺会议在加强亚非

法律工作者之间的团结、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支持亚非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中，作出新贡献。

十月十七日 接见印度尼西亚法律科学家代表团和印度尼西亚科学家协会负责人。

十月二十八日 应《湖北日报》之请，写《纪念黄麻起义三十五周年》诗两首。诗曰：“廿二年间起伏多，黄麻革命涌洪波。大山三座终移去，党引工农奏凯歌。”“燎原烈火起星星，烧却江淮腐恶根。英勇斗争成绩夥，山区到处见新村。”

十一月三日、九日 两次同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负责人钱瑛、王从吾以及中央组织部负责人帅孟奇谈监委工作。十五日，出席全国监察工作会议，并在会上讲了话。

十二月八日 在同《中国青年》杂志记者谈青年人应怎样培养和保持旺盛的革命热情问题时说：要培养与保持旺盛的革命热情，最根本的办法就是不断提高自己的革命自觉性。要懂得为什么要革命，懂得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和任务，只有对革命有了正确的认识，树立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理想，有了为革命献身的决心和不怕一切困难的大无畏精神，才能产生和始终保持高度的革命热情和巨大的革命动力。谈话指出，革命觉悟必须在实际斗争中逐步培养和提高。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还指出要培养和永远保持旺盛的革命热情，还必须培养忘我精神，努力改造思想，克服个人主义。

十二月三十一日 作五言长诗《今年除夕羣儿适满二十二周岁为诗祝之》，以自己一生走过的道路，鼓励子女“青春难再得，植根宜深厚；同群众前进，立功自不朽。”

一九六三年 七十八岁

一月一日 出席周恩来在政协礼堂为在京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各民主党派中央委员、政府副部长以上，年龄在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举行的庆祝新年的便宴。

△ 晚，参加会见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

二月十一日至二十八日 出席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的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严格管理大中城市集市贸易和坚决打击投机倒把、一九六三年国民经济计划和中小学工作条例等问题。

二月十二日至二月十八日 参加接待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的各项活动。

二月十五日 赋诗《咏雷锋同志》，赞颂雷锋共产主义战士的不朽精神。“有众读毛选，雷锋特认真。不惟明字句，而且得精神。”“所作平凡事，皆成巨丽珍。普通一战士，生活为人民。”

三月五日 中共中央发表毛泽东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

三月六日至十日 接待老挝国王西萨旺·瓦达纳来我国访问。

三月十三日 接见日本法律工作者、日本国际法律联络协会副会长、日本和平委员会会长平野义太郎。

六月六日至六月十七日 接待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长崔庸健来我国访问。

六月十一日 瞻仰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沈钧儒遗容，并赋诗悼念。十四日，参加由朱德担任主祭的首都各界对沈钧儒的公祭，并致悼词说：沈先生是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他在长期政治生活中，不断受到共产党的教育和影响，一生追求真理，要求进步，不断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是一切爱国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

七月二十八日 收到贵州省文史馆一馆员来信。在得悉这位老先生十余年来已写旧体诗一千余首、现代史资料十余种但无力刊行的情况后，给中共中央统战部领导人写信说，各地文史馆馆员响应政府号召有不少创作，但他们缺乏纸、笔、墨的供应，印刷也成问题，建议研究一项解决办法，报中共中央核准，由国家机关做出统一安排，以鼓励这些老人从事写作。

八月三十日 参加会见和宴请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的活动。

九月五日 主持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第四十二次双周座谈会，并就国际形势问题作了发言。

九月六日至二十七日 出席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的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农村工作、一九六四年国民经济计划等问题，并着重讨论了工业发展的方针问题。会议确定，从本年起，用三年时间，继续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

九月二十三日 接见以山本幸一为团长的日本社会党代表团。

十月三日 上午接见来自巴西、古巴、加纳、葡属几内亚和佛得角、印度尼西亚、秘鲁、西南非洲以及桑给巴尔妇女代表团代表。

中午接见印度尼西亚中国友好协会代表团。

十月五日至十日 到宁夏回族自治区视察工作，中监委负责人钱瑛同行。视察了银川市、青铜峡水库工地、银川市郊区红花公社北塔大队。对稻谷选种和植树造林工作提出了建议。在视察北塔大队和青铜峡水库工地时，勉励工人和社员奋发图强，勤俭建国；要充分利用一切人力和条件进一步发展生产，要千方百计在路边、渠边、沟边和房前屋后多种树，把自治区建设得更加美好。

十月十一日至十七日 由钱瑛陪同，到内蒙古自治区视察工作。先后视察了包头钢铁公司，一机厂、二机厂，听取了包头市委的汇报。在呼和浩特视察了市郊昭君墓南桃花人民公社，对植树造林工作作了指示。写《谒昭君墓》七言绝句一首，歌颂王昭君为使汉族与匈奴修好毅然出塞和亲的不平凡行动。诗云：“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词客各摅胸臆，舞文弄墨总徒劳”。还视察了毛纺厂，在自治区监察工作会议上讲了话。在包头和呼和浩特都接见了民主人士。

十一月六日 出席首都各界庆祝十月革命节集会。会前和陈毅一起接见了苏中友协代表团。

十一月十五日 参加最高国务会议。会上，刘少奇、周恩来就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和今后任务讲了话。

十一月十七日至十二月三日 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届四次会议。十七日听取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关于一九六三年国家计划执行情况和一九六四年国家建设计划的报告。十八日听取副总理李先念关于一九六三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二十一日，参加湖北小组讨论，就林业问题作了发言。

十二月五日 接见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主席蒙德拉纳。

十二月六日 赋诗《吊赵一曼烈士》四首，赞颂赵一曼烈士“北

去南来党命衔，不因负病卸仔肩。工农解放须参与，抗日矛头应在先。”“抗倭未胜竟成俘，不屈严刑骂寇仇。自是中华好儿女，珠河血迹史千秋。”

十二月 重游中共一大遗址之一嘉兴南湖，应当地同志之请，为嘉兴南湖烟雨楼书写对联：“烟雨楼台，革命萌生，此间曾著星星火；风雨世界，逢春蛰起，到处皆闻殷殷雷。”不久，由嘉兴到武汉。

十二月二十五日 在武汉观湖北省戏曲学校同学演出。

是年 先后接见了老挝、伊拉克、几内亚、匈牙利和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

一九六四年 七十九岁

一月一日 在武昌洪山宾馆，参加湖北省、武汉市党政机关负责人及各界人士团拜，迎接新年，并接见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工作会议全体代表。

一月八日 在武汉接见参加湖北省委召开的全省林业工作座谈会的各地市的专员、市长和省直有关厅局的负责人，并在会上着重讲了发展林业的紧迫性。提出要“大办林业”。“我们要急起直追，赶上去，实现林业的现代化，以适应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指出：木材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迫切需要加速林业的发展。我国地区辽阔，零星分散的土地很多，加速林业发展，除造成片林之外，还有赖于分散零星造林。在铁路、公路和渠道两旁、村庄周围四个方面大力开展植树造林活动，是用较少的钱和劳力，植更多的树的好办法。若干年后对国家是个很大的贡献。特别是村庄周围造林，湖北省大有可为。希望动员广大群众，群策群力，在一定时期内把上述四个方面都栽上树。对老林区要注意迹地更新。

一月九日 在武汉至长沙途中写《人民公社生产队要大办林业》诗一首，希望农村基层党政组织动员和鼓励农民大力开展植树造林活动。

一月十日 到广州休养，同时视察了一些单位。

一月十一日 在广州，写信给张体学，将在南下车中所写的《人民公社生产队要大办林业》一首诗寄去，再三嘱咐“只要农村社员对所在地周围隙地植树的积极性发动起来，帮助铁路、公路的植树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并将此信连诗抄送陶铸、王任重、刘建勋、林李明及邓子恢。

一月十四日 写《铁路、公路应把植树作为业务的一个组成部分》诗五首，提倡在铁路、公路两旁植树，希望引起各方重视。

一月十六日 同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陶铸谈植树造林问题。

一月十八日 会见中共中央中南局各书记，进行了谈话。

一月二十二日 给湖北省省长张体学写信寄去号召人民公社植树和铁路、公路两旁植树的两首诗，并说明本意是想动员农户每年植树，见缝插针，不让住房周围有空地；铁路、公路两侧植树，过去是为了风景美化，现在是作为一项附属业务来经营，应作为路政建设的一部分。

一月二十六日 同国务院副总理、农林办公室主任邓子恢就公路两侧植树归公社所有是否可行的问题交换意见。

一月二十七日 同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张云逸到广州市监委了解工作情况。

二月四日 在广州，接见阿尔及利亚法律工作代表团。

二月九日 在湛江参加植树造林，在海滨公园栽白玉兰一棵。

二月十日 到雷州半岛视察，参观了青年运河和鹤地水库。

△ 为湛江博物馆抗法馆题诗一首，“不甘俯首听瓜分，抗法人民组义军。黄略麻章皆创敌，寸金桥隔自由云。”

二月二十四日 赋诗《向欧阳海同志学习》，赞颂欧阳海“赴汤蹈火如需要，脸不变色心不跳”。“见义勇为出天性，生平只知干革

命。”

△ 应武汉钢铁公司第十三子弟小学和湖北省当阳县河溶中学之请，为两校题校名，并写信建议两校师生积极植树造林和试养蓖麻蚕。

三月二日 给中共湛江地委书记及专员写信说，已看到送来的湛江地区植树材料，得到不少启示，建议在湛江林业尚待发展的地区找一、两个点推动农户植树造林，看可否一试？这要在林权确定，社队准备好树苗的条件下进行。把群众发动起来，有了树苗，植起来费工不多，保证成活后，年年有收益，农民必然会响应领导的号召，积极行动。在一、两点做了这段笨工夫后，再和群众一道总结经验，逐渐推广，三、五年后，群众植树一定会普遍开展起来。

三月十二日 向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雍文涛了解中南地区林业工作情况。

三月十三日 游南海县西樵山。赋诗《游西樵山寄玉阶》：“西樵何所有？岩上白云多。览之自怡悦，述与子同歌。”

三月十六日 给广西科协主席陶希晋复信说：我对植树造林的建议是否真能动员每户农民年年参加植几株树？还要有具体试验的地方作证明。要认真地在一个点上作三、五年工作，才好判断其有效与否。试验的地方，要定林权、育苗圃、学技术、觅空地、组织农户栽种等等，除林权问题外，社队领导要年年费力的，要做点笨工夫。我建议你在广西找一、两个点试验一下。另建议用木薯叶养蓖麻蚕，广西盛产木薯，这将是农村一项很好的副业。

三月二十三日 离广东赴浙江。在湖南、江西沿途注意铁路两旁植树情况，均不甚满意。

三月二十五日 在浙江省视察了新安江水电站。

四月二日 游杭州西湖。

四月五日 由杭州到上海途中,在嘉兴作短暂停留,又重访了嘉兴南湖烟雨楼,看了中共一大在南湖结束会议时乘坐的画舫,写《清明节车过嘉兴访烟雨楼》诗:“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共党庆工农。重来正值清明节,烟雨迷濛访旧踪。”

△ 晚抵上海。

四月六日至十六日 在上海视察了吴泾化工厂、上钢五厂、上海合成纤维厂、闵行一条街和张庙一条街,了解了华东地区林业工作情况。特地看望了在上海的宋庆龄。

四月十八日 在南京,瞻仰了雨花台烈士遗物陈列馆,赋诗《谒南京雨花台死难烈士遗物陈列馆》:“英雄洒血雨花台,暴露奸权尽蠢才。毕竟人民得胜利,斗争规律史安排。”从十八日至二十三日,视察了南京无线电厂等单位之后,于二十三日回北京。

四月三十日 接见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古巴工会代表团。

五月三日 接见铃木信率领的日本前松川事件被告访华代表团。

五月中旬 自广东买回蚕种一批,在北京家中试用蓖麻叶喂养。另将蚕种寄给红安家乡一批。建议在红安也进行试养。六月中旬两地试养均获成功。

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十七日 出席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的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农业规划和农村工作、第三个五年计划(一九六六~一九七零年)、政治工作问题。此外,还讨论了反修防修、培养接班人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问题。在参加华东小组会议时,作了关于黄金、白银生产问题的发言。二十日,还向会议提出关于植树造林的几点设想,一是动员农户植树;二是建议铁路公路都把植树作为经营业务的一个组成部分;三是建议各省、区利用驻屯军队每年造林,有计划地消灭荒山荒地;四是动员全国学生

植树造林。

五月十六日 接待苏丹共和国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阿布德来我国进行的国事访问。

五月三十一日 同交通部有关人员谈林业问题。指出发展林业是国家百年大计，应利用公路两侧的绿化发展经济林。要做好这项工作，首先要从领导思想上解决问题，其次要形成制度，第三要搞出规划。

六月一日至十一日 参加接待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总统萨拉勒来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六月十一日 给张体学写信说：“关于发展林业的几点设想，需要进行重点试验，搞点眉目出来。自己也想亲自抓一个重点县，搞它两三年。指出解决对植树造林的认识问题，要重视反复宣传。许多问题一到下面就会碰到具体困难，比如如何弄清情况做规划，育苗的土地，选种的经费，以及技术指导，人员编制等等，都是困难。下面的工作又多，如果思想认识解决不透，认识不够，具体困难解决不了，也会落空。”还说：“你曾说，我们这么大年纪了，能多为人民办一件有益的事，就很不错。这话对我很有启发。我想最近一个时期着重抓植树造林和推广养蓖麻蚕的试验。要是在这两方面能做出点成绩，那将是自己莫大的快慰，请你鼎力支持。”

六月十三日至十九日 接待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合共和国第二副总统卡瓦瓦来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六月二十二日 接见尼泊尔法律工作者、尼泊尔所得税法庭首席法官、皇家律师普拉卡希·巴哈杜尔。

六月二十七日 出席首都佛教界和文化界人士纪念玄奘法师逝世一千三百年的集会。会前接见了来自柬埔寨、锡兰、印度尼西亚、日本、老挝、蒙古、尼泊尔、巴基斯坦、越南等国家和地区前来参

加纪念活动的佛教代表团和代表,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六月二十八日 给河溶中学师生复信,对他们积极参加植树造林和试养蓖麻蚕,并在短时间已取得很好成绩,表示祝贺,同时将自己“关于植树造林的几点设想”的书面材料寄去征求意见。特别询问每年动员学生植树是否可行?有何困难?建议他们总结经验,把饲养蓖麻蚕进一步试验下去。但特别指出在没有取得较完整的经验时,不要急于推广。只有把蓖麻蚕的经验摸透,再具备一些指导能力之后,才能建议县领导机关向全县农村推广。

六月二十九日 同朱德、王维舟视察承德和内蒙昭乌达盟。向内蒙古自治区和昭乌达盟负责人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听取承德专员汇报该区林业情况后,指出:林业工作和农业一样,点多面广,群众性强,要把群众的当前利益和国家的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向群众讲清楚。公路、铁路两侧要植树。群众把公路、铁路两侧留的土地都种了庄稼,不对。应向群众讲清楚,划清楚,进行植树。动员农户利用农村空地,见缝插针,把空地都植起树来。每户每年用三个工,栽十株树,是完全可能的,一直搞三十年。要贯彻四自(自采、自育、自造、自用)政策。群众育苗,经费有困难,国家可以设法给予贷款;技术有困难,政府要帮助训练技术人员。希望蹲点总结经验,做出样子,踏踏实实地工作,不要提过高的口号。还提出:要动员军队造林,造林由地方选择设计,造后交地方管理。要发动学生造林,当地政府划出土地,包给学校,包造包管,将来有了收入归学校。关于林权问题,希望抓紧处理,权属确定后,随即发证,使群众安下心来。

六月三十日 路过赤峰,特地参观了市郊区的一个固沙林场,称赞他们固沙所取得的成功,希望继续坚持下去,在所有的荒山、沙丘、河岸植树造林,就会根本改变这个地区的面貌。

七月一日至六日 和朱德、王维舟到辽宁视察。先后视察了阜新市海州露天煤矿、沈阳军工厂、辽宁省博物馆、辽宁工业展览会。还接见了东北局、辽宁省委的领导人，听取了工作情况的汇报。

七月四日 专门听取辽宁省林业厅厅长的汇报，谈到国营林场工作，指出：固定工人不要太多，太多就成了包袱；多用临时工，降低成本。说林场造林不能用临时工就不合理，林场造林用临时工是一举两得的事。强调社队见缝插针，潜力很大，大有文章可做。要先把林权地权处理好，长期不变。林业有周期长的特点，如权属稳定，群众就放心。说有人怕社队造林多了会产生资本主义，这是不对的。对军队和工厂造林问题，可由省委提出号召试办。

七月七日至十四日 和朱德、王维舟到吉林视察。先后视察了通化葡萄酒厂、小丰满水力发电厂、吉林化学工业公司、吉林铁合金厂、吉林电机厂、延吉延边大学、和龙林场等单位，听取了工作情况的汇报。沿途考察了林业情况。

七月九日 视察松花湖，看到四周造林和封育起来的林子长势很好，极为赞赏，赋诗赞美。

七月十一日 由吉林市前往延吉，途中看了不少次生林，指出：这样好的自然地理条件，应该培育高标准的林子。

七月十二日 在延吉市，对市周围荒山秃岭树木稀少的状况，提出批评。

七月十三日 乘车到东沙沟林场（采伐场）的一个作业区视察。看到该区林子长势不错，每亩木材蓄积量约十立方米，全区共约十八万立方米，但管理部门计划每年采六万，三年就要采完。董必武深感不安。指示：采伐办法要很好研究，不能采取大面积剃光头的办法，必须考虑到森林后续资源，要做到永续永伐，越采越

多,不能中断。

七月九日 再给张体学写信谈“关于植树造林的几点设想”,打算找一个省,直接到公社生产队,带身边工作人员成为一个小组,帮助县及社队植树造林的工作,包括推动和帮助他们解决林权问题。指出:林业搞不好,影响农业很大。有些地方林业上不去,农业也上不去;有些地方林业搞好了,农业就增产,至少可以少受自然灾害;也有些地方林业受损害,农业就减产。

七月上旬 北京家中收到中共湛江地委负责人寄来的蚕种,要家人在北京用蓖麻叶进行第二次试养,至八月上旬获得成功。

七月十五日 和朱德、王维舟一起开始视察黑龙江省。当日,在视察镜泊湖水电站时,听取了东京城林业局局长关于该局林业生产情况汇报,随后就林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采伐、更新、经营管理、木材将来过关、木材利用、造林树种和封山育林等问题,以及我国当前林业情况和世界一些国家的林业简况,进行了座谈。发言说:要根据中国的情况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创造出我国的林业经营方式,不要机械地抄袭其他国家的经营方式。采伐方式要逐步改进,要轮伐作业,不能长期大面积剃光头采伐,使作业中断,经常搬家。造林育林,要高质量高标准与广种薄收同时并举。还指出:如镜泊湖这样好的条件就应该搞高质量高标准的人工林。现在这种封育起来的次生林,对水土保持能起很大作用,但没有考虑将来的出材,产量低,质量差,林种不全,对这样好的土地反而有浪费,未完全达到地尽其利,是美中不足。针对当前木材利用不够合理、浪费很大直至腐烂在山上等现象,指出“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容许的,尤其是我们少林国家更不能容许。有关部门要研究解决。”要把群众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全面地看,不要有片面的群众观点,要看到林子有破坏容易恢复难的特点。

七月十八日 访问农垦部实验农场虎林红心村，并赋诗赞颂农垦战士“斩棘披荆忆老兵，大荒已变大粮地。”

七月十九日 在佳木斯参观造纸厂、木材加工厂和刨花板厂时，提出：造纸一定要设法利用枝丫废材，不能老是吃大原木。可以考虑国家今后少拨或不拨给造纸厂原木。有些机器不适应，应积极设法加以改装。搞刨花板是很好的，但目前厂子停产，林业部要想办法，帮助提高技术，打开销路，坚决搞下去。这是节约木材、利用废材的一条出路。

七月二十日 路过带岭，看了育苗和落叶松人工丰产林，听了当地负责人关于更新已跟上采伐的汇报，表示满意，指出：在更新和条件好的地区，造林都应该像这块丰产林一样高质量高标准地搞下去，为将来木材过关打下可靠的基础。

七月二十二日 专门听取合江地委书记、农垦总局局长汇报后指出：农林是一家。农场利用荒山荒地和四旁地植树造林，条件非常好。你们不能光采不造，采光了将来怎么办？农场兼搞林业意义很大，好处很多：可以防风固沙，保持水土，促进农田生产；可以调剂劳力，使农闲劳力有事可做；可以把所有土地都利用起来，使地尽其利；可以解决自用木材，还可以支援国家木材。同时，林子搞起来了还可以搞许多林副产品，增加农场收入，提高农场利润。不论是农场还是人民公社，不搞林业，农林牧不全面发展，要大幅度增加收入，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是有限的，应该充分地认识这一问题。

七月二十四日 在哈尔滨听取东北林业总局和黑龙江省林业厅负责人汇报林业工作后，指示：林区建设一定要按勤俭节约的方针办事。黑龙江的新型林场办法很好，把林子全面管起来了。对有人说管得太死了的问题，指出“应该先死后活，现在已经管住了，就

要研究活的办法,要给群众找个出路。”“造林工作要扎扎实实搞。造林最困难的问题,一是育苗,二是整地,要逐渐地搞上去。”“群众育苗的款,可以贷。一省需要一百多万元,全国只不过是二、三千万元,将来可以考虑国家拿出一亿元作为群众育苗基金。”还说:“朱总司令有个想法,就是每开发一个林区,要固定下来,农、林、副结合。”反复强调:“不管搞什么工作,都要贯彻勤俭建国、自生更生的精神,少花钱多办事。”

八月二日 在齐齐哈尔听取嫩江地委书记汇报该区生产情况后,指出:铁路沿线树木很少,要多植树造林。并说:嫩江地区荒山荒地很多,要广泛发动群众造林。可以给劳改农场下达任务,要他们大量植树造林。

八月五日至七日 和朱德、王维舟视察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海拉尔市和通辽。在鄂伦春自治旗访问了一个蒙古族牧业生产队。沿途除听取各地工农业生产情况汇报之外,特别听取了牙克石林业管理局的工作汇报和齐齐哈尔铁路局关于植树造林情况的汇报。

八月五日 在海拉尔,听了呼伦贝尔盟负责同志汇报后,特别指出:应在国防边境线上造护林带。铁路两侧无树的应该植树。住宅周围也应该绿化。牧区人民定居后也应试行绿化造林。机关、学校、部队驻地周围都应该绿化。

八月六日 参观海拉尔西山的一片樟子松原始林,看到这些树木多年生长在沙丘上,把沙固定了,现在成了森林公园,感到非常高兴。指出:要建立林场,设专人管理,千万不能破坏。连声感叹说:“要是沙区荒山都搞成这样该多好!”

八月七日 路过通辽,听取哲里木盟负责同志汇报。当谈到该区每个大队都有苗圃,由生产队发苗给群众造林,树成活了不要苗

木钱,死了要钱时,指出:死一株,应该让他补栽两株。

八月八日 在返京途中,听取陪同到河北、内蒙、辽宁、吉林、黑龙江视察的林业部同志讲了观感后,指出:林场要实行轮伐作业,长期经营,永续利用。固定工人不要太多,实行亦林亦农。职工家属要组织集体生产,搞试点,创造经验。更新造林要以人工为主,但也不放松封山育林。要抓紧搞苗圃育苗。更新造林要高标准高质量。开展集体造林育林,要照顾群众需要。缺木缺柴的省份和地区,应作出规划,提出限期自给的任务。社队要进行育苗,经费采用贷款办法解决,可以考虑国家每年拿出人民币一亿元作为长期低息贷款。还强调指出:清理林权很重要,应抓紧进行,这是关键性问题。林权问题不处理好,群众的积极性就调动不起来。处理好以后,要随即发林权证。还希望林业部对军队、机关、学校的植树造林,要积极采取措施鼓励试办。林业部还要注意抓思想问题,人们对林业的认识不完全一致。应广泛开展讨论,收集各方面意见;对不同意见,不要给人家“扣帽子”。一定要按科学规律办事。要注意到地方困难,体谅他们的困难。对各地的好典型要亲自看,一是总结经验,二是看是否真实。

八月九日 同农垦部部长王震谈黑龙江、松花江汇合地区水网地带开渠排水问题和农垦地区植树造林问题。指出应先在公路两旁造林;要有一个长期计划。慢慢搞起来。国营农场应从现在开始着手种树,十年、二十年后就会有收益。要为子孙后代着想。林业和农业密切相关。植树造林花钱花劳力不多,但得益将很大。

八月十日 给中共湛江地委负责人写信,感谢寄蓖麻蚕种,并告诉他除在北京试养一批外,还寄了一部分给湖北红安,两地试养都获成功,说明蓖麻蚕可在北京、湖北等地区推广。

八月十二日至二十二日 在山东省视察了济南市、烟台地区、

长山岛、芝罘岛、烟台张裕酒公司、威海市、陶家疃生产队、刘公岛等。在视察济南部队时，专门同部队领导同志谈造林问题，指示部队，“把每年为群众服务的力量抽一些来植树造林”。十三日，在济南听取山东省委汇报后说：在经济建设中要量力而行，从实际出发，“有多少钱办多少事”，这个思想问题必须解决。在谈到植树造林问题时说：我国木材每年有缺额，年年吃老本，老本吃光了，再搞起来，要好多年。植树造林有三方面的问题：林权、育苗和管理，建议山东省委和公路、铁路部门以及部队加强联系，一起抓植树造林。植树问题容易被忽视，因为树不是一下子就能长起来。林业部门可以逐步拨点钱给农民银行作为育苗的经费。

八月十六日 在收到河溶中学师生来信报告试养第二代蓖麻蚕以及用白杨叶养蚕的试验情况后，回信给予鼓励，并介绍自己组织家人在北京两次试养蓖麻蚕的经验和教训，指出如果推广养蓖麻蚕，必须首先推广种蓖麻。有了蓖麻，即使叶子不喂蚕，也可以收籽打油，有了蓖麻叶，再推广蓖麻蚕，才不致发生饲料恐慌。

八月十九日 收到陆军某部来信，对该部决定每年拿出一定人力植树造林表示高兴，告知已将来信转给地方，请直接联系着手规划和具体安排这项工作。祝该部队在建设部队巩固国防和植树造林这项关系到百年大计的重大工作中取得更大成就。

八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 视察旅大市。二十七日，在听取旅大市委负责人汇报后，着重谈了植树造林问题。指出要确定林权，就要解决干部的思想问题；社员种几棵树成不了资本家；树长起来社员砍点树枝也不要干涉；多种树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林权问题解决了，护林工作就会做好。还要解决育苗问题，一个生产队给几分地育苗也好。分给农户去种，几年就能得益。植树造林工作要有个规划。

九月二日 对中国科学院武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写《武汉工人阶级夺回汉口英租界斗争史》的有关人员谈话说：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历史，千万不要主观地认为应该有这么一件事或那么一件事。要多搜集材料，引用材料和回忆录都要十分慎重。指出个人记忆难免有主观成分。不少人写回忆录都多少夸大个人的作用，这是不好的。个人只是在革命浪潮推动下起了一定的作用。还指出：“一九二七年在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中，湖北省委没有起什么作用，主要是党中央的决定，领导斗争的是刘少奇，不要提我。”

九月十一日 接见由刚果(布)全国革命运动中央委员、国会议员、国防、外交委员会委员阿方斯·穆昂达一扎乌率领的刚果(布)友好代表团。

九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 参加接待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

九月二十八日至十月三日 接待刚果(布)总统马桑巴——代巴来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九月二十九日至十月八日 接待由崔庸健率领来我国参加建国十五周年庆典的朝鲜党政代表团。

九月三十日 陪同毛泽东会见前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五周年庆祝活动的亚非各国政府代表团、印尼共代表团、日共中央监委代表团、印尼军事代表团、柬埔寨军事代表团。

十月一日 出席首都人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的国庆典礼和焰火晚会。

十月二日 陪同毛泽东接见社会主义国家参加国庆观礼的代表团以及各资本主义国家参加观礼的客人。

十月三日至八日 陪同崔庸健率领的朝鲜党政代表团到西

安、延安访问。

十月八日 在政法学会四届会员大会上被推举为政法学会名誉会长。

△ 参加党政领导人同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的会见。

十月九日 接见阿尔巴尼亚法律工作者代表团。

十月十六日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十月二十四日 向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许之桢遗体告别。参加许之桢治丧委员会。二十九日，首都各界举行公祭时，任陪祭。

十月三十日至十一月十三日 接待阿富汗国王查希尔和王后来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并陪客人到武汉、广州、南京、上海、杭州参观。

十一月一日至二日 接待马里总统凯塔和夫人来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十一月二日 接见以哥伦比亚保卫人权法律委员会主席阿尔瓦罗·佩雷斯·比维斯为团长的哥伦比亚法律代表团。

十一月六日 关于要军队抽出一定时间参加每年的植树造林活动的设想，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和林业部采纳，并联合发出关于部队参加植树造林问题的通知。要求做好思想工作，使广大官兵认识植树造林和保护林木的意义，造林要讲求质量，地方林业部门应与部队协同搞好造林。

十一月上旬 给林业部负责人写信谈林业工作中的问题。指出：（一）大部分林区采取大面积采伐，更新工作跟不上，结果使得采伐迹地变成荒山，成了一个大问题。必须赶快减少或停止大面积采伐，狠抓迹地更新，做到有采有造，才能做到青山常在，免除后顾之忧。（二）国营林场工作有季节性，固定工人太多，开支增大，

应采取亦林亦农的办法，多用临时工，多吸收农村的多余劳力。

(三)林业部门领导干部应亲自下去蹲点、调查研究、总结经验。

(四)应尽快解决林权问题，它是关系到开发集体林业生产的关键性问题。(五)应与有关单位协商解决等外木材和小材小料的积压问题，给国家减少浪费。

十二月十五日至十八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全国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

十二月十八日 出席最高国务会议。

十二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 专程从北京到昆明，迎接访问非洲和柬埔寨回国途中，在我国作短期停留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和他的随行人员。

十二月二十日至三十一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届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

十二月二十二日 下午自昆明飞返北京。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十二月二十三日至三十日 分别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全国工作会议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上午接见古巴法律工作者代表团，下午出席最高国务会议。

十二月下旬 接到人民来信一封。信中建议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大力开展节育避孕的提案。阅后非常赞成，当即转给人大秘书处。

是年 先后接见了法国首任驻华大使和叙利亚驻华大使，接受了叙利亚大使递交的国书。

一九六五年 八十岁

一月二日至四日 继续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届第一次会议。三日，会议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朱德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根据刘少奇主席的提名，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

△ 给中共山东省长岛县委复信说：接到该县发展林业规划的来信很高兴，称赞他们因地制宜，规划得很周详，祝规划能如期实现。

三月十九日 离广州赴四川成都视察工作。

三月二十五日 和叶剑英、徐冰等被推定为中共代表，参加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工商联代表的双周座谈会。

四月中旬 在四川重庆视察。

五月上旬 在湖北视察。由张体学陪同，用八天时间视察了渣河水库、四湖排灌工程。看到这两项工程使千万亩旱涝为灾的农田，变为旱涝保丰收的良田，极为兴奋。沿途看到植树造林的成绩显著，也很感到高兴。指出要使植树造林坚持不懈地搞下去，干出成绩，关键在于抓好育苗，抓好落实。

五月九日 在视察当阳河溶中学时，参观了这个学校的养蚕室，了解了试养蓖麻蚕的情况以及学校其它方面的情况，对农村教育工作表示关怀。

五月十四日 给张体学写信，对《湖北林讯》所载张体学关于湖北林业的几次讲话，表示完全同意。并就视察孝感、荆州、宜昌等地区沿途所见植树造林还存在的问题，如还有不少荒山荒地未种上树，水渠两旁植树尚不普遍，长江防浪堤林带还可增强扩充，宅旁植树成绩尚不显著等，建议湖北林业厅同志注意逐步解决。还建议省公路局同志在既有成绩的基础上，分段考察，将公路两侧不少应成林带的空地，按实际情况逐年补种，公路经营就会和林木经营打成一片。再次强调推广群众植树，要着重解决林权问题和育苗问题。

五月十五日 同湖北省林业领导小组负责人谈话。谈到育苗问题，提出公社、大队、生产队都要育苗，要真正做到省、地、县、公社都有一班子人去抓。再三说：“工作要落实。”希望省林业厅领导小组的同志们要亲自到地、县、公社、大队、生产队去检查，一年出去几次，要自己亲自动手去做，靠发文件、开会是落实不了的。靠行政命令、发号施令是不行的。要解决彻底，一定要真正落实。育苗问题抓好了，植树造林问题也就好办了。谈话中，还对长江防浪堤、公路、铁路造林以及发动部队、机关植树造林等需要解决的问题，一一提出了意见。此外，还希望湖北能把蓖麻蚕养起来。

五月十七日 中共湖北省委向全省发出《关于认真学习董必武副主席的信和谈话的通知》，指出：“董老是八十高龄的人了，这样热心林业，我们青年人、中年人怎么能不好好地干！我们必须遵循董老指示，以身在荒山，胸怀祖国的壮志，老老实实地干，力争在尽快的时间内，把全省的四旁地、荒山都栽上树，在质量第一的前提下，完成全省十年绿化的规划！”

五月十九日至六月十六日 陪同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到各地访问（五月十九日为胡志明七十五寿辰，胡为避寿米我

国)。陪胡志明先后参观访问了山东济南、曲阜,安徽芜湖,于二十一日到黄山休息,六月九日参观浙江新安江水电站,十三日游览莫干山,在杭州停留到六月十六日,欢送胡志明回国。

六月十七日 返回北京后,就看到济南部队某军五月十二日关于植树造林情况的报告,对他们在本年五月以前就完成了全军植树百万株计划的六分之五以上的成绩,深感高兴。

六月十九日 给陆军某部党委复信,肯定该部植树造林的巨大成绩。信中说:“就你们的成绩看,我设想后方驻军有计划的植树造林是可行的”,“植树造林、消灭荒地荒山,绿化大地,是后方驻军常年工作之一”,希望继续开展这项工作,并列为部队一项长期任务。认为他们已取得驻军植树造林的一套完整的经验,值得推广。

六月二十五日 接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长康良煜率领的朝鲜人民代表团。出席首都各界隆重举行的纪念朝鲜祖国解放战争十五周年大会。

六月下旬 收到河溶中学师生寄来的用莴苣叶和蓖麻叶喂养的蚕茧后,复信表扬他们一年多来在教学之余认真试养蓖麻蚕为集体农民兴利取得了初步成果。

七月十五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政治部将某军关于植树造林的报告和董必武的批示,印发所属单位,指示各单位很好学习,结合自己情况,积极配合地方搞好植树造林工作。

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 参加接待来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索马里共和国总统欧斯曼。

七月二十七日 中共山东省委将山东某军报告和董必武的批示转发各级党委,并指示各级党委积极协助当地驻军解决植树造林工作中的具体问题。

七月 在听取交通部公路工程管理局汇报一年来公路绿化情况后,指示说:一年多来,交通部门在公路绿化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一定成绩,要很好地总结经验。指出:公路绿化造林,必须形成制度,作为各级交通公路部门长期的经常性的工作。公路两旁除公路部门植树外,对于沿线荒山荒地,应告知当地林业部门抓紧造林;长江及其它河流的堤坝上都应植上树;公路植树应以用材林为主,适当发展经济林;公路部门应自己解决一部分修桥、修车用的木材;解决公路树权问题,最重要的一条是砍伐必须经公路部门批准。此后不久,交通部向交通部门发出通知,“要认真贯彻董必武同志对公路绿化的指示”。

七月三十一日 和刘少奇、邓小平一起接见李宗仁及其夫人。

八月十日 接见几内亚总检察长、亚非法律工作者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及书记处总书记。

八月十四日 出席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华大使为纪念八一五朝鲜解放二十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八月二十一日 中共中央华东局发出专门指示,将山东省委印发的《董必武同志对二十六军植树造林工作的批示》,连同山东省委、济南军区政治部给所属单位的指示,一并转发华东各省、市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华东各省市部队,指出:发展植树造林,不仅是给国家提供建设用材,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大事,也是加强国防建设的一项有重大意义的措施。希望华东各地驻军也像二十六军那样,把植树造林活动大力开展起来,切实执行董必武同志关于“植树造林,消灭荒地、荒山,绿化大地,是后方驻军常年工作之一”的指示。地方各级党委除了积极协助当地驻军解决植树造林中所需的树苗及其他具体问题外,应当对去年年底召开的华东林业工作会议的贯彻执行情况,认真地进行一次检查,加强领导,采取措

施,促使全区植树造林工作更好地向前发展。

八月二十七日 接见由毛利与一率领的日本法律工作者代表团。

九月二日 主持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第五十四次双周座谈会。座谈备战备荒为人民的问题。

九月四日至六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九月十八日 出席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的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一九六六年国民经济计划和长远规划问题。还讨论了财贸和党的建设问题。决定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拿出两百亿元来调整物价,降低农业生产资料和部分生活资料的价格,使广大城乡人民首先是农民获得好处。

九月二十七日 接见由苏呼南·哈姆扎率领的印度尼西亚法律工作者代表团。

九月二十八日至十月四日 参加接待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的

十月十二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第二次全体会。下午,在交通部、林业部有关人员前来汇报即将在武汉召开全国公路绿化会议的会议内容和筹备情况时,作了指示:希望交通部门把路旁植树作为公路事业的一部分,修了路不种树,路不算完成。要抓育苗,若干年后交通部门需用的木材要自给,要生产木材给国家用,还要帮助林业部门解决民用烧柴问题。

十月十六日 出席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第五十六次双周座谈会,继续座谈备战备荒为人民的问题,在会上作了关于国际形势的发言。

十月十八日 给交通部、林业部在武汉召开的全国公路绿化经验交流会发去贺词。指出应把植树作为路政经济核算的组成部

分,希望会议着重讨论路旁植树的意义,重视解决育苗问题,希望公路绿化工作跨进一大步。

十月十九日 陪同毛泽东会见阿联副总统萨布里和夫人。

△ 同周扬等谈写党史的有关问题。

十月二十日 收到陆军某部党委寄来汇报植树造林情况的书面报告,对所提部队参加植树造林是否妨碍战备,以及地方机关与部队如何配合造林问题作了答复:部队造林,不仅不会妨碍备战,而且会更加有利于备战。在植树工作中,地方机关给予部队支援很大;但从长远考虑,部队应自建一些苗圃,以减轻地方负担。

十月二十四日 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定隆重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讨论了筹备委员会人选。董必武被推选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

十月二十五日 出席首都人民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十五周年大会。

十月 赋诗《忆张汉卿》。诗云:翩翩年少竟成翁,回首辽东霸业空。敢缚虎狼应有胆,自投罗网遂无踪。帐前歌舞迷飞蝶,岛上鞫囚看挂龙。公子莫悲身世异,人民犹记救亡功。

十一月五日 出席首都人民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八周年的集会。会议前接见了苏中友协代表团等苏联客人。

十一月十日 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揭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十一月十二日 写《为林学院补壁》七言绝句诗二首:“秃岭荒山须覆盖,海滨河坝要经营。环树尽有空闲地,树木栽培志士争。”“利在将来常被忽,效生左右会当寻,君如岁植十株树,廿载将成一片林。”进一步号召植树造林。

十一月十七日 因健康原因,由北京乘火车抵达广州休养。

十一月十八日 写信给何连芝，讲从北京到广州沿途所见：“两湖和广东收成都比去年好。”嘱将山东二十六军党委关于植树的报告转到广州，准备同广州驻军同志谈谈部队植树造林问题。

十二月二十二日 得悉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炎培逝世，书写挽联悼念：“论交近卅年，金错石磨，风雨同舟摠国难；握别刚两月，壤崩栋折，幽明异路悼元良。”

一九六六年 八十一岁

一月十日 中共中央决定董必武担任中共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

二月九日 赋长诗《学焦裕禄同志》，赞颂焦裕禄：“兰考存三害，多年患未除。勇哉焦裕禄，受命困难摅。”“结合千群力，建设绘蓝图。”痛惜焦裕禄“长抱肝癌痛，劳累损其躯，不避风雨恶，不作饥寒呼，关注人民事，忘身直若无。”“吾党悼焦君，模范孰能逾！”

二月十八日 得悉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逝世，书写挽联悼念：“于翻天覆地中论革命宏观，尝自笑为事后诸葛亮；在广厦细毡上谈人民公敌，总不忘指班头约翰生。”

三月四日 给陶铸写信，谈植树造林问题，并附送陆军某部党委一九六五年十月二十日关于部队植树造林问题的报告和一九六五年烟台地区配合当地驻军植树造林的意见两个抄件，指出各地驻军每年抽出一部分力量植树造林，纳入地方林业计划是可行的，为配合部队植树造林，地方应多育苗。

三月上旬 到广西壮族自治区视察工作，听取了工作汇报，对植树造林工作指示说：现在是春季，正是造林的大好时机，植树造林，绿化家乡、绿化祖国的工作，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部分，必须抓紧，要年年抓，抓到底，争取尽快绿化所有的荒山荒地。植树造林应成为全民的群众运动，干部、工人、农民、居民、学生、军队都

要认真参加，特别指出发动地方驻军和学生参加植树造林运动的重要性。强调造林工作要特别注意抓好“育苗”、“移栽”、“管理”三个环节，保证种一株活一株，种一片活一片，尽快完成绿化家乡，绿化祖国的伟大任务。

三月六日 给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写信，也附送了上述两个文件的抄件，希望广西的植树造林工作能从中取得一些经验。

三月八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转发了董必武三月六日致韦国清的信及两个抄件，要求全区各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贯彻，按质按量完成植树造林计划，努力实现“绿化家乡，绿化祖国”的美好前景。

三月十二日 在武昌接见了出席湖北省第二次贫下中农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接见后邀请部分著名劳动模范和先进单位的代表座谈。王任重等陪同接见。

三月十五日 中共中央中南局在《中南通讯》刊登了董必武三月四日致陶铸的信和所附两个抄件，并作批语：董必武同志在这封信中提出的问题很重要，希望省（区）、地、县委和部队党委认真贯彻执行董必武同志的指示，坚持不懈地把造林绿化工作抓好。

三月二十一日 在武昌，赋诗《题赠小学生》：“立志成为有用的人，雷锋王杰是仪型。接班革命学毛选，汲取终身座右铭。”

四月四日 在武昌接见武汉中学的代表谈话时，回顾了早年创办武汉中学的经过和该校师生对革命事业做出的贡献。勉励代表们努力把武汉中学办好，在湖北甚至在全国教育界干出一些名堂来。建议教员利用暑假进修，要学政治，还要学点教学法。最后说：武汉中学过去的校训是朴、诚、勇、毅。朴就是朴素，也就是艰苦朴素；诚就是忠诚，诚实；勇就是勇敢；毅就是要有恒心、毅力，能

够坚持。现在我又加了“干革命”三个字，即“朴诚勇毅干革命”，作为新的校训，送给武汉中学。

四月五日 在武昌接见出席湖北省林业会议的全体代表。接见前，同省林业领导小组负责人进行座谈。接见时，询问了湖北宜林荒山、荒地面积，以及近年来植树造林情况，指出：工作是靠人去做，不抓就是老样子，抓一个就变一点，抓得狠一点，就变得多一点。在植树造林工作中要解决山林权问题，要用革命思想发动群众开展植树造林。还指出：任何工作，只有一般号召，不具体地去抓，效果不大，一轰而起，一轰而散的办法不能解决问题。我国是一个大国，木材的需要量很大，今后需要木材将愈来愈多，必须切实抓紧植树造林。还特别指出：要关心群众生活，湖北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上许多代表反映缺乏烧柴，这是一个大问题，必须认真植树造林，由本省自己解决农村烧柴的需要。在谈话中，赞扬了陶铸抓植树造林。并说“只要我们认真地去抓，二、三十年后，你们省需要的木材，完全可以自己解决。”

四月十三日 接见英国记者吉尔德夫妇，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外地，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议决定停止和撤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职务。十六日，会议通过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

五月二十二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五月二十八日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

六月二十三日 接见由阿联、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苏丹的七位律师组成的阿拉伯律师联合会代表团。

六月下旬 收到中共南宁市委六月六日关于植树造林情况的

报告后,回信说:“南宁市在植树造林工作方面已经取得显著成绩,你们的作法比我提出的植树造林的意见完备得多。建议每年组织工农兵学和机关干部种树,只要稍微安排一点时间用于植树造林,就会大大促进群众性造林的发展。”

七月八日 主持全国政协民主人士双周座谈会。

七月九日 和党与国家领导人一起,接见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各国作家。

八月一日至十二日 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简称《十六条》)。选举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八月十一日 接见巴基斯坦国民议会议长阿卜杜勒·贾巴尔·汗和夫人。

八月 为编写党史事,给中共中央写报告,建议党史编委会由党中央各部委、中央办公厅、检察院的负责人,工、青、妇群众团体的党员负责人,国务院各口负责人以及各中央局的负责人组成。还建议中央调省级以上各党校的教员(每校一人)参加,请中央作出决定。

九月一日 接见刚果(布)国民议会议长穆亚比·安德烈·乔治和由他率领的刚果(布)议会代表团。

九月十二日 接见索马里国民议会议长谢赫·穆克塔尔·穆罕默德·侯赛因和他率领的索马里国民议会友好代表团。

十月九日至二十八日 出席毛泽东主持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陈伯达作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

十一月十二日 主持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在开幕

词中，扼要介绍了孙中山在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建立的不朽功勋，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孙中山先生对中国革命事业所作出的伟大贡献，孙中山先生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大会前，和周恩来、宋庆龄等一起接见参加大会的部分外国朋友、华侨代表和港澳人士。

十二月 看到一些油印小报，把许多老干部诬蔑为“叛徒”、“特务”、“投机分子”，非常气愤，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经过党多年反复地审查和考验，绝大多数叛徒、特务分子在党内是存身不住的，早就被历史淘汰。”

是年 先后接见了阿尔巴尼亚、马里、罗马尼亚、叙利亚、伊拉克、波兰驻华大使，分别进行了谈话或接受了国书。

一九六七年 八十二岁

一月十七日 在广州接受坦桑尼亚新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六月十七日 我国第一颗氢弹在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

十一月二十五日 赋诗《偶成二绝句寄羽、翠、翻儿》：“颇有聪明蚕作茧，亦多能力鹊为巢。老牛负重耕荒地，斑豹韬文隐雾坳。绕屋参差皆是树，沿河荡漾若为瀛。风来有迹叶微动，潮退无声滩渐明”。

冬 和何连芝携良翠、良翻到广东休养。

一九六八年 八十三岁

春 和何连芝以及良舉、良翮继续在广州休养。

三月五日 在广州，赋诗《八十三岁初度》：“八三初度吾衰甚，小病缠身少法惩。”诗句写衰老和疾病缠身，实是抒发对党和国家的一种深切的忧思。

三月二十日 在广州，获悉良翮随良舉由广州返北京抵站时，又一次无端被江青、谢富治一伙逮捕，枕上口占《闻酉儿于北京车站被捕》：“闻尔重入狱，吾衰心更痛！卧床苦无梦，食饭竟忘盛。飞试曾折翼，语频或失声。恢恢天网大，疏释望新生。”为小儿被捕，深为忧虑。

九月十一日 赋诗《挽徐永瑛^①同志》：“病中闻噩耗，使我益心悲。记昔纽约晤，即钦悃歛仪。外勤资协助，侨报赖维持。君久撻痼疾，天胡竟丧之。”

十月十三日至三十日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① 徐永瑛（一九〇二——一九六八），生于安徽省怀宁县。一九二五年赴美留学。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美洲《华侨日报》主编。一九四五年，董必武赴美参加旧金山制宪会议期间，曾协助董老工作。一九四六年回国。建国后，曾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等职。

十二月二日 在林彪、江青、陈伯达一伙猖狂一时的情况下，得不到老战友徐特立逝世的通知。在徐逝世五天后，才从广州《南方日报》上读到讣文，即时赋《挽徐特立同志》五言律诗一首，“晚节全持好，堪为我辈师。救亡曾断指，入党在危时。亲切长征伴，叮咛小集期。何图竟永诀，魂梦郁哀思！”

十二月十六日 和朱德、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起，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罗织所谓的“中国马列共产党”，诬陷以“里通外国”、“准备搞武装叛乱”，要搞“政变”等莫须有的罪名。

是年 先后接受了阿拉伯也门共和国、丹麦王国、捷克斯洛伐克驻华大使递交的国书。

一九六九年 八十四岁

一月二十日 在广州病中，赋诗《小病初愈，从窗隙中见园梅盛开，戏题》：“今冬扶病又南来，习见园中数树梅。原是枯枝新吐艳，好花似为老人开。”

三月五日 八十四初度。偕何连芝游白云山，赋诗：“已闻‘打倒新沙皇’，无意生期举寿觞。虽上白云曾摄影，只留鸿迹向东方。”

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 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二十四日的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四月二十八日 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九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五月初 九大会议后，在所属的党支部会上，根据自己在党内近五十年的亲身经历，向支部全体党员追忆了党的历史，高度赞颂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叶剑英、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功绩，特别是赞扬了当时正受到林彪、江青一伙迫害的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功绩。

五月 在幼子良翮下乡前夕，赠给他一套《毛泽东选集》、一个笔记本和一支红兰铅笔，勉励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力量。叮嘱他说：“革命的后代更要严格要求自己，生活上要艰苦朴素，和群众同甘苦，决不能高人一等。”

九月六日 到越南驻华大使馆，沉痛吊唁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逝世。

九月三十日 出席周恩来举行的国庆二十周年招待会。

十月十九日 接到限令在两天内离开北京的通知后，由何连芝、女儿董良翠陪同，和朱德、康克清、李富春、蔡畅以及张鼎丞，滕代远一行，由北京飞抵广州，当即由机场转移到从化。

是年 先后接受巴基斯坦、赞比亚、阿尔巴尼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瑞典、柬埔寨、刚果(布)、坦桑尼亚、几内亚、法国、越南南方共和国临时政府、叙利亚及阿联等国驻华大使递交的国书。

一九七零年 八十五岁

二月 农历除夕，在广州遇到因所谓战备疏散被遣送长沙又转广州治病的叶剑英，殊感意外，赋诗《羊城农历除夕喜遇叶剑公》，有“备战相逢岂易得，余生能乐几今宵”句，极为感慨。

三月四日 赋诗《八五初度前夕漫题》，深切感叹“知来原不易，鉴往略能明”。

三月 写《偶成》七言绝句一首：“广大精微树义坚，今之马列得真传。吾愚学海将蠡测，读罢三篇又二篇”。在诗后加注说：“两篇指《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去年有人问我‘怎样学毛选’，草一偈句告之”。

四月二十四日 我国成功地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四月二十六日 赋诗庆贺我国人造卫星上天。

四月 赋诗《偶得一绝句》：“新功未建惭高坐，老本无多啃早完。如弩马将长恋栈，为栖梧意学鸣鸾。”

六月十五日至十九日 参加接待索马里民主共和国最高国务委员会主席艾南希来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六月二十四日 陪同毛泽东会见苏丹政府友好代表团。

七月十五日至二十日 参加接待由副主席拉乌尔率领的刚果国务委员会代表团来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八月二日至八日 接待南也门人民共和国主席鲁巴伊来我国

进行国事访问。在二日欢迎宴会上致词，对南也门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进行英勇斗争取得的胜利，独立后在多方面取得的成就，以及南也门政府奉行的各项外交政策，给予高度赞扬。指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美、以侵略，恢复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权利的正义斗争。

八月七日至十三日 接待由苏丹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席尼迈里率领的苏丹友好代表团来我国进行访问。在七日欢迎宴会上致词，赞扬苏丹人民的光荣反帝传统和苏丹政府奉行的反帝、反殖、维护亚非团结的对外政策。相信通过尼迈里主席的访问，中国、苏丹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将进一步发展。

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六日 出席在庐山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二中全会。

八月二十五日 赋诗《牯岭即事》：“山中连日雨阴沉，秋肃为功动鬼神。午后云开红日出，林间暖入晚晴新。”

九月二十九日 和周恩来一起到阿联驻华使馆吊唁阿联总统纳赛尔逝世。

十月十日 出席欢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的宴会。

十一月十一日 和周恩来联名打电报给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蓬皮杜，对前总统戴高乐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并前往法国驻华使馆吊唁。

△ 和周恩来一起设宴欢迎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并在宴会上致词，对叶海亚·汗总统表示欢迎，对巴基斯坦人民同外来侵略和干涉进行的不懈斗争以及在经济上清除殖民主义遗留的恶果所取得的成就，表示钦佩和高兴。赞扬了中巴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感谢巴基斯坦政府一贯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

的合法权利，重申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反对外来侵略和干涉的正义斗争，坚决支持克什米尔人民争取自决权利的正义斗争。

十一月十三日 陪同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

十一月十六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中央作出部署，首先在党的领导机关开展“批陈整风”运动。

十二月三十日 在北京医院，口占四绝句。

是年 先后接见越南、坦桑尼亚、苏丹、柬埔寨、南斯拉夫、毛里塔尼亚、刚果、匈牙利、锡兰、阿联、苏联、阿富汗、波兰、缅甸、赞比亚、伊拉克等国的驻华大使，分别接受了拜会或接受了国书。

一九七一年 八十六岁

三月五日 在北京，赋诗《八六初度》。

春 写《偶成》七言绝句一首：“盗名欺世小爬虫，以假充真变色龙。日照原形终毕露，岿然牯岭孰能冲！”

六月一日 和周恩来一起会见来我国访问的、由齐奥塞斯库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进行了友好的交谈。

六月十五日 惊悉谢觉哉去世，痛哭失声，书写挽联：“长征老战士，文革疯诗人”，坐手推车到谢觉哉灵前悼祭。

九月十三日 林彪、叶群仓惶乘飞机外逃叛国，机毁人亡。

九月中旬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林彪叛逃事件。同时，写给叶剑英诗一首：铁鸟南飞叛未成，庐山终在显威灵，仓惶北上埋沙碛，地下应惭汉李陵。

九月下旬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看了林彪、叶群机毁人亡的照片后，在家中赋诗《观坠机中尸影》：“平生自诩是天才，也把天才奖妇孩。三个天才天不佑，窃机投敌毁成灰”。“好话说尽如新莽，坏事做绝似法西。瞒人耳目暂时得，蒙马虎皮露马蹄”。

十月六日 和周恩来一起，为欢迎埃塞俄比亚海尔·塞拉西一世访问我国举行宴会，并在宴会上致词。说：海尔·塞拉西皇帝陛下来我国进行的国事访问，一定会进一步增进两国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合作关系，并有助于亚非人民团结反帝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十月二十五日 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驱逐出去。

十一月一日 由何连芝陪同，乘车离京到南方休养。夜作《北京车站别儿女》五首，深切感叹：“路线分明正反争，三原则与两方针。亦知挽救难生效，不惜长言见苦心。”教育子女：“马列书多六本先，择尤精读记疑难。增加知识与经验，防止奸人巧夺权。”

十二月十一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中央专案组整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陆续分发全国，开展批林整风。

是年 先后接见了几内亚、意大利、加拿大、古巴、阿尔及利亚、智利、埃塞俄比亚、挪威、奥地利、塞拉勒窝内、蒙古、捷克斯洛伐克等国驻我国大使，接受了他们递交的国书。

一九七二年 八十七岁

一月 在广州。获悉陈毅于一月六日不幸病逝噩耗，深感哀痛，赋诗《挽陈毅同志》：“久被病磨折，元良竟长生。立功丰不伐，求艺广多成。皓月无幽意，清风有激情。井冈山上树，瞻仰总心倾。”“闻君病重久，欲探未成行。忆昔比邻住，曾为倒屣迎，阊阖谈国事，了了述边情，栋折吾忧压，伊谁继直声？”

二月八日 在广州。春节临近，离八十六周岁亦不及四星期，赋诗《偶成长句一首》。

二月二十一日 美国总统尼克松来我国访问。二十八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中美两国开始走向关系正常化。

四月 由何连芝陪同返北京。

五月十四日 在迎宾馆迎接前来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索马里民主共和国最高革命委员会主席西亚德。

六月二十五日 和周恩来一起会见斯里兰卡总理西丽马沃·班达拉奈克夫人。

九月五日 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香凝追悼大会。

九月十七日 会见赞比亚共和国副总统乔纳率领的赞比亚友好代表团。

九月十九日 会见伊朗王后法拉赫·巴列维。

九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九日 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邀访问

中国。二十九日，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在北京签字，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十二月中 由何连芝陪同，到广州休养。

十二月十七日 在广州，获悉邓子恢于十二月十日不幸病逝，赋诗《挽邓子恢同志》：“崛起闽西有俊声，肯挑重担任批评。忠于革命忠于党，应是毛公好学生。”深切悼念。

是年 先后接见了罗马尼亚、英国、索马里、尼日利亚、伊朗、黎巴嫩、比利时、巴基斯坦、摩洛哥、马耳他、科威特、墨西哥、伊拉克、丹麦、加纳、叙利亚、荷兰各国驻我国大使，接受了他们递交的国书。

一九七三年 八十八岁

春 在广州休养。春节前，对广州市决定重新开放停开多年的广州花市，恢复人民群众的正常的春节文化活动，甚为欣喜，为之赋诗《一九七三年羊城重开花市》：“除夕在羊城，重临盛会新。四时花似锦，万众面皆春。锣鼓喧霄汉，云霞出海滨。南邻庆胜利，举酒送瘟神。”

三月五日 赋诗《八十晋八初度》：“八七年来事事新，添筹海幄总欢欣。国家治理逢尧舜，学说推行重马恩。万姓有权能作主，四民从业不忧贫。清诗一首今朝记，未易吾言颇自珍。”不日，书写此诗及《一九七三年羊城重开花市》赠聂菊荪夫妇，并同他们谈“文化大革命”等问题，对林彪等人利用“文化大革命”破坏党的种种阴谋，深表愤慨。

三月十日 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决定恢复邓小平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四月中旬 由何连芝陪同返北京。

四月十九日 和周恩来一起接待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前来我国进行正式访问。

六月二十一日 会见马里国家元首兼政府总理特拉奥雷。

七月五日 到北京柬埔寨国家元首府，迎接访问非洲、欧洲十一国后返北京的西哈努克亲王。

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 出席中国共产党在北京举行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会上，董必武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八月三十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董必武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九月十一日 在迎宾馆会见应邀前来我国进行正式访问的法国总统蓬皮杜。

九月二十五日 会见加拿大友好人士朗宁以及他的女儿和外孙女，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十二月十二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的建议，提议邓小平参加中央军委，任总参谋长。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发出关于邓小平参加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工作的通知。

是年 先后接见了马尔加什、扎伊尔、日本、希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奥地利、澳大利亚、乌干达、布隆迪、巴基斯坦、西班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保加利亚、卢旺达、新西兰、冰岛共和国、阿尔巴尼亚、塞内加尔、南斯拉夫和伊拉克驻华大使，接受了他们递交的国书。

一九七四年 八十九岁

二月二十六日 和周恩来一起，接待应邀来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

四月二十三日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身份，签署《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第二号附加议定书的批准书。

五月二十三日 在南宁休息。赋诗《冬泳亭》。

九月十七日 和周恩来一起，接待应邀来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和夫人。

十月四日 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十月二十一日 由何连芝等和北京医院牛福康大夫陪同，乘飞机离开北京到广州休养。

十月二十二日 下午，中共广东省委指示组织广州军区总医院、广东省人民医院大夫进行会诊，诊断患冠心病、肺气肿、糖尿病、气管炎，肠胃也不安适，三叉神经疼痛复发，体重减轻到五十三公斤。病情变化较大。

十二月初 由何连芝和牛福康大夫陪同，由广州乘飞机返京。

十二月十二日 北京肿瘤医院检查，发现肝脏有肿块，良性肿瘤还是恶性肿瘤，暂不能断定。

十二月 为中共广东佛山地委题“群言堂”三字的横幅。前此，已分别为国务院副总理王震、谷牧等几次题过“群言堂”三字的横

幅。

是年 先后接见了加蓬、土耳其、缅甸驻华大使，接受了他们递交的国书。

一九七五年 九十岁

一月五日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一月八日 接受瑞典王国新任驻华大使递交的国书。

一月八日至十日 出席中国共产党在北京举行的第十届二中全会。全会讨论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一月十三日至十七日 出席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被选为主席团常务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会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实际上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一月十六日 接受马来西亚首任驻华大使递交的国书。

一月二十八日 入北京医院治疗,此后每日体温在摄氏 37.3 度不降。

二月十七日 会诊,发现肝脏右侧原 1.5 公分硬块发展到 2 公分。北京医院及时报告中共中央。中央同意“不作过多检查,不要增添董老的精神负担,请中西医合作,设法控制病情”。是否转移到广州治疗休息,有关人员请示周恩来。周恩来指示:“飞机已经准备好了,不去广州怎么同董老说?还是先去,请广东省委对董老病情组织检查、护理和治疗,病情随时报告中央”。

二月十八日 下午一时十分，由何连芝和北京医院张慧芬、牛福康大夫陪同，从北京乘飞机抵达广州。二时三十分，广东省人民医院内科主任李培雄大夫检查病情，在肝脏右侧摸到鸡蛋大小的肿块，三时三十分，广东省委又组织广东省人民医院、广州军区总医院大夫进行会诊，听取张惠芬、牛福康大夫的病情介绍，进行研究，一致认为是肝脏病变，发展很快，肝脏肿块显著增大，肝癌可能性大。中共广东省委非常重视，立即从广州军区总医院、广东省人民医院抽调医务人员加强医疗小组，决定由王首道负责主持。

二月二十三日 中共广东省委指示：赶快向中央办公厅报告董老病情，地方医疗水平跟不上，建议中央急派医生来广州治疗。

二月二十四日 北京电话转达吴德所说：“接到广东省电报后，政治局准备开会。跟总理通过电话研究过。问何连芝同志能否回北京？”何连芝说：“董老发烧，不能走。董老自己摸到了肝部肿块，是否三月回北京？”同日，北京肿瘤医院吴桓兴院长从北京赶到广州，立即进行会诊。吴桓兴院长说：“在机场已知董老病情，可以基本肯定是肝癌。李富春同志去世时是肺心病，当时已有肝癌”。

二月二十五日 清晨，体温退到摄氏 37.1 度。晚，又升到摄氏 37.6 度。呼吸短促，咳嗽多，咯痰困难，痰呈浓性。二十六日，下午，广州、北京大夫又作了深入讨论，一致认为：按临床诊断，肝癌可以肯定，手术、化疗、注射等治疗都不适宜了。并讨论了应变措施。晚餐后，又呕吐，咳嗽增加，痰的脓度又增加。精神、体力衰弱。专家研究了突然变化，作应急准备。二十七日，咳嗽增多，脓性痰多，白血球上升一万五千。下午，又进行了中西医会诊，由王首道主持讨论。二十八日，咳嗽加急，出现阵发性，体力差、体温、呼吸、脉搏未见好转。到三月三日，饮食困难。会诊。晚，北京电话传中共中央

通知：“要董老在三月六日回北京医疗。”何连芝说：“等三月五日过了生日，再跟董老讲回北京治疗。”

三月五日 在广州病中过九十岁生日，卧床写《九十初度》七言律诗一首：“九十光阴瞬息过，吾生多难感磋跎。五朝敝政皆亲历，一代新规要渐磨。彻底革心兼革面，随人治岭与治河。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写毕，又向家人作了说明。

△ 中央卫生部王树哲副部长向董必武说明中央希望他回北京治疗的意见，“食欲减退，肝脏有些问题，应回北京治疗”。周恩来在病中也拨来电话：“董老病情，可以跟他讲清楚，他是会正确对待的。”

三月六日 由何连芝和北京医院张惠芬、牛福康大夫等陪同，乘飞机回北京，当即入北京医院治疗。

四月二日 晨六时，询问守候在身边的良羽：“几点钟了？”良羽答：“六点钟了。”随后发现痰多，排不出来，经抢救无效，于七时五十八分与世长辞。

四月三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发表讣告，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董必武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一九七五年四月二日七时五十八分在北京逝世，终年九十岁。”赞颂董必武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为党为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衷心爱戴。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董必武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质，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 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宋庆龄、陈云、叶剑英、邓小平、刘伯承、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韦国清、许世友、陈锡联、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阿

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王震、余秋里、谷牧、沈雁冰、江华等五十人组成“董必武同志治丧委员会。”

四月六日 首都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学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八千多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隆重吊唁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前往吊唁的，还有许多国家共产党在北京的代表、各国驻中国的外交使节和国际友人。之前，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等柬埔寨客人，参加了向董必武遗体告别的仪式，向在场的我国领导人和董必武的家属表示沉痛的哀悼和亲切的慰问。

四月七日 下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董必武同志追悼大会”。全国各地下半旗志哀。会场安放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等中央各部门、中共湖北省委员会所献的花圈。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宋庆龄、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刘伯承、韦国清、许世友、李先念、陈锡联、李德生、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谭震林、李井泉、胡厥文等献了花圈。参加追悼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叶剑英、邓小平、朱德、陈云、陈锡联、苏振华、倪志福、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王震、余秋里、谷牧、沈雁冰、江华等，还有在北京的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人大常委、政协常委，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北京市和湖北省方面的负责人，董必武生前友好，医护人员，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北京市群众两千多人。参加追悼会的党和国

家领导人向董必武的夫人柯连芝及子女表示亲切慰问。在追悼会上,叶剑英致悼词,沉痛悼念董必武。悼词赞颂董必武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始终不渝。六十多年如一日,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对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对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夺取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号召全党同志:学习董必武的崇高的革命品质和坚定的无产阶级党性,坚持党的原则,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同一切违反党的利益的行为作不懈的斗争。学习董必武一生坚持无产阶级的优良作风,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坚决反对一切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学习董必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革命事业,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兢兢业业,勤勤恳恳,鞠躬尽瘁。“董必武同志真正做到了一辈子做好事,不愧为无限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后 记

《董必武年谱》从一九七八年开始编纂，在初稿的基础上于一九八二年修改为送审稿。此后，又进一步多方面搜集资料，广泛征求意见，进行了多次补充、修改和订正，于一九九零年九月完稿。

本年谱以党和国家的档案和谱主公开发表的文章、报告、讲话、信件和手稿为主要依据；参考并采用了少量经考证属实的回忆材料。年谱主要按年、月、日顺序逐条记事；为说明某些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有些则采用了纪事本末的方式撰写。为反映谱主一生革命事迹与中国革命、世界革命的关系，适当反映了某些重要的国际、国内背景材料，按时间顺序排列在文中。对同一时间有多条内容的，在第一条开头写明时间，从第二条起用“△”表示与第一条时间相同。

本年谱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指导下编纂，经李琦、力平同志审阅核定。杨瑞广同志在校审中，提供了重要档案资料，作了重大的修改和补充，给予了许多具体帮助。

中央档案馆、湖北省博物馆、南京市档案馆、上海市图书馆和档案馆、重庆市档案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档案室以及南京梅园新村纪念馆、重庆红岩纪念馆和中央有关部门先后提供了大量档案，许多老同志提供了重要资料。

啟功教授热情为本年谱题签。

本书由聂菊荪、吴大羽主编，马鸿儒、刘廷晓为副主编。

一九八二年后分段修改、编写人员：

一八八六年至一九三七年六月 刘廷晓

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九年九月 马鸿儒

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四年 刘廷晓

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七五年 聂菊荪

一九八二年前参加搜集资料、编写初稿、送审稿和部分工作的有(以姓氏笔划为序)：马鸿儒、牛立志、刘廷晓、齐树润、吕文斌、苏鸿章、张永远、林琼、曹为、谭玉轩。董良羽参加了搜集资料和初稿、送审稿的讨论，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由于编者的水平所限，如有疏漏和不当之处，深望读者批评指正。